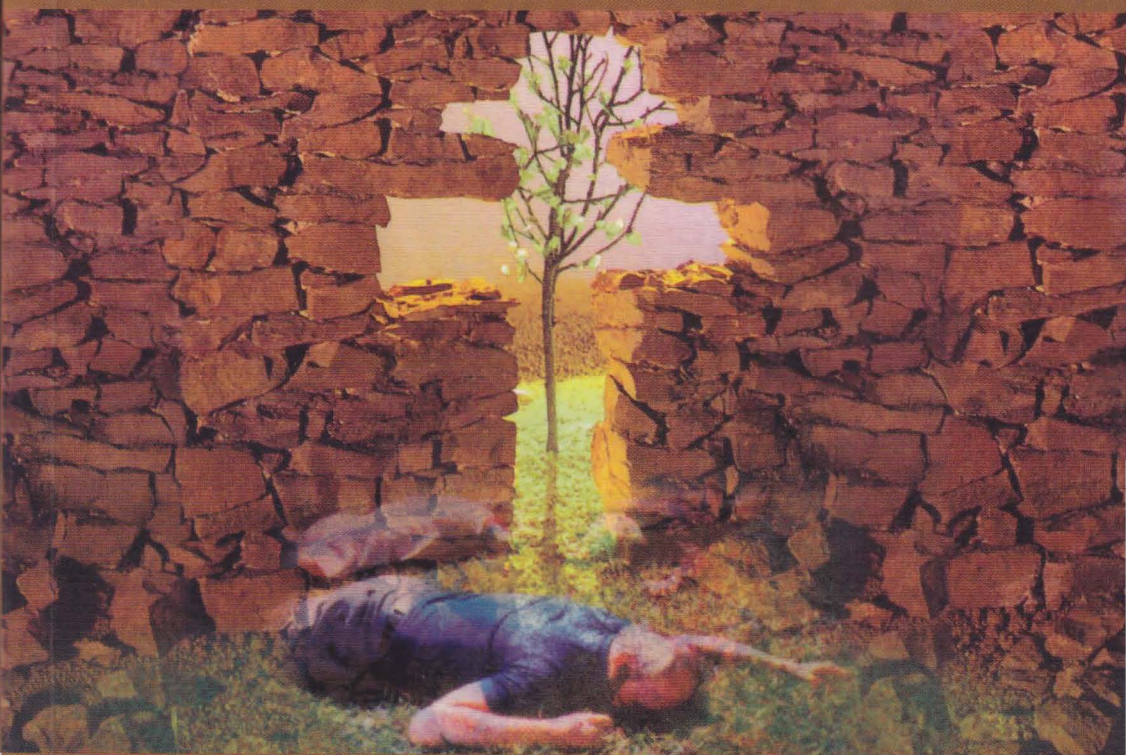


基督的僕人IV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第二春
(西元1814年至現在)



依納西·艾坎立 著
譚 璧 輝 譯

基督的僕人IV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第二春
(西元1814年至現在)



依納西·艾坎立 著
譚 璧 輝 譯

Passion and Glory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IV

Second Spring 1814-1999

By Ignacio Echániz, S.J.

Translated by Cecilia Tan

Copyright © 1999 by Ignacio Echániz, S.J. Borgo S. Spirito 4, 00195 Rome

Published by X. Diaz del Rio, S.J.,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P. BOX 70, ANAND, GUJARAT, 388 001,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第二春

「他在這裡，他已復活」 010

I. 風暴世紀

1. 掌舵者：

羅堂 (Jan Philip Roothaan, 1785-1853) 015

2. 一個在中東的波蘭人：

馬克西米連·萊洛 (Maksymilian Ryllo, 1802-1848) 030

3. 洛磯山脈中的法蘭德斯人：

伯鐸·若望·司麥特 (Pierre-Jean De Smet, 1801-1873) 037

4. 被七個國家驅逐：

方濟·羅曼 (Fracisco José de San Román, 1811-1886) 056

5. 耶穌會士及詩人：

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068

6. 焦達納格布爾的使徒：

康斯坦·利芬斯 (Constant Lievens, 1856-1893) 077

7. 與馬拉加西人同在馬達加斯加島：

雅格·貝爾休 (Jacques Berthieu, 1838-1896) 089

8. 落入中國義和團之手：

任德芬 (Léon-Ignace Mangin, 1857-1900)
湯愛玲 (Paul Denn, 1847-1900)
趙席珍 (Rémi Isoré, 1852-1900)
路懋德 (Modeste Andlauer, 1847-1900) 096

II. 團結穩固與繁榮滋長

| | | |
|---|--|-----|
| 1. 傳教士： | | |
| 方濟·泰利 (Francisco Tarín, 1847-1910) | | 105 |
| 2. 怒氣填膺的耶穌會士： | | |
| 米格爾·米爾 (Miguel Mir, 1841-1912) | | 118 |
| 3. 隨軍神父： | | |
| 威廉·多伊爾 (William Doyle, 1873-1917) | | 123 |
| 4. 兩位應門修士： | | |
| 方濟·賈瑞 (Francisco Gárate, 1857-1929) | | 135 |
| 若瑟·菲格羅 (José Marcos Figueroa, 1865-1942) | | 145 |
| 5. 一名例外的申請者： | | |
| 伊士凡·卡士薩 (István Kaszap, 1916-1935) | | 151 |
| 6. 基督君王的殉道者： | | |
| 彌格·思定·蒲羅 (Miguel Agustín Pro, 1891-1927) | | 158 |
| 7. 兩位納粹主義的反對者： | | |
| 魯伯·馬業 (Rupert Mayer, 1876-1945) | | 166 |
| 阿爾弗雷德·德爾普 (Alfred Delp, 1907-1945) | | 179 |
| 8. 兩名共產黨的囚犯： | | |
| 沃爾特·西斯季克 (Walter Ciszek, 1904-1984) | | 185 |
| 安東·魯里 (Anton Luli, 1910-1998) | | 199 |
| 9. 兩位城市使徒： | | |
| 若瑟·馬利亞·盧比奧 (José M. Rubio, 1864-1929) | | 206 |
| 亞爾伯·伍達道 (Alberto Hurtado, 1901-1952) | | 215 |
| III. 大公會議的挑戰 | | |
| 1. 最後的布道家： | | |
| 雷卡多·隆巴第 (Riccardo Lombardi, 1908-1979) | | 231 |
| 2. 酒精中毒的基督吟唱詩人： | | |
| 艾梅·杜瓦爾 (Aimé Duval, 1918-1984) | | 240 |
| 3. 法國的記事板： | | |
| 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 | 248 |
| 亨利·盧巴克 (Henri de Lubac, 1896-1991) | | 259 |

4. 德國的巨人：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1904-1984) 268
5. 在羅馬的美國人：
 若望·柯特尼·墨瑞 (John Courtney Murray, 1904-1967) 276
6. 大公主義的樞機主教：
 奧斯定·貝亞 (Augustin Bea, 1881-1968) 283

IV 福傳傳統

1. 在馬達加斯加癲瘋病院中的耶穌會士：
 詹·貝澤 (Jan Beyzym, 1850-1912) 294
2. 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
 湯瑪士·埃斯特本 (Tomás Esteban, 1879-1934) 301
3. 春秋之士：
 若金·維拉隆加 (Joaquim Vilallonga, 1868-1963) 309
4. 在馬拉巴爾 (Malabar) 的稻田裡：
 伯鐸·卡洛尼 (Pietro Caironi, 1904-1966) 316
5. 在天寒地凍的阿拉斯加傳教：
 塞甘鐸·勞倫特 (Segundo Llorente, 1906-1989) 325
6. 與日本人在一起：
 雨果·愛宮真備·拉薩爾
 (Hugo M. Enomiya Lassalle, 1898-1990) 332

後 記

- 雅魯培神父與殉道弟兄
 1965-1999 342
1. 伯鐸·雅魯培 (Pedro Arrupe) 的苦路 345
2. 在拉丁美洲集權主義之下：
 魯提利歐·格蘭德 (Rutilio Grande, 1928-1977) 357
 依納爵·埃拉庫里亞 (Ignacio Ellacuría, 1930-1989)
 阿曼多·洛佩茲 (Amando López, 1936-1989)
 霍金·洛佩茲 (Joaquín López, 1918-1989)
 依納爵·馬丁·巴魯 (Ignacio Martín Baró, 1942-1989)

| | |
|---|-----|
| 塞貢多·蒙特斯 (Segundo Montes, 1933-1989) | |
| 若望·拉蒙·莫雷諾 (Juan Ramón Moreno, 1933-1989) | 363 |
| 路易斯·埃斯皮諾 (Lluís Espinal, 1932-1980) | 369 |
| 若望·鮑思高·伯尼爾 (João Bosco Burnier, 1917-1976) | 374 |
| 文生·卡那斯 (Vicente Cañas, 1939-1987) | 379 |
| 3. 置身於炎熱的非洲： | |
| 若望·德烏斯·坎德薩 (João de Deus Gonçalves Kamedza, 1930-1985) | |
| 斯維歐·艾維斯·莫雷拉 (Sílvio Alves Moreira, 1941-1985) | 382 |
| 多福·木齊赫瓦主教 (Christophe Munzihirwa, 1926-1996) | 385 |
| 4. 與印度受壓迫的人在一起： | |
| 安錢尼可·多瑪斯 (Anchanikal T. Thomas, 1951-1997) | 389 |
| 5. 置身於柬埔寨戰爭的受害者之中： | |
| 理查·弗南多 (Richard Fernando, 1970-1996) | 391 |
| 6. 與東帝汶的無辜者一同犧牲： | |
| 塔希修斯·迪萬托 (Tarcisius Dewanto, 1965-1999) | |
| 卡爾·阿爾布萊希特 (Karl Albrecht, 1929-1999) | 395 |

基督的僕人IV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第二春
(西元1814年至現在)



第二春

1814—現在

「他在這裡，他已復活」

「他不在這裡，他已復活了。」耶穌的遺體不見了，這句話證明他已經復活了。

然而「他在這裡，他已復活。」這句話可用來說明解除禁令後的耶穌會的情形。耶穌身體的臨在隱含著這個修會已出死入生，獲得新生命，會士們盡全力要保存耶穌會原有的風貌。

歷史學家認為耶穌會的優點及弱點都在其復興之後呈現出來。緊抓過去，未能適應時代，是它的弱點。在耶穌會被壓制之前，忠於依納爵的精神能使人少拘泥文字，而多一些創造力，即使在受到壓制的時期，藉著採取一些合乎依納爵的直觀的方式，保存耶穌會的實質精神，這也是梵二大公會議時對所有修會所提出的要求。

然而，將古老的耶穌會傳統放置在現代能產生一股新力量，它使修會在精神上、外貌上、組織上、地區發展上，呈現新舊並存的對立情況。例如，會院的團體生活對耶穌會士有什麼影響嗎？他們都是偉大的使徒，懷著慷慨的心及前輩們的勇氣，遠渡重洋，走向天涯海角。他們的典範及勳業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使得在 1814 年的寥寥幾人增加到 1965 年的三萬六千人。

現在呢？一個半世紀後的耶穌會，為了響應大公會議對各修會的呼籲，適應時代，保存原有精神，他們打破傳統，從事前人未曾做過的工作，在忠於創會神恩的精神之下，答覆使徒工作的新挑戰。耶穌會以誠實又徹底的方式，改變了他們傳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不倫不類。

「他在這裡，他已復活」

有什麼成功之處嗎？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能以簡略或從單方面來回答，我建議由實例而非從文件來了解，但是要承認事件中所包含的複雜性。



I.

風暴世紀

「耶穌會像一隻被風浪襲擊的小船，夜幕籠罩，一片黑暗。讓我們努力向前划，因為黎明在望。」、「呈現在你面前的是被罪惡所折磨及傷害的我們。」

上段話是出自兩位總會長，他們的事蹟延續了大半個十九世紀（共五十八年）。羅堂（Roothaan, 1829-1853）於 1831 年的信中寫到耶穌會所受到的迫害，以及 貝希克斯（Beckx, 1853-1887）在 1872 年撰寫了奉獻耶穌會於耶穌聖心的禱文，會士們每月首星期五都誦唸這段禱文，這種傳統延續到 1972 年才終止。這便是他們眼中復興之後的耶穌會：一隻航行在海上、飽受風浪襲擊的小船。

其實，假如以橫掃全歐的政治風暴來區分十九世紀，則耶穌會士無論走到何處，總在他們設立定點後不久，就被驅逐出境，難怪他們總是看事情的陰暗面，一切都不像春回大地，反而是酷寒嚴冬。

這種消極看法阻礙了交談、合作，他們以容忍或攻擊的方法對付敵人。

雖然有這些限度，但是重建工作卻進行順利；被歐洲驅逐的耶穌會士，漂洋過海，去到召喚他們的國家，與古老的耶穌會時代相比，十九世紀是發展福傳工作的時代。

1. 掌舵者： 羅堂

(Jan Philip Roothaan, 1785-1853)

出師不利

我們初次遇見羅堂時，他還是波洛茨克（Polotsk）的初學修士及神學生，1816 年成為奧沙（Orsza）大學的年輕教授。1820 年 5 月 30 日，在離開阿姆斯特丹進入耶穌會後的第十六年，他與其他十五位修士一起被俄國沙皇驅逐出境。

歐洲戰火平息後，他門來到費拉拉（Ferrara）再轉波隆那，羅堂在那裡接受第一個俄國境外的派令，即是前往瑞士辛普倫（Simplon）山下寧靜的比瑞（Brig）小鎮，在那兒滾滾隆河（River Rhone）奔騰而過，流入地中海。

布爾佐佐斯基（Brzozowski）總會長有意進駐羅馬，為能管理耶穌會，他尋求沙皇的准許，但卻遭到拒絕，因此他被迫留在波洛茨克直到 1820 年 2 月 5 日去世之時。

這段隔離期對日後的繼任者產生嚴重的後果。代理會長佩崔西（Mariano Petrucci）於 1820 年 9 月 14 日召集會議，但是以西西里人路易·瑞吉（Luigi Rezzi）為首的一羣會士，運用拖延戰術控制選票，並修改會憲。他們質疑在俄國所發的願的有效性，瑞吉極狡猾的使佩崔西倒向他這邊。在十八位與會代表的支持下，羅沙文（Jean de Rozaven）向下令召開會議並認可在俄羅斯所發誓願之有效性的教宗碧岳七世求助，一切疑慮因此而消除。10 月 18 日佛迪斯（Luigi Fortis）當選為總會長，瑞吉則被開除會

籍。

克服了首次的障礙之後，他們最關心的事就是修會是否能繼續下去。當許多程序上的事獲得澄清之後，耶穌會原有的法條、規章及習慣，如在飯廳中所作的補贖，都仍然有效，並且繼續實行，一成不變，只有視環境所需，才有例外。

比瑞—杜林—羅馬

三個城市，三種職務，三段由下擢升到最高職位的過程：三十五歲時在比瑞擔任三年修辭學教授（1820-1823），擔任杜林（Turin）一所大學宿舍的總監共六年（1823-1829），其間有三個月同時擔任義大利省的副省會長（1829年3月至6月），四十四歲時當選總會長。

羅堂無暇欣賞瑞士的湖光山色，他除了是一位傑出的教師之外，在講道、聽告解及牧靈工作上也是一位成功的牧者，他能說流利的波蘭文、法文和德文。

他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即是，耶穌會的訓練並沒有抹殺他對親戚朋友的感情。在比瑞的三年中，當地省會長多次帶他前往阿姆斯特丹拜訪友人，當他置身他們中間時，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親友之情。對他而言，這真是一大發現，他回來之後寫道：「十七年前的最後告別情景，至今仍令我感動不已，其實，當時我是含淚而別的。」

他在杜林的工作更困難，即是重開一所在國王保護下及大臣監督下極負盛名的大學宿舍。因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而在杜林引起的動亂及學生暴動很快得以平息後，這所著名大學於1823年秋季重新招生，國王邀請耶穌會士管理該校宿舍。他們將一棟坐落在城市中心，面對最美麗街道的昔日修院改裝為大學宿舍。總會

長佛迪斯神父派羅堂接下這項新職務，因此，這位昔日精通文學的比瑞鎮教授，現在要用結巴的義大利文和木匠、泥水匠打交道，著手整修工程。1823年7月，他越過阿爾卑斯山來到杜林，10月，嶄新的大學宿舍開啟大門迎接第一批三十名學生，不久，學生人數便上升到二百人。

羅堂的工作無往不利，他慈祥、謙恭但卻堅守原則，他的行政管理是無懈可擊的，他在各方面的才華，使人不懷疑日後他能坐上總會長的職位。有一位喜愛歌劇的學生想要去觀賞羅西尼的歌劇，這是學校所不允許的，羅堂也拒絕給予許可，但是，由於學生一再請求，令人驚訝的是，他最後還是破例地予以准許，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他為這位聽完歌劇後晚歸的學生等門，並為他準備晚餐。

總會長佛迪斯神父於1829年1月27日逝世，他曾指派帕凡尼（Vincenzo Pavani）為義大利省會長及代理總會長，帕凡尼任命羅堂為義大利代理省會長，直到他被選為總會長——登上最高職務的第三階段——為止。

當選總會長

6月30日召開修會大會，有二十八位選舉人參加，7月9日選舉總會長。前三次投票結果是羅堂與另一名法籍參贊羅沙文（Rozaven）同票，年輕的羅堂在耶穌會裡本是一名默默無聞的會士，只因為他是義大利代理省會長，才有機會出席大會。

第四次投票具有決定性，羅堂獲得多數票，當選為自阿奎維瓦（Acquaviva）以來最年輕的總會長。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雙手放在膝蓋上，低著頭，臉色蒼白，沉默不語，神情憂慮。其他二十七位神父以傳統方式前來親吻他的雙手，表示尊敬和接受。

他抬起頭來，感謝他們對他的信任，把如此重擔放在他年輕的肩膀上。

根據他的夥伴及散文家基頓（Van Geugten）的描述：「羅堂並非一位行動者或一位能以一種眼神、一個手勢、一句話就能帶動別人的天生領袖。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一種努力、一種犧牲，是踏出他內心世界的一步。這並不是說他沒有能力負起責任，他清醒的頭腦、堅忍、智慧與謹慎、圓融與人性化，加上他全心追尋天主的光榮，使他成為同會弟兄效忠及敬愛的領袖與會長。他驚人的行動力並非來自本性的力量，而是出自他對天主的愛，出自他對基督和教會的熱誠。」

羅堂的風格

這位荷蘭籍的總會長已準備就緒將大會的決議案付諸實行。很明顯的，他不能抹去自己過去所受的訓練及一些日積月累所形成的觀念。他在俄國的耶穌會接受培育，未受那些震撼歐洲大陸思潮的影響，憎恨那些來自法國的新奇事務（並非所有的都是邪惡的），而向自由主義和現代靠攏。他屬於俄國時代的耶穌會士，他們人數眾多，分布在歐洲各地，並且塑造了十九世紀耶穌會的形象，被稱為「羅堂的風格」，其核心是使重生的耶穌會不愧對那令人尊敬的古老傳統，在新與舊之間沒有任何中斷，卻有絕對的連續性。

這種風格表現在羅堂對大會要求的修士讀書計畫所作的修訂上，他只充當「整形手術」的角色，卻未按照時代的要求作徹底的修訂。「他並沒有如同依納爵適應了十六世紀的需要般地隨著十九世紀的潮流起舞」（佩伯格，Padberg）。他與他的幕僚在接受早已由修會制定的修士讀書計畫時，未能搶救傳統耶穌會教育

方法的精髓。

除了執行大會賦予他的總會長職務之外，他的一項重要創舉便是將自己的反省以書信方式寫給全修會，他的信件內容有：愛修會及其機構（1830）、修會所受的迫害（1831）、使命（1833）、神操（1834）。

迫害與放逐

教宗碧岳七世撤銷禁令使耶穌會重新立足於教會內，因為他倚靠這些「勇敢的船夫」來掌握被風浪襲擊的伯鐸小船。耶穌會士沒有使人失望；而醜化這些會士們的古老故事卻被加油添醋地流傳著，第一顆子彈已上膛，瞄準他們，準備射擊。

1816年他們返回西班牙，1820年被驅逐，二十五人遭到暗殺。他們又回去，但是1835年被控告帶來霍亂而再度遭到驅逐，他們在馬德里的學校遭到攻擊，四位會士被殺。1840年他們又被驅逐，唯有1851年的協定才給予他們在這個國家的合法居留權。

他們在法國的情況也沒有比較好。從開始，法國政府便不允許他們教書。每一位教師必須簽署一份聲明，表明自己不屬於如耶穌會這類非權威性的教育機構。在1828年的9月，沒有任何一位耶穌會士能進入教室。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教堂、修女院遭到暴民的攻擊，耶穌會在巴黎的初學院與會院也陷入「耶穌會士去死」的喊叫聲中，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城市。讀書修士遷移到其他國家（義大利、西班牙、瑞士），直到情況好轉才回國。

荷蘭與比利時在威廉一世的統治下兩國合併，他們不准許耶穌會士在兩國境內自由行動，在德斯泰柏格（Destelberghe）地區的初學院於1816年解散，先前住在主教寓所內的會士也在1818

年遭到強制驅逐，學校關閉、公開的福傳工作及帶領避靜都被禁止。

在義大利境內沒有一處准許他們自由自在地生活，一次的革命就是一次的驅逐。當時的政治領袖加富爾（Cavour）、馬志尼（Mazzini）、加里玻底（Garibaldi）以耶穌會士為攻擊對象。加富爾宣稱將青年的教育交託在他們手中真是倒楣；而馬志尼退休後住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中，每次當他看見一隻烏鴉時，他就想起耶穌會士。

福傳工作的開展

耶穌會的本質是從事福傳工作的修會，在被禁止活動之前，他們不得不接受委託給他們的福傳工作。福傳工作在羅堂的任期內留下了重要的一章。他開啟了福傳工作的閘門，保證福傳工作如河水般的順暢，他將福傳推廣到全世界，卻沒有忽略每個地區的特色與困難；他一方面順從教宗的指導，一方面也對他的弟兄在傳教地區所遇到的困難提出正確的報告；他驚人的記憶力使他不僅能常常以他們的語言與他們溝通，並且能傾聽他們，鼓勵他們。俯身查看他在羅馬房間內傳教區的地圖，他是十九世紀中最偉大的傳教士之一。

1833年12月3日，他簽署了偉大的福傳文件；早在1830年，他已經派遣首批五名傳教士前往希臘土耳其邊境，1833年，他接受美國西部密蘇里州在印第安人中的福傳工作。然後他陸續開闢了以下的傳教地區：加爾各答（1834）、阿根廷（1836）、馬杜雷（1837）、黎巴嫩（1839）、阿爾巴尼亞（1840）、阿爾及利亞（1840）、烏拉圭（1841）、加拿大（1842）、中國（1842）、巴西（1842）、瓜地馬拉（1843）、巴拉圭

(1843)、留尼旺島和馬達加斯加(1844)、哥倫比亞(1846)、孟買(1853)。當我們再看下去時，看到他授權他的波蘭友人雷洛(Ryllo)神父前往尼羅河，由於他手邊的資料不足，而未能於在非洲建立完整的福傳基地。

羅堂仍擔任傳教工作的指導者，直到新建立的省區能掌管委託給他們的福傳工作，即使各個省區正式負起責任之後，他對傳教區的興趣並未減少，他與傳信部及自己建立的傳教區繼續保持聯繫。

雖然在有些方面他顯得心胸狹隘，但是，有關福傳的方法上，他卻十分開放，他忠實遵守耶穌會的傳統。例如，在阿爾及利亞他支持融合當地文化的基督徒祈禱方式，它與印度祈禱方式相對應。

神操

羅堂是耶穌會福傳工作的恢復者，也是依納爵神操的重整者。他看出神操是耶穌會靈修的根源。從他擔任總會長職務起，便擔心耶穌會的快速發展可能使會士在靈修上的扎根深度不夠。早在 1829 年，總會長任內第一次作個人神操時，他就計畫以書信方式向全修會闡述這主題。經過五年的準備，1834 年 12 月 27 日，他發出了這封信。

信的內容是要求會士回到依納爵神操的根源並研讀這本小書，第二年，他以古典拉丁文出版了神操通俗修訂本，該通俗本於 1548 年審核獲准。

他並不因此而滿足，為了要了解神操的原文版本，他學習西班牙文，並以簡單的拉丁文將它逐字逐句譯出。雖然他只能用星期日的晚上做這件工作，但是他卻在 1835 年完成翻譯，並且是

拉丁文與西班牙文通俗本對照。三年內共出了三版，1853年他逝世時，第五版已準備出版了。他推動西班牙文版本，也鼓勵將神操翻譯為其他文字。他最心愛的禮物就是依納爵的這本小書。

他在信中寫道：「我深信任何人讀了聖依納爵的神操並注意他的用字遣辭後，常常會有新發現。我已經讀了三十年，而在最近一次避靜中，我仍收穫良多。」

羅堂被稱為神操總會長。「除了聖依納爵外，或許沒有任何一人像他一樣對神操有如此正確的了解並付諸實行。這或許說明了他得到『耶穌會第二會祖』榮銜的原因」（里格薩，Ligthart）。

暴風雨

動亂起於法國，然後就演變為橫掃義大利及羅馬的暴風雨。發生在法國一連串的革命、重建、共和及君主立憲，即導致1830年所謂「七月君主立憲」的革命，這些都引爆了1848年的革命。在這時期內，耶穌會成為反宗教運動的眾矢之的，情況慘烈，暴動頻傳，有人勸告他們為了自身的安全不要再作自我犧牲。

這是一個陷阱，幸好他們沒有掉進去。羅西（Pellegrino Rossi, 1787-1848），這位出生於義大利的天生陰謀家，他曾逃往瑞士，日後定居巴黎，並獲得法國國籍，又被任命為法國駐教廷大使，他設法在羅馬散播這種觀念。在1845年6月13日的樞機主教會議上，教宗國瑞十六世立刻拒絕這種威脅，也讓羅堂知道他不曾為了教會的益處而要求耶穌會讓步。他無意要解散耶穌會，而是要他們保持低調，減少出現在人前的機會。

7月6日當羅堂正要服從教宗的命令時，法國政府宣布，耶穌會已同意自行解散，這消息引起法國耶穌會士的驚恐不安。經過協商之後決定，在最嚴格的法律限制下，修會保持現狀。

教宗國瑞十六世任期內（1831-1846）未能在法國達到的，卻於碧岳九世（1846-1878）任期內在羅馬完成。誠如多數人所觀察到的，假如前者是一位強勢保守的教宗，後者便是開創義大利統一局面的教宗，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街道上開始響起「碧岳九世萬歲」的呼聲。

羅堂與國瑞相處融洽，與碧岳的配合卻出現困難。碧岳九世從上任後便作了一些讓步，但是對 1864 年的禁書目錄（八十本「主要當代錯誤」書目）卻不讓步。

在義大利，尤其在羅馬興起了一種誹謗性的運動，即是控告耶穌會士反對國家主義的理想，而認同教宗的至高性，使羅馬變成歐洲保守主義的城堡。街道上的公開示威及污辱成為每日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

散播毒素

此時，在羅馬出現了破壞教宗碧岳九世與耶穌會的關係的詭計，這不是一件難事，因為在梵蒂岡有一股強大的反耶穌會勢力。教宗的告解神師文都拉（Ventura）認為一本由吉歐伯帝（Gioberti）所寫在三個世紀裡反對耶穌會士的文件〈現代耶穌會士〉（*Il gesuita moderno*）是按天主的靈感所寫成的。

1847 年由桂特諾（Crétinau-Joly）出版的《克勉十四和耶穌會士》（*Clement XIV et les Jésuites*）散播了更多的毒素。碧岳九世的幕僚將作者暗示克勉十四世心懷詭詐的內容唸給他聽，並責怪耶穌會出版這本書。事實是他們也無力阻止傷害的蔓延。

這類的毒素能引起極大的傷害，首先，有人開始說耶穌會士不服從教宗，於是教宗又想要解散這個修會；後來，有一位自稱是朋友的人常常拜訪羅堂，並告訴他一些有關教宗對耶穌會士不

滿的「機密資訊」。羅堂注意到他被排拒接近教宗，即使他參加教宗正式接見信眾的聚會時，與教宗談話的機會也被剝奪。與教宗之間的緊張情形使他病倒。

耶穌會與教宗之間的危機是 1847 年修會代表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大會提出一份效忠教宗的文件，並呈給教宗。這是一份草案，不須簽名，也不必由羅堂呈遞，因為據說總會長仍不被允許晉見教宗。當教宗碧岳九世讀這份文件時，他親切的說：

「哦！這是多餘的；我知道耶穌會對教會的熱愛。」

事情並非完全如此。當撒丁尼亞國王的特使吉拉迪（Ghilardi）與教宗談到耶穌會時，教宗仍然表達對羅堂的不滿，因為有些耶穌會神父批評教宗的處事方法。吉拉迪支持總會長，他建議教宗接見他並給他一個為自己說明的機會。1848 年 1 月，與教宗會談之前，羅堂在寫給教宗的信中提到「同樣詭詐的控告者」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控訴他，而他也一再強調「我們對教宗完全的服從。」

信件發出之後，隨即便是教宗的接見。雖然教宗極為和善，但是他卻不斷抱怨某些耶穌會神父對他不夠服從。從教宗的談話中，羅堂知道，教宗所說的並非出自他個人的資訊，而是來自謠言，他說：

「對不起，恕我直言，您所說的一切並不是出自您的資訊，而是別人告訴您的。」

教宗微笑的說：「我可以說出控訴者的名字。」羅堂說：「在每一次的控訴中我都問相同的問題：『發生什麼事？誰做的？發生在何處？』但是總得不到答案，我不需要猜誰是謠言製造者，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放逐

對耶穌會的控訴仍然四處流傳，諸如：耶穌會士不支持義大利人民的民族願望；再者，有人捏造他們支持奧國占領部分土地，組成「奧耶黨」，因此，針對奧國所發起的「聖戰」也含有對耶穌會的仇恨。

首先在皮德蒙特（Piedmont）、威尼斯，然後在那不勒斯及西西里，耶穌會士受到迫害，被趕出會院。在羅馬，這種暴力也逐漸升高。1848年嘉年華會的慶祝期內，有一列詠唱〈為亡者祈禱經文〉的送葬隊伍，抬著一口棺材，上面放著「已故耶穌會」的布條。在3月下旬，耶穌會在羅馬最著名的兩個聚點：羅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以及耶穌（Gesù）會院的神父們，無論在會院或冒險外出都不斷受到騷擾。

3月13日上午，省會長肯比（Cambi）神父晉見教宗（不是羅堂，以避免引起教宗身邊人員的反感），目的在澄清教宗希望耶穌會士自動離開羅馬大學及耶穌會院的謠言，答案是堅定的「沒有」。

謠言愈來愈多，不久之後，謠言又傳說教宗對耶穌會士不悅，並希望他們自行離開，或至少向他請求離開的許可。羅堂不知如何是好，3月13日，他透過第三者詢問得知，謠言屬實，教宗認為他們離開羅馬大學已勢在必行，但是，他要羅堂寫一封信表明耶穌會的立場。

總會長遵命照辦，並且宣布他和修會已準備服從教宗的命令，但是，他不相信他們自行離開或請求當局准許他們如此做的時間已經到來，他提出他的理由。

教宗碧岳九世在3月20日星期一收到羅堂的信，但是沒有

任何回答。在此同時情況持續惡化，有些羅馬大學的教授接受脫離教會的邀請，有些感到惶恐不安，並發覺很難再在那種情況下繼續任教。有一天，當一羣暴民聚集在耶穌會院前時，情勢更嚴重了，他們聽見一個威脅的聲音說：

「明天你們都得走，否則我們要放火燒房子。」

事情似乎就這樣定了。3月28日下午，一位樞機主教帶著教宗的信來見羅堂，教宗的結論是他無法再保證耶穌會士的安全。他沒有下命令；他讓他們做最謹慎的決定，以便阻止一場流血衝突，例如悄悄的離開，亦即彼此所了解的暫時離開。

羅堂當樞機主教的面將這訊息重複告知他的諮議會。經過簡短的討論後，他們決定請求教宗指派一位可信任的人看管耶穌會的會院；會士們將在幾天內悄悄離去。

樞機主教將他們的請求稟告教宗，數小時後回來告訴神父們教宗的准許。諮議們建議羅堂先走，於是他在1848年3月29日下午，與他的告解神師維勒佛特（François de Villefort）及崔高斯修士（Br Trigou）一同乘坐一名英國友人的馬車離開羅馬。

風暴

4月1日，星期六下午，三人在席威塔維琪雅（Civitavecchia）搭乘一艘撒丁尼亞的輪船，有三十名德國大學的神學生也在同一艘船上，雖然羅堂為了避人耳目而戴上一頂黑色假髮，但是仍被他們視破。總之，他在船上的消息已為在利佛諾（Livorno）下船的乘客所知，有人對這位「耶穌會的暴君」發出吼聲。他在熱那亞所受到的對待也並未更友善。

4月5日，這艘輪船將乘客平安送達馬賽港（Marseilles），羅堂暫時將總會辦公室設置在此地。

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恢復與羅馬的聯繫。他的忠實友人的費道明（Domenico Fioramonti）蒙席能隨時接近教宗，成為他的聯絡人。教宗碧岳九世所遭到的災難便是他拒絕向奧國宣戰，因而遭到放逐。在流亡期間，他對羅堂及耶穌會士更感親近。

另一個因素有助消除雙方的誤會，即是在 1849 年 1 月，一位那不勒斯的耶穌會士科爾西（Carlo Curci）出版一本反駁吉歐伯帝觀點的書，他證明該作者所看到的耶穌會與教會之間的不合，是作者自己對教會及傳統教會學的觀念，這本書對教宗及樞機主教們影響很深。

加強弟兄們的信心

羅堂最大的心願便是探訪在法國及鄰近國家的耶穌會士。

情況吃緊，在過去八個月裡已有八個省遭到解散，即是：羅馬、那不勒斯、西西里、杜林、威尼斯、奧國、匈牙利及加利西亞（波蘭西部），接著便是西班牙、葡萄牙及瑞士。八個會院已經關閉，一半以上的耶穌會士離開原有的工作崗位。

羅堂開始探訪法國的耶穌會士，1848 年及 1849 年他到科隆、荷蘭、比利時、英國及愛爾蘭等地探訪弟兄們。

他到各地探訪弟兄的目的常常是提供他們消息並加強他們的信心。在他自己的故鄉，姪子姪女的歡迎使他得到一些安慰（他的兄弟已過世），而他對自己同會弟兄也表達了他人性的一面。

在可倫伯格（Culenburg）修院，他拒絕住在為他準備的豪華房間（主教住宿的房間），而選擇簡單樸素的房間。當團體散心時間沒有人抽菸斗時，他會問：

「你們的菸斗呢？」

在其他國家，耶穌會士是禁止吸菸的；羅堂准許耶穌會士採

用儉樸的教區司鐸的生活標準，即是，假如教區司鐸吸菸，耶穌會士亦可吸菸。因此，羅堂認可荷蘭耶穌會士所喜愛的傳統。

最後旅程

羅堂原本想要到大西洋的彼岸去，但是來自羅馬的消息使他改變主意。1849年7月的流血事件之後，法國軍隊占據羅馬，平息了革命，一切恢復平靜，耶穌會士開始返回他們原來的崗位。

1849年11月30日，羅堂回馬賽，次年1月8日到那不勒斯，4月底前往羅馬。會院廣場前有羣眾歡迎他。

方濟·傑若尼歐（Francis de Gerónimo）和伯鐸·克拉威（Peter Claver）二人的列聖品是教宗再次對耶穌會表示肯定的機會。昔日對義大利統一之事的爭論，使教宗碧岳九世與羅堂之間的關係惡化。這兩位偉人互相推崇，但是卻不能和平共處。教宗是義大利人，爆發力強且熱情洋溢；羅堂則是穩重內斂又自我克制。碧岳九世談到羅堂時說：「每一次我見到他時，我似乎面對一位聖人。當他要說話時，他總是明確的說出，不多不少，恰到好處。」一句真實崇拜的話，但是也暴露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當羅堂到達羅馬後，他通知祕書取消原定在1850年要召開的事務會議，而召開大會。事實上，他在1852年召開了大會，那時，全歐洲已恢復平靜。

有人猜想羅堂作出這項奇怪決定（羅堂從不會不與別人商量就作決定）的背後理由是他渴望選出一位有繼任權的代表，並希望他能改善耶穌會與教宗及教廷之間的關係。

1852年2月7日，四旬期前的星期一，按照慣例，教宗訪問耶穌會總會院，並在明供的聖體前祈禱片刻，然後，他到聖器間友善的與會士們交談。教宗的態度使羅堂備感安慰。

當晚，他就覺得身體不適，似乎快要氣絕身亡。他叫了崔高斯修士，修士感到有責任通知其他幾位神父：

「快來！總會長神父病危。」

羅堂已經昏迷，似乎沒有一點生命跡象。醫生的診斷是心臟停止。這時，病人又恢復了意識，並要求領聖體，然後再要求辦告解。

「每一個病重的基督徒都是先辦告解，才領聖體，然後再領傅油聖事。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恰好相反。」他自我解嘲的說。

他的病延續了三個月，疼痛與高燒不斷。5月7日，疼痛加劇，高燒不退，他最後清晰可懂的話是他心愛的〈基督的靈魂〉禱文中的詞句。1853年5月8日上午，他走完了塵世的旅程，他的面容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2. 一個在中東的波蘭人： 馬克西米連·萊洛

(Maksymilian Ryllo, 1802-1848)

耶穌會士或土耳其高官？

位於貝魯特的聖若瑟大學，為要表示對創辦人馬克西米連·萊洛的尊敬，而在走廊上掛了一幅他的畫像。那不是一幅傳統的肖像畫，與其說是一位耶穌會士的畫像，畫中人看起來倒比較像是一名土耳其官員，一位巴夏。他沒有戴神職人員的四角帽，而是包著白色下垂的頭巾；他未著僧侶的長袍，卻穿著筆挺的襯衫和帶風帽的長衣，當你走近畫像看到那把土耳其彎刀的刀柄時，他很像奧圖曼帝國的陸軍軍官。誠如前任總會長柯文博（Peter-Hans Kolvenbach）——也是這所大學的學生及教授，在1998年10月於克拉科（Cracow）所舉行的紀念這位波蘭耶穌會士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的大會上所追憶的，這幅畫引發學生們的好奇心。

萊洛確實有理由偽裝自己，因為波蘭人是不准進入黎巴嫩的，但是，無疑的，他喜歡以衣服來偽裝自己。他穿著這種服裝走遍歐洲及中東，在君士坦丁堡一名當地的人見過他時說：「我看見一名穿著像阿拉伯人的紳士，踏著輕快而堅定的步伐走過。他那紅色土耳其帽、藍色大流蘇與他垂肩的金色長髮一起飛舞著。長長的八字鬚配上東方的山羊鬚襯托出他俊美白皙的面孔。他那被風吹動的鐵灰色帶風帽長衫露出黑色的長褲；腰部繫上一條美麗的絲質腰帶；他那雙紅色尖頭鞋與白色短襪成了對比。」

某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羅堂神父很驚訝的聽說萊洛曾經穿著他那一身鮮豔的服裝出現在羅馬。

「不可能，他在敘利亞，我幾個星期前才收到他的信啊！」

對這類的笑話，羅堂並不感到興趣，從在白俄羅斯的時期起，他就認識他，也知道他會開這種玩笑。羅堂很高興再見到他，他擁抱他並對與他同來的人說：「你們是誰？耶穌會裡只有一個萊洛呀！」

波洛茨克—羅馬—黎巴嫩

萊洛出生在波蘭，終身以波蘭人自居。1819年在波洛茨克學院完成學業後便進入維爾紐斯（Vilnius）大學，第二年，當耶穌會士被逐出俄羅斯之時，他決定加入他們。在這種狀況下，神父們不要收他入會，但是他抓住運送他們的車輛，用一種巧妙的方法而矇混過去。

由於他想要盡快加入修會，因此，在1820年他與一批年輕耶穌會士，由羅堂陪伴前往羅馬。他進入歷史悠久的聖安德初學院並在羅馬大學深造。

早在那段時期，他的進取精神已受到教宗國瑞十六世的注意。他與同伴為一處監獄的囚犯準備聖體聖事，當這天來到時，他與一位司鐸同來，但是，這位司鐸卻未獲准進入。

「我們去見教宗。」

無人能阻止他。

「我有非常緊急的事。」他不斷向那些設法使他看出自己的請求是何等荒謬的人員說明原因。值班主教不再堅持，並將他的請求稟告教宗。

「聖座，有一名耶穌會修士一定要見您。」

「讓他進來。」

萊洛如旋風一般跑進來，跪下，如雷般的大聲說：

「我們是在基督的城市或是在土耳其鄉村？」

教宗對這名火爆的青年頗有好感，彼此也有一些心靈的交集。萊洛的魯莽行為受到他的上司的責斥，但是他卻獲得教宗的垂愛。

1833年12月21日晉鐸，三十一歲的他開始司鐸的服務工作，並帶領了一次頗受好評的藝術家們的避靜。這次避靜原本邀請羅馬一位著名的講道者帶領，但是這些年輕的藝術家都取笑他，在講完第一次道理之後，他便放棄了。

「叫萊洛來，他可以擺平他們。」教宗說。

次日，萊洛身裹寬大的羅馬披風，優雅的走上講道台，略為停頓，然後宣布說：

「我要與你們談一談美。」

這次的避靜意外的成功。

讓人記憶更深刻的是1835年他在監獄中所帶領的一次避靜。避靜結束時，在沒有任何警衛人員的戒護下，他帶領一千三百名犯人來到靠近拉特朗（Lateran）的地方，無人企圖逃跑，所有羅馬市民，包括教宗及樞機主教都目睹了這一場面。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他成為出名的講道者之後，又被聘請為哲學教授。但是羅馬對他似乎太小了；他感到東方的魅力吸引著他，而他的同伴黎巴嫩畢法亞（Bikfaya）會院的院長雷卡多納（Riccadonna）神父也要他前去。

他的願望得以滿全。羅堂授與他宗座傳教士的頭銜前往該地。為了能進入黎巴嫩，他以Pietro Rolli的名字取得羅馬護照，打扮得如同伊斯蘭教的教長一般，留著鬍鬚，帶著下垂的頭巾。

他於 1836 年 6 月 26 日離開羅馬，9 月 17 日抵達貝魯特。

首先，這位宗座傳教士勘查了這個地區；以虔誠的心探訪了這神聖之地後，他又走遍了美索不達米亞，訪問了埃及教會及拉丁教會，並收集古董。他呈上一份有關上述教會的報告及古董給異常喜愛考古學的教宗國瑞十六世。

亞洲學院

他在 1837 年 12 月 30 日回羅馬時最為人稱讚的事，便是為中東地區創立一所培育神職人員的學校。校址設在貝魯特，他很樂觀的說：「從那裡到印度就容易了。」校名訂為「亞洲國瑞修院」，課程安排一如義大利的學校，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及義大利文均為必修。

教廷傳信部反對這種課程安排，因為這所新成立的學院將成為羅馬傳信大學的競爭對手。萊洛向教宗國瑞十六世陳情，並陳述他的計畫。教宗稱他為「大鬍子」、「一名士兵，而非修道人」，教宗同意看他那長篇大論的報告，刪除一些段落後，在旁邊批示：「必須成立這所學院。」

萊洛試圖以奉承的話贏取羅堂的支持，他說：「這所學院必須是你的，就如德國的學院是在依納爵神父的名下一樣。」耶穌會總會長提供他人員；教宗提供資金；1840 年 7 月 22 日，萊洛已到達貝魯特，準備動工。

同年秋天，在沒有官方許可的情形下，由頗具建築經驗的伯那西納（Bonacina）修士指導開始動工。為了避人耳目，他們在晚上施工。當透過樹林可以看見牆壁時，修士便讓他的工人穿上神父的長衫，並且背朝道路，不被外人認出。1841 年 5 月 25 日，萊洛用印有「貝魯特學院」的信紙寫信給總會長。1841 年秋季，

開始上課，有一百名學生。

此時，中東政局動盪不穩，英國與土耳其聯合政權及各地的暴動趕走了從 1830 年以來由法國扶持的埃及統治。萊洛並未中止他的慈善工作；他未加思索便站在叛軍這一邊，擔負他們與新政權之間的聯絡人，甚至傳說他參與他們的軍事會議。羅堂密切注意這事，他在 1841 年 6 月 20 日的信中寫到：「你的一舉一動傳遍了全歐。」

這種情況迫使他被調離黎巴嫩，然而這只是藉口並非真正理由。誠如柯文博神父在演講中所指出的，這位火爆的波蘭人強烈反對中東是「前途渺茫、複雜詭譎、一觸即發的情勢會讓人一籌莫展」的論調。萊洛的計畫需要強大力量的保護，但是，一些外來的勢力都意圖控制這個地區，如英國、俄羅斯及奧地利。萊洛偏向英國，因而得罪了法國。在創立「義大利學校」時，萊洛忽略了法國有意在這塊視為已有的土地上握有統治權，因此，一位法籍神父取代他的位子，這所「貝魯特學院」或「亞洲國瑞修院」變成了「聖若瑟大學」。

馬爾他—西西里—羅馬

萊洛被告知前往英國屬地馬爾他島，1841 年 9 月 26 日啟程，日夜不停的航行，10 月 22 日他與一位愛爾蘭籍的傳教士抵達瓦勒他（Valetta），但是，後者不久去世，單單留下這一位波蘭人。

這位波蘭人並不氣餒，他展現了令人難以相信的活力。三個月內，共講了一百九十七次道理，平均一天講二到三次道理。但是這位旋風般的人物也引起一場風暴，萊洛結交了英國新教的朋友，卻遭來了具有影響力的教會人士的嫉妒；總主教停止他的一切職權，他要求公開審判；最後由於倫敦教會當權人士及一位貴

族的親自干預，在不需要審問的情形下，恢復他的一切職權。但是他遭到燒炭黨的反對，並聲稱若他不在 1842 年 5 月 1 日離去，便要殺害他。他毫不畏懼地繼續工作。

從地理位置、語言及文化來看，馬爾他是義大利與非洲之間的天然橋梁。萊洛心心念念想要在當地為非洲創立一所學院，如同在貝魯特為亞洲創立的那所學院一樣。日後這理想卻由別人實現了。

1843 年 9 月 4 日他被派往西西里，從事講道及聽告解的工作，直到被任命為羅馬伍朋學院（Urbanianum College）院長為止。

他由 1844 年 7 月 4 日到 1846 年 10 月中旬擔任此職務。這裡不是他的地方，他天生不適合這種繁複的每日行政工作。羅馬省會長葛洛依（Gloia）神父在 1846 年 3 月 23 日的日記中清楚的寫道：「院長從未感覺自在。」

很自然的，他有一些理想中的計畫，他使非洲傳教區的計畫美夢成真，並獲得教會當局的批准。羅堂相信他的朋友能開創大事業，但是卻不能擔負日以繼夜的管理工作，他委派他最後一項職務。

1846 年 4 月 14 日，中非代牧區正式成立，包括撒哈拉、蘇丹及阿比西尼亞，5 月 14 日卡索拉尼（Casolani）神父晉牧為該區的主教，不幸，6 月 1 日教宗國瑞十六世的逝世延誤原先的行程，到 10 月方才成行。在此同時，卡索拉尼主教因畏懼這份重責大任而提出辭呈，但是教宗碧岳九世決定要執行這項計畫，萊洛因而被任命為宗座代表。

非洲

五位司鐸組成了福傳團隊。1847年4月18日，他們在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卓城集合，開始這歷史性的航行，他們溯河而上，目的地為喀土穆（Khartoum）城。令人驚訝的是卡索拉尼主教來加入他們的行列，他聲稱不是來領導他們而是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萊洛在開羅小心謹慎的對待當地的人，並與穆罕默德·巴夏（Mehemet Pasha）交朋友，在貝魯特時他曾令萊洛失望，而現在他卻承諾要支持他們。

8月，一切就緒——供應品、船及水手——準備啟程，然而，萊洛卻染上嚴重的痢疾。10月1日，當他稍有起色後，他們就出發；16日他們抵達亞斯文（Aswan）瀑布。他們已經進入宗座代牧區，並在一座古老的基督徒的大教堂舉行隆重彌撒。

他們在東古拉（Dungulah）停留三十五天，但是萊洛的情況並未好轉。他們乘四艘船到安布考（Ambukol），然後改騎駱駝，與六十名阿拉伯人的商隊同行，為確保安全，他們都佩帶弓箭。當地日夜氣溫為攝氏五十三度到三度，晚上紮營時要生營火，為取暖也為嚇走獅、豹及土狼。萊洛的病情嚴重，有時候他以為自己快要斷氣了。1847年2月11日，他們終於抵達喀土穆。

萊洛的病情稍有起色，他寫了三份報告，分別呈給傳信部、耶穌會總會長及信仰傳播會。

他被命令回到羅馬以獲得計畫的最後批准，但是對他來說已是力不從心了。他的身體狀況確實有進步，也持續了四個月。但他那壯碩的體格，現在卻如同一具僵硬的標本，任由痢疾摧殘。6月11日，他的病情再度轉壞，17日他領受病人傅油聖事。強勁的呼吸已減弱為一絲氣息，在日落前兩小時完全停止。

3. 洛磯山脈中的法蘭德斯人： 伯鐸·若望·司麥特

(Pierre-Jean De Smet, 1801-1873)

伯鐸·若望·司麥特這位傳教士兼拓荒者的先驅，是林肯總統的私人朋友，格蘭特總統的密使，他深獲將軍們及其他人的稱讚，是政府部門的祕書們諮詢的對象，更重要的，他是當時最有權勢、最令人畏懼的印第安酋長的顧問及朋友，唯一能與他們談判及自由進出他們地區的人。此外，他具有細膩的描述才能，將他如何在美國未開發的地區，以徒步及騎馬翻山越嶺、涉水渡河、穿越叢林、走過草原及沙漠的經過，留下了生動的敘述。

他的一生為早年美國的西部開發史留下重要的一頁。耶穌會士進入這一股潮流中是情勢所逼，而非刻意安排。

被迫移民

情況之一便是位於馬里蘭州白沼澤（White Marsh）的耶穌會初學院面臨極度的窮困。七名初學修士，都是法蘭德斯人。他們的食物常常是幾個馬鈴薯和清水。修會長上已經決定關閉該座初學院並將修士遣送回國。正在此時，當這倉促的決定還未傳達給修士時，有人提供一個好去處：紐奧爾良的主教鄧路易（Louis Dubourg）想要耶穌會士在密蘇里州的印第安人中間建立一個傳教據點，他將自己距離聖路易斯市不遠的佛羅里勝（Florissant）的一處農莊送給他們，讓他們將此處改為一座耶穌會的修院。

他們衷心喜悅的接受了這項邀請，全初學院便遷移到中西部，副院長暨初學導師奎肯朋（Felis Quickenborne）和他的同事

提門司（Peter Timmermans）都是法蘭德斯人，以及伯鐸·若望·司麥特、Felix Livinus Verreydt、François De Maillet、Judocus Van Assche、Jean-Baptiste Smedts、Jean-Antoine Elet、Pierre-Jean Verhaegen 等七名初學修士；三名輔理修士雷斯門（Henry Reiselman）、史川罕（Charles Strahan）、梅爾（Peter De Meyer）；以及三對曾在白沼澤工作過，現在要在農場工作的年輕黑人夫婦。

從法蘭德斯到新世界

對原籍法蘭德斯、滿腔熱火的肯塔基州巴爾斯坦（Barnstontown）教區神父查爾斯·尼瑞克斯（Charles Nerinckx）來講，看見來自馬里蘭州這一羣法蘭德斯修士，他有自己的一番說詞。

他慷慨激昂的說：「拿破崙為了消滅一個國家及征服世界能招募百萬人為他而死，難道我為要拯救一個族羣並宣揚天國竟找不到一羣年輕人嗎？」

這位神父所選中的修士之一便是伯鐸·若望·司麥特。體格魁梧、身體強健的他，雖然不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但卻是一名馬路英雄，無人敢與他作對。有一次，一名比他大的男孩惡意捉弄他，於是，我們的三松英雄便把他抓起丟進附近一個水塘中，並為了娛樂圍觀者而將他浸入水中三次。

伯鐸·若望在十六個孩子中排行第十二（他的父親 Joost De Smet 與第一任妻子育有七名子女，與第二任妻子育有九名子女），老家在兩條河流丹德河（the Dender）和史科德河（the Schelde）會合處的丹德蒙（Dendermonde）。

1821年7月24日他極祕密的離開家。他們當然不允許他走，他也沒有告訴父母親，這種不告而別深深刺傷他父親的心。他只向他的好友也是日後魯汶大學校長伯鐸·雷（Pierre De Ram）告

別。當兩人道別時，雷請求司麥特留給他一件紀念物，我們的三松便從口袋中拿出一枚硬幣，一咬為二，一半送給他的好友，一半自己留下。

他也以同樣祕密的方式上船。為了逃避警察，船在晚上駛出港口，停泊在海上等他們。

經過了四十二天的航行，1821年8月15日他們在費城（Philadelphia）上岸，隨即轉往喬治城（Georgetown），並向耶穌會美國省會長可希曼（Kohimann）神父報到，他送他們到白沼澤開始初學期。

千里迢迢赴密州

當第二年已過了一半時，初學導師奎肯朋告訴他們，初學院要遷往密蘇里州。對事情決定的前後經過，他們一無所知，奎肯朋全心接受這項命令，他們更以歡呼聲接受這個決定。

「我們為了印第安人而離鄉背井；他們既然在西部，我們就去西部吧！」

無懈可擊的邏輯推論，也是多數的結論。

1823年4月11日的早晨，他們懷著滿腔熱誠啟程，徒步前往巴爾狄摩（Baltimore）。4月14日，他們開始翻越阿利加尼（Allegheny）山脈，十天之後他們走下了西坡，又經過十八天的跋涉，他們到達俄亥俄河岸的惠林（Wheeling）城。由於他們無錢搭乘蒸汽船，因此，他們買了兩艘大型平底船在河中航行。

對毫無經驗的人來講，在俄亥俄河上駕駛平底船是一件艱鉅的任務，因為這是一條危機四伏的河流，通常都要雇用一名專業的船夫。由於無法雇用船夫，奎肯朋買了一本航行須知交給自稱精通航海的史川罕修士，讓他擔任駕駛一職。

5月22日他們到達伊利諾州的紹尼城（Shawneetown），開始前往聖路易斯的長途步行，首先要朝西北方向走一段一百五十英里的路程，途中他們飽受蚊蟲的叮咬。夜間紮營時，首要之事便是用潮濕的木頭生起營火，以驅逐野獸。

跋涉了一千七百英里的路途之後，終於在5月31日星期六，約中午一時，當他們看見了聖路易斯時，他們的旅程才算到達終點。第二天，正是基督聖體聖血節的八日慶典，他們舉行隆重大禮彌撒及遊行，1823年6月2日星期一，他們正式住進並擁有佛羅里勝農莊。

快速發展階段

農莊四周的風景極為美麗，但是房屋卻非常簡陋。在主建築高高的三角牆屋頂下只有一間單人房，過低的隔間使住在閣樓中的人無法直立。農莊有兩百五十多英畝的可耕之地，但是卻需要整地及耕種。眼前的當務之急便是盡快安頓下來，很快，他們在主建築旁加蓋一棟兩層樓的房屋。這些年輕的修士一面念書一面在田地工作，從1824年開始，當為印第安兒童的寄宿學校開辦之後，他們輪流照顧這些兒童。不久，大部分的擔子都落在司麥特的肩上：直到1828年，他都是這裡的總指導。

未來四年中的干擾使他遭受極大的痛苦：回比利時募款（1833年），患病（1834年），離開修會（1835年5月8日）。1837年9月當他痊癒之後，他立即返回農莊，並獲准再進入修會（11月29日），六個月內，在1838年5月10日他離開密蘇里前往波塔哇米（Potawami）傳教區，該處是不久前在康瑟爾布拉夫（Council Bluffs）開闢的據點。

這真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經驗。藉著每日的接觸，他了解印第

安人的習性，學習如何適應他們，嘗試他們的食物，不去注意他們木頭小屋內的骯髒，接受他們對他所表達的友誼並給予回應。

起初他得到的反應是冷漠的；漸漸他克服困難，印第安人開始有了回應。1839年5月30日他能如此寫道：「改信基督的人數已經增加到三百人，我可以說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有一件棘手的事，就是政府每年補助他們五萬元。隨著補助金的分發，出現了流浪漢、小偷、賭徒，此外，美國所唾棄的威士忌酒製造商以造福印第安人之名引進這種烈酒，這些最溫順的印第安人在喝醉酒之後就像一頭凶猛的野獸。在這一片蠻荒之地，司麥特很疑慮的表示：「這兩千個醉漢我們要怎麼辦？」然而，他並沒有氣餒，皈依者少了些，但是大部分已領洗的信友都能堅守信仰，而鄰近的族羣不斷邀請這些黑衣神父前去講道。

由於他們的糧食存量日漸減少，司麥特自願到聖路易斯去採購。1840年2月13日他離開康瑟爾布拉夫，希望盡快返回，然而天主卻有其他計畫。

信友使徒

大約在1831年10月，有四位陌生者來拜訪佛羅里勝的耶穌會士，他們是平頭族（Flathead）印第安人，來自遙遠的上哥倫比亞山谷，想要見一位黑衣神父。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我們必須先談談依洛郭亦（Iroquois）族印第安人，他們摧毀了休倫（Huron）傳教區，殺死一些傳教士及信徒，但是有些族人皈依了基督信仰，約在1816年，有二十四名族人到西部去建立他們的新家園。漫長的流浪最後終於到了落磯山西側的平頭（Flathead）地區。他們受到歡迎，定居下來，與當地人通婚，融入當地族羣。

當地族羣的首長是稱為「老依納爵」的依納爵·穆斯（Ignatius La Mousse），他曾由耶穌會士手中領受洗禮並常常談論基督宗教；他教導族人一些禱文，也強調邀請那些他年輕時認識的黑衣神父的急迫性。

每年溯河而上的商人告訴他們黑衣神父已經在密蘇里建立了據點。老依納爵召集了族人會議，提議派代表到聖路易斯去，這項提議獲得熱烈的支持，四名印第安人自願前往。

四位客人沒有考慮語言的隔閡，因而無法說明他們長途跋涉來此的目的；此外，兩人患病並在幾天內去世；另外兩人啟程回家，但是卻未能抵達家鄉。

四年後，他們再試一次，這次老依納爵帶著兩個兒子，親自前往。他於 1835 年的夏季出發，12 月 1 日抵達聖路易斯城，但是他只得到神父的承諾而已。

1837 年夏季，老依納爵帶領第三批代表前往聖路易斯，然而這次卻落入蘇族（Sioux）人手中。

他們並不放棄；1839 年的夏季他們作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努力。在一次族人的會議中，一名稱為左手的族人及小依納爵自願擔任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這是非他們莫屬的，因為他們略通一點法文。他們平安到達目的地；主教對他們很感興趣，他寫信給耶穌會的總會長；羅堂總會長深受感動並同意；左手急速返回家鄉，把好消息報告給族人，小依納爵隨後帶領被派遣的傳教士一同回來。

他的聖召

司麥特早已期望能被派前往平頭族擔任傳教士的工作，他自願前去，也獲得批准。1840 年 3 月 27 日，他起程前往落磯山脈。

6月30日，他到達綠河（Green River），這裡是有名的集散地，尤其是毛皮的交易，印第安和加拿大的獵人都集中在這裡，出售皮貨或與白人交換皮革加工品。

平頭族的大酋長派了十名武士來侍候並護衛這位傳教士前往他們的大本營。「我們不像陌生人的見面，而像朋友的聚會，我喜極而泣的擁抱他們，他們也流著淚以溫和的話語，以孩子般的單純歡迎我。他們告訴我部落裡的消息，敘述與黑腳族五天的戰役中，以六十人戰勝二百人的神奇事蹟，他們殺死了五十名敵人，自己卻無一人傷亡。」

7月4日他們又前往另一處，經過八天穿越山岳、河流、峽谷的跋涉之後，他們到達印第安人的駐紮地，有來自八百英里之外的三個部落的人前來迎接他們。

他被帶入名為「大臉」的大酋長的帳棚內，受到大酋長及其他長老們的歡迎，大臉以貴族般的尊嚴口吻對他說：

「黑袍神父，歡迎蒞臨我們的國度。我們滿心歡喜，因為今天偉大的神靈垂聽了我們的祈求。你來到一羣可憐又無知的人中間，我們的雙耳已張開，我們要全心聆聽你的話，黑袍神父，請開口發言吧！我們要遵守你的教導。」

由於這是一次測試性的拜訪，因此司麥特只停留了兩個月。8月27日清晨，從兩個部落裡所選出的十七名勇士來到他的帳篷前，他們要護送他穿過兩個仇視白人的部落黑腳族（Blackfeet）和克羅族（Crows）。日出之前，所有平頭族部落的人都聚集起來，為他送行。無人說話，但是憂傷卻明顯的寫在每一張臉上。年長的「大臉」站起來，代表族人發言：

「黑袍神父，願偉大神靈陪伴你走過遙遠而危險的路途。我們早晚都會為你平安到達聖路易斯祈禱。當冬天的雪在山谷消

失，當春天的新綠出現時，我們現在悲傷的心將會再度歡悅。當草原上的青草漸漸長高時，我們要前來歡迎你。再見了，黑袍神父，再見。」

聖瑪利傳教區

的確，當冬雪融化、春綠再現時，司麥特與兩位神父及三位修士出發前往平頭，有來自該地的先鋒人員，行走了八百英里到弗德霍爾（Fort Hall）來迎接他們。1841年8月15日，兩隊人會合，十五天之後，他們到達比特盧德（Bitter Root）山谷，平頭族的家園。

司麥特曾經建議他們找尋一處便利的地點作為定居之處。他並不是以為可以在一夜之間將一個遊牧民族轉變為定居的族羣。狩獵仍然是他們主要的生存方式，但是，為避免他們不斷隨著牛羣而四處漫遊，他們可以建立一個在牧放期結束後能安靜休息的基地，開墾種地，收穫一些他們在打獵中得不到的農產品，體驗溫暖的家庭生活，為了不墮入閒散的生活，可以學習謀生知識，漸漸養成文明的習慣。

這項建議獲得熱烈的回響並被接受，他們在距離比特盧德山谷二十八英里的地方，即是目前密蘇拉（Missoula）鎮的附近選擇一處做為基地。這是設立在平頭族人中的聖瑪利傳教區，也是太平洋岸西北地區第一個天主教印第安傳教區。10月第一個主日，也是聖母玫瑰節，舉行成立典禮。

司麥特以巴拉圭隔離村的方式規劃這個傳教據點。教堂與學校位於村子的中央；民房、工廠、商店及其他公共設施圍繞在四周。他們學習讀書、寫字、宗教、耕種及手藝，以改善他們的生活。

農業給予他們全新的經驗。過去他們認為將土地挖開，把餵養馬匹的草挖出來，再把可吃的穀類撒入犁溝內，真是愚昧不堪。別人告訴他們一粒種子能生出許多子粒，但是他們不信，當時機成熟，他們看見新芽破土而出，然後是莖，最後是結實纍纍的麥穗時，感到無比的驚訝。

早期基督徒的熱誠

三個月之內，新設立的傳教區已成為信仰蓬勃的地方。「整個平頭族地區都已皈依天主，而其他如卡利斯佩爾（Kalispels）、內茲佩爾塞（Nez-Percés）、科達倫（Coeurs-d'Alènes）、斯內克（Snake）、庫特內斯（Kootenais）人也接受了洗禮；還有許多其他部落也邀請我們為他們付洗，而更廣大地區的人民只等待傳教士去將他們納入耶穌基督的旗幟之下。可敬的神父，這是我在1841年結束時送給您的禮物。」在司麥特寫給聖路易斯省會長的信中，有這樣的描述。

龐多雷族（Pend d'Oreilles）的首長「走路的熊」如此祈禱說：「偉大的神，你知道我為什麼殺了那黑腳族人嗎？不是為復仇，而是給別人一次教訓。我請求祢，在另一個世界中可憐他。我們願意原諒他想要加給我們的傷害，為了證明我所說屬實，我將以我的外衣覆蓋他。」

到了為他們準備初領聖體的時候，在講到告解聖事時，有些人希望公開辦告解。他們選擇在聖神降臨日舉行，儀式極為隆重。1842年8月15日，在司麥特致羅堂總會長的信中寫道：「每個主日，有些家庭全家來到主的餐桌前。我們常常一連聽了二十個告解，卻找不到可赦之罪。」

當舉行一夫一妻儀式的日子來到時，女性與男性同樣表達了

各自的慷慨。

一名婦女看到自己的丈夫痛苦的在她與另一名女子之間作選擇時，於是她說：「我愛你，我知道你也愛我，但是你同樣也愛那名女子。我已經老了，她還年輕。你離開我和我的孩子，留下她吧！這樣我們能悅樂天主並且可以領受洗禮。」

老酋長「大臉」不能再與他們在一起了。那年冬天，高齡九十的他，在初領聖體之後，與族人永別。

「你領洗之後有犯過罪嗎？」

「犯罪？我的責任是教導別人好好生活，我怎麼能犯罪呢？」

他們用他生前每個主日所編織以宣報上主之日的一面旗幟包裹了他，將他埋葬。

偉大的黑袍神父

聖瑪利成為司麥特日後使徒工作的基地，他的名聲由此地傳播到廣大的落磯山脈的印第安人地區，由北邊的平頭族、平弓族（Flatbows）到東邊的皮德諾斯族（Pieds-Noirs）、克羅族、夏延族（Cheyennes），由東到南邊的內茲佩爾塞族、斯內克族，由南再到西邊的科達倫族、斯波坎族（Spokanes）、肖狄耶斯族（Chaudières）和凱透族（Kettle），更向西邊還有可怕的蘇族。他拜訪過這些地區所有的印第安種族，受到友善的及懷有敵意的族羣的歡迎。

他來回穿梭於山丘之間，由聖路易斯經過陸路前往東南地區，也在繞過合恩角後，經由海路從溫哥華到達西部地區。

他又建立許多傳教據點；繼聖瑪利之後，又有聖依納爵、聖心、聖方濟·薩威、聖保祿、聖伯鐸、聖雷濟思、聖母升天、無原罪始胎、聖安娜等處。

如何解釋他的成功呢？在野蠻、無禮、有時令人厭惡的外表下，印第安人具有無可比擬的天生美德，正等著別人去發掘。基督信仰在他們身上行了這個奇蹟。

他的人格特質也是一大助力。他令人難忘的外表，他的成熟與和善，他的純樸，以及當機會來到時，他所表現出的勇氣都是促使他成功的因素。甚至到今天，人人都知道這位偉大的黑袍神父，他是言行一致的白人，是印第安人最好的朋友。

談到他的勇氣，當他在落磯山脈中時，有一名陰沉、壓力過大的印第安人，由於害怕他的過人力量，而誓言要殺害這位傳教士，並消滅他所傳的宗教。一天，司麥特騎馬去訪問鄰近的村莊，身邊只帶了日課經本及馬鞭。突然，他看見一名滿臉怒氣的印第安人向他衝過來，手中揮動著戰斧，嘴裡發出嘶吼聲，就在那一瞬之間，司麥特跳到地上，在敵人出手攻擊之前，他以拳頭把對方的武器擊落。當這名印第安人俯身拾取自己的武器時，司麥特立刻抓住他，把他壓倒在地，重重的打了一頓。

羞愧又憤怒的刺客試著掙脫司麥特的手，但是卻徒勞無功，於是他便求饒，並發誓日後以最大的敬愛之心對待這位黑袍神父。司麥特允諾釋放他，而條件是他要告訴全族的人他被黑袍神父痛打一頓。這名驕傲的武士被迫接受這要求，他站起來，而傳教士卻留下他的短柄斧，假如他想要拿回這件武器，他必須在幾天之內親自到教會來領取。

一週後，這名印第安人來到教會所在地要求見傳教士。司麥特極和善的接待他，與他一起共餐，鼓勵他談談他的英雄事蹟，以及他獵取了多少敵人的頭。漸漸的，這名印第安人滿臉發光，他們的對話也轉到宗教方面，他要求成為新領洗者，這次，天主的恩寵戰勝了他。

中間人

當美國政府要與印第安人締結和平協定時，司麥特在這些部族之間的地位使他成為兩者間的中間人。白人愈來愈向西挺進，占據他們的土地，以永不兌現的承諾欺騙他們，很明顯的，所謂提供給他們的保護，其目的無異於消滅他們。當加州發現黃金吸引大批淘金客由密蘇里州湧向太平洋沿岸時，情況更是明顯。1848年舊金山的居民不到五百人，兩年間人口增加到二萬五千人。當這塊美國政府保證歸他們所有的土地被侵占時，印第安人不得不揭竿而起，準備不惜一戰。

1851年，印第安事務總監米契爾（Mitchell）上校召開拉勒米堡（Fort Laramie）會議，所有落磯山以東的部族都派代表參加。當米契爾知道司麥特在印第安人中間的影響比政府的承諾和威脅更大時，他決定尋求他合作。

司麥特立刻接受邀請，6月7日他乘船到位於聖路易斯西北兩千英里外的尤寧堡（Fort Union）去。9月12日，會議在那布拉斯卡（Nebraska）平原舉行。來自不同族羣的一萬名印第安人聚集在這裡聽美國政府對他們提出的條件。偉大的黑袍神父被各族首領接納並受邀參加他們的宴會，以他的影響力保證日後的和平。

大會延續十二天，美國及主要印第安族的首長共同簽署了條約，氣氛令人感到樂觀。

分裂戰爭

好景不長。參議院沒有諮詢印第安人的意見便擅自改變條約內容。白人殖民者開始入侵中部未開發之地；農地被占，道路也

被淘金者占用。印第安人滿懷憤怒，他們看著殖民者一步一步侵占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抱怨聲也愈來愈大。

「水牛和羚羊都不能在白人踐踏過的土地上生存，我們不能等著白臉人消滅我們賴以維生的牲口；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土地。」

當南北之間的仇恨爆發開來後，印第安人看到這是有利他們驅逐入侵敵人的好時機。他們拿出武器，揮動戰斧，戴上老鷹的羽毛，三天之內他們殺了將近一千名白人。

美國立即派兵攻打他們，雖然擊退了印第安人，但是卻未能平息暴動。美國又派第二支軍隊前往鎮壓，印第安人略作抵抗後就撤退，他們騎著凶猛的戰馬，攻擊美國軍隊後就逃跑，雖然都在視線範圍之內，但是總無法加以擒獲。

1862 年至 1863 年的對抗花掉美國兩千多萬元，而戰爭何時結束卻遙遙無期。有人提議請司麥特神父擔任中間調停人。

這提議並不吸引他。

「我怕失去我在印第安人中的聲望。假如我讓自己成為華盛頓的代表，這會使我的處境變得很尷尬。我要用自己的方法，不收取任何酬勞。首先我要拜訪目前仍是白人朋友的蘇族，然後在他們的陪伴下，去拜訪反叛的部落。我要盡全力說服他們保持和平，促成彼此的諒解。」

1864 年 6 月 9 日他來到貝托爾德堡（Fort Berthold），格羅斯文特人（Grosventres）、阿里卡拉人（Aricaras）和曼丹人（Mandans）的村子已不遠，他們尚未起而反抗白人。一場天災幫助他完成了使命——長期乾旱使農作物枯死。

「具有大能的黑袍神父，難道你不能使天降一點甘霖嗎？」

「我沒有這種能力，只有偉大的神有這種能力。讓我們一起祈求祂，我要誦唸最偉大的經文（感恩祭）。」

第二天，濃雲密布，下了二十四小時的雨。

偉大的黑袍神父已來到的消息傳到蘇族人耳中，7月8日，三百名壯漢在河對岸紮營。他們的出現使守衛的白人驚嚇無比。司麥特獨自出來，乘船渡河，他受到極友善的接待。

武士們表達他們前來的目的是要與他交談。他們會談了三小時。酋長似乎願意謀和並接受美國政府平等互惠的建議。

但是握有大權的蘇利（Sully）將軍主張，在和平未到來之前，這些部落都要受罰。這種態度使司麥特無法執行自己的任務。為善盡印第安人和平使者的角色，他決定回到聖路易斯，與政府人員直接溝通。

在「坐牛」的營區

白人的激怒和殘酷行為使印第安人有開戰的蠢動。於是又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目的是建立永久的和平，成員包括打完南北戰爭的將軍，蘇利將軍也是其中之一。他們再度倚重司麥特對印第安人的影響力，因為只有他能征服他們的驕傲。

他很樂意在委員會的安排下執行自己的使命，1868年3月30日，他以六十八歲的高齡乘船去執行他生命中最危險的任務。經過三十三天困難的航行，他到達靠近坎農坡（Cannonball）河北岸的萊斯堡（Fort Rice），他們將在此地舉行會議，無數的印第安人聚集在這裡，參加「偉大的和平會議」。他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並向他們保證政府和平的態度，6月1日，他宣布要去尋找那些滿懷敵意的部落，目的是勸說他們的酋長來參加這次會議。對他的大膽嘗試，他們感到驚訝萬分。

「黑袍神父，那會要你的命的呀！」

「為了使我的任務順利完成，在聖母像前日夜點著六盞燈。」

「好美啊！我們要陪你一起去。你何時出發？」

「明天日出時。」

當他出發時，很多人都不敢期望能再見到他。6月9日，司麥特立刻派遣四人去尋找敵人紮營之處，並攜帶大量的菸草做為禮物，表示一種邀請或希望就重要的事情進行會商。6月15日，一羣印第安人出現在地平線那邊，他們是一羣可信任的友善人士，後面跟隨著十八名抽著象徵和平的長菸斗的印第安武士，他們要前來與他握手。

「黑袍神父，你的菸草已經收下了。酋長與武士們都想知道你來此地的目的。但是，只有你能進入我們的營區，其他白人都將活著進來，死著出去。」

還有三天的路程才能到達營區，那是在保德（Powder）河流的匯合處，黃石的山谷中。6月19日，當他們爬上山丘俯瞰河流時，他看見五百名分散的武士正穿過平原，前來迎接他。在交換禮物之後，他們向營區前進。約有來自不同支派的六百個家庭聚集在這裡，包括：亨克帕帕人（Hunkpapa）、歐格拉拉人（Ogallala）、黑腳族人、明尼寇納人（Miniconjou）及其他。由四犄角（Four Horns）和黑月（Black Moon）、無頸（No Neck）、坐牛（Sitting Bull）等四位酋長共同領導。其中「坐牛」是最兇狠及難以對付的，但也是接待司麥特的酋長。

經過十六天的長途跋涉，疲累不堪的黑袍神父請求先准許他略為休息，雖然身處四千名與白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印第安人之中，但是，他仍在他們友善的款待中安然入睡。當他睜開眼睛時，四位酋長站在他面前，坐牛以自己族人之名向他說：

「黑袍神父，我幾乎不能再支撐我殺的白人所流的血加給我的重量了。是白人挑起戰爭，我起來迎戰，手握短斧，盡力殺害

白人。今天你在我們中間，在你的面前，我的雙手垂下，我要聽你的話，我曾兇狠對待白人，而我已經準備善待他們，假如他們也願如此對待我們。」

集會在第二天，即 6 月 20 日舉行，只有武士參加，在歌舞中開始。司麥特說了幾句簡短但具有說服力的話，無人打斷他。當他說完後，黑月站起來說：

「黑袍神父，你讓我們對未來抱有一線希望。願美夢成真；讓我們忘掉過去。我感謝你帶給我們這個好消息。有一些武士要與你一同到萊斯堡去聽聽偉大父親（美國總統）提出的條件，假如可以接受，和平就此達成。」

第二天清晨，天亮之前，司麥特啟程返回駐守地。和談於 7 月 2 日舉行，共有五萬名代表參加。簽署了和平條約，「假如白人不違反條約，和平將會持續」（拉韋勒 Laveille）。

「把我靈魂的價值給我」

司麥特把與蘇族的和解視為他們皈依基督信仰的前奏。他們再次要求黑袍傳教士到他們那裡去，而他也計畫為他們建立教會。1871 年 3 月 20 日他在給親人的信中寫道：「兩位神父將與我同去，部落的首長正等著我呢！」

但是這醞釀已久的計畫卻永遠無法實現。1870 年印第安和平政策破壞了他的計畫，甚至使已建立的教會據點面臨存廢的危險。政府將印第安保護區託給在印第安地區工作的各教會支派來管理，假如這種安排是按已往的工作成績來分配，則對天主教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已有十多萬新領洗者，而基督新教只有一萬五千人。

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司麥特被選為天主教的代表，當他去參

加為討論這項計畫而召開的會議時，他發現大約有三十位新教牧師也應邀出席，並發表意見，他們要求分得最好的地區。他日後寫道：「我的出席以及我代表天主教會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徒勞的。」

許多天主教的傳教地區都交給了新教。一夕之間，在無任何商議的情況之下，八萬名印第安天主教徒就這樣離開了教會。在黑腳族中的天主教代表如同放蕩不羈的惡人般被新教的支派所取代。自從黑袍神父離開之後，印第安人感到很難與新來的牧師相處，覺得自己如同孤兒一般。他們向白宮的總統發出緊急信函，請他召回他們的神父，還給他們天主教學校，但是一切都是徒勞無用。

印第安天主教徒不顧所受的迫害，仍忠於自己的信仰。一位衛理公會的牧師設法要使亞基馬族（Yakimas）的一位酋長改變他的信仰，有一天他問這名酋長要多少錢才會改信新教。

「價碼很高。」酋長說。

「兩百元？」

「還要多。」

「那麼你要多少？五百元，六百元？」

「啊，比那個還多！」

「真的，請開價吧！」

「我靈魂的價值。」

美中不足

司麥特得到教會官方的肯定，他第三次被提名為主教候選人，他的祖國封他為騎士，但是，他也飽受誤會與批評之苦。事情發生在承諾關閉聖瑪利傳教地區之時，這事必定令他萬分失

望。他所歸化的平頭族人仇視日後前往工作的神父，而導致放棄該地的傳教事工。1850年11月5日，他的繼任者雷瓦利（Ravalli）神父離開了聖瑪利。

根據一些評論家的說法，這些平頭族的變心該歸咎於司麥特；因他對他們做了一些無法實現的承諾。別人對他的控告呈到總會長羅堂的手中，1851年4月4日，他在寫給司麥特的信中說出自己對他的印象：「我親愛的神父，你似乎向印第安人許了一個無法實現的承諾。」隨著這指責而來的，便是不許開闢新傳教地區的命令。

然而整個事實並非如此，其他紀錄給予我們另外的解釋。平頭族的變心是受到白人入侵者的影響，這些白人灌輸他們有害的思想，使他們遠離傳教士。

決定性的改變發生在1846年的秋天，他們從落磯山東側獵獲水牛回來之後。他們的態度改善很多，從1848年到1849年，有八個月的時間，他們是神父們「真正的安慰」。之後，部落間突然出現意見分歧，造成新的危機。雖然那也過去了，但是卻「影響我們的神聖宗教及我們」，而他們的情況「就此不再好轉」。昔日良好的關係不再，兩位留在聖瑪利的傳教士急速向他們的院長請求協助，但是，並未得到任何有效的幫助，最後的決定是放棄這個傳教地區。

羅堂神父承認：「平頭傳教地區的關閉的確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去年情況的大逆轉至今對我仍是一團謎。總之，真正的奧祕是在於平頭族的變心。」

造成危機的因素已為大家了解，司麥特是天主照顧的人，若無他，落磯山脈的傳教區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不是一位「駐紮」在某處的傳教士，而是一名吸引和聚集印第安人的先驅者，他將

自己建立的教會據點交託給一位常駐的司鐸。他各處募款，甄選傳教士；他陪伴他們來到工作地點，幫助他們，教導他們，當他們能獨立自主的工作時，他就離去，前往別處。

1852年3月，當羅堂總會長病危時，密蘇里的省會長有意提名司麥特為在歐洲為傳教事務募款的人選。這是使他離開他的印第安人的方法嗎？

司麥特接受這項任命。1852年3月12日，在他寫給荷蘭省會長的信中，他說：「我向你保證，我會令你滿意的。」但是，另一道命令卻使他留在聖路易斯，原因日後才為別人所知，即是一項與先前傳教工作有關的和平使命。

他因嚴重腎臟炎逝世於聖路易斯，未能如他所願的死於他心愛的印第安人中間。他受邀最後一次拜訪蘇族，但是卻永遠無法實現。「醫生說我是一隻給貓吃的鳥。」他費力的說出這句話。他於1873年5月24日，耶穌升天節凌晨兩點十五分平安去世，他過人的耐力及驚人的溫和使人們對他悼念不已。

4. 被七個國家驅逐： 方濟·羅曼

(Francisco José de San Román, 1811-1886)

羅曼的個人歷史為拉丁美洲迭經痛苦變遷的歲月作了總結：政治動盪，自由派與保守派政府交替執政，在自由派手中成功地將耶穌會士驅逐出境，他們與保守派的認同，即使在最前線，他們也像是一支暴風雨般的軍隊，成為首先遭受攻擊的對象。

第一次驅逐

當羅曼還是一名修士時，就第一次被自己的國家驅逐。他部分的童年在甘第亞（Gandía）一位公爵的豪宅中度過，1826年9月24日，十五歲的他在馬德里進入耶穌會初學院。1835年解散命令發布時，他正在瓦倫西亞試教。在聖阿舍爾（Saint-Acheul）及魯汶大學完成神學之後，奉派前往布魯塞爾教書。1843年安東尼·馬瑞（Antonio Marey）神父負責甄選第一批派往新格瑞那達（自1886年起稱為哥倫比亞）的修士，羅曼是獲選的十八人中的一員。

這羣人在巴黎集合，1844年1月16日啟程赴勒阿弗爾（Le Havre），四天之後，他們已經看不到舊大陸的蹤影了。

新格瑞那達

2月26日，他們所搭乘的帆船在聖塔瑪塔（Santa Marta）港停靠，這是進入這個國家的必經港口，之後，他們要溯馬格達雷那（Magdalena）河而上，乘坐一種稱為bogós極為原始的船，這

是一種以挖空的樹幹為船身，以棕櫚葉為船頂的船。四名或六名強壯的黑人靠在一根插在河岸或河底的長杆子上，用力將船往上游推。船身狹窄，坐在船上的人不能移動；在酷熱的豔陽下，成羣的蚊子不停的叮咬他們。在蒙波斯（Mompós）他們換了一種比較大的船，稱為 *champanes*。當風浪大時，他們必須分批乘船，有時，半天才能運走一半的人。然而，兩岸風景卻美麗如畫。

在行程中，當他們必須停下來等待時，這些熱心的人就聚集當地的人向他們講道並聽告解。這些居民大多是十六及十七世紀被帶到這裡的非洲人的後裔。

經過三十天的航程後，他們到達名為「天主之母彎道」的下船之處，從這裡他們繼續陸路的行程。大約在 6 月 16 日，他們到達首都附近的方札（Funza）城。

他們在波哥大（Bogotá）幾乎無處可住。他們是應莫斯克拉（Mosquera）總主教之邀而來，當地政府不敢表示反對，但是卻袖手旁觀；政府不把過去的初學院及聖祿茂（San Bartolomé）學校歸還他們。總主教把教堂及方濟會第三會的修院借給他們使用。

一片茫然

正當神父們開始他們的福傳工作時，民間的權貴制訂了一項在波哥大興辦「教會大學」的法令，條文中第十八款便公開與耶穌會的規定牴觸，因為凡院長的派任、校長與教會的職責和功能都由政府決定。

雖然前景一片茫然，但是在 1844 年 11 月 13 日，在耶穌會士到達波哥大五個月之內，有五位初學生進入初學院。一羣傳教士到過麥德林（Medellín）、安蒂奧基亞（Antioquia）、里奧內格羅（Río Negro）、索科羅（Socorro）、騰亞（Tunja）、貝萊斯

(Vélez) 等地。政府的態度略微軟化，例如：他們作出一項奇怪的決定，就是要在波帕揚 (Popayán) 建立一所「訓練減低國內印第安人野蠻之氣的傳教士大學」。這項計畫並未交給耶穌會執行，而是由政府辦理。該國的總統待人禮貌又熱誠，但是在處理公務上卻判若兩人，他將這所歸屬他管理的傳教士大學視為一般軍事學校，政令上清楚的規定：「當波帕揚的教會大學建立並開始運作之後，神父們應毫無遲延的盡速離開。」

1845 年 5 月 30 日，神父們讀了這條政令，並如同小綿羊般的服從。羅曼被任命為這所學校的校長。幾天之後，又頒布一項新法令：將初學院遷移至這所新的教會大學。這是一件愚蠢的決定，因為對日漸增多的入會者來說，波帕揚過於遙遠。然而，他們必須服從，在波哥大頗有成就的神父們準備離開。

第二次驅逐

反耶穌會的一方終於獲勝。該國政府官員及總統本人常常與耶穌會的院長開會；有些人抱著試探性，從不表達他們的意向；其他的人則恐嚇他們，控訴不斷：耶穌會所喜愛的保守派對抗民主自由派；在他們中間有些專欄作家支持本國的幾省與厄瓜多爾合併，然而，這些作家在該國是非法居留。

議會於 1850 年 5 月 17 日開會決定耶穌會士的去留，投票結果只有一票贊成驅逐這些傳教士。18 日，國會議員及推動驅逐耶穌會士的代表們一起聚餐，祕密商談。19 日，政府發布戒嚴令並徵募軍隊；20 日，極力主張驅逐耶穌會士的奧本多 (Obando) 將軍被派在波帕揚及帕斯特 (Pasto) 兩地執行驅逐令，同時也將武器分給當地的大學生。

21 日，驅逐令發布在官方的公報上，這是一份專刊並附有總

統的聲明，內容為：「各位市民：幾名耶穌會神父在本國重要城市裡煽動人民……」

同一天，耶穌會在哥倫比亞的最高上司維斯特（Visitor）神父得知這項命令。23日清晨兩點，為避免引起任何麻煩，在波哥大的神父們悄悄的離去了。

他們在哥倫比亞停留了六年，即1844年到1850年。

厄瓜多爾

法令簽署後四十天內，即是在7月14日，耶穌會士完全被趕出新格瑞那達，連離境的路線也要按照規定。通往厄瓜多爾最便捷的路只有哥倫比亞人才可以走；西班牙人必須經過聖塔瑪塔及巴拿馬地峽再向南到厄瓜多爾的一處港口。羅曼是其中的一人。

即使在巴拿馬的土地上，當權者依舊派人尾隨他，並且設法阻止他乘船前往厄瓜多爾，但是他逃過了他們的警戒，下了船，穿過地峽，搭上一艘向南駛的船。船上一位文質彬彬的青年很快與這些神父們交談，他就是厄瓜多爾未來的總統加西亞·莫雷諾（García Moreno）。

在哥倫比亞的布維那文士（Buenaventura）港，有一個帶著護衛隊的人上了船，當他看見這些神父時，他以兇狠的眼光注視他們。他就是把他們趕出哥倫比亞並發誓要把他們逐出厄瓜多爾的奧本多，現在，他又發誓不許他們在瓜亞基爾（Guayaquil）登陸。

加西亞·莫雷諾察覺到他的計謀，決定要破壞這項計畫。8月4日破曉之前，當船駛進瓜亞基爾港口尚未下錨之前，加西亞·莫雷諾來到迪亞哥·諾波亞（Don Diego Noboa）的床前，因為諾波亞是瓜亞基爾最高掌權者，也是奧本多為達到他的目的必

須聯絡的人。加西亞·莫雷諾說服了他，因而耶穌會士能在一小時內上岸。

但是，假如奧本多未能阻止耶穌會士進入厄瓜多爾，他也會暗示諾波亞禁止他們到國內各地去。西班牙大使提出了抗議，耶穌會士才獲准能自由行動，可到任何地方。他們在瓜亞基爾停留了三個月之後，大部分的會士都前往基多（Ouito），在那裡他們展開了使徒工作，直到今天，人們仍記憶猶新。

哥倫比亞政府召開立法會議討論耶穌會士重返的問題。五萬人連署簽名，要求再開闢耶穌會傳教工作，支持者遠遠大過少數的反對者，最後的決定是，他們不但可以在國內駐留，而且歸還他們上次被驅逐前所擁有的教堂及房舍。

當地人民以響亮的鐘聲接受這個好消息。1851年4月1日，軍隊遊行表示慶祝，4月2日正逢耶穌會被逐出西班牙領地的紀念日，政府頒布法令恢復他們原有的工作，並正式歸還他們所有的財產。

第三次驅逐

然而好景不常。新總統烏爾比那（Urbina）為獲得民心，起先表現得溫和穩健，但是一年之後，他便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國家大事。1852年7月17日，他召集會議審查前任政府所作的決定。眾人所期盼的是，首先要恢復耶穌會的合法性，但是，情況並非如此。會議在9月29日才討論這個議題，在一次祕密會議中，與會者相繼發言，宣稱耶穌會有害公眾的安定生活，因此，應該予以驅逐。這一切都在一次會議中決定，烏爾比那做了哥倫比亞總統沒有做的事，即是將責任推給議會。

他沒有預料到羣眾的反應。當消息一發布後，一大羣人聚集

到廣場上，大聲喊叫。軍隊開到街上，不是鎮壓而是平息羣眾的憤怒，但是，他們未能成功，因此便轉向總主教求救。總主教接受他們的請求，這種行為使他被冠上出賣自己給總統及反對耶穌會的污名，而事實上，他並未如此做。

總統又採行另一種詭計，即是：雖然驅逐耶穌會士的命令已開始執行，但是假如他們自行離開，他們將會獲得最大的禮遇，旅費由官方支付，及保證提供未來一年的生活費。耶穌會士拒絕這項優待，他們願意被迫離境。

最後，暗示他們被驅逐的正式命令是由皮欽查（Pichincha）省的省長發布，准許他們「在四十八小時內安全離境」。議會的命令送達樂於助人的總主教，請他給相關人士看，但是不可留在他的手中。

1852年11月21日，星期日，耶穌會士在基多的會院遭到軍隊的包圍。午夜時分，有人看見他們在衛兵的押解下走出來。當貝拉斯（Blas）神父走過門檻時，加西亞·莫雷諾喊出這句預言：「再見了，神父！十年後我們會在主教座堂詠唱讚主曲。」

在黑夜中離開基多的耶穌會士共有三十四名。他們在厄瓜多爾不到兩年，由1850年到1852年。

囚犯

他們取道洛哈（Loja）向祕魯出發，並不是有人告訴他們這樣走，這條困難的路線將穿越安底斯山脈最陡峭的部分。他們離開里奧班巴（Riobamba）抵達昆卡（Cuenca），凌晨一時，當他們正在休息時，一名暴徒率領一組護衛隊前來把他們從床上拉起來，強迫他們折回原地，然後將他們遣送到瓜亞基爾南邊的那蘭哈（Naranjal）港，這違反他們在基多所接到的命令。這名暴徒不

顧他們的抗議而將他們遣送到巴拿馬，甚至當他們經過瓜亞基爾時也不准許他們購買新衣。

當他們到達巴拿馬時，才知道這一切都得到哥倫比亞當局的默許。在靠近巴拿馬的塔沃加（Taboga）島下錨後不久，港口總督派另一組護衛隊向著船隻喊叫並企圖扣押他們。神父們拒絕下船；他們宣稱，在他們未踏上巴拿馬土地的情形下，巴國無權阻止他們前往哥斯大黎加。

總督上了船為執行命令，大聲向他們說出讓他們自由前往牙買加的計畫。羅曼代替眾人回答，他的理由及彬彬有禮的態度使總督無言以對。

但是，他們被關在船上，並且被士兵包圍，因此，他們決定讓步。他們立刻被帶上岸，在兩排軍隊的戒護之下穿過街道，然後被帶到市區中心大樓的陽台上，面對羣眾，不久，無數紅色皮膚、骯髒、衣服襤褸的旁觀者便聚攏過來觀看他們。

第二天，他們被帶往大西洋岸的科隆（Colón）城，然後被安置在一艘開往紐奧良的丹麥籍帆船上。船長名為彼得遜（Peterson），他與新格瑞那達政府簽下協定將這些傳教士送往他地。

幾天之後，這些耶穌會士藉著談話使他知道他們不是犯人，他沒有責任遵守那項不公平的協定，假如他讓他們在中美洲的一個港口下船，這樣對雙方都好。

彼得遜被說服並准許他們在尼加拉瓜共和國的聖若望德爾蒙特（San Juan del Norte）港下船。

瓜地馬拉

終於他們能自由前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了，瓜地馬拉是他們選擇的地方，耶穌會在當地剛重建他們的傳教工作，政府也提供

最好的條件。1853年的5月中旬，在離開基多後六個月，他們抵達了首都，屬於新格瑞那達傳教區的會士也來到這裡。

人數的增加使得工作快速發展。耶穌會士開始出現在各地。拉梅西（La Merced）地方的修院及教堂都歸還他們，貝拉斯（Pablo de Blas）神父擔任院長；羅曼神父掌管學校；沒有在都市擔任傳教工作的耶穌會士開始前往內地展開新的工作。

福傳的成績卓著，持續的發展使他們建立了一個完全自主的省會。設立初學院，羅曼神父擔任院長及初學導師。正常的人事調動，如派會士到其他國家，使該國的總統卡雷拉（Carrera）將軍大為不悅。當瓜地馬拉的傳教區由新格瑞那達爭取幾位傳教士，並且院長駐在該國時，他才平息了心中的氣憤。

1838年在一次政變中，這位總統奪得了政權，他用鐵腕統治這個國家。1854年，他使自己成為終生的總統。1863年，戰勝了薩爾瓦多之後，他有新的計畫。他向新上任的院長羅曼神父說明薩爾瓦多的首都及其他主要城市有福傳的需要，他支持總統的計畫。在該地的福傳工作沒有好的開始，但是卻有好的結果，這使耶穌會能有機會進入鄰近的國家。

第四次驅逐

1865年4月14日，總統卡雷拉將軍的逝世使美好的日子即將告一段落，當時一切平靜如常。透過選舉瑟那（Marshal Don Vicente Cerna）繼任總統職位，他上任時還執行前任總統的政策，但是在1871年6月3日，由格那多（Miguel García Granado）將軍及巴瑞歐斯（Justo Rufino Barrios）將軍所策劃的政變所推翻，他們兩人的軍隊於30日開進首都，7月1日，政權由新政府接掌。

耶穌會士成為卡雷拉將軍無條件的支持著，也要為他承受一

些痛苦。令人驚訝的暴動首先發生在克薩爾特南戈（Quezaltenango）鎮，神父們在此開辦一所學校，8月12日巴瑞歐斯命令議會召開會議，簽署一項立即驅逐耶穌會士的協定。晚上九時，他們得到口頭命令要他們在凌晨三點離開此地。這個小團體的院長請求看在生病神父的面上延後離開的期限，巴瑞歐斯給了他粗暴無理的回答：

「即使要他躺在馬背上，你們也必須走。」

羅曼向「公民總統」提出正式抗議，而他卻給予帶有諷刺性的回答：

「神父，我要盡忠職守，不能違背他們的意願。」

「是的，總統先生，假如按照剛宣布的自由原則，當人受到欺壓時，而你卻未能保護他的安全。我無話可說。」

耶穌會士在克薩爾特南戈所遭遇到的，在瓜地馬拉也同樣遇到。1871年9月3日星期天，他們的院長收到軍事部長的命令，要他召集「所有的神父、初學修士及輔理修士於凌晨四時集合在特利騰（Tridentine）大學前，有車輛送他們到聖若瑟（San José）港，本月5日乘船前往巴拿馬。」命令中也客氣的祝他們「一帆風順」。

這種倉促的決定並未產生多大作用，因為人民有時間聚集起來，為神父們的離去悲傷不已。

「他們怎麼說老百姓不喜歡你們呢？」車伕很驚訝的問道。

耶穌會士在瓜地馬拉傳教十八年，由1853年到1871年。

尼加拉瓜

七十二位被迫離境的耶穌會士必須乘坐北美蒸汽船聖薩爾瓦多號，但是船長不願意接受他們，因為他不歡迎囚犯搭乘他的

船。羅曼派一位神父上船請求他准許他們搭船。終於在 1871 年 9 月 11 日他們離開聖若瑟港。

羅曼不要他的弟兄離開中美洲，也不要離開瓜地馬拉，他嘗試留幾位弟兄在薩爾瓦多的阿卡胡特拉（Acajutla）港，但是卻未能如願。瓜地馬拉政府希望將對耶穌會士的迫害擴散到鄰近國家，於是要求薩爾瓦多的總統不要特赦這些被他驅逐的傳教士。因此，薩國沒有一處港口准許他們上岸。

宏都拉斯也拒絕他們。現在只有尼加拉瓜及哥斯大黎加兩個國家。在船上正巧有一名尼加拉瓜的紳士，他主動為他們交涉在科林托（Corinto）港下船，並且成功的獲得准許。9 月 15 日，中美洲獨立紀念日的當天，在五彩繽紛的煙火、悅耳的鐘聲及悠揚的音樂中，羅曼和他的「部隊」下船踏上陸地。

羅曼立刻通知主教及李昂（León）行政區的長官，9 月 18 日凌晨三時，他們一邊詠唱〈萬福海星歌〉，一邊渡過海灣。主教無條件接納他們；長官則做了這樣的表示：這不是合法及明確的恢復耶穌會，而是基於個人因素的純政治特赦。

不安的狀況並未阻止他們著手工作；由於政府不許他們開辦學校教育青年，他們便在全國各地宣講福音，從最出名的城市到最遙遠的鄉村。當加西亞·莫雷諾向耶穌會士打開自己國家的大門時，有些人認為他們在尼加拉瓜面臨危險，最好將人員調往厄瓜多爾。羅曼不同意這種看法，而事實也證明他是對的。他在 1874 年被任命為美洲傳教地區會長的職位，他能由宏觀角度來看他所深知的這些國家。

反耶穌會士協議

瓜地馬拉政府也贊同將耶穌會士趕出中美洲，並與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及尼加拉瓜政府簽訂協議，將耶穌會士自中美洲的所有國家逐出，這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壓力。

首先採取行動的是薩爾瓦多，因為國內只有兩名耶穌會士，為避免惹上臭名，政府要求主教命令他們兩人離境，他拒絕了。於是政府假裝取消行動，但是在 1872 年 6 月 5 日聖心節晚上九時，當神父完成一天工作準備就寢時，兩名士兵出現在他們面前，其中之一將他接到的命令給他們看，上面寫道：「由於耶穌會神父拒絕正大光明的離去……因此，你要強迫他們立即離去。」所謂「立即」便是當晚的十一時。

如此，耶穌會士結束在薩爾瓦多三年（1869-1872）的福傳工作。

1881 年，尼加拉瓜總統查瓦拉（Zavala）以一道無人相信的荒謬法令驅逐耶穌會士。7 月 7 日，二百名身強體健的步兵包圍他們在李昂的會院，另一支人數相等的軍隊把守教堂及通往教堂的街道。10 日，他們全部前往巴拿馬。

耶穌會士在尼加拉瓜共十年，由 1871 年至 1881 年。

哥斯大黎加

雖然在哥斯大黎加的危險性較小，但是他們停留的時間卻較短。1876 年，他們受瓜第亞（Guardia）總統個人之邀來到這裡，並在卡塔戈（Cartago）開辦學校，當他於 1882 年逝世後，他的繼承者無法阻止反耶穌會士的勢力，在做了些微的抵抗後，他終於讓步。1884 年 7 月 18 日，卡塔戈的省長接到來自軍方的電報說：「請通知耶穌會神父，他們必須到聖磊思大學前集合，等候進一步的命令，不許與外界聯絡。」

耶穌會士被帶往車站，搭上前往首都聖若瑟的火車。他們在

首都被逮捕，解送往卡里略（Carrillo），於晚上十時三十分到達，疲憊不堪，汗流浹背，滿面灰塵但卻平安到達，隨即搭乘另一班火車，前往利蒙（Limon）港。19日清晨，他們的囚車抵達目的地。

20日，在軍樂的吹奏中，一位軍官及六名士兵來到他們面前，當音樂停止時，他遞給他們一張驅逐令。

到1884年，中美洲已經沒有一位耶穌會士，但是告訴我們這件事的歷史學家表示：「中美洲傳教區又成為哥倫比亞的地區了。」、「哥倫比亞再度向耶穌會士打開大門，他們之中有被中美洲驅逐的一些傳教士。」

長者

我們的老戰士剛放下武器。當耶穌會士在7月離開哥斯大黎加時，安德利迪（Anton Anderledy）接替羅曼的職位，代理總會長在信中寫道：「除了天主外，羅曼在厄瓜多爾及中美洲福傳的成就無人能出其右。」

他說得對，尤其從1863年後，當整個傳教地區在他的掌握中時，羅曼曾經扮演主導者的角色。當耶穌會士離開中美洲時，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長者，半盲的他，已退休，住在基多大學，將時間用於撰寫依納爵神操的註解，這是他長時間默想的結果。

1886年8月8日的早晨，他與世長辭。

5. 耶穌會士及詩人： 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身為耶穌會士同時又是一位詩人，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對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卻不然，他是道地的耶穌會士，也是道地的一位詩人，他覺得這種身分的碰撞在他體內產生了一股電流。

最具原創性的英國詩人

霍普金斯活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1837-1901）並從事詩歌創作，在這長久的統治時代中，每一種東西，從人的禮貌態度到家具都冠以維多利亞時代之名。由此看來，霍普金斯應該稱為維多利亞詩人，但是他卻不是，因為他的詩具有一種根源性，與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不合。西班牙偉大詩人阿隆索（Dámaso Alonso）對他的評論是：「在維多利亞詩歌的主流中，霍普金斯是一個奇蹟，一位具有強烈欲望的藝術家，一位謹慎的工作者，一位迷人詩歌世界的創造者，具有超越文字的感覺，若有任何一顆對美如此敏銳、能接受音符最微弱的震動、並要一探究竟的心，就非霍普金斯莫屬了。」

我們的詩人在各方面都具有確切性，這便是他之所以具有原創性的原因。他發自己詩文的行事及押韻，甚至字彙，有時他不遵守文法，也不受法則的約束。

他的詩不是讓人閱讀的，是讓人聽的，是一種音樂。他採用頭韻法及擬音字，有時如低語般的柔和，有時卻如鞭子揮打般的

堅硬。

這一切都使他成為「瘋狂的詩人」及「最原創的英國詩人」。

學生

他對美的敏感來自他的父母及日後教育的培養。他的父親酷愛詩歌，而對藝術的喜愛是來自母親的家庭。他有一位既是音樂家又是人像畫家的姨母發現他在藝術上非比尋常的天分，因而親自教他音樂及畫畫。霍普金斯開始作曲及畫畫，當他五歲時便讀詩及欣賞別人的詩，十歲時首次獲得詩歌創作獎。

家人注意到他的早熟，但並未因他所具有的原創性而放任他。他還具有正在發展中的特質，如：細膩、憐憫、勇氣及不動搖的忠貞。

1863年，在他十九歲時，因獲得牛津大學巴利奧（Balliol）學院的獎學金而使他的生命有重大的改變。如拉格爾斯（Ruggles）所說：「從海蓋（Highgate）文法學校到牛津就如同飛上枝頭變鳳凰。」巴利奧是牛津大學各學院中水準最高的學院；霍普金斯全心投入學業，成為最傑出的學生；他被稱為「巴利奧之星」。他交了三位終生摯友，其中兩人是天主教徒，一位是詩人，也是他詩作的管理人。

在巴利奧求學的頭兩年，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名愛美的青年，無憂無慮，參與牛津的社交生活，常常同別人共進早餐、喝茶、飲酒，與友人散步於綠油油的鄉間。

內心的困擾

然而，日後內心的一些問題深深困擾著他。那幾年正是「牛津運動」的熾熱時期，它從復興英國國教開始，但是卻以對它提

出質疑為結束，其代表人物便是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他改信羅馬天主教。全心尋找真理的霍普金斯嗅到這股氣息，細心觀察，反省並作了結論。1865年初夏，他與朋友艾迪斯（Addis）來到伯爾蒙（Belmont）的本篤會修院與未來的院長萊諾（Canon Raynal）長談，他在這兩名年輕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迪斯寫道：「我相信從那一刻起，我們英國國教的信仰就消失了。」

霍普金斯的日記中充滿了懷疑、焦慮、害怕及希望。到1866年7月17日，他內心的困擾達到最高潮，他在日記中寫道：「昨晚，我清楚看到，留在英國國教裡是不可能的了，我決定在放假之前，就是在三個月之內我不對任何人說，畢業後，我才會採取行動。」

8月28日，他寫信給紐曼，請求與他會面：「我極渴望成為天主教徒……我已經下定決心，但是成為天主教徒的必要性突然使我在面臨自己迫切的責任時，陷入痛苦的迷亂中。」然後就住進伯明罕教區神父修院。

可憐的年輕人必須等待，因為紐曼出國去了。9月14日，紐曼回信說：「我樂於見你，你訂個日子吧。」

與紐曼會面

霍普金斯第一次見到這位傳奇性的人物。出現在這位年輕訪客眼前的是一位瘦高、斜肩、飽經風霜的老人，他以輕快、古典、高雅的言語及「輕柔、緊張、富有情感、觸電般」的擁抱歡迎他。

這位年長的皈依者與這名青年談了一段時間。好多次，霍普金斯緊張得起身要走，而主人以柔和的手勢挽留他。「紐曼博士

極為慈祥，我的意思是指真誠而不嚴肅的慈祥，不急也不緩，說真的，他非常善解人意。」

當他們兩人的辯論接近尾聲時，霍普金斯失望的說：

「我看出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

紐曼笑著說：「我也一樣。」

他給霍普金斯建議的退路便是要他在一個月內回到教區修院，並被院方接受，換言之，就是加入羅馬天主教，這違背了「畢業前不採取任何行動」的計畫，但是他還是接受這項建議。他將此決定稟告父母，「他們的答覆真可怕，我無法再聽第二次。」他也將自己的決定告訴幾位朋友及教授，他們的反應從氣憤到驚訝到無奈的放棄。他的父母哀求他等六個月他得到學位之後再採取行動，然而他是不可能接受這種請求的。一名皈依者是無法等待的。延長這種懸而未決的情況是違背他的良心的。

霍普金斯寫信給紐曼問道：「你希望我立刻就到伯明罕去嗎？星期四、星期五或星期六？」根據紐曼的日記，他在 186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到了伯明罕，「10 月 21 日，接納來自牛津的霍普金斯先生。」

霍普金斯何時該作他的第一次退省成了討論的問題。紐曼以堅定的語氣寫道：「我認為這並不是最迫切的，你的首要責任是好好求學，讓你家鄉的朋友知道，你成為天主教徒後並沒有忽略你眼前的責任。」

這個忠告有了好結果，1867 年霍普金斯以優異成績自大學畢業。假如把當時他內心的困擾考慮進去，他的成就更顯得卓著非凡。

那年暑假他在國外度過，9 月他到伯明罕去，並應邀在修院學校教半年的希臘文及拉丁文。雖然他不喜歡教書，但是他沒有

其他工作，也不能忽視紐曼博士的心意。

他開始想自己的人生方向。他雖然改信天主教，但是並不阻止他選擇自己喜愛的職業。過去，他曾希望自己成為一名畫家。但是，要將自己獻給天主的願望卻要求完全的奉獻，為一名藝術家，這是不可能的。他覺得藝術會吞噬一個人，而他要將自己完全交給天主。

他要加入教區修院嗎？他知道紐曼一定歡迎他。本篤會呢？但是他們的定居一處及團體的自給自足並不吸引他。紐曼勸他去作退省並決定自己的聖召。半年的時間，他以冷靜態度觀察一位年輕的講師。1868年5月，霍普金斯告訴紐曼，他已經決定要當耶穌會士，紐曼立刻回信：「我一方面感到驚訝，一方面為你高興……我想這最適合你。」

耶穌會士

自從他皈依後，他第一次感到心靈的平安。帶著那份新的安全感，他把自己所寫的詩都燒掉，沒有人要他做這種全燔祭，毀掉這些珍貴又屬於個人的作品完全出於他自己的決定。他向他的朋友布里吉斯（Bridges）說：「我看出它們會影響我目前的狀況和聖召。」他把自己的地址告訴他，假如他到倫敦，請來探望他。

耶穌會初學院所在地羅漢普頓（Roehampton）是倫敦南面一處寧靜的郊區，稀少的房屋及大片的草地。1868年9月7日的晚上，他來到這裡，以最大的熱誠學習耶穌會會規並努力吸取其精神。他不放過刻苦犧牲的機會。

1870年9月8日，二十六歲的霍普金斯誓發初願，二十四小時後前往斯托尼赫斯特（Stonyhurst），開始在耶穌會內的讀書生涯。他的日記清楚記載了他的改變，他的筆記愈來愈多，內容豐

富，見解過人，獨具個人風格。那些都是一位藝術家的作品，是未來經典之作的雛形。

但是他仍然遵守為自己設下的限制，除非有院長的命令，否則絕不寫詩。因此，雖然他一頁一頁不停的寫日記，而詩歌卻悄然無聲。

直到聖布諾（St Beuno）神學院院長鐘斯（Jones）神父打開了水閘之門，水才開始暢然流出。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1875年12月7日，五名被德國驅逐的方濟會修女，因她們的船「德國號」在泰晤士河口三角洲遇到暴風雪，在肯特郡（Kent）的海岸擱淺，而船已損毀。消息傳到聖布諾神學院，正巧，霍普金斯目睹院長深受此意外事件影響的經過，而院長表示希望有人能以這主題寫一首詩。

這便是霍普金斯經典之作〈德國號船難〉（*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他七年密集的修道生活都呈現在這篇詩中，在這首湧流自他安靜心靈的頌歌中」（萊內爾斯，Linares）。沉船的片段與他生命中重要的事蹟交織在一起，即是他的皈依天主教，對降生道理的讚歌，對罪惡與全能天主和好的讚頌，他都以無比的真情寫下這一切。許多人視他這首詩為依納爵神操的詩歌體。

他在聖布諾神學院的最後幾個月是他生命中創作詩歌最多的時期。1877年，他晉升為司鐸，他沒有忘記告訴紐曼。這位可敬的長者也沒有忘記他曾保護過並且每年寫一、兩行詩寄給他的青年皈依者，只是對他的記憶已模糊不清。如今，他站在自己的桌子前，肩膀彎曲，脖子向前伸，無神的雙眼和鷹勾鼻都深陷在他用細長手指翻動的無數舊日備忘錄、信件及日記中，他盡力地寫道：「親愛的神父，由於我的手已無力寫字，若來函未覆，敬請

見諒。」然後又加上附註：「恭喜晉升鐸品」。

受考驗的歲月

霍普金斯日後的生活充滿考驗。第一個打擊便是他將自己的詩作〈德國號船難〉送到耶穌會發行的期刊 *The Month* 請求刊登。編輯神父亨利·可勒利吉 (Henry Coleridge) 立刻接受，但是當他重讀時，因不合他的風格，而退回稿件。

退稿一事影響霍普金斯日後對出版自己詩集的態度。他的朋友欣賞他，鼓勵他創作及出版，然而耶穌會士卻無這股熱誠。

其他的痛苦接踵而來，似乎他的院長都不知道如何看待他，他們似乎都在說：「一位詩人在耶穌會裡有什麼用？」在四年之內 (1879-1883) 他被派擔任九種不同的工作，包括做第三年培育及全職的行政、教書和宣道工作。

1884年初，他突然被派往都柏林擔任兩項工作，一是在大學教拉丁文及希臘文，一是擔任愛爾蘭皇家大學校長。他是紐曼的繼任者，後者曾於1854年至1858年擔任首任校長。事實上，這是出自牛津大學前任教授的稱讚和推薦，並且是一項極高的榮譽，但是他感覺自己內心劇烈的改變，一方面來自對教職的無力感，一方面出自對祖國之愛，無法忍受那些年瀰漫於愛爾蘭的反英國氣氛。

1884年2月他到任，幾天後，即2月20日他寫信給紐曼說：「我從這個我不曾想到會來的地方寫信給您，一所天主教大學。在您的領導下，曾經長久以來鬱鬱寡歡、了無生趣的愛爾蘭，如今靠天主的幫助，希望能不斷的走在成功之路上。從使我來到這裡的事件上，我看見天主護佑的手，深感自己不配擔任此職務，這種感覺使我未能善盡職守，不過，或許天主悅樂的事總是由軟

弱與害怕開始吧！」

經驗使他不再害怕。然而，這位詩人過於理想化而無法成為好教授。他那引人注意的怪癖已使他惡名昭彰，成為眾人聊天的話題。他的授課及獨具風格的演講常激怒學生，使他們想要捉弄他一番，但是，若學生太過分，他也會轉變。據說這位羞怯的老師，受到課堂上心不在焉的學生所刺激，就請一名學生躺在教室的地上，接著他抓住學生的腳跟在地上拖行，以此解說荷馬史詩中阿基里斯（Achilles）拖著海克特（Hector）的遺體繞城的場景。

他陷入深深的憂鬱之中，並且已瀕臨絕望。寫詩的靈感不復湧現，有時一些靈感卻違反他的意願。就在此時，他寫了〈可怖的十四行詩〉（*Terrible Sonnets*），作品中充滿了哀傷。他不諱言的說：「我快要發狂了。」

他生命中最後兩年所創作的詩，使他走出了憂鬱並重新得到心靈的平靜。1889年6月8日星期六，傷寒奪走了他的生命。在領受了臨終聖事後，他努力的低語說：「我心滿意足了。」

身後之譽

他曾寫道：「對自己成就少，浪費時間多，深感汗顏。」

1975年12月8日，是他寫下這句話的八十六年之後，在西敏寺舉行的紀念會證明他沒有浪費時間；那天，英國在該寺的詩人區豎立一塊匾額，給予他偉大詩人的榮譽。

當他去世時，很少人讀過他的作品，幾年後才漸漸為眾人所知。他的詩是他的詩人朋友及作品保管者布里吉斯（Robert Bridges）的初級老師。布里吉斯激烈的反對天主教和耶穌會士，並且是一名自由思想者，但卻是一位偉大的桂冠詩人，常受邀為國家的重大事件寫詩，但是他言行謹慎，他知道霍普金斯的詩深奧

難懂，一般大眾還無法接受，因此，布里吉斯從霍普金斯的詩中選出一些作品，為他出版一本詩文選集。經過十年的耐心等待，詩集終於在 1918 年出版。

詩集的第一版銷售了十年，但是，在這漫長的時間裡，讀者不斷發現詩中包含的希有價值，即新又奇，一時之間，霍普金斯成為流行人物，人人都在談論他。1930 年詩集再版，1937 年通俗本出版；兩年後，英文版的牛津書集將他的四首詩選入其中；1975 年當追認他的匾額在西敏寺揭幕時，全英國都正式尊崇他為一位偉大的詩人。

6. 焦達納格布爾的使徒： 康斯坦·利芬斯 (Constant Lievens, 1856-1893)

焦達納格布爾的使徒

利芬斯的名字與焦達納格布爾（Chotanagpur）密不可分，就如同羅伯·諾比理（Roberto de Nobil）與馬度雷（Madurai）、利瑪竇與中國密不可分一樣。他福傳的高超本領使這個印度地區名聞遐邇。

焦達納格布爾是指比哈爾（Bihar）以東的山區及孟加拉以西邊界的地區。稱為阿迪瓦西史（Adivasis）人的當地居民（約七百萬至八百萬人）為原住民，是印度最早的住民，分別屬於十二個少數民族，主要是蒙達族（Munda）、卡里亞族（Kharia）和奧昂族（Oraon），每一族有各自的語言。公元 500 年征服者雅利安（Aryan）人將他們逐出恆河（Gangetic）平原，他們便逃亡到東邊的森林和山區，即焦達納格布爾地區。拜這與世隔離之賜，直到十九世紀他們都能保持獨立，並保存自己原有的語言及風俗習慣。接下來便是利芬斯要面對的新入侵者，即是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商人及貸款者。

這裡的福傳工作原先委託給英國耶穌會士，1859 年移交給耶穌會比利時省。當美國密蘇里傳教地區脫離比利時省而自成一省之後，他們慷慨地接管這個新福傳地區。悲觀者視這片傳教地區為比利時省的墳場，最初幾年的確如此，會士們到達當地後，兩年之內，半數人死去。

疏忽大意？

利芬斯也沒有活多久。1885 年他來到焦達納格布爾，1891 年，由於面臨死亡的危險，他被迫休息。最初只是暫時性的，希望他能早日康復，然而，這希望卻日漸渺茫。他的健康曾一度好轉，但是，肺結核又將他擊倒，他必須退休，他看起來如一位彎腰駝背的老人。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並非氣候而是過度疲勞。當別人看見他拚命工作而過度勞累時，聰明的人會警告他說：

「神父，以你目前的工作速度，你無法在印度久留。多保重吧！」

「我不擔心自己能活多久，而擔心我能為別人做多少。工作愈快，救的靈魂也愈多。」

直到他生命的末刻，他都被人指責不夠謹慎，而他的回答總是：「我們可以設想有人要淹死了，在人性中謹慎的聲音說：『不要跳下去』，另一個聲音說：『冒生命之險跳下去救人』。謹慎是懶惰之母。十年內做一百件事，比活一百年無所事事要好得多。」

利芬斯的身體極為虛弱；十年中他什麼也不能做。

或許他真的粗心大意並浪費自己的精力，但是他對未來的工作卻很謹慎。「假如沒有神父在這裡，讓這些人接受信仰有何用？」他質疑上級不派人來支援他，在給省會長的信中他寫道：「假如沒有神父陪伴我們的慕道者，最好不要讓他們接受信仰。」

團結的大家庭

他的童年培養了他度犧牲與慷慨的生活。他出生在一個典型

的比利時農村家庭，是十一個孩子中的老七。那是一個貧窮的家庭，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卻是家人之間的愛與慷慨。

當他十一歲時，母親的突然去世，使他必須輟學。昔日母親一人擔負的家務及農場上的工作，現在由大家分擔，康斯坦負責把牛帶到草地上吃草。日後他仍記得自己如何走在牠們後面，如何呼喚牠們的名字及當牠們轉過頭來以口鼻對著他時，他能從牠們眼中得到回應。

很快，他的職位便提升了，即是照顧農場的兩匹馬，餵牠們麥片及乾草，將馬具架在牠們身上，有時，他甚至騎在牠們背上。他的騎馬技術有助於他日後在焦達納格布爾的工作。

「我只是一名窮農人」

穆爾斯利（Moorslede）的代理主教對這名聰明少年極有興趣，他常路過那裡和他聊天，對他富有智慧的想法印象深刻。有一天，他說出早已埋藏在心中的建議：

「康斯坦，你願意當神父嗎？」

少年兩眼發光，微笑著說：

「但願我可以！」

父親同意他的選擇；代理主教為他取得免費入學的許可，1871年10月，十五歲的康斯坦進入小修院。由於過去的生活環境，使他成為一個極害羞的少年，但是，在課業上他卻有驚人的表現，尤其是語文，他精 Deutsch、英文、義大利文、甚至梵文。

暑假一到，他便迫不及待回到農場，擁抱父親及兄弟姐妹，跑到畜舍中和牛、馬打招呼，也幫助他的兄弟們。

他從魯勒斯（Roulers）小修院畢業後便進入布魯日（Bruges）大修院，並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他感到有進一步獻身天主的召

叫。唯一使他猶豫不定的是怕讓他的恩人失望，當這疑慮除去之後，他選擇進入耶穌會，因為「唯有在耶穌會裡，才能滿足天主所激發他的熱烈救靈渴望。」

他告別了親愛的家人，在 1878 年 10 月 22 日進入東強（Drongen）初學院。由於他年紀稍長（二十一歲）及已經念過神學，因此，同伴對他都有幾分敬意，而他卻抗拒地說：

「但是，我只是一名窮農人呀！」

他由家族所繼承的這種強烈的農人特性和氣質，使他成為至今仍為我們景仰的一位傳教士。

在焦達納格布爾

1885 年 3 月 18 日的深夜，利芬斯抵達焦達納格布爾地區的多蘭達（Doranda）村，受到薩巴特（Sapart）神父的歡迎。第二天，他便騎馬到鄰近的詹根（Jamgain）村，在那裡見到庫克（De Cock）神父，後者正在蒙達族及奧昂族兩族人中開始福傳工作。

利芬斯被派往詹根村開始傳教士的生活。加爾各答的總主教果特渥斯（Goethals）及耶穌會當地的院長葛洛斯金（Grosjean）都認為他是最能「形成一種風氣」的人選。普內特（Ponette）說道：「真是癡人說夢，就像要一個人憑空造雨一般，長上們向他提出這些構想，一方面表示他們服從天主的旨意，一方面表示他們深知這名年輕傳教士的特質。」

不到四個半月，利芬斯已經適應當地生活並開始工作。但是，7 月 31 日，他又再度適應新環境，因為庫克神父調往多蘭達，薩巴特神父接管詹根，利芬斯被派往「南方」，如眾所周知的，在「南方」開始的不會在那裡結束。

1885 年 9 月，他在康提（Kanti）一間小茅屋內落腳，那是他

用叢林中的樹枝親手搭建的，從這個大本營，粗心大意的利芬斯細心的控管他的地盤，當他對自己的管轄地區瞭若指掌後，他稟告主教及耶穌會院長，並在 11 月 23 日獲得他們的授權。由於馬匹已讓給了庫克神父，他就定居在托帕（Torpa）。

他的住所！「我只有一間臨時的小茅屋，而雨剛剛把它完全打壞了，目前我沒有屋子，沒有家具，只有每個月來自加爾各答的二十五元盧比。我通常都赤著腳，這樣既經濟又舒適，雖然在石頭路上是有些難走的。能睡覺時就睡，許多晚上我在樹下或畜舍中度過。」

1886 年 1 月，基督徒人數由五十名增加到三百名，4 月時，增加到五百名；當葛洛斯金神父探訪他在托帕簡陋不堪的屋子時，發現他被九百名基督徒包圍著。他寫道：「基督徒很崇拜他。」曾經掌管這地區的新教路德派傳教士煽動民眾，並稱他為魔鬼的同夥。一年內基督徒人數增加到一千二百人，1887 年 5 月，人數到達一萬人。

他的窮苦得到當地一位警官的同情，雖然他是一名婆羅門教信徒，但是他允許利芬斯使用在他的小平房後面的一間側屋。除了這一間寄住的房屋外，還給他一張帆布床、一些米和雞蛋，最可貴的是提供他英屬殖民地繁複的法律之相關資訊。

每一個鄉村都有一名稱為「提克達」（Tikkedar）的收稅員，按照慣例他們都成為地主；每兩個、三個或四個鄉村有一名警長，而整個地區則受「拉傑」（Rajah）的管轄。收稅員將所收的稅金交給警長，警長交給「拉傑」，「拉傑」再交給英國殖民官。

由於當地人民的無知，因而勒索之事極為普遍。例如，收稅員常收了某人的稅金而不開收據，幾個月後，他們再來收一次。

「我已經繳過了。」

「收據呢？」

假如不幸的農民堅持自己已繳過，便會遭到一頓毒打。任何託詞都會使他們遭受牢獄之災，他們的牛羊被沒收，情況在一夕之間變得悲慘無比。

爭取公理

利芬斯充滿正義感，並且設法要終止這種惡行。當首次有人向他抱怨時，他說：

「我們要上法庭控告他們。」

「不要去，神父。收稅員很狡猾。」

「什麼？就讓他們這樣嗎？難道這不是你們的權利嗎？」

「是啊！」

「好！你們將看見神父不會向收稅員低頭。」

他們的控告一直上到蘭契（Ranchi）省的法院，利芬斯全程勝訴。英國法官佩服這位傳教士的勇氣，並成為他忠實的朋友。托帕村有一位能保護原住民權益的司鐸的傳言，由一村傳到另一村。上訴的案件大量增加，而他每次都勝訴。祕訣是在初步調查後，如果他不確信其公理，他就不接手。

消息不斷傳到各村，成千上萬的原住民來到他的住處。1888年葛洛斯金神父來探訪他時，他算一算有四千多人耐心的在他屋外等候他回來。

這樣的名聲大噪有助於他的福傳工作，但是也引起收稅員的嫉恨與迫害。有一位佛教徒要安排一位傳教士的到來，當收稅員得知此事之後，便買通一些暴徒將這名佛教徒痛打一頓，以致二十天之後，他仍不能行走或站立。利芬斯得知這事之後，便急速跑到這村莊，收集相關的資料及證據。這名佛教徒被抬到法院，

作為人證。三名收稅員及兩名暴徒被捕，送往蘭契受審。

卡蘭達加（Karandajor）地區的收稅員是十足的強盜。他的權責是每筆土地收盧比三元的稅，但是他卻要收十六元，並且不開收據。利芬斯來到這裡，聚集全村的人。收稅員與兩名擔任顧問的婆羅門教徒一起出庭，審問開始：

「你怎能收這麼多的土地稅呢？」

收稅員和顧問無言以對只能照實回答。他們不得不在一份正式文件上簽字，承認自己的欺騙行為，他們羞愧的離去，而原住民卻歡欣無比。

焦達納格布爾的收稅員誓言報復。一天，他們認為時機到了。二百五十多名基督徒為相同的案件聚集在法院，就在這同一天，利芬斯意識到這是一件生死交關的大事。他由加爾各答請來兩名最好的律師，打贏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幾乎沒有一位基督徒原住民受罰。

無法抗拒的發展

利芬斯的工作不斷增加，他出現在每一處。這種無法停止的發展及他投入的心力流露在他的信件中。

「我已分身乏術。我很後悔，因為，擔當那棟房屋的建造花去我太多時間。」（1886年3月15日）；「今天早晨，有二十五個新家庭來探訪我。」（1886年7月17日）；「我自己一個人無法應付手中的工作，有時在長途旅行中，我跌倒在地上。」（1886年7月）；「昨天有一百一十六個人來請求領洗及保護。」（1886年12月2日）；「1887年6月有一千名新領洗者。蒙達族的十一個村的全部村民都來要求受洗，這是前所未有的。」1887年5月，托帕已有一萬名基督徒，到10月增加到一萬五千名。

錢勒（Gengler）神父被派來作他的同伴，但是卻患了病；接著被派來的是他童年的朋友司麥特（De Smet）神父，但是，也因過勞而離去；隨後是卡塞特（Cazet）神父及神學生塞茲（Seitz），但是他們兩人停留不到一個月也走了。當司麥特神父的健康恢復後，又重返托帕。

1888年8月27日，利芬斯被任命為焦達納格布爾地區的長上，住在蘭契，此地成為福傳工作的中心，也是法院所在地。他的工作主要是為原住民的案子辯護，指導同伴的福傳活動，而他也自由的訪問這些村落。

他的朋友司麥特習慣稱他為「法蘭德斯之獅」，因為他需要廣大的空間，他需要在森林中奔跑。他的房間裡掛滿了地圖，儼然有如一間指揮中心；他指導他的同伴，陪伴他們，遇到困難時，他急速前往援助，在這些福傳的旅程中，他獲得「極大的享受」。

普瑞·帕撒（Puran Parsath）是蘭契法院雇用的奧昂族人。身材高大，彬彬有禮，是天生的領袖。雖然他是一位基督新教徒，但是長期以來都參加天主教的宗教活動。有一天，他遇到利芬斯並告訴他，他想要成為天主教徒，他也向利芬斯保證，所有在蘭契東南的奧昂人都有同樣的願望，只要他去一次，就能滿載而歸。

利芬斯要他召集村中的領導人到蘭契來見他。他們同意訂在6月1日星期天，並在那天全都到齊。他們代表四十個村莊。利芬斯答應一一拜訪他們，從6月7日開始他的行程。

9月8日，利芬斯寫信給他的姊妹說道：「今年我覺得很好。」

逆勢而行

1889年10月16日他首次訪問一百六十公里以西的巴威（Barway），該地人口約三萬五千人，大部分為奧昂人。在30日的信中，他寫道：「我到普創吉帕（Putrungipat）村去，在一天裡，我為一千五百五十七名男人、女人及兒童付洗。他們如同比利時人一樣，都來參加大禮彌撒。我很滿意，這是我寫信的原因。到今年年底，焦達納格布爾的基督徒人數將達到十萬人。」

這種工作需要一百七十位像利芬斯這樣勇敢的司鐸來擔任。他在每一個中心安排一名講道員掌管祈禱和教授教理工作。之前，從未有司鐸到過巴威，利芬斯發現這裡的民眾已經接受很好的信仰訓練並且準備接受洗禮。當他一走進這峽谷地區，他的名聲已傳遍每個角落。

「穿長袍的大人已經到了。」

眾多的基督信徒使地主及警察感到不安，於是他們向蘭契法院控告基督徒造反，指責傳教士煽動民眾，尤其是利芬斯。待真相大白時，對焦達納格布爾的福傳工作已造成極大的傷害。1890年3月，副省長巴利（Steuart Bayley）來到蘭契，他嚴厲指責幾名官員以私人恩怨為立場所作出的不公平裁判。其中一位官員因毫無理由卻在判決中惡意誣告天主教傳教士而遭到申誡。

然而，其他打擊接踵而至。首先是他的父親於1889年2月底去世。隨悲傷而來的是一線希望，是比利時省要派來十八位新傳教士，利芬斯希望能有幾位來巴威幫助這裡的四萬名新信友。但是，一切希望都落空。

隨後他接到停止發展新工作的命令，強化已有的工作，固守已建立的中心。1891年，這「福傳地區的長上」成為該地的「協

調人」，這種巧妙的權力分配是要削減他的衝勁。

無人能阻擋他。當他在蘭契執行與正義有關的工作時，他獨自處理所有問題，在巴威也是如此。他裝好馬鞍，騎上馬，奔向目的地。為了趕路，很多夜晚也在馬上度過。假如他太疲倦，他就停下來，把韁繩拴在樹枝上，取下馬鞍當枕頭，就地而眠，讓天使來保護他。

十字架的陰影

他堅強的本性漸漸消失。1891年6月5日，當他回到蘭契時已病入膏肓，他被送到庫桑（Kurseong）修養，在高高喜馬拉雅山中靠近大吉嶺的地方，設有一所神學院。

當他在庫桑時，由一位與他福傳方式相反的柏森（Bodson）神父接替他的工作。新來者所採取的不良方法嚇走了許多皈依者，他們開始轉到路德教派去。利芬斯心急如焚的趕來蘭契。12月20日他最後一次到巴威去，他又被命令回蘭契。這是一項懲罰，因為他違背了上司的願望。當他回到蘭契時得知柏森神父被任命接替葛洛斯金神父，擔任西孟加拉傳教地區的長上。

在比利時，人們也談論「利芬斯的福傳方式」、在焦達納格布爾的「恩寵運動」、快而多的皈依者。宗座代表札勒斯基（Zaleski）主教寫信給教廷傳信部，控訴這位年輕比利時耶穌會神父沒有給予足夠教理講授，而為原住民付洗。對於這些指責，利芬斯的回答是：他沒有以任何物質誘惑人接受洗禮，他也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他們都是自動自發來的。至於教理，他不為了解基督信仰精要的人付洗。

利芬斯結束了他在法蘭德斯的日子。1892年8月28日當他離開焦達納格布爾時，希望能再回來，但是卻未達成心願；雖然

生前未能回來，卻在死後回來了。利芬斯屬於焦達納格布爾，他心繫那裡，當地人民視他為自己的一分子，希望擁有他的遺體，1993年他的遺體運回焦達納格布爾。

天主的騎士

為表示對他的尊敬，他也以俊美的騎士塑像出現在他的故鄉穆爾斯利村，一尊戰士的雕像，卻具有傳教士的風貌。他高高舉著十字架，似乎仍在宣講福音。馬與騎士完全相同，也在宣講，這是一匹福傳的馬，牠恭恭敬敬地低著頭，似乎在邀請旁觀者向利芬斯手中所舉起的基督俯首致敬。

對利芬斯而言，一天一匹馬是不夠用的。因為馬的體力有限，他曾經一天換過三匹馬。他真正的居所是馬鞍。如此長時間的騎在馬上，使他的雙腿都發熱。

他以特別的方法馴服他的同伴無法制服的最強悍的馬。有一次，他的院長要他將自己的馬讓給一位身體肥胖的神父使用。這個例子傳開之後，那一年利芬斯讓出了三匹馬。

一次，傳教地區的上司來作一年一度的視察，在查帳時發現利芬斯在一年之內買了四匹馬。一個貧窮的傳教地區，單單一個人竟用了這麼多匹馬。當時他一言未發，接受申誡。

他與馬已成為平等的了，牠們是他的同伴而非僕人，他照顧牠們，餵食給水，背包中最後一片麵包常留給牠們，而自己卻餓著肚子。

牠們也不教他失望。在給家人的信中他寫道：「上個月，有十三名暴徒想要打破我的頭。我的馬救了我的命，牠是最佳的飛毛腿。」

又有一次，有人告訴他，他的一名傳教員面臨危險。他立刻

騎上馬，飛奔而去，趕到時，這人正要被拖到村中廣場屠殺。他大叫一聲，衝進人羣中，在他們認出他之前，他已經抓住那名傳教員，把他放在馬背上，壓緊馬刺，勇敢的馬跳過人羣，把他和他的傳教員帶到安全的地方。

某一個雷雨之夜，他在森林中騎馬，馬已筋疲力盡，拒絕向前走。雖然只有三公里就到達目的地，但是他沒有強迫牠繼續前行，卻自行下馬，馬立刻倒地而眠。牠的騎士也模仿牠，沉沉睡去。當利芬斯在陽光中甦醒時，他看見他的馬已經死了。

7. 與馬拉加西人同在馬達加斯加島： 雅格·貝爾休 (Jacques Berthieu, 1838-1896)

偉大的海島

事實上，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的面積比法國還大。島上居民為印尼人和非洲人，講的是印尼部落的語言。最早發現馬達加斯加島的歐洲人是葡萄牙船長狄亞斯（Diego Dias），他在前往印度的航程中因迷失方向而到達這裡。在十七世紀末及十八世紀初，此處為海盜的藏身之處，但它卻是法國和英國心中想爭取的對象，最後，前者獲勝，因此，從 1896 年到 1946 年馬達加斯加成為法國的領地。

十九世紀在這裡不斷出現的是不同國王與皇后向歐洲人開放或關閉門戶，承認或禁止基督宗教，輪流倒向英國或法國。這說明為什麼在 1820 年倫敦傳教士首先來到這裡，而法國則以武力才能建立自己的殖民勢力。

1831 年首先來到這裡的天主教傳教士是兩名法國神父，雖然他們努力了十年，卻仍然無處安身。其中健在的道蒙（Dalmont）神父被指派為宗座監牧，教會當局並要求他幫助新成立的耶穌會土魯斯（Toulouse）省。麥蘭（Maillard）神父應邀到馬度雷及馬達加斯加接管新會省。這項安排獲得熱烈的回響。

農民之子

雅格·貝爾休的出現強化了這裡的工作。1873 年 7 月 31 日

他進入初學院，1875年9月26日他由馬賽（Marseilles）港出發，經過新通航的蘇伊士運河，馬達加斯加則是他最後的目的地。

他具有良好的條件。像利芬斯一樣，同為農家子弟，他有耕田種地者的美德，也在深厚基督信仰家庭中打下信仰的基礎。他不像比利時人的火爆，而是有點缺乏活力，順服，自我犧牲；但是他卻有農人的堅強與勤奮；雖然他缺少創意，但是他容易接受已有的一切，並且支持別人的提議；乍看之下，他毫不出色，但是最後他總以安靜的效率引人注視。他也沒有利芬斯般的語言天才，但是靠著自己的毅力和努力，他能說流利的馬拉加西語。

他有一種特質使他像利芬斯，即是對家人的眷愛。如同利芬斯，他常與家人保持聯絡，使自己不會忘本。利芬斯自小喪母，因此很崇拜父親；貝爾休自幼喪父，因此對母親有一份很深的情感。這份愛得到很大的回饋，當貝爾休生病時，他的年邁母親堅決要前往馬達加斯加探望他，作兒子的也無法勸阻她。

貝爾休出生在距離歐里亞克（Aurillac）十五公里的蒙洛吉斯（Monlogis）村，生長在一個辛勤工作的家庭。父親是當地傑出的行政官員，擔任市議員多年。貝爾休在距離家半公里的小型學校接受基本教育，1859年，當他十六歲時，進入小修院；六年後考入大修院；1863年5月21日晉陞司鐸。

堂區司鐸的助理

他的第一項職務便是擔任堂區司鐸傑拉克（Jalengues）的助理，這位司鐸原本期望另一名助理，因此從未接納他。貝爾休以耐心適應新環境，他深具彈性的為人處事方式使他終生異於別人。

日後，傑拉克神父的職務由拉士坎（Lascombes）神父接替，這位新堂區司鐸與他的助理相處融洽，似乎不需要容忍彼此之間

性格上的差異。貝爾休是一個負責的人，安靜而細心的工作，閒暇時間則用來讀書與研究。

九年過去了，他似乎也完全安定下來。堂區司鐸與信友似乎都不想要任何改變。但是貝爾休又如何呢？

他確實知道教區當權者有意讓他主管一個堂區。事實上，他已兩次被告知將有職務上的調動，但是卻不見動靜。

他已考慮周詳；他離家很近，與母親和家人關係密切。如何能將這棵樹連根拔起種植到一塊新的土地上，並在不同及不為人知的氣候中生長呢？

天主做了這件事。1873年10月31日，三十五歲的雅格·貝爾休，一位教區司鐸，去敲了耶穌會在波城（Pau）的初學院大門。

耶穌會士

他要適應新環境，適應一起生活但年紀比他小的初學修士們，適應緊湊的每日生活。然而他全心全意努力適應；他向那召叫他投入依納爵理想的聖召開放自己，即是：天主的光榮及人靈的得救。

在波城度過一年後，為要複習自己的神學，他轉入赫赫有名的勒皮（Vals-près-le-Puy）修院，那裡有九十名哲學生及神學生。他在那裡結識拉米爾（Ramière）神父並深受其影響。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傑出的拉米爾神父來到勒皮，我們都很高興。他領導我們作復願前的三日準備。以他獨有的、豐富又生動的表達方式，講解耶穌聖心的神學，使我們有透徹的了解，也打動我們的心。」

對貝爾休而言，與拉米爾神父的相遇極具關鍵性，他因此知

道自己未來的使徒工作必須依靠對耶穌聖心的敬禮。

他也受到瀰漫在這座修院中福傳氣氛的影響。有一次，一位來自敘利亞的修士在飯廳中講道，令貝爾休印象深刻的不是演講者帶有熱火的言詞，而是他是一名殉道者的兒子。

省會長於年底時視察這座修院，不久之後，貝爾休告訴大家：「我被派擔任馬拉加西的使徒。」

傳教士

失望正等著他。他不能登上那座大島，他必須留在大島東北邊的法國領地聖瑪利小島上。1875年12月14日他到達此地，辛勤工作到1880年3月20日，當法國政府決定依照法令驅逐耶穌會士為止。事實上，他們在1881年9月30日下午三時才真正離開。

他第二個奉派的地方是在菲納蘭索亞（Fianarantsoa）中央高原的安柏希門朵所（Ambohimandroso），貝齊寮人（Betsileo）居住的地方。1883年5月16日，法國發動戰爭，馬達加斯加出於報復而將法國人驅逐出境。傳教士被捕並解送到塔馬塔夫（Tamatave）之西的港口，關入集中營。

然而，法國軍隊不理會祖國頒布的傳教士禁令而要在軍隊中設隨軍司鐸，貝爾休便是他們心目中的人選。1885年7月31日，他擔任該國北部法軍占領區的隨軍司鐸，他將這項職務與福傳工作合併為一。內戰結束後，他奉命返回原來的工作崗位，1886年6月11日，他回到闊別三年的菲納蘭索亞。

他沒有回到安柏希門朵所，而到更重要的安柏希特（Ambohitra）傳教地區去，不再是助理而是一位堂區神父，手下有兩名助理與他一起工作。

位於塔那那利佛（Tananarivo）與菲納蘭索亞之間的安柏希特

為他們的「父母」舉行盛大歡迎儀式，他的堂區信友在他的住處堆滿了禮物，有米、雞、羊，甚至一頭小牛。但是，該市的長官拉利佛（Rarivo）卻處處為難他，他親自拜訪這位官員，表示願意合作，並請求他禁止不公平及虐待之事再度發生；他開始在法庭上為受威脅的基督徒辯護。拉利佛則提出抗議：

「但是，神父……」

「假如你把他們送上法庭，就等於傷害我；他們是我的孩子，假如你傷害他們，就是傷害我的眼睛。」

1892年正是他的工作達到巔峰的時期，福傳地區由六處增加為十五處；學校裡擠滿了學生，居民定期參加主日教理課，此時貝爾休被調往塔那那利佛以北的安德納利佛（Andrainarivo）地方去。

要接替那位已深獲當地民心、迷人又文雅的坎佩農（Campe-non）神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貝爾休全力以赴，同理信友的感覺，他告訴他們說：

「你們很傷心，但是，不要失望；不久，你們就會像愛坎佩農神父一樣愛我。」

果然如此，貝爾休的特質都表露無遺，他除了是一位心靈的牧者外，也展現自己改進農耕技術、社會工作及建築的才華。

殉道者

但是，戰雲再度密布。1894年法國向馬達加斯加下最後通牒，命令傳教士離境。1895年10月1日，兩國簽署一項新協議，將該國的各种機構納入法國的保護之下。1895年11月，貝爾休返回安德納利佛。

和平並未因此而恢復。1896年5月，在協議簽訂後的一個

月，當地發生暴動，貝爾休得知陷入動亂的是，被美那拉巴（Menalamba）人所占據，也就是他曾經工作過的北區。當地領導者鼓動離安德納利佛不遠的雷波札卡（Rabozaka）的人屠殺白人並攻擊所有參與教會活動的基督信徒，貝爾休是他們主要的對象。

法國軍隊命令馬拉加西人集中在保護區內；貝爾休沒有拋棄他的羊羣，也分擔了他們的痛苦。有一名殘暴的法國軍官公開表示要對馬拉加西人不利，貝爾休為他們求情，他的勇敢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6月6日他的人民接到命令，為遠離美那拉巴人的猛烈攻擊，要他們朝塔那那利佛的方向南移。7日黎明時分他們出發，貝爾休與他們同行。應該保護這兩千名馬拉加西人的法國軍官及士兵卻走在他們前面，沉重的行李及隨行的兒童使他們遠遠落在後面。

美那拉巴人的攻擊極為猛烈，難以抵擋。為避免被捕，他們躲到附近的村莊裡，並受到當地族人的款待，但是卻有出賣者埋伏在他們中間。當彌撒結束後，他們正要離開時，有人讓敵人進來，他們只好站住不動。

「白人在哪裡？把他交出來；假如不把他交出來，我們就要燒你們的房子。」

他們四處搜索卻毫無結果。當他們正要空手離去時，一名青年喊道：

「回來！他在這裡。」

最後的十字苦路

他們殘暴的本性完全發洩在他身上。有人用斧頭砍他的頭，沒有砍中，卻傷到皮膚，他們不許他擦拭湧出的血。他又被推來推去，敵人用槍托痛打他的身體，然後扣上手銬，把他帶往八公

里之外的安柏希特，一路上飽受他們的虐待與戲弄。安柏希特是他福傳工作的地區之一，他真希望死在那裡。有些敵人主張將他就地處死，有些人意圖將他拖往三公里以北的安比提比（Ambi-atibe），在那裡將他展示給當地的首領。

太陽已西沉，營地還在八百公尺之外。神父已筋疲力盡，幾乎不能再行走了，怎麼辦？誰能看守他？除了兩、三個想要拿他的衣服的人願意外，所有的人都拒絕。兩名美那拉巴人脫光他的外衣，只留下襯衫、褲子及鞋子，他們把他打倒在地上，想要砍斷他的手腳。

「不要，不要！」他哀求他們。

他被迫繼續前行。此時，天色已暗，神父再也無法行走。其中一名頭子雷尼米里唯拉（Rainimiarivelo）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處置這名犯人？誰要留在這裡看著他？」

「不行，白人會來捉我們的。」

「那麼，我們就殺了他吧！」

頭子們同意就在這距離安比提比村五十公尺的地方將他處死。

貝爾休跪下祈禱：

「聖母瑪利亞，為我祈禱！耶穌聖心，可憐我！」

他轉向已準備好射殺他的那一隊人。隊長下令，兩人同時開槍，但是卻未擊中目標，他們開第二槍，也未打中。最後，雷尼米里唯拉朝他開第五槍。當神父仍然跪在地上時，隊長從近距離再朝他開一槍。其實，犯人已死，但是，他的兩眼似乎仍在注視他們，為確實置他於死，雷尼米里唯拉以一根棍棒擊碎了他的頭。

8. 落入中國義和團之手： 任德芬／湯愛玲／趙席珍／路懋德

(Léon-Ignace Mangin, 1857-1900) / (Paul Denn, 1847-1900)
(Rémi Isoré, 1852-1900) / (Modeste Andlauer, 1847-1900)

「扶清滅洋」

這是由 1897 年到 1900 年中國人民所發出的戰爭怒吼：「支持大清，趕走洋人。」

由於中國的封閉又稱外國人為「洋鬼子」，因此，對外國的人、事、物的恐懼成為中國的傳統，但是，這一切卻被屢次軍事上的敗仗一掃而盡，國土割讓給六個國家，這些外國勢力也干預中國的經濟，例如，海關人員必須為英國國民。這如何不使中國人揭竿而起、反抗洋人呢？

滿清政府全面實行改革，進行現代化；1898 年，光緒皇帝在百日之內頒布二十七條改革方案，與反對勢力對抗。9 月，慈禧太后拿回政權，支持反歐運動。她在各地組織民兵，不久這些民兵組織都歸一個稱為義和團的祕密組織指揮。該團團員稱為拳民，練功習武，聲稱刀槍不入，並以凶猛著名。這項運動發源於山東省。1897 年 11 月 1 日，兩位聖言會的德國神父尼斯和漢勒（Nies and Henle）便是在此遭到暗殺。

一夜之間，他們的運動在各地興起，並獲得全國的支持。拳民遍布各省，外國人的畫像隨處張貼，甚至最小的村莊也不例外。單單在北京接受訓練攻擊外國人的拳民估計就有四萬人。

攻擊外國人的行動也殃及中國基督徒，因為他們是「二毛

子」。

犧牲者

法國香檳省的耶穌會士負責直隸東南教區（現今河北省）的福傳工作。1857年當他們接掌這地區時，有八百萬居民，九千名天主教徒，他們是1724年皈依基督信仰者的後代。到1900年信友人數已到達五萬人，上千名的慕道者組成了五十四個中心。有六十位傳教士，六位主教，四十八位司鐸，十一位修士。

福傳工作進行順利，基督徒與其他居民相處融洽。自從1898年起，從遠方傳來教難的謠言，但是他們毫不害怕，這些謠言針對外國人，官員不久就要發布命令。

1899年春，拳民來到河北，進入河間及景州，即任德芬神父的傳教地區。從牆上的畫像、魔術、暗殺及擄獲的戰利品讓人無法不懷疑他們的動機。他們分成一些獨立自治的羣體；他們沒有裝備，是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對當地情況一無所知，只要一、兩個人就能將他們如麻雀般趕走。

但是官方無力抵抗。無論本國人或軍隊或法國外交的壓力對他們都無法奏效。為了自保，傳教士在六個中心加上防禦設施，任神父的中心是其中之一，上百名基督徒在此避難。

他們是一羣不識字的農人及工匠，由七、八歲到七十歲的男女老幼，習慣向權勢及富人低頭讓步。拳民只要求他們背棄自己的宗教信仰，極少數放棄信仰，大多數都堅持自己所信的天主。他們可能不是很虔誠的基督徒，然而，天主的恩寵點燃他們心中的熱火，他們願意為信仰而死，深信這樣卓越的見證將為他們打開天堂之門。

四位平凡的耶穌會士

對這四位耶穌會殉道者或許有很多可說的，另一方面，他們之間的差異並不多，當殉道的恩寵出現在他們生命中時，他們已準備好，渴望接受，他們也意識到，當他們來到中國時，這種可能性就大為增加。

1875年11月5日進入聖阿舍爾（Acheul）初學院的任德芬是一名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具有軍人氣概及無限激發力的十八歲青年。他曾申請派往傳教區工作，但是這項申請卻被遺忘，直到他的第一年牧靈實習結束時，省會長才告知將派他前往中國。他驚喜萬分，但又立刻控制心中的激動。他告訴同伴說：「我被接受了，現在我只需要殉道的恩寵。」

1890年，當他結束第三年培育後不久，即被派往總管河間地區的福傳工作，當地有二萬名基督徒，分散在二百四十個由九位神父掌管的中心裡。1897年他又掌管南邊的景州，殉道的榮冠便在這裡等候他。

湯愛珍個性衝動，生氣勃勃，虔誠愛主。兩歲喪父，十四歲前在一家銀行工作，他以聖文生善會成員的身分探訪及幫助窮人。二十歲時進入使徒學校，二十五歲進入耶穌會。他在中國是一位成功的助理堂區神父，師範學校校長，1897年被任命為故城縣堂區神父，與任德芬神父同屬一個教區，1899年10月10日，殉道的可能性日益升高時，他寫信告訴姪子：「好消息，我們家中不久便會有一位殉道者了。」他勇敢堅守崗位，寸步不離，後來因為任神父命令他到朱家河避難，他才離開。

身為家中長子的趙席珍，十九歲進入康布雷（Cambrai）大修院，但是，因為感到自己有修會生活的聖召，便在1875年11月

20日，比任德芬晚十五天進入耶穌會聖阿舍爾初學院。他在念神學時申請派往尚比亞，並希望在那裡為主殉道。

「你不知道你要什麼。在中國有更多殉道機會，你要到中國去。」

趙席珍欣喜若狂。

他是一位天生的老師，九年的時間擔任張家莊學校的總監。1897年擔任廣平府教區總鐸，開創新的牧靈工作。主教要他出任傳教區的長上，但是天主卻另有計畫。

他的殉道同伴路懋德卻是不同典型的人，害羞、勇敢、吃苦耐勞。他僅有的幾封信表露了一個率直童稚靈魂的純樸，一心只想如何盡忠職守。1881年在法國幾所學校教過德文後，啟程來華，在吳橋縣及武宜縣從事福傳工作，殉道的榮冠使他不再默默無名。

殉道

1900年春天一切都很平靜，但是，到了6月、7月、8月，教難便在各地爆發。

首先單獨殉道的是路懋德及趙席珍兩位神父。趙神父由獻縣經過武宜縣回到他的工作地點趙家莊，當時路神父在武宜縣擔任堂區神父。趙神父於午夜一時離開獻縣，九時到達武宜縣，一切平靜如常。當鄰村的義和團進入縣城時，他幾乎無法走進教堂。他們把教堂團團包圍了兩天，當他們知道裡面有兩名歐洲人時，便決定要除掉他們。他們打破大門，衝入教堂。兩位神父跪在教堂內等候他們的來到。死亡必是瞬間發生的事。之後，有人發現他們是被刺身亡的。

6月20日晚，一名傳教員將此消息告知任德芬神父。這是一

項警告。他在朱家河的住所也被包圍，為保護避難的三千信友，他在四周加強防禦，儲備糧食。到7月14日，一切情況都令人滿意，糧食足夠，槍械彈藥齊備，四周有一千人守衛準備迎戰。

7月15日黎明，警報響起。婦女跑進教堂，男人各就各位，準備作戰。首次攻打又猛又長，但是他們擊退了敵人。攻打持續到第二天，敵人又被擊退。

單靠義和團的力量，他們不可能攻下朱家河，但是在7月17日，他們獲得開往北京的軍隊的協助，包括兩千名士兵及大砲。

當他們告訴任神父及湯神父大軍逼近時，他們正準備吃早餐。任神父爬上教堂屋頂，看見兩千支槍在陽光中閃耀，那些拳匪高聲吶喊，揮舞著刀劍。他回來時已不像去時那樣充滿信心。從那時起，他只關心自己司鐸的職責而不再擔心「軍事」了。

整個下午，基督徒們一直保持樂觀的態度，並且擊退進攻的拳民。然而到了晚上就有些人逃走。兩位神父有機會逃走，但是他們不願拋下這些信友。

最後的屈辱

7月18日，兵士開始使用大砲，但是因為技術不佳而未能擊中目標。19日，他們修正目標，因而摧毀幾棟房屋，一枚砲彈擊中湯神父的房間，另一枚射穿教堂的牆壁。然而，誓死抵抗的信友卻毫不退讓。

古老的作戰技巧是盡量殺死勇士。19日晚上，拳民在馬車上搭建了六座高塔，以便達到圍牆的頂端，20日清晨四時，當大砲已就定位，準備發射時，他們將裝滿士兵的高塔推向圍牆。他們開始攻擊目標，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無益的。

七時，敵人發動攻擊，最後的抵抗者也放棄圍牆的據點，丟

下槍，聚集在教堂的一處。兩位神父帶領教堂中的信友作早禱，任神父與湯神父分別站在祭台的左右，面對信友，傳教員跪在聖所，面對十字架及神父。教堂中信友總人數為一千人，一半是婦女與兩百至三百名嬰兒。當抵抗的勇士們意識到已無法再阻止進攻的敵人時，他們也進到教堂加入信友的行列。

約九時，拳民湧進院子，來到打開的教堂門前。一陣驚訝之後，他們發出兇吼的喊聲，開始對信眾不分青紅皂白的掃射；信眾發出中槍後的痛苦的呻吟，因為他們不想死。於是湯神父站起來，以他宏亮的聲音壓制鼓譟的聲音，他領大家唸〈悔罪經〉，發痛悔，任神父給每人大赦。沒有一個人任意移動位置。

教堂中硝煙瀰漫，攻擊者任意開槍掃射；這點也說明兩位傳教士是較晚才被射殺。此外，一名勇敢的婦女靠在聖體欄杆前，以身體保護任神父。十時前，一顆子彈打中她，隨後便是任神父中彈，他從椅子上跌倒在地，一名傳教員將他抱起，但是他卻願意面對十字架，俯臥在地上。接著被殺的是湯神父，他努力爬起來，跪到他的院長身邊。

約十一時，屋頂著火，教堂內的人已無法呼吸，他們寧願死於刀劍，而不願窒息而亡，於是便一個一個從聖器室的窗子跳出去，就在跳出去的同時，一一被射殺。被拳民扣押的五十人，也在當天晚上在村外遭到殺害。

幾小時之間，朱家河已成為一千八百人的墳場。

參考資料：

LIGHTHART, C.J.: *The Return of the Jesuits. The Life of Jan Philip Roothaan* (London, 1978) .

KANTAK, Kamil: *Le Père Maximilien Ryllo, S.J.* (Beirut, 1950) .

LAVEILLE, E.: *The Life of Father De Smet, S.J.* (Chicago, 1981) .

GARRAGHAN, Gilbert J.: *The Jesuits of the Middle United States, 3 vols.* (New York, 1938) .

PEREZ, Rafael: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Colombia y Centro-América después de su restauración, 3 vols.* (Valladolid, 1896, 1897, 1898) .

RUGGLES, Eleanor: *Gerard Manley Hopkins. A Life* (London, 1947) .

LAHEY, G. F.: *Gerard Manley Hopkins* (London, 1930) .

VAN TRICHT, Victor: *De pastorcito a apóstol: P. Constantino Lievens* (Bilbao, 1941) .

TETE, Peter: *Constant Lieven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otanapur Berthieu, Martyr à Madagascar* (Lille, 1996) .

BURNICHON, Joseph: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France. Histoire d'un Siècle 1814-1914* (Paris 1914, 1916, 1919, 1922) .

RENAUD, Rosario: *Le Bienheureux Ignace Mangin et ses compagnons, martyrs* (Lettres du Bas-Canada, Vol.IX, No. 3, Sept. 1955, pp. 133-157) .



II

團結穩固與繁榮滋長

暴風雨已平息，修會更穩定，在自由的清新空氣中，耶穌會士能順利執行他們的使命。學校裡擠滿學生，教堂中座無虛席；信友團體、避靜院、福傳工作都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

修會生活仍採用傳統隱修院模式。令人好奇的是，所有西班牙修士都集中在昔日的修院中，如奧納（Oña）、維杜拉（Veruela）、格瑞那達（Granada）、默沙（Murcia）。而在其他國家都選擇人跡罕至的地方，例如德國，就選在瓦肯堡（Valkenburg）；美國，在洛斯蓋托斯（Los Gatos）、威士頓（Weston）、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印度，則在庫爾松（Kurseong）和謝貝戈努爾（Shembaganur），這些修院猶如一座小鎮，有果園、畜舍、麵包房、車房、工廠、屠宰場等各種設備，使他們能自給自足。一羣優異的輔理修士有效地管理並從事各項工作。

紮實的培育，在鋼鐵般的紀律下，學業與實踐並重，結果是有目共睹的，這種訓練造就了一羣能自我犧牲、隨時可擔負使徒工作的會士，古老傳統加上現代思想，使他們能打破固定模式，展望未來，而不眷戀過去。

1. 傳教士： 方濟·泰利

(Francisco Tarín, 1847-1910)

基督之獅

傳記作家傑維爾（José M. Javierre）如此稱呼他——基督之獅；對歷史學家雷維塔（Manuel Revuelta）而言，泰利是「一陣狂風」。從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他走遍了西班牙南半部，所到之處都帶來了聖神的降臨。

他創立學校，以嶄新的方法教導學生，成果斐然。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要引人共蒙天恩，不分男女老幼，貧窮富貴，文盲或專業人才，病患或犯人，無一人例外。接受他宗教指導的人曾經達到五千。

他採用眾人皆知的兩種方法吸引人，但是，他卻將它們發揮到極致。首先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樂隊歡迎儀式，他說這需要準備四天。遊行隊伍穿過小鎮，邊走邊唱，吸引路人觀看；到達教堂時，他便開始以動人的言詞講道，當天晚上他又使出第二絕技，就是黎明〈玫瑰經〉，他常說：「黎明時誦唸的〈玫瑰經〉，直接進入太陽裡。」

他將早晨的時間用在兒童身上。他把他們集合起來，教他們唱聖歌，與他們一同遊戲。在講解教理時，他會安排兒童彌撒及領聖體，如此，也可能吸引他們的父母。

下午，他到醫院探訪病人，若有犯人關在監獄裡，他也去探訪，他還拜訪以刺繡手工及祈禱幫助他的修女們。

晚上是福傳工作的重要時刻，即是準備講道稿的時刻。

他的講道長但不枯燥，一位經常與他在一起的同伴說：「他的宣講充滿新奇與情感；他不背自己所寫的稿子，許多都是美麗動人的即席創作。」

全心的奉獻生活，使他的禱詞感人至深。他用很長時間祈禱、做補贖；睡眠少，幾乎從未有三小時坐在椅子上過，不停的由一處到另一處從事福傳工作。

「我生命真正的中心點」

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其實泰利體弱多病。他是家中最聰明的孩子，喜歡讀書，但不適合做勞力工作。他的父親是多得利塔（Dodelletta）地方富有的農夫，日後遷居到瓦倫西亞（Valencia）開了一家生意興隆的商店。

泰利就讀一所教會學校，成績優異，但因健康狀況不良而延誤了大學學業。第三年年底，舊病復發，幾乎喪命。經過一年的休養後，他在 1871 年夏天復學。

1872 年初，兩位耶穌會士來鎮上宣講，喜歡聽演講的泰利每場必到，從未錯過任何一次。11 月，他遇見馬林（Marlín）神父，兩人成為朋友，不久他便決定也要成為耶穌會士。

他的另一位朋友是他姊姊的小叔羅撒（Quico Llosà），他是瓦倫西亞駐軍的聯絡官，泰利深受其影響，在申請入耶穌會之前，他還想要當兵，加入卡羅斯（Don Carlos）的部隊。得知父親反對他的計畫後，他就離家出走。

1873 年 8 月 31 日他離開瓦倫西亞，徒步走向馬德里，9 月 8 日到達，疲憊不堪。羅撒幫助他搭乘火車前往布爾戈斯（Burgos）。從布爾戈斯他又到位在納瓦拉（Navarre）的埃士特

拉（Estella），卡羅斯軍隊的總部便設在這裡。泰利的請求卻遭到拒絕，但是他遇到兩位耶穌會隨軍神父，他們鼓勵他成為耶穌會士。

耶穌會士剛好在法國南部的波揚（Poyanne）蓋了一座修院，泰利立刻前往。10月9日他到達此地，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給家人，他如此寫道：「何等的修院，何等的神父，何等的耶穌會。讚美天主，祂允許我在尋尋覓覓之後，終於來到我生命真正的中心點。」

他的旅程整整持續了四十天，徒步行走了一千兩百公里。

準備時期

耶穌會士只會在波揚待四年。1869年5月3日他們買了一座大莊園作為訓練中心，包括初學院及神學院，將二百名修士都集中在這裡。除了一棟大古堡外，還有幾間小屋、一座大果園及種有葡萄和各種樹木的山丘，樣樣齊備。雷維塔曾說：「他們似乎要把波揚當為永久的處所而不是暫時居住之地。」

二十四歲的泰利是最年輕的初學修士，他以順服之心全心投入初學院的生活中。他的同伴中日後出了幾位著名的耶穌會士：如莫里諾（Lino Murillo）、亞斯崔（Antonio Astarain）、亞雷布拉（Ignacio Aramburu）、蓋瑞特（Francisco Gárate）。他們都為他的自我犧牲、彬彬有禮、積極熱誠、擔負最困難的工作、謙遜、虔誠、富有愛心作證。他在信件中述說了自己的快樂：「我可能無法讓你們相信一個人遠離父母、朋友及所有童年夥伴也能如此快樂。」

三個月內，他有一位意外的訪客，就是朋友兼親戚的羅撒，他帶來了好消息，卡羅斯的軍隊打敗了敵人，獲得無上的榮譽。

在波揚的修會團體得知這好消息，高興無比，而曾經申請加入這部隊的他已不再關心這類消息了，因為他要一心一意忠誠的侍奉另一位君王。

初學期滿之後所學的修辭學，是講道訓練的開始，然而，他的開始是很艱難的。在聖心節的這一天，按照慣例，班長要在餐廳裡，在特殊邀請的客人前講道。泰利用心的準備，並背得很熟，但是因為緊張而中途忘了內容。他寫信告訴姊姊說：「我忘記了，我必須走下講道台。」

1877年10月他開始讀哲學，為期三年，但是在第一年時，因戰爭結束，西班牙國內漸漸恢復平靜，耶穌會士可返回本國，1876年底，他們開始找尋可以容納這些修士的地方，最後選中昔日本篤會修院奧納、默沙、卡里奧（Carrión de los Condes）及羅耀拉作為新培育中心。

首先回到卡里奧的是哲學修士，在1878年2月，為了盡可能避人耳目，他們分批抵達目的地。泰利找機會教兒童教理，同時他也在沙拉曼卡（Salamanca）大學完成哲學課程，並在1880年6月4日及6日通過考試。

同年夏天，他們獲知，在波揚的修院被法國警察占用。法國政府宣布驅逐耶穌會士。神學生遷往奧納，泰利與他們同去，繼續念神學，並且不中斷他的牧靈實習。這一切都在他三十三歲時完成。

實務訓練

對泰利未來的使徒工作而言，奧納提供了優異的訓練。他認真的研讀神學，他也利用閒暇時間練習司鐸應從事的工作，深獲好評，這也暗示了他即將成為一位極富盛名的傳教士。

說他晚上不睡覺只坐在椅子上的傳言滿天飛，並且愈傳愈遠，很多人都想找出真相。

奧納地方的人對耶穌會士沒有好感，當地的青年無知又多是文盲。泰利找到一位與他年齡相仿、個性相投的同伴康得（Juan Conde），兩人共同教育這些青年，康得日後成為「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裡卡斯蒂利亞省最出名的傳教士」（阿雅拉，Ayala）。他們兩人創辦了一個文化中心，誇大的將它稱為學院。日落之後，當這些青年由田間工作歸來後，便是學院發揮作用的時候了，在這裡，他們學習讀書、寫字、算術、歷史、地理及教義。

學院辦得極成功，村中的人對神父不再抱有敵意，而開始以新眼光看他們。

下一步便是打基礎的工作了，在學院中所組成的聖母會也很成功。那些看起來兇狠的青年，其實都是一些心地善良的大孩子。

泰利很懷念自己家鄉黎明〈玫瑰經〉的宗教儀式，並且想將它用在奧納。聖母會會員樂於接受這種儀式，為給大家一個驚喜，他們祕密的籌畫，舉行這黎明〈玫瑰經〉的第一個早晨引起極大的轟動。1881年耶穌升天節的早晨，〈玫瑰經〉唸完後，大雨便降落在乾涸的土地上，救活了農作物。

1881年底，泰利寫信給家人提到：「這村子裡的人是西班牙最好的人，不藐視別人，老教友好似香醇的葡萄酒。」

1883年7月31日，村中的孩子都來參加他的首祭，父親及所有親戚朋友也來參加這一盛大典禮。彌撒結束時，這位新司鐸向來賓說：「我深感不配接受這崇高的職位，因為我是一名罪人。請為我祈禱。」

特恩

他首先被派往一所優秀的學校，然而這卻是一項錯誤的決定，證明了「老鷹生來就不能關在籠子中」（阿雅拉）。但是不久後，他便接受最適合他的工作，即是流動的傳教士。

1886年9月，在第三年培育之前，他被派往塔拉維拉（Talavera）工作一年。頭五個月的時間，他用來熟悉環境，其他七個月從事勞累的福傳工作，以此來考驗自己的生活。

1887年10月4日上午十時，他到達默沙修院，此處已成為托利多（Toledo）省的初學院。他在這裡接受第三年培育，並協助初學導師。

做完了第三年培育中重要的三十天避靜後，他計畫要在默沙地區灌溉及耕種福傳的田地，並立即付諸行動，這種經驗有助於他未來的工作，也為初學修士提供訓練的機會。

他的計畫包括兩階段，首先是營造神父與當地人民之間的和諧關係。雙方伸出友誼之手，反應良好。當彼此僵化的關係解凍之後，在四旬期展開第二階段的計畫，兩位神父到每個村莊以一週時間宣講及聽告解。這些計畫在三十個鄉村中進行，一半由泰利執行，其餘則由其他神父擔任。5月21日，三十個鄉村的居民聚集在拉富聖塔（La Fuensanta）舉行盛大的聖母加冕儀式。

往後的幾年他到其他地區從事福傳工作，之後又返回原處，以原有的經驗來擴大新的工作。他拜訪這三十個鄉村，準備這一大片福音園地。有一名婦人曾說，當人們知道他來到時，每個人似乎都瘋狂了。他身披神職人員的外衣，十字架在他腰間擺動地來到，大家都跟隨著他。

最後的大集會於1889年6月10日，聖神降臨後的星期一舉

行。前一天，這地區所有鐘樓都鐘聲齊鳴，宣告黑夜將盡。大會在光明之母教堂舉行，附近兩座小教堂作為輔助之用。每個城鎮，每個鄉村都有指定的地方。

朝聖者達到三萬五千人。服務人員估計約有二萬五千人領聖體，由於缺少麵餅，約有七千人未能領到聖體。

對泰利而言，這種來自上天的恩賜使他成為一位傳教士。

傳為佳話

他由默沙到卡塔赫納（Cartagena），受命去設立一座教堂，這無異將一小塊肉丟給獅子吃。該地尚未準備好要接受傳教士，而時機也沒有成熟，但是，泰利卻看中了一處，即是以監獄作為福傳的目的地。每一個人都勸阻他不要前往，尤其是典獄長。但是他堅持要去，他們明白告訴他，這樣做是冒生命危險。

當他一進入監獄範圍後，他便接近犯人，好似他是一名剛入獄的犯人一般。他友善的與每一個人交談，甚至還到戒備最森嚴的牢房裡去。午餐時，他與眾人一樣排隊領取餐盤及木製餐具，並與這羣新朋友一同進餐。餐後，他繼續與愈來愈多包圍他的人談話並教他們唱宗教歌曲。日落時，全監獄的人都在聽他講道。

於是他站在一張桌子上，以他生花妙舌盡情宣講。就連最頑固的犯人也俯首認罪。當黑夜降臨時，獄警、監獄職員、典獄長聽見從院子裡傳來一陣低沉的聲音。他們凝神靜聽，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犯人正在一起合唱流行的懺悔詩歌。

監獄的小教堂裡只有一張破舊的加爾默羅山聖母像，但是當泰利與他們告別時，一名犯人已經雕刻了一尊聖母像。

1891年前半年他在埃斯特雷馬杜拉（Extremadura）從事福傳工作，之後有一年多的時間（1891年10月到1893年2月）他在

格瑞那達及內華達山（Sierra Nevada）兩地傳播福音，「以天主的火照亮雪地」。

他從海邊的莫特爾（Motril）開始他的福傳之旅。他和同伴在晚上乘坐驛馬車由格瑞那達出發，午夜時分，兩位傳教士被車夫的粗口驚醒。泰利的同伴隨即又入睡，當他被馬車的晃動所驚醒時發現泰利不在身邊，他立刻叫車夫停車，探頭向車外察看時，看見泰利與車夫並肩而坐，和他交談，此後不再聽到車夫的惡言惡語了。

1895年他到巴拉曼達（Barrameda）的桑盧卡爾（Sanlúcar）地區去，前往五個不同省分的十二個城鎮，6月1日他去到卡蒙那（Carmona），在那裡他使當地的著名公證人瑪利亞諾（Mariano Trigueros）回頭改過，天主的恩寵深深打動他的心，他流淚痛哭向神父告明自己的罪，但是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要求准許他在市政會議時公開向大家認罪。

當天不僅會議廳而是整棟大樓都擠滿了人。市長及議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泰利坐在市長旁邊，瑪利亞諾坐在另一邊。這位公證人在肅穆的氣氛中站起來，以堅定但帶有謙虛和感性的聲音向大家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請求大家原諒他的過錯及罪惡行為，之後，他請求神父赦罪。

1896年的洛哈（Loja）是精神主義、共濟會和自由思想者的大本營。泰利在教堂內講道時大肆抨擊他們，但是卻不能打破他們的心防；教堂內雖然座無虛席，但是卻無人真心悔改，回歸信仰。泰利決定走出戶外，向大家宣布，他帶著悲傷的心將在三小時內離開此地，因為他無法打動他們使他們回心轉意；他沒有譴責他們，卻責備自己，承認自己的罪過；他愛他們，也想要擁抱他們。

一名在他所站的陽台下聽他對羣眾講話的十一歲男童，此時正順著窗戶的欄杆往上爬。一名警察要把他拉下來。

「小子，你要做什麼？」

「神父說他想要抱我們，我想要抱他。」

「讓他上來，讓他上來！」泰利說。

當這男童爬上陽台張開雙臂抱住神父、神父也彎下身體抱住他時，羣眾中發出了哭泣的聲音。他們的心防已經打破了。

卡迪茲（Cádiz）一位司鐸曾說：「泰利並非只是一個傳教士，他還是人們心中的英雄。」他吃苦耐勞的精神使別人視他為一位偉大的苦修者。不斷由一處到一處其實就是無止境的面對種種困難，而他卻接受得甘之如飴。

「不要擔心，對基督的窮人而言，什麼都是好的。」

一餐飯只要有一片麵包、一個蛋和一個番茄為他就夠了。

「請不要給我這些義大利食物，它們使我想起侵占教宗領土的伊曼紐（Victor Emmanuel）國王。」

人們常常在那排在修道院外等候食物的窮人隊伍中看見他，他拿著自己的盤子與他們坐在一起，他以二十四小時的守齋治好胃病。

樞機主教的憤怒

泰利帶著滿懷的痛苦向西班牙教會的最高首長，也是著名反耶穌會士的托利多總主教莫內西羅（Antolín Monescillo）樞機致謝，那位比他更痛恨耶穌會士的私人祕書阿卓尼拉（Juan Arjona）對他影響極深。在沒有獲得總主教授權的情形下，泰利曾大膽進入當地修女院禁地向她們講道。當他在另一座修女院帶領避靜時，中途接獲來自總主教公署的命令，要他立刻離開。

泰利遵命，但是他去見這位對耶穌會士極端不滿、並抱怨他們既忘恩又驕傲的樞機主教。

「道明及方濟的孩子來見我時都謙遜地親吻我的腳，你這頑固的巴斯克人（對依納爵的弟子的統稱）難道就不嗎？好，我要讓你瞧瞧。」

看他如何懲罰他們。耶穌會士在托利多總教區唯一的會院是在塔拉維拉。1896年12月，聖母會女會員舉行傳統的無原罪始胎慶節的九日敬禮，由女孩擔任歌唱，這違反成立時的約定，即女性禁止參與禮儀歌唱，但是無人遵守這規定。

當九日敬禮正進行到高潮時，塔拉維拉的耶穌會士收到來自總主教公署的公文，停止他們的一切職務，亦即是禁止泰利及其同伴講道、聽告解及舉行彌撒。

所有報紙都登載這一則聳人聽聞的消息。1月5日當泰利正在科多巴（Córdoba）時得知此消息，他火速前往馬德里以了解實情。8日到達，獲知消息內容後，他覺得自己應該拜訪樞機主教。他的計畫獲得批准，但是有人勸他等這風暴平息後才去見樞機主教。

1月25日泰利來到托利多，樞機主教臥病在床，他以粗暴的態度接見他，也不為他謙遜的態度所動，生病的樞機主教大聲責斥他及耶穌會。跪在床邊的泰利聽見他說：

「你們這些耶穌會士愛管閒事，就連廚房的事也不放過。」

「樞機大人，您對我的指責與事實不符；我的母親耶穌會是無辜並且是很神聖的，我以她為榮。假如她膽敢闖入廚房，也一定是為徹底執行禁食的規定，不要違反教會所禁止的將肉糞入魚中的命令。」

他知道再堅持自己的立場是徒勞無功的，遂起身離去。

當他走出樞機主教的臥室時，遇見這陰謀的幕後策劃者以虔誠但又帶哀傷的口吻說：

「這件事對樞機大人的打擊真大呀！」

泰利拒絕扮演這齣戲中的角色，就打斷他的話說：

「我跪著聽樞機主教的責罵；但是我不能容忍你的譏諷。」

困獸

假如我們要將泰利到過的地方標明在地圖上，其範圍涵蓋半個西班牙南部。他真正是納道爾（Nadal）所描述的耶穌會士：「他理想的居所就是使徒的旅途。」他常停留的地方是那些原始火車的三等車廂。

他也有正常的居處，處於一個團體，如：馬德里（1889-1896）、科多巴（1896-1898）、塞維爾（Seville, 1898-1904）、雷亞爾城（Ciudad Real, 1904-1909）、塞維爾（1909-1911，他去世時）。不同的是，當他第一次在塞維爾時，他是會院的院長。這項職務不允許他按照過去的習慣經常不在會院。

難道這是企圖將他困在一處的方法嗎？他持續不斷的往返各地，疏於照顧自己的健康，以及他腿部的瘡，這一切理由可能使他的長上設法將他留在會院裡。當他擔任塞維爾會院的院長時，他就不能離開那裡前往別處。

泰利小心翼翼的執行他的職務。在他六年的任期內，只有六次因職務之故離開塞維爾。上午他聽告解，晚上他到城裡從事福傳工作，他避免與社會名流交往，寧願前往郊區為窮人服務。

他為了工作不惜犧牲必要的睡眠。有一位在九日敬禮中講道的神父生了病，他必須接替他的工作。泰利接下這重任，全力以赴，由於他的道理精闢動聽，所有聽眾都要求他等到九日敬禮結

束後才走。曾有一次，他按照習慣由祭器間走出來講道，先在聖體前跪下，在作簡短祈禱時，他突然倒在地上。聖母會會員立即衝上去把他扶起，但是他卻自己站了起來。他並沒有覺得身體不適，只是睡著了而已。

之後，他便疾病纏身，大部分時間他都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雖然他的健康已有起色，但是卻因為沒有足夠的休息而前功盡棄。1904年8月12日他離開塞維爾到馬德里去，一大羣人來到車站向他道別，「全塞維爾城的人，高官名流與市井小民、貴族與乞丐都在火車開動前聚集在這裡，月台上擠滿送行人羣，動彈不得。」

試探與日落

1904年8月14日，當他到馬德里後，身體狀況日漸好轉。他寫道：「我還沒有到達會院就已經覺得好多了。省會長只要我關注自己的健康，我想我很快就會康復的。」

省會長帕加（Pagasaurtundúa）神父是一位「正直的人也是一位十足的紳士」，他聽到有關泰利四處奔波及做過多補贖的抱怨。他的關心不僅只在於勸告和建議，而轉化為命令。他將泰利調往雷亞爾城，恢復他昔日傳教士的工作，但是卻有限制，即是他不可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也不可接受其他城市邀請他擔任的繁重工作。

帕加神父是泰利的第一任省會長，為期六年（1903-1909），之後在他生命最後一年（1910）擔任他在塞維爾的院長。為傳教士寫傳記的阿雅拉（Padro M. Ayala）大膽的說：「雖然這段時期不長不短，但是泰利覺得自己受到院長的迫害，他一再阻止他的福傳工作或干預他的計畫。」

原本還有馴服這頭獅子的第二項計畫。幸好，他在雷亞爾城的院長埃雷拉（Herrera）神父催促他向帕加神父說出他們兩人之間的困難之所在，院長神父自己也寫信給帕加神父，設法找出解除兩人之間僵局的最好方法。

泰利一定對這建議深思過，因為他決定要與帕加神父談談。1905年9月18日，星期一，他見了帕加神父，結果令人滿意。在一張給埃雷拉的明信片上，他寫了好奇的讀者無法了解的話：「沒有與馬德里的這位老兄一起解決這事之前，我不會回來，他滿意我的說明。現在我可以自由從事我的工作了。」

不再受馬德里這位老兄的限制後，這頭獅子又可自由地到處走動了。1906年及1907年真是泰利的年代。1907年他的工作成績為：十八個福傳地點，十五次九日敬禮，十一次避靜，五次三日敬禮，走了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公里，聽了將近三萬個告解。

他的生命已快要走到盡頭。按照他的福傳計畫，1909年5月他來到塞維爾，城中的人設法不讓他走。6月25日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道：「從明天開始，我將住在塞維爾。」

雖然他還是如同當年一樣的工作和各處奔波，但是這頭獅子已經累了，器官也衰竭了。1910年11月11日至19日當他在埃爾科羅尼（El Coronil）從事一項福傳工作時，腿部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坐在椅子上講道。兩天後他跌倒，堂區助理神父衝上前去扶住他，此時，泰利臉色蒼白，他的情況已很危險，那位神父給了他臨終大赦。

當他回到塞維爾會院時，他已不能行走；有人用椅子把他抬回他的房間，放在床上。他愈來愈虛弱，最後在12月12日下午一時，他平安的將自己的靈魂交在天主手中。

2. 怒氣填膺的耶穌會士： 米格爾·米爾 (Miguel Mir, 1841-1912)

我們幾乎無法再找到一位比米格爾·米爾更容易怒氣填膺及自命不凡的還俗耶穌會士。現在當他所引起的風暴平息後，我們便可以對他的人格及他的所作所為，給予客觀的評價。他自以為是了不起的天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但是他的同會弟兄以及他的院長可以對他更忍耐一點，不須過於認真。懷著無比的同情和些微的幽默，歷史學家巴特羅利（Battlori）視他為「激情的歷史學家，西班牙古典文學的讀者，謹慎的靈修作者，對文章的內容研究不夠深刻，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作品的傑出編輯。」耶穌會總會長路易士·馬丁（Luis Martín）對他的評語並不佳。

一位受爭議的人

米格爾·米爾出生在馬霍卡（Majorca）的帕爾馬（Palma）一個傳統的宗教家庭裡，但是對保守或自由的思想卻抱以開放的態度。他所經驗到的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西班牙天主教會面臨的分裂情況，應該使他在耶穌會內扮演和好的角色。然而卻非如此，他的拘泥於形式、驕傲、好與人爭鬥使他積極進取，找尋不同的機會。雷維塔說：「他是院長們永遠的大難題。」

1871年當他完成學業後的第一項工作，是與托瑞（Torre）和卡布瑞（Cabré）兩位神父一起編輯聖依納爵的信件，這些信件將是耶穌會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因為他忙於一些可能使他進入西班牙研究院的工作而對這份編輯工作毫無貢獻。

他獨自編寫一本名為《科學與信仰的和諧》（*Harmony between science and faith*）的新書，以反駁德雷伯（Draper）的著作《宗教與科學的衝突史》（*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因而獲得倫理與政治學研究院的獎章。根據路易士·馬丁的說法：「他以觸怒院長的方式」設法獲得這個獎。亞拉岡（Aragón）省的省會長維戈登（Román Vigordán）得知米爾試圖成為西班牙研究院的一員，便召他回省區，但是米爾卻抗不從命。他請求轉到他得獎的托利多省，但是在 1882 年他被送到聖瑪利亞港（Santa María）。第二年他回到馬德里繼續編輯聖依納爵的信件，而路易士·馬丁卻說：「這三年裡他一事無成。」透過與保守派的接觸（該派於 1884-1885 年再度掌權），他在西班牙研究院謀得一個職位，這件事又引起長上們的不滿，總會長安德里第（Anderledy）得知此事後便將他召回亞拉岡省。1887 年路易士·馬丁在扎拉哥扎（Zaragoza）看見他，發現他「非常悲傷，與團體隔離，在一旁窺視他們的言行舉止。」

拒絕

在這因強烈的對立而使得西班牙天主教會分裂的時期裡，耶穌會士採取中立的立場，對當時的各種言論保持緘默，不予置評。但是他們也有表達自己忠誠擁護某一方的方式，即是修會團體所訂閱的報紙。事實上，每個耶穌會會院都訂了極端保守的報紙，會士之間的言談及信件已足以說明他們的立場了。這些事使主教及教宗良十三世抱怨連連；1890 年 3 月 20 日，教宗致烏爾熱（Urgel）主教的信中寫道：「『傳統上一些對宗座素來忠誠及敬愛的修會會士』，在教會面臨分裂時，應該表達自己的立場。」

米爾並未利用這機會改正偏激的言論，反而強烈攻擊他所厭

惡的長上。他的拒絕表態讓人對耶穌會產生誤解及不良印象。

1886年11月，他首次表示自己的抗拒。為設法不被調到扎拉哥扎，他引用部分的修會文件抵制上級的命令。教廷大使，亦是未來的拉姆波拉（Rampolla）樞機主教，一方面想要勸阻米爾放棄這項計畫，一方面也請院長撤銷這道命令。雖然安德里第已表示按照教宗的決定處理此案，但是他並不認為將米爾調到扎拉哥扎是出於任何政治動機，而他確實有抗命行為。教廷大使再次友善的勸告米爾，為他的抗命開脫，並以尖酸嚴詞諷刺耶穌會的政治立場：他們並不像總會長所說的那樣光明正大；他們全力支持卡洛斯事件；地方院長只許當地會院訂閱保守的*El Siglo Futuro*報紙，而不准訂閱其他報紙，這是人人皆知的事。

米爾找到一個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並在1890年10月初為促成教會團結而於扎拉哥扎召開的西班牙主教第二次會議上大放異彩。他被列入程序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獲得扎拉哥扎總主教班納維德斯（Benavides）樞機的信任（這是路易士·馬丁告訴我們的），被選為大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他利用自己的職位對耶穌會所作的許多決定大肆抨擊。

這些控訴文件呈送給當時已擔任西班牙國務卿的拉姆波拉樞機主教，由於他的保護而延緩米爾被逐出耶穌會。事實上，1889年2月5日他已提出離會的請求；當月26日安德里第總會長勸他忠於自己的聖召打消離會的念頭。對他而言，這是一項太大的要求，1890年11月5日維德立特（Videllet）神父寫道：「他憎恨我們，對修會內的每個人、每件事他都反抗，心懷不滿。」1891年1月20日，他也曾慎重考慮自己的去留。當所有的努力都已無效之後，1891年12月24日，安德里第神父終於批准他離開耶穌會。

小冊子作者

幾天後維德立特又寫道：「雖然米爾已經私下把他的筆記給了某人，但是我想他不會出版，假如他真要出版，那對他自己的傷害遠大過對我們的傷害。」

事情並不如他所料。1896年，米爾在巴塞隆納（Barcelona）以無名氏出版了他的手札，暴露了他所記錄的耶穌會的種種內幕。

雷維塔說這本小冊子每一頁都是無價之寶，米爾記錄了耶穌會士的每項罪行。今天我們讀起來覺得荒謬可笑，但是在當時卻引起他昔日同會弟兄的憤怒。他的紀錄裡確實有些值得他們反省的部分，例如：他們認為自己是最好的，追求獨立與卓越，他們缺乏人性的溫暖與家庭精神，過分強調會規與各項規定，無人性的服從。而言詞最犀利的是名為「官僚」，專論長上的一章。

米爾早年編輯聖依納爵信件時的夥伴托瑞神父認為「那是一本用詞狠毒、惡意批評的書」，內容虛構，誇大事實，錯誤的報導，使整個修會受到全世界的咒罵。

這本書的確使耶穌會受到傷害，但是其作者也不能倖免。許多米爾的朋友指責他出版這本書是一種不願承認自己過失的懦弱行為。有人原封未動將書奉還；他希望為他的書寫書評的報紙保持緘默；有人給他的回答是：「家醜毋須外揚。」

這本書沒有銷售多久；就在它出版的同年4月17日，由於教廷大使奎歐尼（Serafino Creoni）的請求，耶穌會總會長馬丁神父設法使米爾收回他的書。他阻止這本書的出售，並命令將剩餘的書全部銷毀。

米爾繼續寫文章攻擊耶穌會，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耶穌會祕史》（*Internal and Documente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誠

如書名所顯示的，它不再是諷刺性的文學作品，而是一本嚴肅的、有系統的書籍。他曾經對他的密友說：「我的書要把耶穌會致於死地。」

這本書在 1905 年付印，但是作者無法獲得教會的出版許可，於是他銷毀了原先的版本，做一些修正後再出新版。然而他沒有看見新書的出版；他於 1912 年 12 月 29 日去世，而最後他對耶穌會的指控卻使修會在 1913 年初看到了曙光。

這時，耶穌會不再如 1896 年那樣沉默了。關於米爾書中在細節及觀點上所犯的嚴重的歷史性錯誤，阿曼多（Ramón Ruiz Amado）神父一一提出反駁。皇家歷史學會也介入此事並發表嚴正聲明，認為無論從事實或評論或所採用的文件上的觀點來看，米爾的這本書都不能稱之為歷史；他只為了達到自己特殊的目的而引用歷史罷了。

3. 隨軍神父： 威廉·多伊爾

(William Doyle, 1873-1917)

幽默與英雄主義

假如米格爾·米爾是陰沉、內心充滿怨憤的人，那麼威廉·多伊爾便是散發光熱與令人喜愛的人。他的兄弟以「在主內喜樂」(Merry in God)為他的傳記命名。他在同學中極受歡迎；他的姊夫曾說：「這是我見過最好的學童。」

事實上，快樂是他最引人注意的特點，但是那並非一種表面的快樂；在他單純的外表下隱藏著慷慨與積極的精神。甚至當他還是嬰孩時就已表現出騎士與士兵的天性，沒有比扮演士兵讓他更高興的了。他的母親必須為他縫製兩邊有紅條的士兵服裝；當他打勝仗時，母親要在衣服的袖口上加紅條。按當時習慣，七歲的他已經過了穿天鵝絨的衣服及留鬚髮的階段。當他由理髮店回來，母親看見他被剃掉的頭髮時，真難以掩飾自己的悲傷，但是他卻很高興的說：「媽，士兵是不留鬚髮的呀！」

這種「軍人精神」引領他藉著刻苦征服他自己。

孩童時期

威廉——在家中大家都稱他威利——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么。他們住在都柏林以南八英里的道奇(Dalkey)小鎮上，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一棟寬敞的房子。

威利生長在一個快樂的家庭中，天性快樂、活潑、惹人疼

愛。但是這個快樂的孩子有他神祕的一面。當他很小時，有一年的四旬期，一位年長的姨母正巧走進他母親的睡房，發現他對著鏡子，比手劃腳地自言自語說：「你這個下流東西，你這個惡棍，我要讓你挨餓，我要殺死你。不給你一粒糖果，不給你一塊蛋糕！」他對著鏡子裡蒼白的小臉揮動自己的拳頭。

然而他只對自己如此嚴厲；他對父母、兄弟姊妹、家中傭人及附近山丘的窮人的細心與和藹是眾所皆知的。

他幫忙做家事。有時，家人吃完一頓豐盛又費時的晚餐後，廚房常常髒亂無比，第二天早晨，當僕人抱著要花一小時清洗碗盤及地板的不悅心情走進來時，他們發現一切都已清洗乾淨並且物歸原位，這都是威利做的。

在道奇山丘上住了一些窮人，「主人威利」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常常探訪他們，生病時陪伴他們，為他們採購食物。一名獨居老婦人很喜歡吸鼻菸，也想在無人覺察的狀況下抽一、兩口菸。威利很快發現她的弱點，隨時提供給她菸草及鼻菸。這名婦人身體虛弱，無力清掃自己的房子，使它保持整潔。威利注意到她房子髒亂的情形，於是他買了抹布及刷子，將她的房子徹底清洗。然後，他又在老婦人的反對與祝福之下，跪在地上刷洗地板。除了借給他圍裙的廚子及女僕外，無人知道這件事。

威廉神父日後的紀錄中已記載他早年的人格特質。他將自己慷慨的個性發展為英雄主義，但是卻不失他惹人疼愛的天性。

學童

1884年9月，十一歲的威利進入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雷克利夫學院（Ratcliffe College），那是一所環境優美的教會學校，他在那裡度過了愉快又獲益良多的六年。他並不聰明，但

是總會得幾個獎帶回家。他是一名傑出的運動選手，深受同學的喜愛，隨時準備與他們一起惡作劇。假如他沒有設計一個，他也願意支持別人的計畫。

有一天，一位朋友邀請他及另外兩位朋友一起分享他打到的一隻幼鴨。但是要到哪裡去煮熟牠和享用牠呢？唯一可能的地方便是供應暖氣的火爐。但是火爐間常常是鎖著的，管理火爐的賈斯伯（Jasper）從不許任何學生靠近他的地盤。威利想到解決的辦法，即是由外面的滑道滑進火爐間的存煤箱。滑道入口雖然狹窄，但是足以讓一個小男孩擠進去。他們選定的時間是下午賈斯伯添完煤，將火爐間的門鎖上後直到晚上再來的這段空檔期。當他們正要享受烤得焦黃的鴨子時，他們聽見鑰匙插入門鎖的聲音，門門推進去，門打開了，賈斯伯走了進來，齜牙咧嘴的怒視這些受到驚嚇的孩子。

「小鬼，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我要報告舍監處罰你們。」

「賈斯伯，我們只是鬧著玩的，請吃一塊烤鴨吧，好吃得很呢！」威利說。

「不啦！小伙子，我還有事要做呢！」

「賈斯伯，要不要一些菸草？」威利用他最動人的語調問道。交易就這樣開始，賈斯伯最後說道：

「我的心太軟了，我應該報告舍監的。心太軟了，心太軟了。」

他鎖上門，走了。

召喚

1889年，威利的兄弟查理進入位於塔拉貝格（Tullabeg）的初學院。他知道威利有志於神職，但是，是教區司鐸或修會會士

呢？1890年夏季，已進入初學院十個月的查理邀請威利到那裡小住數日，在告別前，他問威利對未來有何計畫。

「我希望盡快進入大修院。」威利說。

「你考慮過度修會生活嗎？」查理問。

「從來沒有。無論如何，我永遠不會到這個洞裡來的。」

1890年聖誕節，當他獨自在彈鋼琴時，他的父親走進來問他，他對自己的未來是否已有打算。

「有。」他說，以開放的心將自己交給耶穌後，他在鋼琴上彈出了內心的喜悅。

1891年3月31日他進入耶穌會塔拉貝格初學院，三、兩步地跑上通往長廊的台階，使索休斯（Socius）神父驚訝無比，因為他不習慣看見一名如此快樂的初學修士。

不斷的成長及持續到底的愛，證明了他真實而堅定的聖召。1893年5月1日，初學期即將結束時，他用血與童貞瑪利亞達成一項「協議」，即是他要成為一名慢性殉道者，希望她能為他轉禱，獲此殊榮，「我渴望獲得的恩典就是成為一名耶穌會的殉道者。」

耶穌會士

由於健康的關係，他未能繼續讀書，而被派往都柏林附近一所頗具規模的住宿學校克隆高·伍德（Clongowes Wood）書院實習，在這裡人們稱他多伊爾先生。他是一名成功又受學生愛戴的老師，一名優異的規劃者，一名傑出的運動員；他既仁慈又公正，學生深受這兩種特質的吸引，也由衷的敬愛他。

他在一次偶發的事件上表現了自己的英雄主義。他受邀仲裁一次具有爭議性的板球比賽；少年組險勝，輸的一方認為對方竄

改分數，雙方各持己見，爭執不下，多伊爾判定少年組贏了這場比賽。這裁決激怒了一名男童，他罵多伊爾是「愚笨的騙子」。每個人都期盼他立刻受到懲罰，以示警惕，但是多伊爾卻不動聲色。兩、三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這名口出惡言的學生開始悔悟。他終於向多伊爾道歉，並表示願意接受處罰，但是，多伊爾只是很幽默的笑一笑，請他吃餅乾，喝檸檬汁，並勸告他一番便讓他走了。

他在克隆高·伍德工作四年後，被派往比利時的法國耶穌會哲學學院攻讀哲學。但是，由於他的健康持續惡化，一年後，即是1899年9月他轉到史東尼赫斯特（Stonyhurst）繼續未完成的兩年哲學課程。他那單純、開放、愉快的個性，尤其是隨時準備為別人犧牲自己的精神，使每一個人都深愛他。幾年之後，一位英國的同會弟兄說：「雖然我不記得他的樣子，但是，我記得威利總是不忘行善。」那幾年正是波爾戰爭時期（譯註：英國與波爾人之戰），不同的民族主義情操常出現在修會團體中。雖然他的觀點與大多數人不同，但是，他從未失去別人對他的尊敬與重視。這都要歸功於他活潑快樂的天性，他敢拿那些製造緊張氣氛的民族情操問題開玩笑。

當了幾年的舍監後（1901-1904），威利到都柏林念神學。他覺得很困難，「你知道，全能的天主從來就沒有要我終日埋頭於書堆中，爬煙囪或倒立走過屋頂更是我的專長。」但是，他勇敢的讀完神學，並於1907年7月28日晉鐸，同年10月，他到特契尼斯（Tronchiennes）接受第三年培育。

司鐸

在第三年培育時期，多伊爾神父被派往蘇格蘭的亞伯丁（Ab-

erdeen)，四旬期時他到亞穆（Yamouth）服務。他在亞伯丁的同伴是一位具有經驗的成功傳教士瑪竇·包爾（Matthew Power）神父，他對這位年輕同伴的觀點是：「幾年前，我們開創這項重要的福傳工作時，年輕又無經驗的他，從他的第一次講道便證明了他是天生的耶穌會傳教士，當地的人愈來愈愛他，我們離開那裡時，他和我都很難過。」

當他在亞穆時，有一天夜裡，因聽告解而晚歸，路上遇見一名妓女。突然間一股力量推動他上前攔阻她，對她說：

「孩子，不是很晚了嗎？妳不回家嗎？」

然後以誠懇的眼光注視她，又極溫和的對她說：

「不要傷耶穌的心，祂愛妳。」

他說完就走了，並很快忘掉這件事。

兩年後，當他在都柏林附近一座修女院裡帶領退省時，英國監獄的典獄長拍電報給他的省會長，內容是：「請派多伊爾神父到 D 監獄。一名明天就要處死的婦女請求見他。」

他來到 D 監獄，問道：

「這名婦女是誰，為何要見我？」

「她的名字是凡妮（Fanny Cranbush），來自不幸的家庭，她是一樁謀殺案的共謀。當她被押送來這裡時，有人問她是否想見神職人員。她回答說自己無宗教信仰，也不需要見牧師或神父。然而幾天後她告訴我她改變主意了，她想見某一位司鐸。我問她司鐸的名字，她說不知道，她只記得兩年前他在亞穆工作，來自愛爾蘭，在那裡的教堂傳教。」

雖然多伊爾神父聽了這些敘述，但是仍舊不知道這名婦女是誰，又為什麼要見他呢？典獄長帶他到她的囚室，讓他單獨與她談話。她解釋道：

「你當然不記得。兩年前的一個夜晚，在亞穆的街上，你把我攔下。我一輩子都是一個壞女孩，那晚正要去做壞事。你對我說：『孩子，很晚了，妳不回家嗎？不要傷耶穌的心，祂愛妳。』你很溫和的對我說了這些話，以看穿我心的眼神注視我。」

多伊爾神父點點頭。

「我想起來了！」他自言自語的說。

我們不難想像故事的後半段。多伊爾神父為她講解教理，為她付洗；在她囚室中搭了一個小祭台，凡妮在這裡參與她生平第一台也是最後一台彌撒，領了她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聖體。當多伊爾神父陪伴她走向刑場時，她向他耳語道：

「神父，我很高興。耶穌知道我後悔傷了祂的心，我知道耶穌愛我。」

宗徒

第三年培育接近尾聲時，多伊爾申請到剛果傳教區去，但是他的申請未獲批准。他被派往貝爾維迪爾（Belvedere）學院，再次擔任教職。雖然他忠於職守，但是，他仍渴望從事牧靈工作，而在一年內，他就成為一名傳教士。

他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天賦使他成為一位成功的福傳者，例如：給人深刻印象的外表，清晰有力的聲音，言詞流利，熱誠，周全的準備，無窮的精力。走下講道台，他甚至是一名更成功的福傳者。他遠大的觀點、耐心與同情使他成為一位理想的告解神父，他的告解室外常常圍滿了等候辦告解的人。身為「從事慈善工作者」無人能出其右，他喜歡發掘最棘手的問題，一旦被 he 發現，就無所遁形。一位熟知他的人說：「他可以為所欲為」。

然而，他成功的真正祕訣並不在於他本性的優點，而在於他

藉祈禱和補贖所獲得的恩寵。

苦行

曾經對著鏡子向自己揮拳的小男孩現在用苦行對付自己；渴望慢慢殉道的初學修士現在開始身體力行了，他如何做呢？

我們從他的日記及好友口中所知有限。

「某夜，我曾赤腳走了兩哩的石頭路，到教堂去。我帶了一把小刀，因為我渴望為耶穌流血。我跪在祭台前，用力在胸前深深的劃了一刀。」

「冬天，我做了連我自己都害怕也無法描述的補贖。我必須以誓願的力量來驅使自己去完成。在天寒地凍的清晨，我把鬧鐘撥到三點，穿著睡衣溜出去，站在池塘裡，進出兩、三次，為罪人祈禱，直到我全身凍僵為止。」（池塘在都柏林的雷法罕 Rathfarnham 退省院內）。

「有幾次我脫光衣服在荊豆叢裡滾動。幾天後仍可以感覺被無數小刺所刺傷的疼痛。」

由於他在 1914 年 5 月 7 日所寫的一封機密信，我們才得知這些事件的細節。「你可能記得幾年前我在戴格尼 (Delgany) 被一種多刺植物刺傷的意外事件，據醫生說，那是可能送命的。那真的不是什麼意外。那些日子裡，深愛被釘耶穌的熱火在我心中燃燒，我渴望為祂受苦，甚至要以殉道方式將自己的生命交給祂。懷著這種思想，有一天晚上我獨自走過一片多刺植物叢林。機會來了！我脫光衣服，在叢林中走來走去，直到我全身都被刺傷，好似一個大水泡。言語無法形容我心中的平安及身體所受的痛苦，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我沒有一刻閉上眼睛，因為毒素已進入血液，體溫升高，疼痛加劇，然後便開始像是用火紅針頭的一陣

鞭笞，由腳到臉，有規律的來回打著，我幾乎以為有一隻幕後黑手在執行這項任務。好多次我跪在床邊，把我的生命獻給祂，因為我想自己活不久了。突然間，一陣劇烈疼痛之後，無比的平安、喜悅充滿我的靈魂，我深信耶穌站在我身旁，似乎祂謝謝我承擔祂的痛苦。當我嘗試要站起來時，我的腿已經僵硬不能動彈。我像醉漢一樣，跌跌撞撞的走到修女院（他在該處帶領退省）。我只能含含糊糊的唸彌撒經文。但是，當祂的聖體接觸我的嘴唇，頓時我感到自己的改變，我能一如往常般地講完上午的道理。」

渴望殉道的人在戰場上找到了機會。

隨軍司鐸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1月9日多伊爾神父志願申請擔任隨軍司鐸，但是到1915年11月15日才獲准。他屬於愛爾蘭第八皇家軍團。

1915年2月17日，他們接獲命令渡過海峽。在大雨不停的天氣裡，他們搭乘火車前往基地。經過了二十一小時的車程，又步行了十二英里，最後終於到達目的地阿曼特斯（Amettes），2月28日，他們離開較為舒適的營房而前往戰壕。

艱難又危險的火線最後遭到毒氣的攻擊，幾次激烈的戰役造成許多人的失蹤與死傷，隨軍司鐸的任務是在士兵上前線之前及他們倒在德軍槍砲下時幫助他們。從洛斯（Loos）到索姆（Somme），他參與了重要的戰役。因他在索姆的英勇表現，而獲頒陸軍十字獎章。

在戰場的另一方，有一位耶穌會神父魯伯·馬業（Rupert Mayer）也英勇的與德軍一起作戰。多伊爾在前線度過1916年的聖

誕節；1917年1月他的感冒仍未痊癒；3月初，他獲准十天的休假，可以到愛爾蘭作最後一次的拜訪。

他只有五個月可活。他的生命在整個一次大戰中最慘烈的伊普爾（Ypres）戰役中劃下了句點，1998年11月11日伊利莎白女王與愛爾蘭總統都來參加伊普爾戰役結束八十年紀念大會。

1917年7月25日，多伊爾神父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不久我們就要有一場激烈的戰爭了。」8月16日，星期四黎明時分，愛爾蘭軍隊的據點都在德軍的控制之中，援軍無法到達，因為在德軍的橫向掃射下，無人能存活。多伊爾神父像一位慈善天使，穿梭於各處。

8月16日當情況愈趨危急時，撤退已是勢在必行的了，所有非戰鬥人員，包括醫生及隨軍司鐸都奉命撤退。多伊爾神父卻留下來，他繼續在各處為傷兵服務。下午三點，他與充當他勤務兵的二等兵麥尼斯皮（McInnespie）來到軍團的醫療站，此時，有消息傳來，一名都柏林軍官倒在空曠的地上，傷重垂危，多伊爾神父立刻離開醫療站，爬向那名軍官。他半拖半背地將這名軍官移到較安全的地方，他的勤務兵也來幫他。他們來到一個碉堡外，三名軍官走出來站在旁邊，受傷的軍官仍活著，多伊爾神父請這名勤務兵給傷患一口水喝，當他正要取水時，一枚砲彈打來，當場炸死四名軍官及多伊爾神父，勤務兵也受傷昏倒在地。當他清醒過來努力站起來時，發現他的同伴都已氣絕身亡，他步履踉蹌地走回醫療站，氣喘吁吁地說：

「多伊爾神父死了！」

很快多伊爾神父就被埋葬了，無人發現他的墳墓。

英雄

威廉·多伊爾是一位理想的隨軍司鐸，愉快又令人喜愛，他深愛這些士兵，常常稱讚他們是最勇敢的戰士。

「我們不得不以我們愛爾蘭的青年為榮。人人都愛他們，法國女孩更是不用說了；店員愛他們的單純，因為他們常付五倍的價錢，老闆喜歡擁抱他們，因為他已經賺了不少錢；在教堂裡，許多士兵常奉獻三到五元法郎；白天，無論何時，他們單純的虔誠態度，吸引大批人羣來教堂朝拜聖體，耶穌一定愛他們，他們引以為傲的是隨軍司鐸與他們一起守在戰壕中。令人欣喜的是聽見他們向路過防彈壕溝的陌生人指著多伊爾神父說：『那是我們的神父』，特別強調『我們的』三個字。」

使他們折服的是他與他們同甘共苦。他與他們一起在雨天、爛泥地上及雪地裡赤腳行軍，而不像其他軍官一樣騎馬，他與他們一起忍受戰壕裡的老鼠、跳蚤、泥巴及潮濕；他冒著生命之險，穿梭於第一線上，陪伴垂死者，在敵人的砲火下埋葬亡者，做他職務以外的事。

他獲得垂死士兵動人的感謝。「一名年輕的士兵抓住我的雙手，不停的親吻著；另一名士兵張開眼睛看著我說：『啊！神父，現在我能安心的走了，因為我已經看見你了，我不再怕死，也不再怕什麼了』。」

「當我跪在一名垂死的士兵身旁時，他張開眼睛以微弱的聲音對我說：『喔，多伊爾神父，多伊爾神父，』然後示意要我彎下身，似乎有話要說。當我彎下身時，他用手臂抱著我的脖子，並且親吻我。這是可憐的他唯一能表達感謝的方法，他覺得沒有孤獨的死去，在他去見天主前他得到臨終聖事的安慰。」

多伊爾神父有資格獲得最高的獎章。除了他已獲得的陸軍十字獎章外，所有他的直屬長官都推薦頒給他維多利亞十字獎章。然而「高層」卻認為不適宜在他死後頒給他獎章。

這項拒絕引起廣泛的驚訝及氣憤，並被視為是一種歧視。賈爾文（Galvin）中尉說：「如果誰有資格在這場戰爭中獲得維多利亞獎章，那就非多伊爾神父莫屬了。」一位都柏林的陸軍中士寫道：「人人都說多伊爾神父早就已經得到許多次維多利亞獎章了。」

他被拒絕的理由是什麼呢？他有三點不合資格：他是愛爾蘭人，他是一名天主教徒，以及他是一名耶穌會士。

4. 兩位應門修士： 方濟·賈瑞 (Francisco Gárate, 1857-1929)

轉變的時代

方濟·賈瑞生活在十九世紀革命的餘波中。1868年10月3日到13日，當三百名耶穌會士由羅耀拉逃往西班牙南部時，他才十一歲。他可以從距離耶穌會會院一百公尺的農莊看到他們。21日，驅除令下達羅耀拉，這名男童親眼見到會士的離去，留下一棟空樓。

為了表示反抗當權者的命令，奧杜那（Orduña）市議會於1870年2月8日通過一項法令，將他們昔日的學校交給耶穌會士，並請他們教育他們的青年學子。一位慈祥又有智慧的蘭達（Domingo Landa）神父負責主辦這所學校，當他在羅耀拉時就認識賈瑞家族，他想或許可以邀請他們的孩子來就讀這所學校。

方濟·賈瑞早有加入耶穌會的意願。他的虔誠，傳承自父母並在家庭中細心培育出的美德，受到出生在附近的耶穌會會祖的吸引，這些在在都使他成為合適的候選者。蘭達神父寫信給當時流亡時期裡人數眾多的修士訓練中心波揚，商議後彼此同意賈瑞在家度過1873年的聖誕假期，隔年1月中旬前往波揚，1月16日，他在父親的陪同下出發往目的地去。

「我抱著喜悅的心及生生世世都在耶穌會內的決心來到訓練之地。」這位年輕的候選者在正式申請書上如此寫道。

他在波揚深受該處特有精神的影響，即是：意志堅強，虔誠

愛主，厭惡當時的罪惡。

拉加第亞 (La Guardia) 的看護

位於西班牙西北部的拉加第亞寄宿學校坐落在田園之中，他在波揚受完初學訓練之後便派來這裡服務，同樣是一處與世隔絕、專注求學的地方。人們稱這裡為諾亞方舟，因為它包含三個機構：一所中學，一座修院及一個高級研究中心。

諾亞方舟的創始人及靈魂人物是高梅茲 (Tomás Gómez) 神父，一位善於計畫但缺乏組織的人，將效率與理想混成一團，他總不了解處於孤立與遙遠的拉加第亞學校無法使他的計畫成功；對他而言，這些困難都是一種優勢。最後，三個機構都遷往他處，學校遷往維哥 (Vigo)、修院遷往庫米拉斯 (Comillas)、研究中心則轉往畢爾包 (Bilbao)。這對高梅茲神父是一個致命打擊，他因此而得了重病。

賈瑞是這裡的看護，他除了在波揚的醫務室接受過一些訓練外，便無任何專業訓練了。他的首要責任就是照顧這一百二十名學生的健康。附近有醫生嗎？最近的醫生在哪裡？緊急時醫生多久才能趕到？這位富有特恩的創始者從未考慮過這類問題。

建築的位置也是另一個困難，所有的房屋都分散各處，無法將病人集中在一處。賈瑞必須在來自大西洋的風雨裡來回奔走於不同的房屋之間。

他依照院長的吩咐，不畏艱難、克盡職守。我們不知道在那疾病傳染的時期裡，院長是否將實情告訴這位年輕的看護，但是我們的確知道當學童病重時，他如何全心全力的照顧病患。他不吃不喝，心中所思只有他的病人。當傷寒流行時，他沒有一夜上床休息過。病人每晚都看見他安靜坐著，收心沉思。

無可置疑的，他具有成為一位傑出人物所需的絕對奉獻精神，這也使他的工作及服務地點有所改變，他被調往畢爾包的第士托（Deusto）擔任看門職務。

大學「畢業」

第士托大學於 1886 年開辦，1888 年 3 月賈瑞來到這裡，但是卻沒有「畢業」，直到十年後一項動搖院長權威的偶發事件，才使上級批准這位看門人的「畢業」。

一直被視為維持優良的研讀與紀律的制度，不久就證實它的不實際性。被認為是基礎科目的七年哲學，每節課與課之間的靜默，在室內的排隊行走，諸如此類的鋼鐵般的紀律是為要培養讀書氣氛。這些都是必須遵守的拉加第亞規定，是當時耶穌會教育的原則。

大學開辦的頭幾年，諸事順利，但是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終於在 1898 年爆發。那年正值西班牙失掉最後兩處殖民地的時候，即是在西方的古巴及在東方的菲律賓，由於戰爭失利，它們都落入美國手中；而第士托大學的紀律也在同一年解體。

4 月 19 日，美國宣布擊敗西班牙後的十八天，畢爾包的學生發動反美示威，第士托的學生想要加入。有「第士托歷史上最令人敬畏的校長」之稱的卡薩多（Casado）神父拒絕他們的請求，但是允許他們在校內發動自己的示威。

擔任了十年守門職務的賈瑞對學生中的騷動已略有所聞，為預防發生意外，他請了兩名身材壯碩的警察來強化他的權威。誠如他所猜測的，校長批准的示威已經失控。有人畫了一張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的像，有人拿出一面美國的國旗。學生集合在院子裡，他們將畫像掛起來，在狂笑和鼓掌聲中焚燒美國國旗。然後

他們衝向大門，企圖加入街上示威者的行列，賈瑞與兩名警察攔阻了他們。當有些學生開始對警察歡呼並喊叫說：「美國人去死」時，緊張氣氛就此緩和。

由於無法走大門，他們便改由後門出去，加入在市政廳前示威的羣眾行列。當他們回來時，舍監命令他們立刻就寢。懷著大膽挑釁的心情，他們演出了 1868 年反神職的啞劇，並吟唱雙韻詩句，嘲笑院長及其他幾位神父。感謝埃切維里亞（Echevarría）神父的強勢制止，校內又恢復了昔日井然有序的生活。

這是一次痛苦的教訓，然而一切都過去了，事情也開始改變。往日鋼鐵般的紀律放寬了一些，在更合情合理的範圍內，全校的氣氛得以改善。

賈瑞與學生

寧靜的氣氛也帶給賈瑞職務上的一些小變動。但是，有時他仍然要執行一些令人不悅的任務，以防止學生夾帶違禁品入校，例如酒精飲料等物品。雖然如此，他仍保持親切、文雅的態度；事實上，他很快就得到文雅修士的綽號，這也說明他深獲學生的喜愛。

學生都知道，因著他的謙遜與純樸沒有任何事能逃過他的眼目。他們說：「文雅修士是一位聖人，但是他也很精明。」最常發生的便是當學生晚歸時，他們都以為可以悄悄的溜進來，但是當他們進入寢室時，才發現賈瑞已通知了舍監。

有一天，伊西多爾（Isidoro Valverde）想要到城裡與一位朋友吃飯。為要獲得院長的許可，他假裝成自己的叔叔打電話給賈瑞修士要他轉告院長：他的姪子要與他共進晚餐。

「伊西多爾啊，你裝得一點都不像你叔叔的聲音。」他聽見

另一端的回答。

然而，許多次他的正義感保護了學生免受院長不公平的處罰。一名來自畢爾包的住宿生朱立歐（Julio）已經獲得院長許可在母親生日那天回家吃午飯，條件是他必須在某時間內回校上課。他遵照規定回校，但是在返校途中遇見一羣同學，他們告訴他不上課，因此他沒有按時回校。院長由賈瑞得知他未按照規定時間返回，於是說：

「當他回來時告訴他，他被開除了。」

賈瑞深知這名學生的無辜，他決定要以仁慈的方法來執行院長的命令。當朱立歐回到學校時，他讓他回寢室。之後，院長問他朱立歐是否回校。

「是的，神父，他已經回來很久了。」

由於賈瑞違背命令而使院長大為不悅，等院長的怒氣平息後，他以謙和的語氣說：

「神父，這都是我誤會了您的意思。」

其實並沒有誤會，而有的卻是合乎常情與公平正直。

訪客

聖士托大學的客廳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許多訪客都屬於上層社會。農家出生的賈瑞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及良善的天性，公平接待每一位訪客，善盡職守。

見證人曾說他對讓人心煩、喋喋不休的人和對來見自己神師的上流社會淑女都「一視同仁」。他禮貌而不諂媚的對待上流人士，也不會以高傲的態度對待低層百姓。

他有鴿子般的純潔及蛇一般的機警，任何欺騙行為都逃不過他銳利的眼光。他可以立刻猜出某些訪客的目的，許多次他為院

長解圍。當有人要求見院長時，他先查明來者的目的，然後他會告訴院長他的疑慮。院長讓他全權處理，他便以他的專業外交手腕，在不傷害糾纏不休的訪客的情況下圓滿解決了問題。

有一天，一名訪客要求見院長。從他由前廳走到客廳的樣子就足以讓賈瑞對他產生懷疑。他告訴院長，以他的看法，可以在客廳裡就將事情解決。賈瑞說對了，因為來者是一名騙子。

當西班牙首相達托（Eduardo Dato）在無預告的情形下來到並要求見院長時，他也以另一種方式表現他的謹慎。賈瑞認出來客的身分後，便謹慎地問對方他應該通報誰，他向對方表達尊敬及驚訝之情。他陪首相進入貴賓室，愉快的招待他，直到院長來到。校史上記載修會團體及學生都以仰慕之心，讚許這位農家之子的應門修士能將這尷尬的場面處理得如此天衣無縫。

他最喜愛的訪客

他最喜愛的客人便是當時經常來到修院門口的窮人。

在他開始擔任應門工作時，固定每週一、兩天接待窮人，人數在三十到四十之間，有時到一百人。他們排著長長的隊伍，蓬頭垢面，身上發出惡臭。他面帶微笑，發給每人一片麵包。

這種景象引起一些人的側目，一位院長禁止他這樣做。此後，為避免在訪客多時門口擠一羣乞丐，他們可隨時來尋求幫助。

這項新制度的優點是在調濟窮人時能更審慎，並有機會注意到每一個人。賈瑞善加利用它的優點。他總是有東西給那些窮人，即使是麵包碎片，他也能把它弄得不像碎片。僅僅在物質上幫助他們並不能滿足他，他還聆聽他們的故事，安慰他們。有人說：「他真像一位母親。」另有人說：「與窮人共度的時光使他很愉快。」

他特別照顧一羣害羞而不敢公開乞求食物的窮人。他趁其他客人到廚房去取食物時才讓他們進來，以這種方式減輕他們的自卑感。沒有人看見這些窮人，只有廚師也是他的同鄉低聲埋怨，但是仍舊將他所要的食物拿給他。

歡呼與掌聲

賈瑞的趣事處處流傳，應門修士成為大學裡最受人愛戴的人物。

一位舊日畢業生在 1920 年代當上了財政部長，返回母校，校方以盛大餐會歡迎他。當他看見賈瑞修士時，他高聲向大家說：「聖人來了。」

「你一點都沒有改變，你還是沒頭沒腦的。」賈瑞打趣地回敬了他一句。

餐會結束時，部長要求院長請賈瑞修士來。院長傳令下去，有一個龐大的歌詠團已準備妥當。

修士以為這只是這位沒頭沒腦的朋友在開他的玩笑。但是當他知道那是院長的命令時，他便立即前往。他試圖由後方走到主桌，但是他們擋住通路，因此他被迫由大廳正面，在歡呼與掌聲中走到主桌。他低著頭，兩眼垂視，忍受這種折磨直到院長告訴他可以離開。他在大家的掌聲中匆匆離席。

這種景象並不像 1898 年的畢業典禮，這是對一位受人景仰、愛戴和尊敬的經驗豐富人士的肯定，是對一位大師的讚揚。

天主之人

無疑的，他是一位無言的大師。一位平信徒作證說：「他幾乎不和人談論宗教話題，我們是好朋友，但是他從不給我什麼勸

告。」他以自己的生活和真誠教導別人。

我們所能看到的便是他為天主所有。當他每天必須在屋子裡走上走下、執行大大小小的工作時，他總是靜靜的一邊做事一邊祈禱。只要有一點自由時間，他就退到一處，安靜的祈禱。

事實上，他在客廳旁的小房間裡布置了一個祈禱室，放上聖母像及他奉為榜樣的聖雅風（St. Alonso Rodríguez）的塑像。他通常雙臂交叉胸前，站著祈禱。假如有人看見他跪著祈禱，他會感到尷尬。很多次有人看見他在黑暗中祈禱。

在教堂裡，他通常選擇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跪著不動，雙臂交叉，恭敬的低著頭祈禱。而他最恭敬的態度是五體投地的俯伏在地上，一旦被別人看見時，他就立刻起來，假裝不曾伏倒在地上。

沒有人知道他在那間為自己所選、靠近大門的既小又不舒適的房間裡每晚睡幾小時。我們推測他最早休息的時間是晚上十一時，最晚起床的時間是早晨四時半。擔任守夜的修士有一次看見他在早晨四時走在通往小教堂的樓梯上。

「修士，今天早晨四點鐘你在做什麼？」白天時他問賈瑞。

「我已經穿好衣服，我去教堂時我並不知道時間。」

當然他已經穿好衣服。大家都知道晚上他只坐在椅子上，而不上床睡覺，他的床單總是平整的，沒有睡過的痕跡。當然他不知道時間，因為他沒有手錶，若要知道時間，他必須去看掛在樓梯間的鐘。守夜者已經多次看見他在凌晨二時與三時之間出來看時間。

他每日的時間表是由早晨五時的彌撒正式開始，直到晚上最後一人回來後才結束。無論團體中哪一位最晚回來，賈瑞總是等他，為他準備熱騰騰的晚餐，當他進餐時，與他愉快的交談。

最後又最長的一天

賈瑞默默忍受某一種慢性病的折磨。1929年9月8日聖母誕辰日，是他在世的最後一天，也是他生命中最長的一天。

與他同住的人在早晨五時當他打開教堂的門時，便一起開始一天的工作。對他而言這一天早已開始了，因為幾天以來他都在忍受閉尿症的痛苦，疼痛使他無法入睡。

疼痛的症狀已愈來愈明顯且加劇，終於有人勸他到醫療室去休息。下午五時半，彎著腰、臉色蒼白的賈瑞離開他看門的小屋，從此不再回來。一反他平日單純與自我克制的本性，他擺出一個象徵性的、出人意料的、引人注目的姿勢。

他轉向那間他與主心靈相遇的小祈禱室，深深一鞠躬，這是一種禮儀性的姿勢，似乎強調他生命的大禮彌撒到此結束，然後他便緩慢的、吃力的爬上樓梯。

嚴重的病情並沒有顯露在他的臉上。此時，院長神父正巧走過，他告訴院長：

「神父，他們要我到醫療室去。」

「是的，修士，快去吧！」

到醫療室的途中經過小教堂，他走進去，朝拜了四十一年來他在第士托大學忠實侍奉的師傅。

看護命令他上床休息。他辦了告解，領了傅油聖事。午夜時分，醫生來看他，發現他有嚴重的閉尿症，並且引起膀胱腫脹。雖然排出三公斤的小便，但是病人情況並未好轉，反而更加惡化，根據醫生的診斷，可能是攝護腺腫瘤所引起。

約在凌晨時分，他要求領病人聖事，之後他交代了一些事務，如一把送修還未取回的雨傘，在門房小屋的桌子的抽屜中有

十五台彌撒的獻儀。院長神父誦唸祈禱文，他雙目緊閉，專心一意地一起誦唸。

死亡隨著祈禱文的結束而來到。他如同睡著一樣，沒有斷氣時的痙攣，安然去世。雖然他一直都是清醒的，但是由於他的自我克制，他一言未發，也不曾大聲祈禱，安靜的離開人世。

若瑟·菲格羅

(José Marcos Figueroa, 1865-1942)

具有歷史性的地方

阿根廷聖大非 (Santa Fe) 的聖母無玷大學是一處具有歷史的地方，其年代可追溯到 1610 年。在耶穌會遭到解散之前，這裡是頗具名望的教育機構，也是福傳中心。在耶穌會士被驅逐後，1853 年首次人民代表便是在這裡的某一間大廳制訂國家新憲法，因而將該大廳命名為「憲法之廳」。

1862 年，大學獲准重開，除招收一般學生外，也供巴拉那 (Paraná) 教區修士進修之用。1878 年提升為省級大學，與其他省級大學同等。1884 年一個充滿敵意的政府收回這項自主權，而 1891 年一位較友善的總統又恢復這項權利。於是學生不僅來自聖大非及國內各地，也紛紛從巴拉圭與烏拉圭蜂擁而來。1902 年在校舍的東南面設立一座氣象觀察站。

修院也有其歷史。它與大學同在一棟大樓中，彼此互動良好，直到 1900 年，一位主教認為他應該執行拉丁美洲全體會議的決定而將修院與大學完全分開。這項決定牽涉到建築工程、增加人員等許多複雜的問題和極大的不確定性，1906 年當修士們轉往瓜達露佩 (Guadalupe) 後，一切才得以解決。

在這重大的調動及因此而產生的影響和改變中，有一件不變的就是若瑟·菲格羅的面容，從 1888 年到 1942 年他去世為止，他一共看了五十四年的門。總是保持平靜的態度，面帶微笑，他好似一位國王以自然平和的態度看守這裡的入口。

從卡納里（Canary）羣島到阿根廷

然而這位國王是卡納里羣島中蘭薩羅特（Lanzarote）島上的一名謙卑農人之子，此島土地貧瘠。在 1873 年，這饑荒之年，三十五歲的菲格羅先生與二十八歲的妻子拉菲拉（Rafaela）帶著他們的四個孩子：八歲的若瑟，五歲的瑪莉亞，三歲的依莎貝爾及幾個月大的瓊安，與其他的同胞一起獲准移民烏拉圭。

遷往烏拉圭卡內洛內斯（Canelones）地區的人民一向都受到別人的歧視。菲格羅一家在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上岸，然後再遷往靠近卡內洛內斯地區的聖塔路西亞（Santa Lucía）的一處農莊上定居。

若瑟·菲格羅上了四個月當地學校，學習語文。這便是他僅僅所學的。他的記憶力和聰慧使他善用這僅有的學校教育。

星期天他通常騎馬走很遠的路到聖塔路西亞參加彌撒，十二年來如一日，他的虔誠與規律性留給堂區神父阿羅斯皮德（Arróspide）深刻的印象，單純的靈魂使他萌生度修道生活的意念。神父的母親同樣對他留有深刻印象，主動向他提到進入修會的可能性。

若瑟·菲格羅接受這項建議，他見過掌管智利與烏拉圭福傳工作的耶穌會長上後，於 1886 年 1 月 30 日告別父母，進入位於蒙得維的亞的小修院，當備修生。8 月 12 日，他進入哥多巴（Córdoba）初學院，初學導師巴斯塔門特（Bustamante）神父接受他，隔年，這位神父調往聖大非擔任院長之職。

1887 年 5 月菲格羅染上天花，除了看護羅傑斯（Rojas）修士外，不許任何人接近他。修士寸步不離的照顧他，最後他痊癒了，而修士卻因受到感染而死亡。這個經驗深深烙印在菲格羅的

生命中，由此，他學到什麼是如英雄般的愛德。

聖大非的看門者

他沒有完成哥多巴的初學訓練，便在 1888 年 5 月 20 日被派往聖大非服務，該地的院長是他昔日的初學導師巴斯塔門特神父。發願之後，他擔任看護助理與採買助理，一年後擔任總採購及看門助理；1892 年是兩項職務的總管；從 1893 年起，他是這裡的唯一看門者。在證明他有擔任這項工作的能力之前，他曾嘗試過不同的職務。最後，他留在這個職位上直到 1942 年去世為止。

在早年以父權為主的日子裡，看門的工作並不像日後那樣複雜。然而，意外事件總是少不了。例如，旱季時，鄰近居民會到學校水井取水，維持秩序便是看門修士的職責了。

照顧花園也是一件占據他的時間的工作。「橘園」及紫藤亭是他照顧和看守的對象，當學生忍不住來偷摘橘子時，修士就會在樹叢中把他們逮個正著。

當時最光鮮亮麗的人物之一便是學校的樂隊。人們稱其隊員為「惡棍」，通常他們不僅在學校的慶典中演奏，也在學生到校外參加遊行時吹奏樂曲，以使他們步伐整齊一致。

逝去的美好時光永遠不再回來。學生增加，觀測站需要擴建，1907 年 7 月 29 日當土地歸於耶穌會名下時，有人鼓勵學校主管接下這份職務。為了配合工作上的需要，大樓內部空間的使用也稍作調整，這真是對他耐心的一大考驗。最後他被安置在面對廣場的一個房間中，從此他不能再欣賞橘園的美景了。但是，這裡也有它迷人之處，即是在靠近「憲法之廳」的外牆，矗立一尊白色的、雙手張開歡迎訪客的耶穌聖心雕像。

主動活潑 笑容滿面

歷史學家弗隆（Guillermo Furlong）說得好：「當你一踏進聖母無玷大學的門，教育的藝術就開始了。」它從一位只受過四個月學校教育、但卻充滿真正智慧、來自天主的人開始。

菲格羅認識每一個學生，記得每一個人的名字。歲月過去，凡是重返母校的舊日學生沒有一人不來探望修士的，並且受到愛他們的人的接待。

早晨六點他打開校門，晚上八點關門。他要接三種電話：氣象觀察站接聽官方的電話；還有當時市區沒有公共時鐘，許多市民打電話來問確實時間，菲格羅都會慈祥有禮的一一回答對方。

超人的記憶及靈敏機智，使他在執行看門職務時不失掉自己的穩重。有時，他細膩的良心不允許他說謊，因為一句謊言會引起其他問題。故意說院長身體不適，找不到人，或在開會，或不在校內，這類與事實不合的話都是說謊。假如某人堅持要見院長，他會用一種不訴諸謊言的方法突破窘境，即是簡單而堅定的說：

「很抱歉，你不可能見到他。」

似乎怕他太閒無事可做，原先在觀測站工作的修士於 1923 年調往別處，所留下的工作從此便落在菲格羅的肩上，他要在指定時間爬到塔頂，將觀測資料記下並傳送。1925 年，他與一位神父和一名校友，為學校的修繕而組織一個募款會。單單他的簽名就可以打動校友慷慨捐助。他也成了一名店主，為使學生便於購買書籍、筆記本、筆，他大批採購這些用品，然後以成本價賣給他們。

還不僅這些呢！他也成為「優良印刷品的使徒」。在聖大非

不易買到好書，菲格羅聯絡了國內外二十五個出版商及書店。他那些保存下來的帳本，是當時記帳的範本。為能向他的顧客推薦好書，他利用空閒時間博覽羣書，他儼然成為參考書籍的權威人士了。

怪手

1940年的一天，學校決定要在入口處建一座新禮堂，需要占用橘園及部分修院的土地。當怪手挖倒具有歷史性的「憲法大廳」時，也同時挖斷了牆上的爬藤，這叢青色藤蔓已經在耶穌聖心塑像上形成了綠色棚蓋，三十五年來菲格羅以無比的愛澆灌它們；如今它們的消失似乎也在他個人生命中產生一種危機感。在他擔任看門職務的五十二年裡，他並沒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只有他以自己最喜愛的藥方——木瓜葉所治好的膿包，同樣他也用木瓜葉使自己的感冒及腸胃不適得到痊癒，這已成為他的仙丹妙方了，他開始以感恩的心來照顧木瓜樹。當他感到心臟不適時，他便以祈禱來醫治自己。

然而，現在這些他最喜愛的良方也不奏效了。從1942年開始，他的身體狀況就江河日下。他感到十分疲倦，坐在椅子上，什麼事都不能做。院長神父警覺到他的情況，並請心臟科醫師來治療他。

檢查報告及心電圖都顯示了不樂觀的病情：高血壓，大動脈閉鎖不全，慢性心肌炎，血液循環不佳。由於已無藥可醫，院長決定不再讓他接受治療。

6月中旬，他染上了肺炎，幾乎使他喪命。他領受了傅油聖事，之後又重新開始工作，8月初又擔任起看門職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接近終點，因此他將經手的事務安排妥當，如：書店

裡未結清的帳目，未回覆的信件，未計算的折扣。

修會團體中另一位修士的去世給予他很大的衝擊，11月9日晚上，他神情落寞，身體狀況不佳，院長命令他上床休息。看護修士給他注射一針強心劑並讓他服藥。看護修士為照顧另一位臨終修士而暫時離開他，當他回來時，發現菲格羅已斷氣。他安靜的去了，沒有麻煩任何人。

5. 一名例外的申請者： 伊士凡·卡士薩 (István Kaszap, 1916-1935)

童年

位於布達佩斯（Budapest）西南五十二公里，一座匈牙利歷史古城塞克什白堡（Székesfehérvár）的郵政局長，是一位天性善良、個性溫和的人，但是他的第三個孩子伊士凡卻完全不像他，是一名脾氣暴躁的小子。假如有人逗他，他就會大發雷霆，兩腳亂踢，並隨手抓起東西丟向觸怒他的人。當到了該上學的年齡時，他卻拒絕不去。只有當家人告訴他警察要來捉他時，他才讓步。

伊士凡的少年時期與童年截然不同，暴躁的童年轉為文雅的少年期。人人都注意到他的改變，他變得仁慈又親切。為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他開始照顧鄰居的孩童，以賺取工資，貼補家用。他喜歡窮人，有一天，一名乞丐向他要一件襯衫，他便把自己身上的脫下來給了他。

求學時代

與他的哥哥們一樣，他也就讀由熙篤會士所辦的學校。

他並不是一名聰明的學生，成績中等，表現平平，但是，學期末卻是許多優良學生中的一名。

六年級時，是他成績最差的一年，日後漸漸有進步，但仍屬中等。七年級時，除兩科外，其他都拿到最高分。八年級時，他

拿到傲人的分數，他的成績單上都是全班最高分。

他並不光芒外露，不善於言詞，但卻是最佳的同伴，善良、愉快又勇敢。毫無怨言的幫忙家務事、砍木柴、將麵包送到公共烤房、準備飯食、洗碗盤。文雅而快樂的做每一件事。

他喜歡當彌撒的輔祭，一台彌撒不能滿足他，而要愈多愈好。他六時起床，急速前往祭衣間等候神父來舉行彌撒。

他也是最活躍的幼童軍之一。他忠實的寫日記；在他七年級時，被選為童子軍八人小隊的隊長，受到幼童的崇拜，他們在家裡常談到他，請自己的父母來看他。當他組織野外活動時，家長都很放心。

童子軍的主要特色是喜愛大自然，伊士凡也是大自然的愛好者。每年他們在一處美麗的森林裡舉行年度露營，清晨，「當樹林開始甦醒，鳥叫聲瀾漫林間時」，這是最美的時刻，此時，伊士凡漫步林中，欣賞大自然，做半小時的祈禱。

他是體育老師丹金格爾（Denkinger）教授的得意門生，這位老師以非凡的能力訓練年輕的運動員。伊士凡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接受嚴格的訓練，而成為校隊。他參加全國比賽，得到第四名，也贏得許多金牌、銀牌和銅牌。

1934年3月7日是他生命中最光輝的一日。在他家鄉所舉行的運動會上得到所有項目的最高分，並被大會遴選為當地的青年冠軍。

耶穌會的聖召

他蓬勃的朝氣使他在學生、童軍和運動員中都成為活躍的一分子，也是學校聖母會的領袖，並擔任過這團體的秘書。

他是班上最強壯的學生，但是他從來都不自我炫耀。他不大

聲吼叫，但是他的權威性卻被所有同學認同；假如有人說：「伊士凡·卡士薩已經說了。」任何討論便就此決定，他的話是最後的定論。

他被視為純潔的模範；當他感到肉體的衝動時，他以自己稱為「青年的力量」，即是得自聖體的力量來抵抗。他的父親一定注意到他的掙扎；他給他看馬賽爾（Marcell Koszterszitz）所寫的書《嚴格命令》（*The hard command*）。「我很喜歡這本書，每天早晨穿好衣服後讀一章，從中獲取抵抗一天誘惑的力量。」

他唯一的誘惑來自他認為自己是一個一無是處的罪人。長久以來，他一直想自己是個無用的男孩，不會有任何成就。這種心理狀況使他在八年級和畢業前遭受很大的危機。

從年幼時，伊士凡就想當神父，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聖召也日益穩固，「長期以來，我就想當神父，但是，我還無法決定要加入哪個修會。」

為解決他的不確定性和消除困擾他多年的誘惑，他做了一次退省，退省結束後，他的疑慮也消失了。他讀了奧托卡（Ottokár Prohászka）的自傳《方法與階段》（*The Way and the Stages*）中〈德匈學院〉一章，其中作者敘述他在羅馬求學的點點滴滴，「耶穌會的生活最適合我」這句話在他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他很輕鬆的度過在學校最後的時光。拿了優異的成績單，他做了安排，稟告父母他的計畫，獲得他們的首肯後，他決定在1934年6月20日踏上另一段旅程。

第二天，他出發前往位於布達佩斯郊外一處美麗的森林地區札格里蓋特（Zugliget），耶穌會的初學院便設立在這裡。他見到初學導師，修會也決定收他，並選定7月30日正式入會。

那天他與母親一同前往，他在31日的日記上寫道：「昨天，

在沒有鞋跟的靴子所製造出的噪音中，我進入修院。」

病痛

同樣在 1934 年 7 月 31 日，聖依納爵慶日這一天，幾乎使他致命的病痛發作。似乎它就在靜靜的等待這一天的來到，似乎他進入初學院是病痛發作的信號。

當他起床時，覺得自己聲音沙啞，並且漸漸失聲；當聲音恢復後，他的扁桃腺卻發炎，腳踝開始腫脹。然後在他手指、頸部及臉上出現膿包；扁桃腺消炎之後，他又染上了肋膜炎，而原已消失的膿包又出現了。

情況略微好轉之後，他又開始發燒，並且兩腿疼痛，在左大腿靠近腹部的部位出現如雞蛋大小的紅斑，不久就變成一個瘤。雖然瘤被切除，但是他的體溫卻升高，紅斑也愈來愈大；醫生將傷口割深又割寬，壓緊腫瘤部位，膿便如同火山口的岩漿般噴出來。

他領受了病人傅油聖事，一輛救護車將他送往醫院，那天是 1935 年 3 月 17 日，是他獲得青年運動員冠軍的週年紀念日。天主召喚他接受另一項考驗，領受另一種獎章。

這是一次大手術。從不同方向長長的劃了六刀，發炎化膿範圍很大。他在生死之間掙扎了幾天。傷口化膿，就連身上的衣服也使他疼痛不已。疼痛使他全身抖顫，但是他的勇氣卻未減退。他輕聲的呻吟，醫生及看護都驚訝他有如此大的忍耐。

他已經慢慢恢復，並返回初學院，受到熱烈的歡迎，我們可以想像人人都想陪伴他。但是當這興奮的時刻過去後，他開始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痊癒；令他感到驚訝的是，他注意到自己很容易疲倦，不僅是身體也包括精神方面。當他愈來愈疲累時，精神

上的苦痛也隨之加深。1935年7月26日他寫道：「對我而言，每一件事都是一個十字架，一個大大的十字架。」

膿包又出現了並且開始蔓延。漸漸的，他發現自己已不再能過初學院的生活，總有一天他要面對事實，即是無法繼續接受初學訓練，院方表示他必須離開這裡。1935年10月31日，他將這消息告訴了父母。

他的母親到布達佩斯去接他。她很憂慮他的狀況，而兒子卻安慰和鼓勵她。最難過的便是他一一與同伴握手道別的那一刻。當他握完所有人的手之後，他已兩眼含淚。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五個月。

最後的考驗

11月1日，他回到家。8日他發高燒，家人請醫師來診斷，他注意到手術傷口處原有的紅斑。家人叫了救護車將他送往醫院，母親很悲傷的說：

「你又離開我們了。」

「沒關係的，媽。這是天主的旨意，不要害怕。」

診斷的結果是丹毒，因此，他被安置在傳染病病房內，兩週後，即是在11月底，他出院回家。

雖然丹毒已經醫好，但是扁桃腺的疼痛仍然存在。伊士凡願意盡快在聖誕節前將它們切除，待身體復原後再重回初學院。

12月4日，他住進布達佩斯醫院，割除扁桃腺，14日出院回家，他深信自己病痛的根源都切除了。

就在那天晚上，他全身發抖，喉嚨紅腫，體溫升到攝氏四十度。16日，當醫師來看他時，他在紙上寫道，請醫師清除他喉嚨裡的黏液。醫師要他走近窗口，檢查他的喉嚨，然後很哀傷的說：

「可憐的孩子，那不是黏液，是一個腫瘤！」

這消息使伊士凡頓時陷入絕望中。他靜靜的回到床上，開始祈禱。經過一位喉嚨專科醫師的診斷後，即刻用救護車將他再次送進醫院；假如腫瘤自然消失了，就不需要開刀，否則便要切除。

他不能呼吸，為要呼吸一點空氣，他有間歇性的喘息。清晨三點，他已陷入無意識中，醫護人員將他送進手術室進行氣切手術。

「假如我們延遲十秒鐘，」值班醫師說，「他便會在手術台上窒息而死。」

當伊士凡清醒過來後，他在紙上寫道：「請找一位神父來。」值班修女知道大部分病人做完氣切手術後，病情都會好轉，因而就沒有去請神父。

伊士凡含蓄的堅持自己的請求，又在紙上寫道：「神父會來嗎？」修女微笑的看了紙條，但是卻沒有動。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便指著紙條以懇求的眼光看著修女。這位修女確定病人情況並不危急，就沒有答應他的請求。

伊士凡將兩眼轉向他由初學院帶回來的十字架。被釘的耶穌是他唯一的陪伴者，似乎人人都棄他而去。

早晨五點，看護人員換班。當另一名巡視病房的值班修女來到伊士凡床邊時，他以無力又顫抖的手寫道：

「我無法辦告解，我只請求赦罪。我無法領聖體，因為我不能吞嚥，我要求傅油。」

「我立刻去請神父來。」

伊士凡以感謝的眼光注視她，她急忙去請神父。在這同時發生了什麼呢？就在他最後神智清醒時，他拿了桌上的紙和筆，躺在永恆的門口，以抖顫的手寫下最後的話：

「再見了，我們天堂見。不要哭，這是我在天堂誕生的日子，天主降福你們。」

神父來到時發現他兩眼睜開，注視著十字架，但是他已無意識了。不到半小時，他呼出最後一口氣，「在天堂誕生了」。那是 1935 年 12 月 17 日早晨六時十分，他在世上的歲月只有十九年八個月。

6. 基督君王的殉道者：
彌格·思定·蒲羅
(Miguel Agustín Pro, 1891-1927)

人生舞台

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五年發生在墨西哥的宗教迫害，其慘烈狀況與初期教會時發生在羅馬的教難相比並不遜色，信徒的英勇也不亞於當年地窖中的基督徒。

1857年由貝尼托·胡雷亞斯（Benito Juárez）制訂的憲法裡已有反神職的字句。1914年卡蘭薩（Venustiano Carranza）奪得政權，8月20日他的軍隊高舉「神職人員是愚民主義者；自由是光明」的旗幟進入墨西哥市時，教會處境更是每下愈況。軍人攻擊教堂，打開聖體櫃，取出聖爵，把聖體丟在地上，竊取鐘樓裡的鐘，用槍彈射穿聖體櫃及十字架，在明供聖體時，拿走聖體光。

卡蘭薩修訂1857年的憲法，於1917年頒布新法，提倡土地改革，縮減教會權利。新憲法不過是一些從未實行、只表達他個人意願的條文罷了，但是卻執意要迫害天主教徒。

由於卡蘭薩沒有履行他的承諾，他在一次由奧夫雷貢（Obregón）將軍領導的政變中被推翻，後者在1920年12月1日當選總統。但是，實質上他卻是一名獨裁者；他以武力統治國家，並選出自己的繼承人。整個選舉只是安排好的形式而已。

1924年7月6日，曾擔任教師的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當選總統，決定嚴格執行1917年的憲法。關閉天主教學校，數千名孩童流浪街頭；禁止司鐸履行他們的職務；墨西哥的總主教

遭受審問，被判出賣國家；軍人戲弄宗教物品，穿上宗教服裝，口出淫穢褻瀆之言。

教宗碧岳十一世寫信給墨西哥的天主教徒，鼓勵他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墨西哥的主教請求修改憲法。卡列斯的答覆是：新法律將規定可以由平信徒建立學校，排除修會，禁止批評憲法、當權者及政府，任何宗教活動必須在教堂舉行，並且受國家的監視，所有教會建築都歸國有。

新法律於 1926 年 7 月 31 日強制執行。六天前，墨西哥的八位總主教及二十一位主教已遭到解職，「在政府控制下，不可能舉行宗教儀式……從 7 月 31 日起，凡需要司鐸主持的公開宗教儀式一律禁止。教堂不應關閉，好使信友在那裡祈禱，但司鐸須交出管理權。」

就在那一刻，我們的主角出現在舞台上。

這號人物

在彌格·思定·蒲羅身上，似乎融合了兩種人格特質，一是愛說笑話及快樂的，一是祈禱與刻苦的，兩者都同樣突出。那喋喋不休及惡作劇的蒲羅在每年八天退省中變成了嘉都西會士（隱修會士）。喜歡開玩笑並在談話中逗人開心的蒲羅花在聖堂中祈禱的時間或許比任何人都多。

他的父親是墨西哥中部瓜達露佩一個礦區的工程師。彌格·思定是男孩中最大的，或許比其他孩子都調皮，父母很注意他過分的行為。當他十五歲時，他用五年的時間幫助父親處理公務。他一有時間，便到礦坑與礦工聊天，這便是日後他在工作中與人交談時有豐富語彙的原因。他也學會彈吉他和曼陀林，能唱許多流行歌曲；這些音樂才華、講故事和模仿人的本領使他一直是家

庭聚會時不可缺少的人物。

1911年8月11日，二十歲的他進入耶穌會在埃爾雷諾（El Llano）的初學院。他曾經在教堂裡被一位神父的講道深深打動：「耶穌基督為我們受這些苦，我們能為祂做什麼呢？」

1913年8月4日的晚上，正巧接近他要發願的時候，二十二名卡蘭薩的軍人在初學院前紮營。彌格於8月15日發願，修會團體面臨解散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從8月15日開始，三、四人一組步行越過邊界到達鄰國。在一連串軍事衝突之後，十四位會士於10月9日逃亡到加州洛斯蓋托斯，美國耶穌會士在該處有一座出名的培育中心。

由於無法在自己國家接受進一步的培育，蒲羅修士只好在外國接受所有的訓練：在西班牙念修辭學和哲學；在尼加拉瓜牧靈實習；在西班牙及比利時念神學。每到一處，他都留給別人聰明又愉快的記憶，他能使同伴快樂，而自己內心卻極為痛苦。他為國內遭受迫害並且已淪入赤貧的家人感到痛苦萬分。假如他看起來比平常高興，那便表示他得到家鄉的壞消息，這是他的反應。長期的胃痛使他苦不堪言。經常在散心時間，當別人笑得前俯後仰時，他卻因胃痛而離開。他動過三次手術，第三次是在布魯塞爾，當他還在診所時，得知母親的去世。他向一位朋友述說：「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平靜或是暈眩，也沒有流淚。但是，到了晚上當我獨自一人時，我握著十字架，不停痛哭。」這就是蒲羅修士內心的一角。

採取行動

令蒲羅十分驚訝的是1926年7月初他能很順利的重返墨西哥，「政府曾經驅逐司鐸和會士；現在卻無人反對；辦理入關手

續時，無人查驗我的護照，也不檢查我的行李。」

8 日下午兩點鐘，他享受了一頓已有十二年沒有吃到的他最喜歡的午餐。他可以擁抱自己的父親、姊姊安娜（Ana María）和弟弟羅勃托（Roberto），他的另一名哥哥漢伯托（Humbert）還在監獄中。

那是最後一段還能在教堂裡舉行公開崇拜儀式的時日。「我抱著旅途的勞累開始一連串的工作。我的告解亭外擠滿了等待辦告解的人，好似在大節日一樣。我兩次昏倒，被人抬走。我同時要講道及主持聖依納爵敬禮。」

1926 年 7 月 31 日，聖依納爵慶節是他最後一次舉行公開彌撒。空空的聖體櫃，熄滅的燈，無聲的鐘。眼前的情況使他哀哭，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主啊，回到聖體櫃中吧！」

但是他並沒有在詩文中尋找安慰，墨西哥的人民也不向政府的高壓低頭。就在政府最大的弱點——財政——受到人民杯葛的那一天，卡列斯以關閉一百二十九所天主教學校，五十座教堂及許多福利中心來反擊。天主教徒並未因此而受到恫嚇。他們更增強抵制的行動，在全國各地散發「抵制到底」的傳單。蒲羅的口袋裡塞滿了這些傳單。他被抓，但是仍然與押送他到警察局的司機聊天，並沿途丟撒傳單。

他有繁重的司鐸職務，諸如聽告解，舉行地下彌撒，每天為二百至三百人分送聖體，接見夜間來與他談話、尋求靈修指導的人，為老師及工人帶領避靜（他年少時在礦坑裡學到的工人用語，此時很自然的都記起來了）。

保護宗教自由聯盟推舉他為該組織的主講者，他也安排訓練課程。有一個工作小組負責將人員分散到墨西哥市區去，其他的人則保護禮堂及聽眾的安全。他們買了一台無線電發射機，透過

它可將演講傳播到各地。

他也從事慈善工作。透過一小組志工，他救濟了三十九個面臨急難的家庭，接受他救濟的家庭數目增加到四十六、七十，最後到一百。他背著大袋麵粉穿梭在墨西哥的大街小巷，或在周遭人的笑聲中抓著六隻母雞乘坐公共汽車。

跟蹤與被捕

與醉漢混雜在一起的人、眨眼示意的小販、衣衫襤褸的小孩及流氓，這些都是卡列斯總統最親信的偵探。1926年10月政府頒布一道搜捕他的命令，他只有很少的逃亡管道。

有一天早晨，當他在稱為聖體站的地方送聖體時，警察來了。他告訴大家保持鎮靜，他命令他們將所有可能暴露他們身分的宗教物品都藏起來，他戴上一頂髒帽子，點上一根香菸，等候侵略者的來到。

「你們在舉行宗教儀式。」

「根本沒有。」

「我看見一位神父進來。」

「我跟你賭一杯威士忌，這裡沒有神父。」

「我有搜索令。跟我來。」

「請盡量搜，如果你看到公開的敬拜儀式，告訴我，我也好去參加彌撒。」

當然他們找不到神父。

又有一次，是在1926年年底，他在一條暗巷裡被兩名警察跟蹤，幾乎就要被抓到。在轉了一個彎後，他看見一名他認識的年輕女孩。他一眨眼，她便了解他心中的計畫了，他們兩人肩并肩像一對戀人般的走上街頭。十秒鐘內警察追了上來，蒲羅神父

已不知去向，只有一對快樂的情侶在那裡消磨他們的時間。

蒲羅有熱切的殉道渴望。1927年9月21日，他在一座修女院舉行彌撒，他請修女為他祈禱，他願意為總統、為司鐸、為墨西哥的益處犧牲自己，他要為這些意向獻上這台彌撒，求天主接納他的奉獻。整台彌撒他痛哭不止，結束時他說：

「我不知道是否是想像，但是我清楚感覺到主已經接受我的奉獻。」

一項嚴重事件提供了機會，11月13日星期日下午二時，由一羣天主教徒策劃反對奧夫雷貢將軍的陰謀激怒了當權者。三名共犯被捕，一名在逃，當局將一切歸罪於蒲羅兄弟。

搜索圈愈來愈小，直到11月18日清晨四時蒲羅神父被捕為止。

犧牲

彌格·思定與他的兄弟羅勃托和漢伯托一起藏在巴爾德斯（Valdés）太太家中庭院的盡頭。三人共住在一間房屋內。當軍隊要強行打開門時，巴爾德斯太太給他們一個信號：

「警察來了！」

「等一下，我要穿衣服。」蒲羅神父說。

房門被踢開，警察走進來，他們用槍對著他：

「不許動。」

「你是誰？」

「警察檢察官巴塞爾（Alvaro Basail）。你們是蒲羅兄弟嗎？」

「是的。」

「你們被捕了。」

「兄弟們，我們被抓了，讓我們為墨西哥的和平獻上我們的生命，讓我們三人祈求天主收納我們的犧牲。」彌格·思定說。

此時在逃的第四名共犯已經投降，並且供稱蒲羅兄弟與這件陰謀無關。奧夫雷貢也相信他們是無辜的，然而在 22 日的晚上，他去見卡列斯總統，要求立刻處決他們。卡列斯同意並下令執行。

蒲羅神父與羅勃托的牢房是一間既潮濕又充滿惡臭的地牢，面對中央走道兩旁的牢房。蒲羅神父一如平常，情況良好。20 日是主日，他安排了一個包含祈禱、讀經及詩歌的簡短宗教儀式。

22 日中午，幾位記者前來訪問他們。蒲羅神父發表聲明：「我堅決否認參與這次陰謀事件。」

當天他的聲明便登載在報紙上。然而官方版卻照舊登出：「有鑑於這項指控直接企圖危害奧夫雷貢將軍的性命，而他們對此案應負全責，因此依法處決。」

22 日晚上，獄方為蒲羅神父及羅勃托拍照。從上午八時起，警察局四周便有喧嘩的聲音。攝影人員及記者接連來到，一大羣旁觀者湧入附近的街道。

約十時二十分，一名獄警來到地下室喊道：

「彌格·思定·蒲羅！」

神父沒有穿外套就走出來，獄警請他穿上外套，然後跟他走。途中，一名負責逮捕他的獄警走近他，請求他的原諒。他說：

「我不僅原諒你，也謝謝你。」

警察局的院子裡站滿了軍隊，中間只留有供四名行刑者站立的空間。蒲羅神父雙眼垂視，雙手被銬，極平靜的向前走。他站在指定的地方，面對行刑小隊；他請求跪下祈禱，慢慢劃十字聖號，親吻手中的耶穌苦像，默禱片刻。他再站起來，拒絕蒙上眼睛，轉身對政府代表及行刑者說：

「願天主憐憫你們，願天主降福你們。」

他一手握著苦像，一手拿著唸珠；他伸開雙臂，如十字形狀，重複耶穌死亡時說的話：

「我全心寬恕我的敵人。」

然後口誦墨西哥殉道者臨死時常說的一句話：

「基督君王萬歲！」

行刑小隊舉槍瞄準，開槍，蒲羅神父應聲倒地，雙臂仍然伸開著；當時是 1927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十時三十六分。

五分鐘後漢伯托也被處決。拜最後一分鐘一通電話之賜，羅勃托無罪獲釋。神父的姊妹安娜很快領到屍體，但是必須等候驗屍完畢才可離開。彌格·思定的臉完全變形。漢伯托看上去也不一樣了。安娜跪在屍體旁痛哭，她聽見父親的聲音說：

「我的兒子在哪裡？我要看看他們。」

有人為他打開棺材，他一語不發，也沒有落淚，彎下身，先親吻自己的耶穌會兒子的前額，再親吻漢伯托的前額。安娜倒在父親懷中，不停的飲泣，他堅強的扶著她，溫和的說：

「我的女兒，我們不要哭。」

他們帶著兩具屍體回家。隨後當然便是進行封聖程序了。

7. 兩位納粹主義的反對者： 魯伯·馬業 (Rupert Mayer, 1876-1945)

力之柱

我們要為一場新的達味與巨人哥利亞之戰作見證。誠如聖經中的達味一樣，我們的達味也是無恐無懼，屹立不搖，而納粹巨人卻戰慄不已，運用所有方法企圖消滅他。

在那要毀滅他的狂風中，魯伯·馬業如同巨人屹立不搖。人人都讓步了，唯有他堅定不移；他不承認希特勒為德國的偉人，對他而言，希特勒仍舊是一介平民。因為他持有一種強而有力的武器，即是：他擁有傲視對手其他頭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擁有頭等鐵十字及戰場受傷英雄的勳章（以此對抗希特勒的二等勳章）。當他走進法庭時，他胸前的勳章足以使他在審問他的那些小人物面前抬頭挺胸。

然而，在對抗中，他最有力的武器是以典型的條頓民族特性所散發的基督徒之愛。這是他的真正偉大之處。

準備

魯伯·馬業出生在斯圖加特（Stuttgart）的一個小康家庭中，是兩個男孩中的老二，在他下面還有四個妹妹。每一個人都能彈奏一種樂器，他們組成一個小樂團，魯伯擔任第一小提琴手。

他的耶穌會聖召是在不尋常的情況下產生的。他的父親送他到拉芬斯堡（Ravensburg）完成他的高中教育，在那裡他遇到許

多曾經就讀位於奧地利費爾德基希（Feldkirch）的耶穌會斯泰勒（Stella Matutina）學校的學生，他們對耶穌會的師長有極高的評價。他私自前往這所名校，在那裡做了避靜，當他下次回家度假時，他宣布：

「我要當耶穌會士。」

父親極盡全力想要勸阻他，而他只能與兒子達成下面的協議，即是：魯伯先晉陞司鐸，假如他仍堅持自己的意願，他可以加入耶穌會。

他沒有進入任何修院；他先後在福堡（Fribourg）、慕尼黑（Munich）及圖賓根（Tubingen）大學各就讀一年，最後在羅坦堡（Rottenburg）修院完成第四年神學課程，於1899年5月2日晉鐸。在烏坦堡（Württemberg）一個小堂區史賓青根（Spaichingen）擔任一年教區司鐸後，他告訴主教，他想要加入耶穌會。起先主教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當魯伯神父一再請求時，他便同意了，1900年10月1日，魯伯穿著他那雙擦得發亮的馬靴進入初學院。

經過八年的耶穌會訓練（1900-1908）及三年的福傳工作（1908-1911），他接受終身的任命。

第一階段：慕尼黑

工業發展吸引大批民眾由鄉村湧入城市，其中大多數是天主教徒，慕尼黑的三十個堂區已面臨沉重的負擔。當地總主教請求耶穌會省會長派一名神父專管這些移民，省會長於是選中魯伯·馬業神父。1912年1月8日，我們的主角便到達巴伐利亞（Bavaria）的首府。

首先他很仔細的研究當地實際狀況。他發現每年有二萬三千

人湧入都市，他們最迫切的問題便是在這有一萬失業人口的城市裡找到房屋和工作。其次是在這大城市裡，他們與教會失去聯絡。

馬業深知憑他個人力量，所做有限。他開始尋找數以千計的助手，有五千六百名志工協助他挨家挨戶，甚至到閣樓及地下室找尋這些移民，與他們交朋友並引導他們。他爬上樓梯，探訪住在棚子裡的人，照顧那些不易接近的人。

一年半之內，在 1913 年 8 月 2 日，他有了初步的成果。雖然問題尚未解決，但是卻對問題有了透徹的認識，並且有可能制訂可行的政策。光有執行方法是不夠的，工作人員及個人接觸是極需要的；新來者要受到歡迎並幫助他們加入商會，否則他們無法找到工作；他們應該與教會取得聯繫；應該抵制反宗教的宣傳。鄉村的老百姓應該意識到他們在大都市中將要面臨的困難；假如在都市中已有失業問題，湧入大批的外地人會使情況更糟；為保有他們宗教的認同，應該教導他們分辨新聞的錯謬言論。

馬業為保護女孩提出實際方法；由於現有的修會團體沒有一個願意照顧她們，他因此而創立一個團體，在 1913 年 8 月開始訓練她們。

走上第一線

1914 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魯伯·馬業便自願擔任隨軍神父。一想到上千的青年受傷或死於戰場時，他就覺得要陪在他們身邊。對他而言，隨軍神父應該和他們一起出生入死，同甘共苦。

他的願望並未立刻實現。1914 年 8 月，他被調往一所野戰醫院；但是 1915 年 1 月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巴伐利亞第八醫療站的總隨軍神父。當他一到達時，他便與其他士兵一起走向前線。

「你想做什麼？這裡不可能舉行宗教儀式。」羅伯（Robert Bandort）醫師說。

「沒關係，我和你一起到戰壕裡去，跟士兵談談話就好。」

他一路受到熱烈的歡迎，使羅伯醫師頗為驚訝。八天之後，士兵得知將有彌撒，所有的人都來參加，無人缺席。馬業知道，是個人的接觸才有這種結果。他常常說：「每一名士兵都應該知道，隨軍神父是他們的好朋友。」

1916年發生了一次大戰中最慘烈的索姆戰役，威廉·多伊爾與魯伯·馬業站在對立的兩方。「在1916年7月29日到8月13日激烈的戰爭中，馬業神父總是與我們一起守在最危險的地點。」羅伯醫師敘述著，「他日以繼夜地與醫療隊一起從戰場搬運傷兵。」有一天，在激烈的砲火中，抬擔架的士兵因害怕而躲進戰壕，將擔架上的傷兵留在外面不顧他的死活。傷兵兩腿已斷，無法動彈。突然，他看見隨軍神父以自己的身體掩護他：

「不要怕，假如子彈碎片飛過來，會先打中我，」

馬業獲得許多勳章，其中以頭等鐵十字勳章代表最高榮譽，引人注目。他獲頒此種獎章的理由是：「我們能堅守重要據點，只因為受到馬業神父英勇榜樣的激勵。」更令人驚訝的是，當時耶穌會仍被視為「國家的敵人」而處於被驅逐的狀況中，第八醫療站的將領以基督新教徒之名推薦他。

1916年秋天，醫療站移至羅馬尼亞的前線；聖誕節之後，他們奉命攻占一座能俯瞰全部山谷的山頭。12月30日，在渡橋之時，馬業被子彈擊中腿部。他先倒臥在血泊中，然後被抬到一處野戰醫院，接受由膝蓋以下的截肢手術。1917年1月6日，他轉入匈牙利一所軍醫院，23日，也是他41歲生日的那天，醫生告訴他，由於傷口發炎，必須接受第二次截肢，他的這條腿只剩下

短短的一節殘肢。

戰後的慕尼黑

馬業需要極大的意志力來適應自己的義肢並學習重新行走，終於在 10 月 27 日，他滿心歡喜的舉行了彌撒。

為恢復昔日狀況，慕尼黑面臨重重困難。除了對戰後生活感到不滿外，又加上急速的政治轉變。君主制與共和制，左派與右派，國家主義與反政府主義，這些都是人人所談論的；共產黨抓住政權，建立類似俄羅斯的「蘇維埃共和國」，但是他們被軍隊推翻了。

這便是魯伯·馬業跛腳進入慕尼黑時的情況。他不顧自己的殘障，決定參加激烈的共產黨集會，聆聽他們的演講，也請求發言。聽眾有時為他鼓掌，有時也對他發出噓聲。偶爾主持人請他向聽眾發表演講。他的重點是：德國人的得救不能仰賴其他國家的幫助；國家重建的最好方法便是履行基督信仰；各黨各派之間彼此仇恨，而他卻宣講愛。

他的威望使他聲名大噪，從 1919 年 11 月 8 日到 12 月 14 日，他組織了大型城市福傳工作隊。誠如他早年為鄉村移民所做的，運用志工的力量；他篩選了三千六百人，把城裡的三十座堂區分為四或五區，如此，他們可以接觸所有的居民。

馬業已經成為慕尼黑的「超級宗徒」。為了穩固及繼續福傳工作，他接管自 1610 年創立、已有二千五百人的聖母會，並將人數增加為八千人。聖母會會員是每個堂區的活躍核心分子，與神職人員密切合作、他們穩固的靈修訓練、參與都市運動和大型集會，三者并行，使他們覺得自己是強而有力的組織的一部分。

面對納粹主義

就在那時期，也就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漸漸形成。慕尼黑的宗徒必須表明立場。

納粹主義要將德國的愛國主義變為一種宗教，起初他們沒有露出真實面貌，希特勒極小心且絲毫不表現出對教會的憎恨，也不反對基督信仰；相反的，他擺出「積極基督信仰」推動者的姿態。兩位共產主義的反對者馬業與希特勒曾在 1919 年共產黨集會上不期而遇。當共產黨演講者講完後，馬業請求發言，說明天主教信仰反對共產主義的理由。希特勒緊接著也起立說：

「神父由宗教觀點說出他發現的困難；我要從政治觀點提出我看到的問題。」

之後，便開始了兩週新政黨的集會，如同過去參加共產黨集會一樣，馬業也參加他們的集會。他感興趣的是他們對宗教的態度而不是他們的政治觀點，他發現納粹唯一的倫理原則只有德國人的祖國，他們盲目的反對猶太民族。他也看出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集權國家，並要在人心中激發與基督徒之愛無法相容的恨。在參加這些集會時，他對這種公開的個人崇拜產生強烈的反感。「我非常肯定，希特勒是自我中心的人，是典型的神經質。」

一如他習慣在共產黨集會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現在他也毫不猶疑的在納粹分子的集會中講話。主講者之一深信希特勒推動「積極基督徒信仰」，隨後其他的演講者都主張國家社會主義能與天主教信仰和諧共存。於是馬業站起來發言，並獲得熱烈掌聲。

「我怕你們的掌聲來得太早一點。我要讓你們失望，我將說明為何天主教徒不可以加入國家社會黨的理由。」

1923 年 11 月 9 日希特勒企圖以「希特勒起義」之名在慕尼

黑奪權，但是失敗了，他的跟隨者歸咎於馬業和他的宣講。不久，一位高官告訴他，有人計畫要殺害他，但是毫無動靜。或許納粹分子意識到，暗殺會增加馬業的知名度，並會產生與預期相反的效果。1924年5月2日，當他慶祝晉鐸銀慶時，希特勒派人送來賀函，馬業卻將它撕掉，丟入廢紙簍中。

公開爭鬥

納粹起義失敗後，馬業不再參加納粹分子的集會；他知道納粹主義對教會的危害。他提高警覺因為這個新政黨在天主教徒中愈來愈有影響力。一位堂區神父告訴他：「五分之四的堂區信友支持他們。」

希特勒掌權的最初兩年，蓄意培養自己是積極基督信仰推動者的形象，尊重教會的權利。麻煩發生在1935年與傳統慈善工作有關的募款事情上。那年他們獲得官方許可，於7月18日募款。當志工拿著捐款箱走上街頭時，他們遭到希特勒青年隊的攻擊。馬業向警察抱怨，但毫無結果。下午三點警察命令停止募款活動。下一個主日馬業在講道中表示不接受這命令。

下一個對抗便是有關天主教學校。由於這些學校受到教會與政府協議的保護，政府不可關閉它們，因此，希特勒便想出其他方法，即是：大肆宣傳建立普通或不分教派的學校。馬業極力保護天主教學校，他參加兩個贊成建立普通學校的大型集會，他要求發言，但未獲准；轉瞬間，希特勒的軍隊將他團團包圍，藉口說「為要保護他」。最後他被聖母會會員護送走出人羣。

第三波攻擊是針對神職人員的惡意宣傳。上千的納粹分子被派去刺探司鐸與修女的言行，納粹的報紙鼓吹他們所發現的這些教會人士的惡行，使人認為司鐸罪惡滿身，而修道院更是犯罪的

溫床。慕尼黑宗徒在講道中拒絕這樣的指控，他說：「相信官方報紙言論的時代已過去了。」

他盡力反擊納粹的宣傳。他每個月在全國各地作七十場的演講，主日講六到七次的道。他的講道極受歡迎，大批羣眾前來聽道，教堂已嫌太小無法容納，他就到廣場去宣講。

納粹當權者已不能再忍耐他了，設法要制止他。蓋世太保肆無忌憚的以謀殺及將人關進集中營的方式對付反對分子，但是卻不能如此對待魯伯·馬業神父，因為他太出名。他們只好用其他方法，即是禁止他宣講。1937年4月7日，他們發布下列命令：「由於馬業神父的宣講危害國家，因此禁止他公開發言。」5月28日，兩名蓋世太保軍官告知他這項禁令。他接受這道命令，但是，他表示仍會繼續宣講。

他告訴弗哈勃（Faulhaber）樞機主教及耶穌會省會長羅士赫（Roesch）神父他的決定及後果，並請問他們兩位他是否應服從命令。最後的決定是准許馬業向當權者公開挑戰。

「省會長神父，我衷心感謝您的准許。我非常高興。」

賭注已經下了。

在蓋世太保手中

馬業不僅在慕尼黑，也在附近的城鎮宣講，沒有人制止他。當權者正準備以許多卑鄙的事來指控耶穌會士的種種惡行。當蓋世太保認為一切都準備妥當時，便在1937年6月5日星期六派兩名軍官來逮捕他。第二天，在慕尼黑所有教堂的主日彌撒中發布了這消息。市民發動示威與暴動，警察也四處驅散羣眾。

星期一，省會長羅士赫神父去見蓋世太保的長官史狄普（Stapp），發現他極為苦惱。省會長神父請求見馬業一面。

「你為何要見他？」

「想了解他的情形，問問他需要什麼。」

「我向你保證他很好，你可以告訴所有的人。」

「別人不會相信的。」

「假如你見了他，他們就會相信嗎？」

「假如我真的見了他，他們就會相信的。」

「你見不到他。」

「我一定要見他。」

「如何見？」

「他是一名傷兵，他的母親已經八十歲。難道我要告訴她，她的兒子關在監獄中，而獄方不許我見他嗎？」

史狄普站起來，衝出去，用力關上門。十五分鐘後門打開了，馬業出現在門口，這位長官站在他背後。

「啊，省會長神父，太好了！」

講完他所需要的東西後，馬業說他想要辦告解，但是史狄普嚴厲的禁止。經過較友善的商討後，一名較為溫和的警官試著促成協議說：

「假如我們只准許你在耶穌會的教堂宣講，而不准在其他教堂宣講，你接受嗎？」

馬業拒絕這項提議。

「假如我准許你在慕尼黑城內所有的教堂裡宣講，而不許在城外教堂宣講，你接受嗎？」

「我要按良心的指示宣講。」

「那麼你就留在監獄裡吧！」

由於當權者的要求，雖然馬業知道自己被禁止宣講，但是他仍然寫下自己決意要繼續在巴伐利亞地區宣講的文件，簽署時間

為 1937 年 6 月 9 日。第二天，史狄普手中握有這份供述書，馬業不再是蓋世太保的犯人而是一名待審的犯人，並且由蓋世太保的監獄押送到在施塔德爾哈（Stadelheim）的普通監獄中。

不屈不撓

蓋世太保催促特殊法庭盡快審訊馬業的案件，於是在 7 月 22 日開庭審問。當馬業到達正義之宮時，他的辯護律師請他簽署下列文件：「無論我是否是一名受歡迎的宣講者，我都要盡力遵守法律的規定。」

這不是承認自己有罪的暗示嗎？

馬業不願意簽這份文件，只有當他的律師向他保證省會長神父也贊同時，他才同意簽字，但是他加上自己的說明：「只要與我良心的命令是一致的。」

馬業被判刑六個月，但是，由於那對他有利的最後一份文件，法院收回逮捕令，並暫緩判決，因此他無罪釋放。蓋世太保極為不悅，害怕他會如英雄般重回慕尼黑。省會長神父提出妥協方法是：馬業退居到距離慕尼黑三十公里的羅門修希（Rotmanshoehe）避靜院裡，並在未來七週不對羣眾宣講。蓋世太保接受這項決定。

七週後，馬業神父靜悄悄的回到慕尼黑，按照樞機主教的意願及省會長所同意的，他恢復以往的使徒工作，除講道外。這點使馬業很難過。他告訴省會長，人們會誤以為他向蓋世太保的威脅屈服。

1937 年聖誕節前，省會長承認教友都感到失望，而納粹則興高采烈，他告訴馬業：「我同意你的看法，你去宣講比較好。」

1938 年元旦，馬業再度登上講台宣講；他宣講耶穌聖名，避

免發表任何冒犯性的言論，1月5日，兩名警官來探問他明天是否還要宣講。

「當然。」

於是他就被抓，押送到關重刑犯的監獄去。他被視為一般犯人，剃光頭髮，留下指紋，被人由不同角度拍照，並給予一個號碼：9469

他的服刑期應是六個月，到1938年6月5日止，而事實上他在5月5日便提早出獄。他回到慕尼黑，參加基督聖體節的遊行，使羣眾歡喜若狂。蓋世太保堅持他不應該宣講或向廣大羣眾演講；樞機主教不想被蓋世太保找麻煩，而省會長神父又不能違背樞機主教的意願，因此，馬業神父只好繼續保持緘默。

他找到另一種從事使徒工作的方法，即是在修女院裡從事個人談話與靈修輔導，勸導與聽告解，參加聖母會會員小組聚會——如此便沒有奸細向蓋世太保告密。

第三次被捕下獄

1939年10月的某一天，他被傳喚前往蓋世太保總部。一名軍官向他讀一份保皇黨成員的報告，文中提到他們設法獲取馬業的支持推翻納粹政府，恢復君主體制。馬業並未同意這項建議也未接受任何職位。但是，蓋世太保想知道是否還有別人向他提出同樣的企圖。馬業拒絕說出其他人的名字，因為這是嚴重的不忠於自己的職守。

他回家去，深信事情不會就此了結。11月3日，兩名蓋世太保軍官將他帶走。重新審問他，企圖由他口中獲得其他參與者的名字，再一次遭到馬業拒絕洩漏機密。警察聯繫臥病中的樞機主教，他表示在一份正式文件上規定，德國法律有義務保護司鐸的

守密權。

在官署等候一天，看到應訊者臉上畏懼的表情及全身的顫抖，這一切對馬業來講，已習以為常了。深夜之後，一位軍官告訴他，他已遭到收押，並帶他進入一間囚室。幾天之後，他得知自己被抓的理由是「支持仇恨國家的運動」。

柏林蓋世太保的首領決定馬業應該關在嚴密監控的牢房中直到戰爭的結束。他也命令將他轉移至柏林以北三十公里的集中營裡。12月22日晚上及23日，他被押搭乘掛有「蓋世太保保留車廂」的火車，前往柏林。在集中營裡，由於他是一名傷兵，因此不住在一般營房中，而住在醫療室裡。

他的健康亮起紅燈，體重每週減少一公斤。假如他死在集中營裡，納粹黨就必須面對羣眾的憤怒。在與慕尼黑的總主教做了長時間的協商後，他們決定在1940年8月7日將他移送到慕尼黑以南埃特爾（Ettal）山區一座本篤會修院中。

他受到該修院院長最熱忱的歡迎。馬業神父問警官他目前的身分是什麼；他們告訴他，他已完全自由，但是，他不可走出修院的範圍。其他的限制是：不可與外界接觸，只准與近親通信及接受他們的探訪，不可聽告解。他完全處於另一種囚禁狀況中。他將自己的情況做了以下的總結：「雖然我還活著，但是我已被判了死刑，遠勝我所面臨過的許多次真正的死亡。」

這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因為他覺得被所有的人遺棄。美麗的風景、本篤會修院著名的優異產品及啤酒都不能吸引他。他仍堅守自我克制的原則。

從1940年8月7日到1945年5月6日，馬業在那裡度過了五年的歲月，直到美軍占領埃特爾並控制該地區為止。在耶穌升天節那天，他走遍整個城鎮，並在修院講道，以慶祝自己重獲自

由。5月11日，慕尼黑的新任警長，也是他昔日的老友開車來接他。回到慕尼黑後，他親眼見到戰爭留下的斷垣殘壁；百分之九十的城市毀於戰火，六千六百三十人死於戰亂。

5月27日，聖母會舉行戰後的第一次慶典。上千人前來參加，他們昔日的指導神父為鼓勵他們低沉的士氣，義正辭嚴的向他們說道：「天主使我們活下來，是要賦予我們使命。我們必須全力以赴，達成任務。」

「主！」

他的工作包括防止不正義的事發生。在他們積極宣傳「反納粹化」的過程中，占領德國的美軍將領懲罰了許多無辜的人民，馬業過去在納粹統治下遭迫害的紀錄，使他能自由的發言，他也利用此優勢表達自己在倫理方面的權威；他寫過三百多封信，為那些因莫須有罪名而失業的人求情。

通常，他利用晚上的時間寫信。1945年10月31日晚上九點，如同往常一樣，他的打字員史提芬（Steffen）修士來到他房間準備開始工作，出人意料的，馬業告訴他說：

「我們不再工作了。」

他看起來非常疲倦。第二天是諸聖節，他在小聖堂舉行彌撒，唸完當天真福八端的福音後開始講道，但是卻停頓了，只說：

「主，主，主。」

事實上，是天主在召叫他。他的義肢支撐著他的身體，使他不至於倒在地上，有幾個人衝上前去扶著他。有一位參與彌撒的醫生診斷他是腦溢血。他被送進醫院，但是並沒有清醒。上午十一時，他走完了塵世的旅程。

阿爾弗雷德·德爾普 (Alfred Delp, 1907-1945)

在波洛成斯 (Plötzensee) 的處決

1945年2月2日，柏林提格 (Tegel) 中央監獄的神師布赫霍茲 (Buchholz) 神父祕密的得知一批犯人將在波洛成斯遭到處決，官方在那裡設置了集體吊刑的刑架。神師神父不許陪伴叛國罪犯走向絞刑架。然而，納粹的愚昧作法卻無法泯滅人性，官員中總不乏善良人士向神父通風報信。因此，當死刑犯走近他藏身的地方時，他能一一的降福他們，並親眼目睹殘酷、沉悶的過程。

在漫長的服刑期間，他曾探視過他們，因此，他熟知他們，其中有一位是他最喜愛的德爾普神父。他不顧獄方的阻擾，在探視他時一起談論德國的未來、受迫害的教會和時代偉人；他們一同祈禱，毫不害怕自己那充滿希望與畏懼的未來。他曾將麵餅與葡萄酒私下帶入監獄，而現在，在他奉獻自己生命之前，他要給他最後的降福。

德爾普神父的另一位朋友在當天晚上得知他的死訊，死者的姊妹設法要拿到他的骨灰，將它安葬在慕尼黑。官員用輕蔑的言詞告訴她，他們遵照長官的命令將骨灰拋棄，「將他們完全銷毀，絲毫不留。」

聰敏又熱誠

阿爾弗雷德·德爾普的父親是基督新教徒，母親是天主教徒。德爾普在天主教受洗，但是當他念中學時，他的父親命令他

接受新教牧師的教導，並到新教教堂參加禮拜。在中學的最後幾年，阿爾弗雷德可能受到於 1919 年創始、但日後被希特勒禁止的新德國運動影響，而堅決選擇天主教為他基督信仰的依歸。他一定是被這運動的新穎和突破傳統的方式所吸引。

十九歲時他進入慕尼黑的耶穌會初學院，接受正規訓練。其間，他遇到許多困難。他對哲學大師海德格（Heidegger）的熱愛引起一些人的關注。事實上，他並非想要探討海德格的哲學體系，而是要了解他的學說對當時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運動所造成的影響。

1939 年完成讀書階段後，他被指派到該校社會學部門所辦的 *Stimmen der Zeit* 雜誌編輯部工作。1941 年，政府查封雜誌，占據他們的房屋，解散作者羣。德爾普退居到慕尼黑的一處堂區，正式擔任聖喬治小堂的駐堂神父，透過講道與個人接觸從事使徒工作。

他沙啞又不悅耳的聲音及粗魯的動作，未能使他成為一名成功的講道者；但每個主日，那些忠實的信友都已習慣聽他講道。那幾年正是德軍所向無敵、連連獲勝的時期，而他毫不畏懼的表達自己反對國家社會主義。他尤其強調的是德國民族的優良傳統已遭到濫用，轉變為暴力及控制權。他看見將有一天，傲慢會導致國破家亡。「優秀之人的勝利遊行變成強勢的軍力競賽，隨後是成羣的乞丐，最後是一望無際的死屍。」

有些朋友開始關心他的直言和煽動力會為他帶來什麼後果。當發隆重聖願的日子來到時，長上們決定延期，他深感失望。由於生性坦誠，他無法忍受長上們的緘默和保留的態度。他很難面對自己不為修會接受的事實。

但是天主有另外的計畫。當他在 8 月 15 日誓發末願時，天

主以他不知道的方式引領他面對更美好的一天。

克萊斯奧 (Kreisau) 小組

那旅程的第一步便是籌組克萊斯奧小組。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想要召集一批菁英分子一起反省德國的戲劇，並且為納粹垮台後重建國家作準備，他請耶穌會省會長羅士赫神父推薦一位能參加聚會的神父。羅士赫神父向他提到德爾普。

毛奇伯爵是德國最高貴族之一，在西里西亞 (Silesia) 擁有大片土地，傑出的國際法專家，但是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他不贊成德國對法國犯人的待遇，要求政府按日內瓦公約對待犯人。他警覺到一些丹麥官員採用反猶太政策，德國政府也即將在國內推行這政策。

毛奇伯爵召集的小組成員包括貴族、官員、職業外交官、社會學家、軍事家及代表基督教會的牧師和德爾普神父。該小組是以首次聚會地點的名稱命名的。

這個計畫被 1944 年 7 月 20 日推翻希特勒的行動所破壞，貴族和官員都逃走了，接下來便是恐怖的鎮壓。雖然克萊斯奧小組沒有參與行動，但是小組成員都與同謀者有關，有些是他們的親戚，總之都是他們的同路人。當主謀者及參與行動的軍官遭到處決後，納粹隨即便逮捕小組的成員並決定將他們列入共犯，以便控訴他們的叛國罪。

7 月 28 日德爾普神父在慕尼黑的聖喬治小教堂舉行彌撒，有兩個並非來教堂祈禱的人，在彌撒結束後，突然地將他帶走。

落入蓋世太保手中

慕尼黑的蓋世太保拒絕提供有關德爾普神父的訊息。但是在8月6日當他被解送到柏林時，天主卻安排某人在火車上認出他來，他設法要別人知道他被帶往何處。

然而他要被帶往何處的監獄呢？一位勇敢的婦女找出了答案：8月14日她得知德爾普關在雷爾特史崔西（Lehrterstrasse）監獄中；第二天她送來一包衣服給他，並寫了一張鼓勵他的字條塞入包裹中，在聖母升天慶節收到這張字條，德爾普視它為天主照顧的記號。他感到在最需要時，得到了朋友的關懷。

在雷爾特史崔西監獄裡，他被單獨監禁了一個月，每晚接受冗長的審問，全身處處都是刑求所留下的斑斑傷痕。有一天晚上，刑求完之後，獄警將他丟進牢房，然後對他說：

「你今晚睡不好，就如你所願的祈禱，但沒有神明要聽你的禱告，沒有天使會來解救你。我們會一覺睡到醒，明天，我們體力恢復，從頭再來。」

9月12日，他被換到提格的中央監獄，法學家、經濟學家、高階官員、貴族、牧師、神父、克萊斯奧小組成員，以及傑出的德國名人如俾斯麥（Gottfried von Bismarck）、恩斯特（Ernst von Harnack）、普朗克（Erwin Planck）……等都關在這裡。一名警衛毫不掩飾的表達他對這些犯人的好奇，他們「整天工作，晚上一半的時間用來祈禱，似乎比警衛還快樂」。

在這裡，獄方規定較鬆，警衛很親切，隔離比較不嚴，德爾普可以戴著手銬做彌撒。他的信件及日記說明了彌撒對他的重要性：「昨晚的彌撒充滿了恩寵……我幾乎無法入睡；花很長時間坐在我的小聖體櫃前，不停的誦唸：主，請收納。」

祭獻

11月10日開始審訊第一批嫌犯。三名天主教軍人被判死刑，並於14日執行，這對其他人是一種警告。聯軍轟炸柏林使情況變得緊張，對犯人更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對德爾普而言這是極困難的時期。30日，他開始做聖母無原罪慶節的九日敬禮；他要在聖母的慶節上找尋天主的記號。12月7日晚上，他收到一包衣服，裡面塞了一張字條，告訴他明天塔頓巴赫（Tattenbach）神父要來探視他，並以耶穌會之名接納他的隆重聖願。

第二天，1944年12月8日，德爾普與來訪的神父分別坐在桌子的兩端，警衛坐中間。塔頓巴赫神父告訴他一些消息後，便向警衛說明他們要以拉丁文祈禱。由於情緒過於激動，德爾普只能慢慢的唸誓詞並在發願書上簽字。當晚他在日記上寫道：「一瞬間有這麼多事，真是太多了……我只祈求在九日敬禮中一天一個記號，讓我知道我的祈禱如何被天主俯聽。現在我已不為自己活了，因為慈愛的天主已判定我配得上祂的恩寵。」

12月25日他在自己的牢房裡「舉行我生命中最美的子夜彌撒」。他已準備接受天主任何的安排：「假如天主要我接受波洛成斯的絞刑，我會全心的接受。」在1月1日耶穌聖名慶節的這一天，他寫道：「在新年開始的一天，我希望寫一個名字，就是我的主，我的修會的名字：耶穌。它總括了我想得到的一切，我所相信的及我希望之所在。」

判處死刑

1945年1月9日，克萊斯奧小組的成員在特選的並按照既定

方式審訊的陪審團前接受審問。德爾普及其他被告極小心的準備自己的辯護；法庭沒有提到他們參與前一年 7 月 20 日反對希特勒之事件；審判長強烈的表達自己的震驚，因為他們竟然敢認為德國人民除了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及元首的計畫外還能有前途；他再度強調基督信仰與國家社會主義不能相容，並且極力的污衊天主教及耶穌會。

11 日，審判定讞，六人被判死刑，德爾普與毛奇伯爵是其中的兩人，另外三人被判入獄服刑。

與過去重大刑案不同的是，審判並未在當天公開宣布，不論是否有延期宣判的可能，被告被遣回提格監獄。

24 日布赫霍茲神父得知在波洛成斯正在為執行絞刑做準備，但是德爾普與毛奇伯爵並不在死刑犯的名單中。在這緊要關頭，他們兩人互相鼓勵，在伯爵寫給德爾普神父的字條上，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唯一關心的一定會如同種子般掉落在肥沃的田地裡。」

這位耶穌會士已經準備好面對 2 月 2 日，另一個聖母的節日將要發生的事。1 月 31 日晚上他被帶往波洛成斯，將在 2 日被處死，這天，許多耶穌會士將在修會聖堂誓發未願。他怕自己太軟弱不敢面對酷刑，但是情形並非如此，他以平靜和收斂的心度過最後的時刻，完全承認自己的罪過：「拒絕傲慢與暴力的宗教；在基督信仰及教會中看到給予德國新生命並解救國家的力量；在耶穌會內找到歸宿並深愛這修會。」

8. 兩名共產黨的囚犯： 沃爾特·西斯季克

(Walter Ciszek, 1904-1984)

從寒冷的地方歸來

1963年10月11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紐約《美國》雜誌的編輯大衛神父（Fr. Thurston N. Davis）辦公室的電話響起。電話來自他的一位朋友，告訴他當天下午四時國務院將宣布一項重要消息：蘇聯已釋放被監禁的兩名美國公民，以交換被美國逮捕的兩名俄羅斯商人。兩名美國人將於當晚搭乘飛機返國，於第二天上午抵達紐約艾達華國際機場。

兩名美國人是二十四歲的富布賴特（Fulbright）大學學生馬文·馬克能（Marvin Makinen），兩年前因間諜罪名被抓；另一名是飽經戰亂、一度被認為已遇難的耶穌會士沃爾特·西斯季克神父。《美國》雜誌不能錯失這獨一無二的事件；大衛神父曾經是這位被稱為英雄的夥伴。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第五〇一號班機於早晨六點五十五分抵達。首先走出機艙的是年輕的美國人和這名耶穌會士，他們被紐約警察團團包圍。

歡迎式是私下的，只有家人及幾名耶穌會士。但是幾天後在閃光燈下於雜誌社舉行記者會情況就不同了。日後，他先向耶穌會團體敘述自己的冒險經歷，再由丹尼爾神父（Fr. Daniel Flaherty）書寫成冊，書名為《與主同在俄羅斯》（*With God in Russia*），書中有西斯季克經歷的真人真事，有丹尼爾神父優美

的文字敘述。

從紐約到烏拉 (Urals) 山區

「我二十四歲，我自己作決定。」當耶穌會省會長問沃爾特·西斯季克是否有父親的許可進入耶穌會時，他這樣回答。

「這是最後一次，你不許去。」他的父親用拳頭槌桌子說。

「我要去。」沃爾特大聲吼叫道，同樣用拳頭槌桌子說道：「是我去，不是你去。」

抱著這樣的決心，沃爾特於 1928 年進入紐約聖安德初學院；1934 年他到羅馬俄羅斯學院就讀，並成為俄羅斯傳教地區的一分子；1938 年他加入波蘭東部一個東方禮的堂區；1939 年德軍裝甲車由西部入侵波蘭，俄羅斯軍隊由東面占領波蘭。西斯季克神父留在原來的地方沒有遷移到別處，不知不覺中，自己已身處俄國境內。很快他便有機會深入蘇聯內部。

此時，俄國正要由占領的地區雇用大批工人前往烏拉山區的工廠工作。西斯季克與兩位同伴諾維考夫 (Viktor Novikov) 和莫斯科瓦 (Jerzy Moskwa) 決定加入這批工人的行列。他們獲得耶穌會上級的許可及利沃夫 (Lvov) 的大主教謝普提克 (Andrej Sheptickij) 的批准，並接受下列指示：小心謹慎，熟悉情況，一年內回來向上級報告。他們認為自己的身分不會被發現，這是何等天真的想法。

西斯季克用新名字利皮斯基 (Vladimir Martinovich Lipinski) 及新身分——一名在德軍轟炸時失去家人的波蘭籍鰥夫。1940 年 3 月 19 日，他與諾維考夫乘坐八九七二五號火車前往二千二百五十公里外的烏拉山中部，莫斯科瓦隨後才到。

經過兩週火車的旅程，最後終於到達丘索沃伊 (Chusovoy)

外一處龐大的木材中心，該處的原木是順著附近的丘索沃伊河和烏拉河兩條河漂流而下，匯集於此地。他們被派往丘索沃伊以東五十哩的太拉亞高拉（Teplaya-Gora）木材場工作，這是另一個漂流原木集散地。到達後，他們被交由監督管理，他是一位機靈的卸職律師，並且似乎立刻就對這兩名耶穌會士的身分產生懷疑。西斯季克告訴他自己悲慘的遭遇：妻子與孩子死於德軍的空襲；他們過街時，一枚炸彈在他們身邊爆炸，妻子、兒子及兩個女兒當場死亡，自己被彈到對街，倖免於難。對他的故事，這位卸職律師無動於衷。

在人民內政委員會的掌控中

在木材場裡，他們住在粗糙又簡陋的房舍內，毫無隱私可言。諾維考夫被派擔任文書工作；西斯季克則做簡單的勞力工作，即是將原木從河裡拖上來，然後排成長長的一行。赤手搬運外皮粗糙而又沉重的原木使他的雙手皮破血流，雖然如此，還是要伸手到河水中將木頭拖上岸，排列整齊。不僅如此，他還與那位在一個工作天排了六十平方米原木、體格魁梧的另一名工人比賽，他排了五十五平方米，僅次於前者。即使這樣的努力工作，也無法消除那位卸職律師對他的懷疑。

1940年夏末，西斯季克申請擔任貨車駕駛。他通過了考試，上級給他一台老舊的輕便貨車，由於車身過於歪斜，致使他無法在夜間的森林裡下車；他身邊沒有工具，以致必須在黑暗中用凍僵的雙手修理它。

在營房裡不可能做彌撒，他們兩人便走到樹林中，以一個大樹樁為祭台，在上面做彌撒，一人在路口把風，另一人舉行聖祭。「這是終身難忘的經驗，在寂靜的森林裡，你可以聽見松鼠

在林間跑動的聲音，鳥兒羣聚在頭頂上方。頓時，你似乎非常接近大自然，接近天主。一切都如此美麗，神祕無比，一時之間所有的危險都遠離了。」西斯季克說道。

然而他們的行動已經引起監督人員的懷疑。1941年1月，他們突然被調往另一處原木場。諾維考夫仍擔任文書工作，西斯季克則在木炭窯安放木材。6月23日清晨三時，祕密警察包圍營房，以德國間諜罪名逮捕兩位耶穌會士及他們的室友，西斯季克被押送到彼爾姆（Perm）附近的監獄，抵達的當天便接受審問：

「你是誰？」

西斯季克開始敘述自己的故事。

「不，不，不，你不是利皮斯基，你不是俄國人，你也不是波蘭人。你是一名司鐸，你的名字是西斯季克，你是德國間諜。你為何不說實話呢？」

西斯季克啞口無言。

「你看，我們對你一清二楚，所以，請講實話吧！」

「好，我說實話，我不是德國間諜。」

此後便開始了一連串的審問，時間由一小時到一天，長短不等。相同的問題一再重複。有兩、三次他被帶到有特殊布置的房間，坐在橡皮棍中間，只要他稍微移動，臉部就會遭到重擊。他們不再審問他了，只想要摧毀他的反抗力。

在審問過程中，他們愈來愈清楚他是美國籍的司鐸，曾在羅馬求學，持波蘭護照入境俄國；至於他用的假證件，現在都不重要了。他們堅決相信他是一名德國間諜，想要知道他詳細的間諜活動內容。

1941年8月某天早晨，衛兵叫他的名字，經過一連串的檢查後，他被帶往路比安卡（Lubianka）。

路比安卡的五年歲月

他在這裡的時間是由 1941 年 8 月到 1945 年 6 月，1942 年 8 月 20 日他被判服十五年的勞役。最初幾年是他最辛苦的時期，他經歷過飢餓、孤獨、疲勞的審問，誠如他日後在伍德斯托克大學演講時所說的，那種精神上的折磨曾幾度使他企圖自殺。有一次當他想要跳樓時，被警衛制止。當他陷入最憂鬱的狀況時，他強烈感受到天主的愛的臨在，使他恢復了內心的平安及力量。當前途一片黯淡之時，這種經驗曾多次出現。

第一次的審問使他感到極為震驚，他們對他生命中的點點滴滴瞭若指掌。日後他得知莫斯科瓦供出了一切；1941 年 1 月 29 日莫斯科瓦在越過匈牙利邊境進入俄國占領的波蘭時被捕（莫斯科瓦被解送到基輔監獄，1941 年 7 月 7 日判處死刑，當天即處決）。這便說明了在 1941 年 6 月 23 日西斯季克與諾維考夫被捕之前，他們已經受到監視。

德軍開始對莫斯科的轟炸中斷了他在路比安卡的監禁；10 月 6 日清晨，囚犯解送到火車站，如沙丁魚般的將他們擠進停放的车廂內。炸彈不停的落下，但是卻沒有一枚打中他們。從莫斯科車站他們被送往沙拉多夫（Saratov）監獄，1942 年 1 月 23 日德軍開始撤退，他又被送回路比安卡。

在兩、三天內他面對最嚴厲的審問，幾乎是全天不間斷的問話。審問者是一位約三十五歲友善的男士，嚴肅中有幾分冷靜，禮貌但卻有效率。有一天當這位審問人員離開座位去拿一份文件時，西斯季克偷看他的護照，知道他的名字是塞多夫（Aleksandr Sedov）。

塞多夫審問西斯季克有半年之久，他總覺得他隱瞞了一些事

實。烏拉山區是蘇聯主要戰備工業區，在太拉亞高拉有一座機槍工廠。塞多夫認為司鐸自願到該地區去，如果不是為了蓄意破壞，便是以德國間諜身分前往。

由於無法獲得西斯季克的口供，塞多夫採用一種狡猾的伎倆企圖得到他的信任。一天晚上，他拿著三明治、一塊蛋糕和兩杯熱茶。

「打擾你的睡眠，請你吃點點心。」他解釋道。

西斯季克只喝了半杯茶，立刻他的下顎便開始僵硬，雙手垂下，頭也突然低垂，他被迷昏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作了一些告白，那天是 1942 年 7 月 26 日。一個月後，即是 8 月 26 日，他以梵蒂岡間諜之名，而非德國間諜被判十五年勞役。

以「補充審訊」之名，他又被留在路比安卡三年，在這幾年裡他有許多祈禱和閱讀的時間。

告別路比安卡

1945 年 1 月，他出乎意料的發現自己與諾維考夫同關在一間囚室裡，後者與他因同樣罪名在同一天受審。他們為自己安排每日作息時間，與耶穌會任何一處會院差別不大。

不久，有一位頗有教養、口若懸河、名叫尚朋（Champon）的法國人加入他們，很快就成為兩位耶穌會士的朋友，並且戲稱自己是他們耶穌會士團體的一員：「我曾經聽過也讀過有關耶穌會士的種種，現在我自己正度著這種生活。」

然而這是一種新的詭計，想要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發現另一些證據。西斯季克一如往常沒有任何改變。但是在 1945 年 5 月末的某一天，這名法國人被叫出去接受訊問，然後又沉默的回來，此時，西斯季克開始對他產生懷疑。同一天的晚上，諾維考

夫被叫出去，又很沮喪的回來。西斯季克問道：「怎麼啦？」諾維考夫看了那名法國人一眼，搖搖頭，不發一語。一、兩天之後，他再次被訊問，回來後更沮喪。但是這次他明白的說了：「他們對他施壓，以各種方法試探他對俄國的愛國情操。」囚室裡的氣氛完全改變了，尚朋不再與他們兩人交談，諾維考夫也陷入沉思之中。

第二天中午前，西斯季克被叫出去。

「現在是你最後的機會了，你改變主意了嗎？」

「我告訴你們的都是真話，還有什麼可改變的呢？」

審問者什麼都沒說，拿起電話叫衛兵，衛兵進來後他只說：

「把他帶走。」

西斯季克沒有被帶回囚室而被帶到一間拘留室中。過了一會兒，同樣的衛兵把他的行李拿來，他知道自己不是要到另一間囚室而是要離開路比安卡。他想要自己的鞋子，請求衛兵去取，但是他們卻空手而回。1945年6月的某一天中午一時，西斯季克提著行李，腳上穿著厚襪子，最後一次走出了路比安卡。

十年勞役

接下來的旅程，無論是在莫斯科往西伯利亞中部的克拉斯諾雅斯克（Krasnoyarsk）的火車之行，或是由克拉斯諾雅斯克前往北極圈的杜金卡（Dudinka）的水上航行都是恐怖無比。因為同行的都是盜賊與罪犯，飢餓與擁擠更增加舟車之苦。當他到達杜金卡時，歡迎他的是以下的話：

「這裡是杜金卡，你們要排好隊，十人一組的下船。排好，排好。任何擾亂或企圖逃跑將立刻遭到射殺。任何人無論什麼理由，只要走出隊伍，我的人立即格殺勿論。」

他們一天工作十二小時。食物僅夠維持生存而已；氣溫是攝氏零下三十到四十度；住在簡陋的營房內，睡在沒有床墊的木板上，沒有足夠的毯子蓋住身體，晚上睡不暖，早晨全身僵硬得如一塊焊鐵。

整個集中營就是痛苦的源頭，這裡的一切都由罪犯掌控；他們分配食物，也偷取同伴們所分得的少量食物。為了要生存你必須自衛及與他人對抗。

在許多的暴徒中少不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例如哥薩克與土耳其混血的奧圖曼（Ottoman）曾殺死八個人，是一名特別保護西斯季克、性情粗暴但是行為卻像孩子的人，喜歡聽他敘述美國的故事；葛瑞夏（Grisha）是一名吉普賽人，教他如何摸魚和取得額外的食物；小偷伊夫蓋尼（Yevgeny）是一名雙手靈巧的竊盜，教他如何以技巧得到食物，但是卻不幸被一名路德派信徒所殺，使西斯季克為之傷心不已。

他在這羣人中發現另外兩位司鐸，因而可以舉行彌撒、送聖體及聽告解。

他被派做許多不同的工作。剛開始他在碼頭卸煤；從 10 月到 12 月，他從冰凍的河水中拉出原木；下一年他在北極礦坑工作；從 1947 年開始他被派到諾里爾斯克（Norilsk）去幫助修建工廠；日後，靠一位老朋友的協助他得到一份助理看護的工作。

兩項因素使情況戲劇性的轉變：一是史達林於 1953 年 3 月 5 日逝世，一是囚犯非人的待遇導致持續了將近一個月的暴動。反抗者立場堅定，不肯妥協；幾天之後，似乎官方有意讓步並答應他們的要求，但是，那只是暫時的手段罷了。安全措施更嚴密，防備也更加強，有些帶頭者自殺了，營中恢復以往的規律。在最後一次攻擊中，西斯季克發現自己倒在屍體中，險些被槍彈擊中。

1953年10月，他被調往凱爾罕（Kayerkhan）礦區，該處工作極為艱辛，甚至時時有喪命的可能。有一天，有七個礦工死於一次爆炸中，西斯季克被一陣風吹到十幾公尺以外的地方，雖然沒有送命，但是卻昏迷了兩小時。1955年春天，一名年輕的立陶宛醫生，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告訴他假如他還想活下去，就要擺脫煤礦的工作，並設法為他安排較為輕鬆的工作。

一年後4月的第一週，西斯季克被叫到營區辦公室，告知他十天後將可獲釋。主管人員查閱記錄後發現，按照新規定他可減少三個月的工作。十五年的判刑，實際上他服了十四年九個月的刑。

離營的前一晚，大家為他開惜別晚會、募款和贈送禮物，一起談話到深夜。1955年4月22日上午九時，他用了兩小時在蘇聯的國家安全局辦公室簽署文件，填寫表格，聆聽有關他未來身分的長篇大論的訓話。由於他是一名認錯的間諜，他只能有部分的自由，並獲得有限制的公民身分。

十一時半，完成一切離營手續後，他最後一次走出營區大門。大約走了十五步，他本能的停止腳步，等候衛兵，一如多年來每次出外工作必須遵守的一樣。囚犯和衛兵都在觀看，他們都捧腹大笑，百分之九十獲釋的犯人走出大門時都是如此。西斯季克掩飾自己的窘態，回頭對營區投下深長的最後一瞥，似乎要把自己與它撕裂一般，然後提起腳，向火車站走去。

受限的自由

有一班火車正要開出，他上了車前往他極熟悉的諾里爾斯克。他認識兩位朋友，一位是兩個月前獲釋的烏克蘭籍神父維多（Viktor），另一位是年輕的波蘭人拉迪士拉斯（Ladislav）。

他聯絡到維多神父並受到熱烈的歡迎。他一再改變自己的住處，在一個實驗室找到一份工作，有許多牧靈工作等他去做，尤其當維多神父回國後，他便是那裡的「堂區神父」。他寫信給自己的姊妹，也收到了獲釋後的第一個包裹，裡面有許多件衣服，還有一件長袍。

有一天，他被蘇聯祕密警察包圍。他們詢問他一些問題，最後提到重點：

「是誰准許你從事福傳工作的？」

「我在家鄉有舉行彌撒的許可，並且可以隨時祈禱；假如有人進來，我不會把他趕出去。」

「司鐸向人民要錢是違法的。」

「請你舉出我向人民要錢的例子來吧！你知道，你舉不出來。」

他被釋放了，但是他也知道他們會阻止他的「顛覆活動」。1957年初，他又被傳訊。他們告訴他停止司鐸的活動，這是最後的警告。

1958年復活節，他的福傳工作達到頂峰，他的教堂熱烈慶祝復活節。小教堂裡擠滿了信友，他按照俄羅斯傳統習俗所祝福的復活節麵包與糖果「可以裝滿一卡車」，當他隆重的開始主持復活節彌撒時，唱詩班及信眾開懷的歌聲似乎快要使教堂崩裂。

警察從頭到尾參與，但未干預儀式的進行。禮儀結束後，西斯季克回到自己的房間，筋疲力竭，內心感到無比的滿足。他覺得自己在俄國為天主羊羣服務的梦想已經開始實現了。

還未到星期三，在他去工作之前，他就被祕密警察包圍。

「你是利皮斯基嗎？」

「我是。」

「換好衣服，請跟我們來。」

他被帶到祕密警察總部，一名身材高大的警官冷眼注視他，然後說：

「利皮斯基，你在諾里爾斯克的福傳工作是不需要的，你了解嗎？」

「是。」

「你有十天時間準備離開諾里爾斯克，永遠不要再想回來。」

他拿到一張飛往克拉斯諾雅斯克的機票，4月13日他含淚揮別了信友。

十二年來第一次他在克拉斯諾雅斯克經驗到溫暖的春天。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當地人數更多、組織更健全的天主教團體，並再度參與其中。有一天，他得到命令：

「四十八小時內你必須離開這裡，否則我們會把你押出去。」

他可以在阿巴坎（Abakan）與詹尼西斯科（Jenisseisk）兩地之中作選擇，他選了前者，因為比較靠近南邊。第一天晚上他露宿街頭；後來找到了棲身之處，但不急於找工作；他覺得很累，於是決定休息一段時間。一年後，他覺得自己已「身強體健」，便開始找工作。他在修車廠找到一份工作，並且獲得老闆、同事及顧客的肯定。他也結交朋友，然而祕密警察總是在跟蹤他。

1963年4月，他的姊妹告訴他，她終於拿到來俄羅斯列寧格勒（Leningrad）、莫斯科、基輔（Kiev）、敖德薩（Odessa）、利沃夫等地的觀光簽證，這次旅遊於6月19日起從莫斯科開始。西斯季克決定前往首都，但是在他搭機前半小時，他收到電報，他姊妹的行程延期。

突然間，西斯季克成為祕密警察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一位軍官訊問他；經過漫長而友善的談話後，他將西斯季克介紹給他的

助理帕瓦洛維克（Viktor Pavlovich），此後帕瓦洛維克便「接手」西斯季克的一切事務。他們的談話都離不開往後的日子，也被問到許多繁瑣的細節問題，並且向他做了許多誘人的承諾。若不是有高層人士在幕後操縱，這一切不可能發生在西斯季克身上；只要他同意合作，他就可成為蘇聯政府的重要人物。

這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為結束這筆交易，帕瓦洛維克以試探的口吻問道：

「你認為如何？」

「我不相信你所說的。」

懸疑與拒絕

9月過去，10月來到，西斯季克沒有得到來自祕密警察或他姊妹的消息。直到那一聲敲在廚房窗戶上尖銳又響亮的聲音，開始了一連串使他離開俄羅斯的事件。他再次被祕密警察包圍，並告知他必須停止工作前往莫斯科，他們給他三天時間做準備。在不知道任何原因的情況下，他離開阿巴坎，前往莫斯科，他猜想這可能與他的姊妹的抵達有關。在莫斯科他遇見帕瓦洛維克，並將他介紹給他的同事庫茲涅索夫（Kuznetsov）。

「利皮斯基，你跟他走，他會照顧你的。」

西斯季克自言自語道：「怪不得，但是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庫茲涅索夫待他如上賓。他讓西斯季克住在莫斯科最高級的旅館中，每天以山珍海味招待他，帶他到戲院去觀賞表演；他想要帶他去欣賞波修瓦芭蕾舞，但因未能買到票而去聽一場沉悶乏味的蘇聯民歌演唱會。他帶他走遍莫斯科；西斯季克對那裡的道路、摩天大樓、列寧大學、紅場、克里姆林宮古老的東正教教

堂讚嘆不已；他聽見克里姆林宮的鐘樓在正午的報時聲，五年來他每天都聽到這鐘聲。

他們到底想從他身上得到什麼？他不禁感到納悶。

直到有一天他們到達機場時，他們才含蓄婉轉的向他說了幾句他不明白的話：

「利皮斯基，假如你想留下，你可以和我們在一起；你在那兒可能會過得很辛苦。」

這名俄國佬強調：「假如你要留下，我們可以停止對你的跟監。假如你要走，只要讓我知道，而你隨時都可以回來。」

他們已經走到登機處。有兩名看起來不像俄國佬的人來到他面前，其中一人對他說：

「西斯季克神父，我很高興見到你。」

這位先生名叫科爾克（Kirk），是美國大使館的官員。這是他在俄羅斯第一次被稱為「西斯季克神父」。多年來在這裡的人們都稱他「利皮斯基」或「偉利叔叔」（Djadja Valodga）。

庫茲涅索夫與科爾克都很緊張，但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有什麼玄機呢？終於庫茲涅索夫開口了：

「我們要將這案子結案嗎？」

「好，讓我們將這事結束吧！」科爾克說。

科爾克拿出一份文件，請西斯季克簽字後說：

「神父，從現在起，你又是美國公民了。」

「這真是一則神話故事。」西斯季克低聲的說，突然間，他覺得自由又輕鬆。他還剩下三塊盧布，他邀請眼前的幾個人到機場的餐廳去。他還沒有開始喝茶時，一名祕密警察走過來說：

「快！快！不要誤了飛機。」

他們搭上正在等候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機起飛，

向上爬升，然後轉了一個大彎。克里姆林宮的尖塔出現在遠處。西斯季克緩慢地、慎重地對著他正要離開的這片土地劃了一個十字聖號。

安東·魯里

(Anton Luli, 1910-1998)

幾乎是一位殉道者

1996年11月7日，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舉行慶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晉鐸金慶大會。當晚的「明星」是阿爾巴尼亞籍的耶穌會士安東·魯里，他的故事深深觸動這位波蘭籍教宗的心。

自從1979年11月6日他被宣判死刑後，便音訊杳然，大家也認為他死了。現在，他向鴉雀無聲的一萬三千名聽眾簡單敘述他的故事。

修士生涯

阿爾巴尼亞是巴爾幹半島上一個多山、交通不便的國家，曾有四個世紀屬於羅馬帝國。居民中百分之七十信奉伊斯蘭教，百分之二十信奉東正教，百分之十為天主教徒，該地區的福傳工作委託給威尼托—米蘭省的耶穌會士。其中心不設在首都地拉那（Tirana）而在斯科德（Shkodra），此外還有一所中學、使徒學校及修院。雄偉的建築是整個城鎮的驕傲，人人都稱它為阿爾巴尼亞的梵蒂岡。安東·魯里進入修院，原想當一名教區神父，但是他覺得自己有耶穌會的聖召，並告訴母親，她卻極力的反對，說：

「我要送你的兩個弟弟去修院，你必須回來。你是家中的老大，你需要養家。」

後來他知道，母親對他的選擇感到高興。

安東·魯里在義大利接受初學訓練及進修，1943年，就是德軍進攻阿爾巴尼亞的同一年，他回到斯科德。由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所領導的反抗勢力為共產黨的奪權鋪了路，1946年該國宣布為人民共和國。身兼阿爾巴尼亞工人黨的創始人（1941）、首相（1945-1954）、黨書記（1954 至去世）的霍查（1908-1985）以過於嚴厲的方式管理國家，偏離共產黨精神，使該國陷入孤立，並與蘇聯決裂。這便是日後魯里被監禁及受酷刑的背景。

宗教迫害極為嚴厲。由處決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副省會長佛斯提（Giovanni Fausti）及斯科德修院院長達加尼（Daniel Dajani）事件開始，繼而便是關閉及占據修院和擁有四十萬藏書的學校，這是阿爾巴尼亞最好的圖書館。魯里前往距離斯科德三十公里的斯奎里（Shkreli）擔任堂區司鐸，但是在1947年12月19日被安全人員逮捕。

殘暴中的殘暴

逮捕他的理由是他反對政府。他被帶到山中的小鎮科普里（Koplik），鎖在一間滿地糞便、似乎從未清掃過的廁所裡，狹小的空間，使他無法伸展四肢。幾天後，有一名不知是敵或是友的青年也關了進來。

政治委員每天傳喚他，宣告一些他從未犯過的罪。

「我從未做過這些事，假如我做過，請告訴我，並拿出證明。但是，假如控告不屬實，我就不簽字；我不能審判我自己，是你審判我。」

酷刑令人不寒而慄。有一天四、五名警察把他拉到樓上，開

始將他當成足球一般的踢來踢去，然後一名體格壯碩的大漢在他身上跳動，直到幾根肋骨斷裂；最後是以勒緊他的喉嚨到幾乎窒息結束這場酷刑，在腳踢和戲弄中把他送回狹窄的囚室。

獄卒每天把六百克的麵包和一點水丟在滿是排泄物的地上，這便是他的食物。八個半月來，他不曾洗過臉和手。

聖誕節在特殊的酷刑下度過。政治委員將他帶到樓上另一間廁所，脫下他的衣服，把他吊在梁木上。冷風侵襲他的身體，當寒氣逼近他的腹部時，他開始劇烈的抖動；當寒氣侵入心臟時，他想自己就要氣絕身亡了，他開始像瘋子般的喊叫。政治委員聽見了立刻跑來，從膝蓋以下為他取暖，將他放下，把他帶到辦公室，那裡有一個火爐，他坐在上面，花了半小時才使自己全身暖和起來。

此外還有其他形式的酷刑，我們不再提了。他仍然要接受固定的審問，最後被判遣送到卡瓦查（Kavaja）平原的沼澤之地比登（Bedén），接受七年的勞改。在那裡每天黎明出發，一天不停的工作，黃昏時才返回營地。食物是麵包、五穀湯、豆類或麵條，分量為七百五十克。衣服則破爛不堪。

1953年，即是他勞改期滿前一年，他被送到貝里歐（Burrel）監獄，該處因每天有幾名囚犯死亡而出名，它被稱為「消滅營」。由於一名囚犯藉個人關係而獲釋，他才得以進入。該國政府規定這座監獄只能有十七名犯人，他正好是第十七名。

試驗

1954年10月20日，他服刑期滿獲釋；他向主教報到，主教派他到申科爾（Shenkoll）。1955年5月15日正式接任堂區職務直到1967年3月19日，這是令人難忘的一天，因為阿爾巴尼亞

在這一天宣布自己是「全世界第一個真正的無神主義國家」。所有的教堂都關閉，神職人員也被解散。

魯里在他的兄弟家中住了一段時間，但是他發覺自己是兄弟的負擔並為他帶來危險；他在合作農場找到一份工作。十二年來他手持鋤頭、鐵鏟，在爛泥和濕地裡做工。他祕密而謹慎的做彌撒，甚至也是司鐸的室友也不曾注意到。

再度入獄

1979年4月30日，正當他在田裡工作時，一輛軍用車停在他面前，他無法想像這是來找他的，但是他聽見一聲命令：

「上車。」

他被銬上手銬，帶進他的寢室。

「你有宗教書籍嗎？」

「這就是我所有的。」

他被帶到斯科德，經過全身搜查後，找不到任何可疑之物。他被推進一道門裡，當他們鎖上門時，一股悲傷之情湧上心頭，但是，就在同一時刻，他感到天主安慰的臨在，如此貼近，使他覺得自己在與祂對話。

他在那裡度過了恐怖的四年。只能關四、五人的囚室，竟然關了二十人。為了生理需要，每次只打開一間囚室，其他的則門戶深鎖。你可以結交朋友或與別人點頭之交或對別人一無所知。

九個月以來，他不斷接受審問，同樣的問題一再重複。他們通常抓住他的身體，用力撞牆，不停地折磨他：

「我們知道你做過許多傷天害理的事。」

「請告訴我有那些。」

「我們要你自己承認。」

一小時後他們累了，告訴他說：

「滾吧！自己去反省。」

他們對他的指控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情，例如：在採收時，他忽略了五、六支埋在土裡的玉米而被指控為蓄意破壞；他被命令去收割玉蜀黍或太陽花時，卻被控告只收割豐美的而留下枯瘦的。

這類的指控持續了九個月，1979年11月6日，法院以危害人民的罪名判他死刑；兩天之後，判決改為坐二十五年牢及五年拘禁。對七十高齡的他來說，這無異於判他死刑。

由一營到一營

由於魯里年事已高，他被送往該國南部的一處集中營巴拉許（Ballash）。那裡有一千六百名犯人，其中有十五名司鐸。除清掃房屋和庭院外，他們沒有其他工作，但是生活本身便是一種酷刑。他們住在由三圈鐵絲網重重圍住的營區裡，有手持輕機槍的警衛全天監視；他們的頭被剃光，但是卻不許剪指甲，因為他們不許擁有任何小刀或剪刀；他們的食物包括六百克的麵包及如水般的湯。犯人中有一位醫生，他救了魯里三次的命。

他在這裡關了四年（1979-1983），之後送往他曾擔任堂區神父的申科爾，又在那裡關了四年（1983-1987）。最後一年，他染上幾乎使他喪命的肺炎。

不論這裡的犯人年齡多老，他們都被視為兒童。營中一名官員是黨員訓練師，他向他們宣講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歷史。高齡八十的魯里又坐在教室的長凳上了。

有一天，這位訓練師走進教室，很氣憤的大叫：

「司鐸都站起來，不許坐下。」

魯里沒有動。訓練師問每一位司鐸：

「你怎麼想？你要不要為黨效力？你相信天主或是相信我們的黨主席霍查？」

沒有一個人的回答是他所期望的。他最後問到魯里：

「你，安東，為什麼不站起來？」

「對不起，我聽不清楚。」

「你想說什麼？」

「我被教導要愛天主，要對天主抱有希望，至死不渝。」

說完了他就坐下。當他們離開大廳時，有幾位伊斯蘭信徒前來握住他的手說：

「謝謝你的作證。這些話對我們也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都相信同一的主。你的話給了我們勇氣。」

1987年他被送往第三個集中營沙蘭達（Saranda），在那裡關了兩年。他想自己會死在這裡，因此祈求天主賜他力量支撐下去。

最後的這個營區如同醫療所，然而這裡的生活卻非常艱難，因為有不同類型及不同年齡的犯人關在這裡：知識分子、遭解職的前任官員及既無知識又無憐憫之心且目中無人的頑固分子。生活在這裡，令人痛苦不已。魯里靠著讀書及服務別人來度日。有些人要付給他酬勞，但是他卻不收。

「我不需要酬勞。與你們在一起，並且互相打氣便是給我的報酬。」

獲得自由 心中無恨

1989年4月15日柏林圍牆倒塌，國家宣布大赦，司鐸獲釋。魯里前往斯科德附近他兄弟的家中小住。替他檢查身體的醫生告訴他，由於他的身體已虛弱不堪，幾天內就會死去。

他漸漸的復原，由於對自己家庭成員認識不夠，因此他仍很隱密的舉行彌撒，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 1990 年 11 月 4 日，教堂歸還天主教會為止。同月的 25 日，家鄉的信友請他為他們舉行彌撒。

「非常樂意。」他說。

一羣帶著刀槍的青年前來保護他，他要他們混進和平示威的羣眾中。

一切都很順利。第一台彌撒在墓園舉行，雖然天寒風強，仍有大批信徒參加；年長者感動得像孩子般哭泣。從那天起他便在教堂舉行彌撒，日後共產政權將這座教堂改成電影院。

由於還沒有主教，也沒有人安排神父們的工作，因此他們便各自返回自己原本的堂區。魯里回到申科爾，這是 1966 年 12 月 6 日在阿爾巴尼亞最早關閉的教堂，1991 年 3 月 27 日，聖週五重新開放，也是該國最後開放的教堂。

義大利耶穌會士曾負責阿爾巴尼亞的福傳工作，現在，當情況恢復正常後，上級派梅歐內（Pietro Maione）神父回到這裡召集生還的會士。魯里被派往首都地拉那負責聽告解；有來自全國的信徒向他辦告解。

在那裡的每一個人，甚至共產黨員，曾經迫害過他的人，都稱他為聖人；大家都看見他在街上擁抱對他最殘暴的獄警。

當他在教宗面前敘述自己所受的酷刑時，他說：

「從人性面來說，我不怨恨那些想要置我於死地的人。」

9. 兩位城市使徒：
若瑟·馬利亞·盧比奧
(José M. Rubio, 1864-1929)

保護人與受保護人

出生於阿美利亞省（Almería）的達里亞斯（Dalías），格瑞那達教區的若瑟·馬利亞·盧比奧，在格瑞那達修院求學時，一名教授對他萬般呵護，好似母雞保護雙翅下的幼雛一般。這位神職人員是來自以頑固聞名全西班牙的阿桑西歐（Joaquín Torres Asensio）神父；他為人正直，不向錯誤妥協，心胸寬大，但是脾氣暴躁。

具有這些特性的他非常喜愛這名年輕修士，並且要他與他同住。無疑的，保護人完全控制被保護人，但是從正面觀點來看，他頑強的個性改變了盧比奧羞澀與優柔寡斷的個性，長者的務實主義指引了年輕修士走出理想主義。

阿桑西歐神父與格瑞那達新任主教之間的不合，使情況有了改變，他辭去所有職務，然後在馬德里謀得一份新職，他不加思索的將他所保護的這名年輕修士送進馬德里修院就讀。

年輕的若瑟·馬利亞最後在馬德里晉鐸，1887年10月12日他在主教座堂善導之母祭台上舉行首祭，此處曾是耶穌會所管轄的教堂，磊思·公撒格（Aloysius Gonzaga）便在這座祭台前聽到天主要他進入耶穌會的召叫。

盧比奧的第一個職務是在欽春（Chinchón）擔任助理堂區神父，但是不久（1889年）又被派到埃什特美拉（Estremera）擔任

堂區神父。他的前任堂區神父不擅長管理，使堂區陷入雜亂無章的狀況，沒有留下領洗者、新婚者或死亡者的紀錄。祭衣間的牆壁竟成了堂區事務的登記處。

這位新任神父盡全力在精神和物質上重振這個堂區。一切都極為成功，所有花費都出自阿桑西歐神父的口袋。

「這人对金錢毫無概念，常常花錢如水，總有一天會毀了他，也毀了我。」

這位不屈不撓的神職人員運用他與教廷大使的關係，除原有職務外又在馬德里獲得一份地位崇高的職務。現在他要說服被保護人回到馬德里來。

「若瑟·馬利亞，你一定要再回到我身邊；你必須參與這場頗具競爭的考試。」

馬德里

這是一次為爭取一個有薪俸的職位而舉行的極為競爭的考試。另一位更有影響力的候選者獲得了這職位，盧比奧回到埃什特美拉。一個月後他又回到馬德里，因為他的保護人在修院為他爭取到一席教職。但是盧比奧不適合教書，因此未能持續很久就想放棄。他的吐血使問題更急迫，就連強硬的阿桑西歐神父也不得不改變主意而放棄。阿桑西歐神父以自己的影響力安排他擔任馬德里著名修女院的駐院神父。

現在是受保護人要為他的保護人安排住處了。對這位年輕的使徒而言，情況開始好轉；他的教堂對一般大眾開放，他的熱誠也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展現出來。修女們對他的偏見也很快消失了。

宣講、聽告解以及慈善工作，這位年輕的駐院神父已經如同一名耶穌會士在從事日後馬德里使徒的工作了。一如他常常說

的，他在意願上已是耶穌會士了，唯有他對阿桑西歐神父的感恩使他不能加入耶穌會。當盧比奧到格瑞那達去作靈修祈禱時，阿桑西歐神父心中不知不覺產生疑慮，自我警覺的說：

「若瑟·馬利亞會不會丟下我去加入耶穌會呢？」

1906年1月16日天主召回了阿桑西歐神父。如今這位在意願上已是耶穌會士的年輕神父成了正式的會士。他生命的第一階段已結束，現在他進入第二階段，也是最後的階段。

耶穌會士

「瓦勒拉（Valera）神父比阿桑西歐神父更愛我。」

這是這名新初學修士對他的初學導師的評語，他毫不掩飾自己對他的敬愛之情。

「我想我又變成小孩了。我非常高興，這也是我找尋的。」

在馬德里繁忙生活之後的平靜生活，使他在新聖召中找到生命的停泊處。按照當時嚴格法令規定，這時期卻很短：兩年初學（1906-1908），一年神學，一年協助城市裡的福傳工作，他在曼雷薩完成最後階段的訓練（1910-1911），然後回到馬德里的會院。

他所屬的新團體裡有傑出的宣講者與學者；盧比奧的簡單講道、基本神學、在告解室中平淡無奇的勸誡，這一切都使他與他們格格不入。他的派令來自昔日的初學導師、如今已是省會長的瓦勒拉神父，有一天他在幽暗的閣樓聽盧比奧講道。不久他就衝出來，說：

「我的天呀，我如果講這種道理，我會羞愧得要死！」

不用美麗文字的講道者

簡單樸實是他宣講的特色，沒有振奮人心的思想，沒有華麗的句子，沒有任何抓住人心的修辭；但是聽眾的心卻被他的話所折服；他的聲音一如天主的聲音在聽眾的心靈間回響；少了人的要素，卻開了恩寵之門。

有一次，突然他要代替名宣道家托瑞斯（Torres）神父去帶領一次靈修祈禱。以下是他的開場白：

「我從告解室出來；我毫無準備，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靜默祈禱了一會，然後開始講道。所有的人都很驚訝他明確而又有內涵的道理。

某些人因他笨拙的言詞發笑而離開教堂，卻也一再地回來聽他講道，甚至還全神貫注地聆聽，聽完道理，懷著無比感動的離去。

盧比奧常常是老調重談，但是人們從不感到厭煩地一再前來聽他講道。會院的教堂已經容不了被他所吸引的人。有一次，由於聽講的人太多，使得修女必須叫來警察制止他們。盧比奧被調換後，來聽講道的人數驟減，修女把以前坐在閣樓的女學生移到教堂裡，坐在長椅上。

一名曾經在托瑞斯神父指導下作靈修祈禱的信徒，聽過一次盧比奧的講道後作了以下的結論：

「其他的神父對我們的理性講話，這一位神父卻是對我們的心靈說話。」

馬德里主教蓋瑞（Eijoy Garay）修正以上的說法：「有人說他對人心講話而不是對人的理性講話。其實並非如此，他對整個人說話，包括理智、意志及行動；出自他嘴唇的言語充滿了新

生命，帶給人生命並驅使人立即行動。」

告解神父

蓋瑞主教稱盧比奧為告解神師：「馬德里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忙。在告解亭左右兩邊排滿了等候數小時想要辦告解的人。他的告解亭不僅是清除罪惡的地方，更是一處精神鍛鍊場所。信友在那裡獲得的是培育而不僅是赦罪。」

在等候辦告解的行列裡，不僅有婦女，也有男人，有些人每週搭火車來辦告解。還有人雇用專人排隊兩、三小時，為自己占位子，這些人搭第一班車來到馬德里，辦完告解後當天即返回家鄉。有一個家庭以他為全家告解神師，他們早晨四時半就出發前來盧比奧的教堂；清晨，教堂大門尚未開，但是外面已有人在排隊了。

似乎所有馬德里的居民，包括市中心住宅區的居民及郊區的窮人都蜂擁而至，來到他的告解亭外，他的客廳裡更擠滿了要見他的人。有一次，他正和一位窮苦婦女談話，有人想要從中打斷他們，於是盧比奧直截了當地說：

「教他等一下。現在和我談話的也是一個需要關懷的靈魂，是基督內的姊妹。」

由於女工必須回工廠報到，他會優先聽她們的告解。

「有女工要趕回去工作，請讓她先辦告解。」

他有效率的聽告解。他不說廢話，那些抱怨他的簡潔勸導的信徒仍然回來向他辦告解，因為他給人一種安全感。他的勸導因人而異，純屬個人性。「人們必須明白：赦罪來自天上。」他以諮商的方式而不用命令方式給予人靈修指導，他極為謹慎，甚至使人覺得他有些拘謹；他不會逾越天主的恩寵，而是等候天主採

取行動。當他認為自己該採取主動時，他會立場堅定的作出決定。

馬德里的使徒

他的工作不限於教堂內的神職。他與馬德里的窮人及輿論喚醒者，運用他組織方面的長才，一起從事慈善工作。

他的慈善工作是他靈修方向的具體表現；他藉著由虔誠信友中篩選的信友所組成的工作團隊，從事各項工作。

「我不知道這位神父的特殊才能是什麼；我每天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計畫，但是當他打電話給我，請我開車陪他去拜訪窮人時，我便放棄自己原先的計畫，開車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並等候他；有一次，我像傻子般等在一所學校門外，我知道所有的女學生都在作靈修祈禱。」

他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指導人的輔導者，也是一位出入都市的富人區及郊區窮人區的宗徒。

他最關心的郊區是凡特拉（La Ventilla de Tetuán）貧民區，在那裡神父的長袍被視為古怪並且不受歡迎。盧比奧將婦女及兒童集合起來，組成隊伍，上街遊行。他走在前面，在旁觀者好奇的眼光下走在狹窄的街道上。遊行隊伍在口哨、喊叫及威脅聲中穿梭於大街小巷間，最後到達一處小廣場。當第一塊小石頭打中他時，他說：

「大家站住，不要動。讓我們大聲唱歌。」

喊叫聲終於停止了，盧比奧開始講道。男人開始過來，漸漸改變先前凶猛的態度，最後興致勃勃的與孩子們一起歌唱。

日後在困難與對抗中，盧比奧在這裡創辦了一所學校。這是一所從無到有的學校，學生及教職員的人數不斷增加。

盧比奧的工作並不僅限於這裡。他對窮人和病人的關懷，以

及他所從事的慈善事業使他能照顧馬德里周圍的受苦大眾。

他被視為馬德里天主教的典型人物，那幾年由他創辦及領導的使徒工作有：一般的福傳工作、靈修祈禱會、1911年國際聖體大會、豎立於天使山（Cerro de los Angeles）的聖心像（西班牙地標）、由國王親自宣讀奉獻全國於天主的禱文等。

反對的標記

這位馬德里宗徒無法避免嚴峻的反對考驗。一些並不令人意外的迫害都出自別人對他的誤解，最讓他痛心的是來自他的上司的誤解，面對誹謗時，自己內心的掙扎，媒體的壓力，企圖逼迫他退讓。但是當他成為傳奇性人物時，這時期就會過去而進入另一階段。

黑暗就在他的使徒工作達到高峰時來到，許多的顧忌使他心煩意亂。人人都注意到他花很長時間唸赦罪經文，他獲得寬免以唸玫瑰經代替唸日課。外在事件也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的計畫及方法都被人誤解，他的工作遭到恥笑，並且由他人取代。

1917年夏季，他創立聖若望門徒團。這個新團體有很好的開始，但是有些人卻仇視它，其理由可能是它對其他現有團體將構成一些威脅，另外也遭到別人的譏笑。有人傳說盧比奧神父要在某棟樓中創立一個新組織，最後因警察的干預而未成功。這一切都是虛構的謊言，但是謠言並未停止。有一天他公開表示：

「我要告訴你們，這一切都過去了。」

令信友驚訝的是他下面說的話：

「是的，聖若望門徒團遭到打壓是天主的旨意。」

同一組織的婦女分團發展順利，成功的從事新工作。但是有一天，盧比奧召集幹部開會，大家期待他會宣布新的工作，然而

他只是很簡單的說：

「我召集你們來，是要告訴你們，我不再是你們的指導神父了。」

他仍然是聖心侍衛的領導者，他創辦一份月刊，藉此與不同的中心取得聯繫。不久他又接到意外的命令：

「停刊。」

他毫無反抗的接受，沒有表達任何痛苦或驚訝。許多同情他的人說：

「盧比奧神父，你一定很難過！」

「我？我向你保證，我非常快樂。」

真的如此。他只是將他的靈修原則付諸實行罷了，那即是：承行天主的旨意。

圓滿的終曲

1929年4月17日，星期三，這天是當地的聖若瑟慶日，他向婦女信徒作了重要的報告，即是他要創立一個女性平信徒的組織，他稱它為「靈魂祕密之軍」。

當天的午夜，一位耶穌會士聽見有人敲打他房間隔板，因此起身一探究竟。他看見盧比奧神父躺在床上，以手表示自己很疲倦；他的脈搏跳得不規則，也沒有人找得出原因。到了早晨，醫生診斷說：

「是咽喉炎，病人必須完全休息。」

病人立即被送往阿蘭胡埃斯（Aranjuez）的初學院，受到意料中的熱烈歡迎及尊敬。

他對看護說的第一句話便是：「我不能再返回工作崗位了。」

他的健康似乎略有起色；但是誠如他對自己的病情所說的，

在他肺部的「小鬼」卻愈來愈猖狂。

5月2日是他在世的最後一天。凌晨一時半，隔壁房間的神父被敲打隔板的聲音驚醒，是盧比奧神父在叫他。這是第二次的警告，還有第三次及第四次，決定性的一次是在下午六時。

他坐在椅子上，右手握著一條手帕，似乎快要入睡，安靜而無任何抖動，就在1929年5月2日，星期四晚上六時二十五分，他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亞爾伯·伍達道

(Alberto Hurtado, 1901-1952)

智利的使徒

假如盧比奧是馬德里的使徒，亞爾伯·伍達道無疑便是智利的使徒。從拉雷恩（Manuel Larráin）主教在殯葬禮上所說的話：「天主探訪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可以知道亞爾伯的思、言、行為都具有先知性。他對拉丁美洲天主教信仰的分析，預言了四十年後這地區主教的角色和責任；他不僅由宗教觀點，也由社會觀點分析事實；他的優先性也是今天諸位主教的優先性，即是：以窮人為優先，青年教育，司鐸聖召，與「社會建造者」一起工作。他所創辦的事業繼續蓬勃的發展；他創辦的「基督之家（Hogar de Cristo）」已經發展到其他拉丁美洲的國家，靠每月由十一萬智利人民的捐款幫助成千上萬的社會邊緣人；他創辦的雜誌《信息》（*Mensaje*）仍然暢銷各地，持續為基督徒提供時事的分析。他的著作如同每個階段的里程碑，例如：「智利是天主教國家嗎？」（1941）、「選擇職業」（1943）、「社會人文主義」（1947）、「貿易聯合主義：歷史，理論，實踐」（1950）。

生活的學校

亞爾伯·伍達道在生命經驗中學習一切。他四歲時父親撒手人寰，留下年輕的寡母及一大筆債務。她不得不將農場賣給出價最高的買主，好能償還她承擔的債務。

亞爾伯早年在貧窮中度過。他母親的經濟狀況使他們幾乎沒有獨立生活的可能，而要面對不斷搬遷的事實，從一位好心的親戚家中搬到另一位親戚的家中，從未享受過擁有自己家的快樂。

然而亞爾伯的母親，安納（Ana Cruchaga）卻是一位堅強又勇敢的女士；貧窮並未阻止她去為最窮的人服務。智利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處處都是住在擁擠茅草屋中的窮人，他們是來自外地的農民，想要在這裡謀得一份好工作，過比較好的生活。基督徒慈善團體組成一些機構照顧他們，安納是最積極的一名團員。她的兒子從她身上學到對窮人的慈善。

一項獎學金使他能進入依納爵學校就讀。他加入聖母會並接受神師比維斯（Fernando Vives）神父的指導，他對青年的培育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也成為亞爾伯所需要的靈修指導神父。1917年，他感到天主召叫他加入耶穌會，並申請入會；但是他不能離開他那孤獨無援的母親而到天主教大學去攻讀法律，然而進入耶穌會依然是他生命中的夢想。

當出售農場之事被發現是無效時，他母親的財務困難因而獲得解決。亞爾伯提出聲明，而買主同意另付一筆賠償金，這款項足夠維持他寡母的生活。1923年8月14日，這位年輕的律師進入了初學院。

前往國外進修使他的培育內容極為豐富，尤其是在比利時，該地教會人才輩出，魯汶大學更是具有權威性的教會發言之地。禮儀運動出現在比利時，工人運動也首先在這裡由賈爾定（Cardijn）主教發起。亞爾伯以無比的熱忱在這所生活的學校中努力學習。

闊別家鄉八年之後，獲得教學法博士學位的亞爾伯，帶著重重的書籍，於1936年1月中旬乘船返國，心中充滿了熱火。

青年的教育家

他被派返回母校教授宗教課程及擔任聖母會的指導神父。他的教導對青年學子深具影響，他與學生之間有緊密的關係，許多學生視他為自己的靈修指導。按照耶穌會的古老傳統，一名會士同時要擔任幾項工作，他也不能例外，因此，他被聘在天主教大學及宗座修院教授教學法。打從一開始他便推動司鐸聖召。

有人將他忙碌的生活視為逃避服從及共同生活的藉口；這些批評傳到羅馬耶穌會總部，但是總會長並不相信，1941年9月6日，他寫信給亞爾伯，消除了他心中的畏懼。然而，在人們心中還是存有認為他的原則不健康的印象。他的原則是：有關傳統、宗教紀律及外在規定，需要遵照個人信念及孝愛精神予以實行。

1941年，因昔日法學院的同學，目前已是薩利納斯（Salinas）蒙席的提議，他被任命為公教進行會青年之會的導師，他滿腔熱誠接下這職務。在當年的五、六兩個月就有三百多名青年參加他所帶領的各種靈修祈禱活動。他走遍全國各地，從南到北建立中心。1943年公教進行會在六百個堂區、大學、其他學校、農工中心共有一萬二千名青年，二千多名青年曾做過依納爵神操。

同樣在1943年，他為在公教進行會中希望特殊奉獻於主的會員創立基督君王服務小組。該組成員被要求度積極靈修生活，隨時準備承擔使徒工作，但是它並不是一個祕密團體，也不與其他公教進行會一爭高下。

痛苦的分裂

1942年年初，在有關為大學生成立分支團體的看法上，伍達道首次與薩利納斯蒙席意見不合，他提出辭呈，但是卻未獲准。

被視為天主教團體的保守派面臨分裂，這一點使他的工作備感艱辛。該團體的領袖控訴他不夠支持他們並在報紙上攻擊他。他在教會指導下劃分出開放與團體的政策；他對前者較有興趣。

也有一些批評來自教會內部。有些人控訴他挑撥離間那些希望進入修院的年輕耶穌會士；有些人建議取消他神師的職位。伍達道以事實舉證：他的講道以及他送入修院的聖召人數。

但是這些並非導致他辭去 1944 年所擔任的顧問之職的原因。邀請他擔任此職務的薩利納斯蒙席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上司。這一點使得眼前的分裂更令人痛苦萬分。

對伍達道的控告共有三點，即是：他對教會聖統制缺乏服從，他的政治性活動，及他的分裂精神。

薩利納斯蒙席控告他輕視主教；假如他自己缺乏對聖統制的尊敬，他如何能教導青年服從聖統制？這些控告的根源一方面來自於他按照耶穌會士對上司的開放與坦誠，一方面因為他是蒙席的好朋友，因此，誠如蒙席所說的，「他責罵了他」，因為伍達道認為他毫無自己的意見，他的講道空洞無內容，他對青年缺乏明確的策略，他是主張服從教會者。這些對伍達道的傷害真是高明。

至於政治方面的問題，薩利納斯蒙席承認伍達道並沒有偏向任何一個政黨，但是，他相信伍達道的「動向」已經造成某些事實。他舉出兩個例證，其一是：公教進行會青年分會的主席，在伍達道辭去職務之後，便立刻加入某個政黨；其二是：另一名會員寫信支持智利與俄羅斯建交。

在伍達道所帶領的公教進行會不同的自治團體中，薩利納斯發覺分裂的情況以及他「言行不一」的事實。

身為公教進行會全國指導的伍達道認為，假如他得不到總指

導薩利納斯蒙席的完全信任，他便無法在社會分裂的氣氛下保持青年的團結。一旦這團結遭到瓦解，他便感到自己應該辭職。1944年12月28日，他辭職獲准。

「基督無家可歸」

1944年10月，一個寒冷陰雨的晚上，當伍達道神父返回聖依納爵學校時，有一個人擋住他的去路。那人穿著單薄的衣服，站在寒風中，骨瘦如柴，全身因發燒而顫抖。他沒有睡覺之處，他請求面前的這位司鐸給他錢，好能在旅館中找到一個床位。

第二天，10月18日，伍達道向五十位女士述說這段令他黯然神傷的經驗。令他感到汗顏的是基督新教及救世軍都為這些無家可歸的人設立庇護所，而天主教卻什麼也沒做。「這不是實踐我們信仰的理想的時候了嗎？就是給無處居住的人棲身之地；基督就在那許多受苦者身上、那些被趕出家門的人身上，他們在街上四處流浪。基督在那些多年來得不到父親的保護和母親的親吻的兒童身上。基督無家可歸！」

稍作停頓後，他為自己臨時起意的發言及對日後工作毫無計畫向大家道歉。但是他的話深深打動聽眾的心，有人奉獻珠寶及現金，有人承諾要一起合作。

那天的經驗催生了「基督之家」，也凸顯了它的特色：一項由基督徒之愛所啟發的工作，尊重窮人，因為他們就是基督本人。

自從卸去公教進行會的工作後，伍達道便全心投入這項工作，並有效率的予以推動。在那次打動人心的演講之後的兩個月內，即是在1944年12月21日，聖地牙哥總主教祝聖了第一座「基督之家」的奠基儀式。

當時約有四千名街童在城市裡四處遊蕩，「順應那時社會環

境的不成文規定，他們組成了自己的團體，採用他們自己的祕密言語，年輕的領袖，分成不同幫派，以及一些敵對者。他們身體半裸，但常常露齒而笑，終日在首都的街道上及公園裡漫無目的的走動，拾起菸蒂，一旦遇到意外攻擊便隨時展開防禦。他們舉止輕率，不能取信於人，動作敏捷，快速消失無影。他們抓住公共汽車車後的安全桿四處流浪，以在街頭跳最流行的探戈舞向路人乞討，偷竊那些心不在焉的年長婦女的背包，遊走於火車站與惡名昭彰的酒店外，晚上，成羣結隊的來到馬波丘（Mapocho）河邊，生火煮熟飲。人人都看見他們，但是只有伍達道神父是第一個以基督眼光看他們的人。」（傑斐若，Gilfeather）

他開始每晚到街上和橋下尋找這些頑童，把他們帶回「基督之家」。1949年被伍達道神父撿到的荷西·安東尼歐·帕馬（Jose Antonio Palma）寫道：「有一天晚上，他開車在街上找尋流浪街童時，看到了我。第二天，我們梳洗完畢後，被送到有『小房子』之稱的地方，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與伍達道神父談話；他擁抱我，並告訴我要做個好孩子，為了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我應該學一技之長；我告訴他我願意留在這裡。他的談話使我印象深刻，實非言語所能表達。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臉上所流露的溫文有禮及仁慈的微笑。」每個孩子都有一位認養母親；荷西·安東尼歐的認養母親常邀請他到她家中作客，星期天帶他去散步，夏季還到海邊去，為他購買衣服，提供他的學費。

「基督之家」不斷擴大服務對象，這要感謝智利人民的慷慨協助；1947年開辦了一個有八十個床位的男性緊急收容中心，1950年中心擴建；此外，又成立流浪婦女及兒童中心，1949年時收容了十萬名帶著兩名、三名或四名孩童的婦女。1948年他進行另一項具有挑戰性的計畫：自費修建房屋，自己成為屋主。

精神力量

伍達道對天主的臣服和對天主的愛都表達在對兄弟姊妹，尤其對有急需的人的服務上，「基督之家」便是這種服務具體可見的結果。他知道自己是在奉行天主的旨意，這種意識使他全心依靠天主的照顧，事實上，「基督之家」的需要也證明了天主無時無刻的照顧。有一次，由於缺乏經費，委員會主席不批准新建築的建造；當伍達道由會議室出來時，遇見一對夫婦，他們遞給他一個信封，裡面裝有委員會所要求的金額，不多不少；他轉身走回會議室，把錢交給委員們並對他們說：

「錢在這裡，你們這些小信德的人。」

「自我給予就是去做正義的事。自我給予就是奉獻自己及所有一切。自我給予就是將自己的心與意志轉向等待他們的人。自我給予就是永遠的付出愛及完全的愛。當我們完全自我給予時，事事都變得單純。我們也找到了自由。」

伍達道神父以全部的愛來服務窮人，在他們身上看見基督。有一名證人寫道：「他對窮人所表達的愛，真令人感佩不已。唯一能解釋的理由是：他在貧窮、飢餓及無家可歸的人身上看見了基督。」

另一名證人指出：「他在『基督之家』的工作的明顯果實是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深深感受到愛的影響力及對窮人的尊敬；我相信這些與『基督之家』所提供的物質有同等價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1950年7月4日，在「基督之家」婦女同工每月彌撒中，他談到愛的奉獻。當他出人意料之外的提到創立「基督之家」的想法時，他偏離了主題說道：

「我問我自己：假如天主對你沒有額外的要求，假如在服務窮人的工作上，祂並沒有要求你完全自我給予。那麼這種自我給予將按照每人的職務表現在貧窮願和服從願上，這兩種願比新工作優先。」

他暫停一下，然後向大家道歉，因為他沒有計畫要說這些。這便是「基督之家」的起源，為那些感到自己被天主召叫，願意奉獻並投身為有需要的弟兄服務的人所創立的一個友愛的團體。

這是蘊含在他工作中的精神力量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智利貿易聯合行動

他最不想擔任的一項傳統工作便是貿易聯合行動。

1947年6月13日，他與一小組學者共同草擬一份工作計畫，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麼。一次歐洲之行幫助他看清楚自己的目標。他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社會研究週，又在道明中心度過另一週，他遇見昔日魯汶大學校長而今已是耶穌會總會長的詹森斯（Janssens）神父。

亞爾伯深信與眾多離棄教會的工人一起工作確實有急迫的需要，但是他意識到這種工作在智利耶穌會內引起的傳言、抱怨及控訴使他必須到羅馬走一趟。他渴望見到總會長神父，向他稟告自己的理想和計畫，當時總會長正在準備一篇有關社會使徒工作的教導，他完全贊同並批准亞爾伯的計畫說：「我不是你的省會長，是他要作最後的決定；但是我想你應該離開學校及卸下其他的工作，讓你自己完全投身社會行動。」

1948年2月7日他返回首都，7月7日助理主教薩利納斯蒙席批准他為智利貿易聯合行動會的指導神父。

一年後，聯合行動會分為三部分，即是：工人、從業人員及

學者。他們草擬了計畫；採取行動保護貿易聯合會，伍達道再次走遍智利全境，組織分會。他實現了自己昔日的願望：嘗試工人的生活。

1951年1月初，埃地克（Idique）食鹽公司的人事主任打電話給他的上司拉瑞（Osvaldo de Castro Larraín）說：「我遇到棘手的問題了。這裡有一個單獨工作的人；他請求被派到最遠的地方去，他已經在太陽下工作了兩週。其他的工人都說他非常友善。」

拉瑞查閱了這名神祕志願者的資料後發現，原來他就是伍達道神父，便前去見他。

「我被抓到了。」伍達道說。

發行雜誌

伍達道社會行動的另一項計畫便是發行一本如同法國的*Etudes*及美國的《美洲》的雜誌。他這樣描述道：「雜誌內容既不是文學性的，也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普世性的；它將喚醒平信徒的良知，將信仰落實於生活中，在敵對者面前合理而又嚴肅的表達天主教的立場，打破信仰與生活之間的人為藩籬。」

這項計畫是切實可行的，因為已經有一些優秀又受過訓練的耶穌會士及許多具有實力的平信徒，他們已準備共同合作發行這本雜誌。

1951年10月，雜誌正式發行。在發刊詞裡，伍達道以編輯身分說明雜誌名稱 *Mensaje*（信息）的意義：「天主之子由天堂帶來的信息，藉我們的雜誌傳遍智利全國，及我們這苦難的時代。」

困難重重

在他事業的顛峰時期，十字架也伴隨著他。他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是卻有人嚴厲批評他。由於更多的批評來自同會的弟兄，因而使他更痛苦。有些人堅稱他不履行會士的職責，其他的人認為他的社會思想頗具危險性。

1950年1月，掌管拉丁美洲事務的總會長助理崔維（Travi）神父訪視智利耶穌會會務。他相信過去以及目前所有對伍達道的控告，不僅如此，他強迫省會長拉文（Alvaro Lavín）撤除伍達道在諮議會中的職務。

1950年6月27日，在伍達道給總會長的信上寫道：「崔維神父最近訪視時，他向省會長表示對我的疑懼。我向他說明，但是他卻一語不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些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對我卻傷害極大，知道自己被上司懷疑，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伍達道接著問了一個足以表達自己內心痛苦的問題：「在修會裡還有可能還我清白嗎？」

崔維神父不是唯一不相信伍達道的人。有人說在智利的耶穌會士中分為兩派，一派會士瞧不起學校的教育工作，只關心社會工作，不遵守修會的服從誓願。伍達道神父是他們的領袖，上司也無法制止他們。

伍達道對年輕的耶穌會士確實具有影響力，並在他們中間形成一種「伍達道風格」，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所謂「伍達道風格」就是快樂而堅定的精神，行動敏捷，不受瑣碎小事影響的大無畏和慷慨的精神，完全將自己交付於基督手中。雖然這並不是他所樂見的，但是年輕會士對伍達道所發起的社會行動的熱烈參與被誤認為是對其他形式的使徒工作的鄙視。

遭受指責的伍達道寫信給省會長尋求援助：「我本人一定反應遲鈍並缺乏判斷力，這是極為嚴重的事，而它的影響尤其嚴重，因為它破壞我們會省的團結。」然後他要求批評他的人明確說出他們所不滿的人，這是唯一能幫助他了解他們，並設法補救的方法。最後，他很痛苦的寫道：「假如你無法做到，那麼我就求你把我調離我對別人造成傷害的地方，讓我離開學校或調到其他會院或轉往其他省區。」

省會長讓伍達道休息。曾以服從精神從事各種工作的伍達道按照拉文神父的指示放下工作。假如省會長將伍達道調離他正在從事的工作，他會終身感到遺憾。他知道伍達道所做的有意義的工作以及他對年輕耶穌會士的深遠影響。他不僅沒有取消伍達道前往初學院，反而讓他常去那裡。

「主在叫我」

1951年年底，伍達道神父被迫減緩他的工作速度。1952年3月20日，亞爾馬斯（Armas）醫師檢查他的身體，但是查不出造成他高血壓的原因。之後發現是一種無藥可治的靜脈炎，也被懷疑可能是癌症，最後的檢查證實了一切。

6月4日當他轉入大學醫院時，發現他罹患了癌症。最後的診斷是胰臟癌，但是6月25日他才知道真相。那天下午，當亞爾馬斯醫師來探望他時，他告訴醫師說：

「主在叫我了，我很高興，我已經準備好了。」

8月上旬，他的病情日益惡化，8月15日，他似乎已走到生命的最後階段。18日星期一，神父在他病房舉行彌撒，他很困難地領了聖體。下午，一些「基督之家」的男孩來探望他。「他已經不能說話，但是他要我們靠近他，以他的眼睛及慈愛的微笑向

我們道別。這最後的見面，使我終生難忘。」莫拉里斯（Mariano Morales）這樣說。漸漸的，他陷入昏迷，走廊上都是為他祈禱的人。當一位神父靠近他時，他微微的抬了一下手，請求他向聖母祈禱。這是他最後的手勢。

主在下午五時召叫了他，帶他回天鄉，誠如他生前常說的：快樂，主，快樂。

參考書目：

AYALA, Pedro María: *Vida documentada del Siervo de Dios P. Francisco de Paula Tarín* (Seville, 1951) .

JAVIERRE, José M.: *El León de Cristo. Biografía de Francisco Tarín* (Madrid, 1980) .

REVUELTA, Manuel: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2 vols. (Madrid, 1984, 1991) .

EGUILLOR, REVUELTA, SANZ DE DIEGO: *Memorias del P. Luis Martín*, 2 vols. (Madrid, 1988) .

DOYLE, Charles: *Merry in God. Father William Doyle, S.J.* (London, 1939) .

O'RAHILLY, Alfred: *Father William Doyle, S.J.* (London, 1922) .

ECHANIZ, Ignacio: *El Hermano Finuras* (Bilbao, 1993) .

BLANCO, José M.: *Hermano José Marcos Figueroa S.J. Portero de la Inmaculada* (Santa Fe, 1996) .

ENDRODY, László: *Esteban Kaszap. La vida por Cristo* (México, 1951) .

BODAY, Jenó: *The young Stephen Kaszap, Servant of God* (Montreal, 1997) .

DRAGON, Antonio: *Blessed Miguel Pro, Martyr of Christ the King* (Anand, 1993) .

RAMIREZ TORRES, Rafael: *Miguel Agustín Pro, Memorias Biográficas* (México, 1976) .

STAFFNER, Hans: *Blessed Rupert Mayer, the Apostle of Munich* (Anand, 1992) .

KOERBLING, Anton: *Father Rupert Mayer, a Modern Priest and Witness for Christ* (Munich, 1960) .

DELP, Alfred: *Honneur et liberté de chrétien. Témoignage présenté par le Père M. Rondet* (Paris, 1958) .

CISZEK, Walter J. with Daniel L. Flaherty: *With God in Russia* (New York, 1964) .

OSIPOVA, Irina: *Se il mondo vi odia Martiri per la fede nel regime sovietico* (Milan, 1997) .

基督的僕人 IV

GIRAUDO, Cesare: *Già dasto pet martire. I Fioretti di un gesuita albanese* (Roma, 1993) .

STAEHLIN, Carlos: *El Padre Rubio. Vida del Apóstol de Madrid* (Madrid, 1974) .

CASTELLON, Jaime: *Padre Alberto Hurtado S.J. Su espiritualidad* (Santiago de Chile, 1998) .

MAGNET, Alejandro: *El Padre Hurtado* (Santiago de Chile, 1990) .

GILFFATHER, Katherine: *Alberto Hurtado, S.J.,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Anand, 1995) .



III

大公會議的挑戰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為教會歷史開啟了新紀元。過去被視為有爭議的觀點，現在成為官方教導的一部分。四位耶穌會士代表了這戲劇性的改變；曾經是具有爭議性的人物，日後受到尊敬及認可。

在他們之前有打動人心的宣道家及一名天才歌唱家，之後有一位富有青春精神、令人尊敬的長者，他向「分離的弟兄」敞開大門。

了解這幾位人物便是在苦難與光榮中了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起源與歷史。

1. 最後的布道家： 雷卡多·隆巴第 (Riccardo Lombardi, 1908-1979)

最後的布道家或大公會議的先驅

說真的，在布道家和先驅兩個角色上，或許隆巴第更偏向於前者，但一方面也是帶有布道家精神的先驅。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標是教會的革新，使教會成為社會的酵母。「從他的特恩來看，他是慷慨的個人主義的犧牲者，他是從事改革的最後一位英雄，梵二大公會議便是要將這種改革推行到整個教會。」（紀卓拉，Zizola）

非洲的諺語說道：「你不能用一根手指打鼓。」

天主的麥克風

1938年夏天，總會長蘭多科斯基（Ledochowski）神父指派他新的工作時告訴他，「讓新鮮空氣進來」，此後，他就成為天主教刊物 *La Civiltà Cattolica* 作者羣中的一員。

幾個月後，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被邀前往帕度亞（Padua）大學代替柏伊爾神父（Charles Boyer）做了幾場演講。這次成功的演講使他被無數的聽眾包圍；隨後許多義大利知名大學如波隆那、杜林、比薩和威尼斯等相繼邀請他前往演講，教授和學生把演講廳擠得水泄不通。

1942年，他放棄與護教學有關的主題而改講與實際生活有關的題目，藉此為那些遭受戰火摧殘的心靈帶來一股希望。然後他

將注意力轉向威脅義大利安危的共產黨，並成為反共的勇士。在這一點上，他吸引了來自各階層的廣大聽眾。大學禮堂已不敷使用，他必須移往大戲院去。1945年5月31日，他首次在羅馬的基里諾（Quirino）大戲院登台，出乎意外的成功，為了滿足聽眾的要求，更多的場地都被租借一空，邀請函如雪片一般飛進他的辦公室。

在1946年時，隆巴第把自己定位為彌撒中的宣講者及天主教反共的理論家。他在隆巴迪（Lombardy）、皮德蒙特（Piedmont）、羅曼納（Romagna）、托斯卡納（Tuscany）各地宣講，佛羅倫斯的教堂無法容納被他吸引而來的聽眾。這時他開始稱自己為耶穌的聲音，他常說：「耶穌已經告訴我！」或「耶穌告訴我，凡沒有犯過罪的人就讓他丟第一塊石頭吧！」接著他又說：「這可不是修辭學的技巧。」

1946年12月22日，教宗碧岳十二世向公教進行會的會員提出更急切的呼籲說：「羅馬已經成為贊成基督和反對基督、擁護教會與反抗教會兩大敵對陣營的戰場。」

隆巴第回應教宗的呼籲，並為義大利的信仰復興擬定一項全國性的行動計畫。他請求見教宗，1947年1月11日，獲教宗接見，並面對面晤談了四十五分鐘。嚴肅的教宗慈祥的接見他，開懷大笑，甚至還和他開玩笑。

那次與教宗的晤談極為重要，因為教會官方決定以廣播方式將隆巴第四旬期的講道傳送到全國各地。1947年2月19日是他的首次廣播，獲得熱烈的回響。透過收音機，他的聲音比在講道台上更具說服力。在玻璃窗另一邊操作機器的技師對他的播音技巧感到驚訝無比。

「神父，您上過什麼課？您在哪裡學的講話和停頓的技巧？」

「我沒上過課，這不是技巧的問題。我是跪在地上學的。」

「天主的麥克風」的綽號就此誕生。這是第一次義大利全國透過廣播來準備復活節。下午五時二十分，不在教堂裡，也不在講道台上，人人透過收音機聆聽四旬期道理。當聲音播出時，北方和南方，左派與右派，天主教徒及共產黨員，雇主同工人都一起聆聽。

布道家的戰役

在義大利被視為最多人收聽的宣道者，我們的布道家已經整裝待發，走上戰場，迎接挑戰。他心中滿懷理想，首先便是建立能取代自由派及共產黨世代的基督徒世代。不久他提出仁慈的十字軍運動，並將這運動擴大為一項包含改革教會的計畫，連羅馬教廷也不例外。

他幾乎無法開始他的計畫，教宗的新命令使他提出的運動遭到曲解。1948年4月18日的選舉愈來愈近；這是決定義大利前途的關鍵時刻；面臨共產黨強大的威脅，教宗想要訓練所有雄辯人才一致反對共同的敵人——共產黨。

隆巴第服從教宗的命令並全力配合。共產黨的威脅雖然減輕，但是並沒有消失，「天主的麥克風」繼續在米蘭、杜林等大城市強烈的抨擊共產黨，所引起的反彈使他的生命遭到威脅，而需要警察的保護。共產黨日報稱他為「可恨的宣道者」。

他來到薩丁尼亞（Sardinia），改變了宣講的語調。他說：「俄羅斯把共產主義給了世界，義大利卻把耶穌給了世界。」1948年12月4日他與共產日報編輯，也是義大利共產黨書記陶格里耶堤（Palmiro Togliatti）的左右手史帕諾（Velio Spano）在卡利亞里（Cagliari）的聖尤拉利亞（Santa Eulalia）教堂舉行公開討

論會。

史帕諾開始以傲慢的口氣說共產黨可以贊同福音的原則，此時隆巴第不得不採取辯論的方式，他說：「我沒有宣講仇恨，而是宣講仁慈。我夢想有一天，共產黨員與基督徒能在天主的標記下互相擁抱。一切都在天主的照顧之下，甚至共產黨也不例外。」

他站起來，走向敵對的一方，擁抱他。羣眾熱烈鼓掌，在場的新聞記者跑到電話亭打電話，將這消息告訴他們的報社。

在卡利亞里與敵人的擁抱遭到教宗的譴責。隆巴第也向教宗說明了經過情形。1948年5月5日，這名十字軍得以向教宗提出他的新夢想。

「擬出一個完整的計畫來。」教宗最後說。

8月15日，他龐大的革新計畫已經完成，其實是一本記錄教會不安定的原因的書。8月28日隆巴第的同伴洛東第（Rotondi）將這本書呈給教宗，當教宗閱讀此書時，特別專注在有關教廷的部分上。此後，隆巴第的計畫便不知去向。這位激起義大利教會改革風潮的耶穌會士當然不是梵蒂岡所重視的人物。

現在是走出義大利並將他的十字軍開往海外的時候了。不懂英文或德文或帶有義大利口音的西班牙文都不重要了。他訪問過奧地利、德國、英國、美國以及全部拉丁美洲。他吸引廣大羣眾，喚醒他們的意識，激勵神職人員，啟動基督徒的革新運動。為要終止與教廷之間的不和睦，他返回義大利，重新開始他的十字軍。

大膽直率

他放在教宗面前的不外是天主對教會的最後通牒。他大膽的提出改革的步驟，而他要求全面的革新要從羅馬開始，但是樞機

主教代表米卡拉（Micara）卻拒絕。隆巴第建議推舉米卡拉的告解神師卡沙里（Don Giuseppe Casali）神父為代表。1952年6月10日，教宗授權隆巴第親自去見米卡拉。

致命性的會談發生在兩天之後。

「教宗對你很不滿意。」

這不過才是第一槍而已，隆巴第像機關槍一樣，傾全力給予痛擊後，便離開了淚流滿面的樞機主教。消息傳遍了梵蒂岡，最後傳到教宗的耳裡。眼見這些困難，於是教宗凍結了這項由隆巴第建議的任命提案，同時總會長也勸告他應全力推動教會改革。

8月21日教宗在岡道夫宮接見隆巴第，他的同伴洛東第也在場。

「羅馬需要一位牧者，而不是來自主教公署或教會機關的某人。」

隆巴第以強硬的語氣推舉卡沙里擔任羅馬的代表。然後他更明確表達他的意思說：

「此外，樞機主教代表是個文盲。」

教宗溫和的說：「但是，神父，你要知道米卡拉樞機主教曾經擔任駐比利時的大使。」

「那就是說您派了一個文盲到比利時去。」

「是什麼理由讓你認為米卡拉樞機主教是文盲？」

「因為他寫給我一封錯誤滿篇的信，連小學生都不會犯這些錯誤。而將這樣的人放在如此重要位置上到您的責任。您必須知道是您指派的；您允許這樣的人擔任這項職務。卡沙里神父是適合的候選人；他具有讓羅馬動起來的能力，羅馬動，全世界就會動。」

隆巴第滔滔不絕的發表自己的看法。

「您或者任命卡沙里神父為代表，或者我辭職到拉丁美洲去。」

洛東第臉色蒼白；教宗安靜的坐著，雙手緊握，無人知道他內心的感覺。在隆巴第發表完他的長篇大論之後，教宗靜默了一下，然後站起來說：

「神父，有一個解決方法。你來坐在我的位子上，當教宗！」

隆巴第覺得全世界都壓在他身上，他跪倒在教宗的腳前說：

「聖父，請原諒我，原諒我，原諒我。」

教宗彎下身把他扶起來說：

「神父，因天主的愛，不要認為作決定像思考那樣容易。我非常感謝你。」

教宗碧岳十二極為激動，在哭泣中吃完午餐。當天晚上，抱著無比謙遜的態度，他打電話給洛東第說：

「今天我傷到了隆巴第神父的心，我請你，在我們睡覺前，代表我向他道歉。」

第二天他再打電話給洛東第。

「我不能再與隆巴第神父交往了。我曾說天主的手指在他的宣講中，但是當他干預將要完成的事時，我就看不見天主的手指。與這種人交往是不可能的事。」

洛東第回應了以下的話語：

「而我日日夜夜都得與他相處！」

美好世界運動

這兩位都是屬於天主的人，不久他們便重修舊好了。教宗全力支持教會革新運動。1952年2月10日，星期日上午當他宣布羅馬所負的使命時，他發表了一篇歷史性的演講：「誠如幾年前

我接下教宗之職的沉重十字架，現在我雖軟弱，但是如果這是天主所要的，我就要接受這艱鉅的工作，即是成為美好世界的使者，親愛的羅馬子民，我希望將這使命交付給你們。」

「天主所要的美好世界」，隆巴第以這句話作為他的十字軍的新名稱；因此十字軍不再是他個人發起的運動，而成為教宗正式批准的一項運動。

緊接在羅馬之後，這項運動傳到了義大利共產黨的大本營波隆那，在那裡所引起的熱烈回響使當地總主教勒卡洛（Lercaro）及教宗極為興奮。

這項運動需要一個工作團隊，隆巴第由教區司鐸及不同的修會會士中找尋適當人選；此外，也需要一個訓練幹部的專屬地方，最後在岡道夫宮附近找到一處訓練中心，並將它命名為「教宗碧岳十二世美好世界國際中心」。

隆巴第有兩項創舉，一是以神操精神加上交談的訓練方式，一是日後頗為普遍的「水平面向」。

美好世界運動由一組人指導，他們包括司鐸、非司鐸、修會會士、教區神父、男女信徒。這項運動推展到十個國家，有一百二十五位合作者，有兩個國際中心，三個國家中心。接受訓練者在義大利有三位樞機主教，二百三十二位主教，七千五百七十一位司鐸，一千六百二十一男會士，三千五百八十六位修女，約八千名平信徒；在西班牙有相同人數，在墨西哥約有二千二百人。

隆巴第擬定一份使徒規章，使這項運動成為宗座的事業，並將這項運動與普世博愛運動合併，他的計畫遭到內部強烈的反對，總會長命令他暫緩進行。

使徒規章經過多次修改後終於定稿，但是並不合他的意。1958年8月28日，當他因過度疲勞而住在醫院時，收到這份修

訂後的規章。這是他的朋友及保護者教宗碧岳十二世送給他的最後禮物，後者於 10 月 8 日去世。

掙扎與失望

出身貴族、個性溫順的教宗碧岳十二世在本性上與性情剛烈的隆巴第是兩極的。他既不喜歡他的悲觀思想，也不欣賞他的強勢作風，甚至不能接受他所用的「十字軍」的名稱。

「不要在我面前提那個名稱。我曾經到過君士坦丁堡，我知道『十字軍』這名稱足以使基督徒分裂。」（「十字軍」與「布道家」二字的英文同為 Crusader——譯者註）

他聽到許多反對美好世界運動的聲音，需要時間來研究事實真相。1960 年 11 月，他指派三位樞機主教組成調查小組，其調查範圍從該運動的組織是否合法，到它的財務，因為在這方面有些模糊不清，甚至有與「公開反對左派」的義大利政治人物掛勾的嫌疑。

隆巴第的反共立場又再度被提起。1948 年他曾經區分邪惡的共產主義與善良的共產主義，也曾擁抱一位共黨的領袖，而現在卻與那些批評新任教宗以友善態度對待共產黨的人士站在一邊。因為新任教宗接見赫魯雪夫的女婿。

隆巴第在一本書中寫出他改革的理想，包括羅馬教廷在內，這本書造成他與教廷之間的不和。那些觀念並不新奇，他曾在以前的提案中表達過，現在又提出，似乎是獲得了新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支持。報紙以顯著標題刊出，教廷人士強烈反彈。樞機主教極為憤怒，否認書中的內容。雖然隆巴第加以解釋，但卻是徒勞，這本書所造成的傷害已無法挽回。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承認教會內的動亂使十字軍運動受到阻

礙，但是他仍然支持教會內的改革。1963年10月2日在一次戲劇性晉見中，教宗告訴隆巴第，他決定將這任務交給耶穌會士，即是完全要倚靠耶穌會。其他次要的決定是：為美好世界工作的他會會士必須在1965年12月31日前返回自己所屬會院。會士的撤出使這項工作荒廢。

讓他最痛苦的是他的夥伴一步一步打擊他的過程，有人直言不諱地對他說：

「你有在彌撒中講道的特恩，但是在實際工作上卻是最差的。許多人離開修會都是你的錯。你利用教會來實現你的夢想，而不是為教會服務。你是一種阻礙，你最好放手吧！」

雅魯培是「隆巴第的護守天使及策略者，他擔負起按照會祖的精神，從事革新及適應時代的工作」（紀卓拉）。他保護隆巴第，並保證他有自主權，能繼續從事原有的工作。

隆巴第令人堪慮的健康（1965年4月6日的大腦血栓症及幾次發作的心臟病）和他遭到多次的磨難都沒有使他失去活力。他來到亞洲及美洲，向數百位主教及司鐸講解神操精神，他也不斷向新教宗提出建議，雖然教宗接受也研究過這些建議，但是因為都無法實行而被擱置一旁。

1979年12月14日，星期五凌晨二時四十五分，這顆偉大的心停止跳動，他所激起的旋風也隨之沉寂了。

2. 酒精中毒的基督吟唱詩人：

艾梅·杜瓦爾

(Aimé Duval, 1918-1984)

在梵二之前，有兩位耶穌會士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他們兩人都走遍各地，到處宣講；兩人都抓住聽眾的心，一人以雄辯的口才，一人以吉他伴唱的歌聲，兩人都有自己的追隨者。例如在德國的庫斯特（Herr Wilhelm Köster）先生是隆巴第的支持者，而他十五歲的兒子韋答林（Wendelin）卻是杜瓦爾迷，這就是當時的模式，即是：成年人支持隆巴第，而年輕人喜歡杜瓦爾。

然而他們兩人的個性真有天壤之別！隆巴第頑固如石，激烈如火，你可以稱他是羅馬的辯論家，身體強壯，肌肉發達，他所標榜的是「改革」；而杜瓦爾文弱優雅，是心思細膩的藝術家，他表現於外的是溫和、憐憫。他的好友，也是他生命中關鍵時期的上司及日後為他撰寫訃聞的諾伊爾（Pierre Noir）如此描寫他：「一名真正的泥土之子，一位藝術家，一個慷慨的人，一生默默忍受各種痛苦，忠誠又開放的基督徒，自始至終是一名忠實的司鐸及耶穌會士；是一名病人，直到生命終結。」

吟唱詩人

有「真正泥土之子」之稱的杜瓦爾生長在法國東部佛日省（Vosges）阿糾勒（Ajol）山谷的農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並且深愛大自然，不禁令人聯想起成長於相同環境的法伯爾的童年。雖然他受洗的聖名是呂西安（Lucien），但是家人都叫他艾梅（Aimé），這也是他留名青史的名字。

他的母親是一位安靜但又敏銳的婦人。當艾梅第一次告訴她他酗酒，但是已經戒酒並幫助其他酗酒者的事時，她沒有收起她那肯定的笑容，而是說：

「喔，好，只要你能幫助別人。」

杜瓦爾的結論是：「這位婦人具有一切美德，我看見她整日操勞，不要我受苦。」

「我成為酒鬼並不是因為我有一個沒有愛的童年。」

他於十八歲進入當時流亡在比利時的耶穌會初學院，很難與那位嚴厲又刻板的初學導師相處，他到敘利亞服兵役，在完成修會規定的訓練後（哲學在瓦爾斯 Vals，神學在昂吉安 Enghien，第三年培育在伊尼呂 Ineuil），開始在蘭斯（Reims）擔任有限的教書職務，在這件工作中證明他是一位優秀的藝術教授及富有創意的合唱團領導者。之後，他被調往第戎（Dijon）及南溪（Nancy），從 1955 年起，他在這裡住了三十年，直到他去世。

自從他被調往南溪後，他便帶著吉他在法國及世界各地演唱。以一位專業歌唱家的身分到處演唱只有一個目的，即是：「竭盡全力宣傳福音和兄弟之愛」（諾伊爾）。本著這個目的，他先創作自己的歌曲，約有二十張唱片，然後旅行了二百萬公里，在四十個國家開過二千場音樂會；常常整夜駕著裝滿昂貴器材、配備、三百張唱片、小冊子、樂譜及兩把吉他的車子疾駛於兩地之間。

無論是面對倫敦和柏林的三萬名聽眾，醫院病房裡的三十或四十名病患，以及監獄教堂內的一百名受刑者，他都能盡情的演唱。

觀眾的反應極為熱烈。在里斯本，一名老人送他一瓶百年的陳年老酒；在西班牙畢爾包，一名袖珍黑衣婦人送他一隻名貴手

錶；在德國，艾德諾（Adenauer, 1949-1963 任西德總理）送他一把吉他，因為他為德國青年帶來歡樂。

歌迷的來信如雪片般飛來，雖然他已經撕了很多，但是仍舊塞滿了信箱；這些來信真是包羅萬象，有友誼的、感動的、懇求的、驚訝的、詢問的、鼓勵的，還有請求的，例如：「我是馬達加斯加的一名傳教士，你可以幫我買一輛吉普車嗎？」偶爾他會遇到一些令人厭惡的記者，他們常作些不真實的報導、不客觀的評論及不公正的批評。就如一名記者嘲笑他，因為他曾說一場三小時的音樂會可以使他瘦一公斤。「記者先生，假如你們計算一下彈吉他時左手承受的壓力，右手五根手指撥動五條弦時所用的力量，並要忍受聚光燈的熾熱，你會立刻明白流一公升的汗是最起碼的。」這些不公平的批評使生性敏感的杜瓦爾受到很大傷害。「甜蜜又勇敢的母親，自傲又安靜的父親，你們沒有訓練我接受這種殘忍的事。性情溫順的牛或忠誠的狗也不能忍受這些。」

逐漸墮落

「酒精中毒在暗中、不知不覺地發展。直到 1968 年，我都在自己的書桌前作曲。為要幫助我的工作，我通常會到樓下的櫃子裡拿一瓶啤酒到自己房間。在工作中我偶爾喝一、兩口。當歌詞寫完後，接著便譜曲，此時我就繼續的喝。一小時內喝完一瓶啤酒，然後我下樓再拿一瓶。當曲和詞及我的聲音完全配合，當休止與呼吸都調整妥當後，我大約已工作了四、五個小時，在我桌旁也有兩、三個空酒瓶。還有和弦需要譜寫，我繼續工作直到全曲完成。此時便有四或五個空酒瓶，然後我就去睡覺，完成了作品，心中高興無比。」

新作品問世，杜瓦爾根本不會想到有多少空酒瓶。清潔女工

會將這些空瓶放回原本的盒子裡。

「但是這一天終於來到了，當我喝完一瓶之後我到樓下去再拿一瓶，十年後，我才意識到這反常的行為。」

此後，情況迅速惡化，而他本人並未察覺。但是卻有人不斷向他提出警告。1961年當他飽受憂鬱症之苦時，一位日內瓦的醫師告訴他：「注意你的肝臟，不要喝酒。」1964年一位貝魯特醫師看見他喝酒時警告他說：「注意！你會惹出麻煩的。」1964年，當他為了在科隆舉行的三場大型音樂會過度疲勞而喝了一瓶烈酒時，他首次得到嚴重的警告，其後果是胰臟衰竭。清晨三點，他衝到醫院去就醫。頭四個晚上，他有嚴重的妄想症。他深信在廣場有革命活動，他拔掉身上的點滴管，跳到窗台前，開始對下面的羣眾作慷慨激昂的演說。第二天晚上，他全身赤裸衝出病房，逃避想像中的記者和攝影師。

沒有人告訴他這幻覺的根源是酒精，他自己認為是工作過量而造成的疲勞。1968年6月的一天，正是演唱會開始之前，他全身劇烈顫抖，包括他最需要的手指。他感到極端痛苦，但是卻沒有人告訴他那是酒精中毒所引起的症狀。

他已經習以為常的設法偷偷摸摸的繼續喝酒，這也使他感到內疚。將空酒瓶藏在未開的酒瓶後面，這種常見的行為不僅發生在耶穌會會院，也發生在他朋友的家中：「古（Gauthier）先生：請原諒我喝了你的酒並把空瓶子藏在未開的酒後面。請原諒我不敢告訴你。我現在知道在喝了第一瓶酒之後，我的勇氣就全然消失了。」

酒精中毒

靠著杯中物的支持，他繼續到各處開演唱會，每天過著病態

的生活。

羞愧感讓他白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見人，晚上他便像一隻貓一樣，鬼鬼祟祟地走到一樓，從櫥櫃裡拿酒喝。當管理櫥櫃的修士發現酒的數量迅速減少時，他便把櫥櫃鎖上。杜瓦爾注意到會院中瀰漫著排斥他的氣氛，當團體中其他成員遇到他時，常眼看別處而走開。這些人的一舉一動深深傷害了他。他開始不辭辛勞地到一百二十公里之外的梅茲（Metz）去痛飲一頓。

幻想症又復發，而且情況更加嚴重。某次，深夜兩點，他上去洗手間，當他出來時，他覺得自己在瑪莉皇后郵輪上被綁架。之後，他的右臂出現間歇性的麻痺。在他受病痛折磨時，他轉向掛在床頭、他發願時領受的十字架，哀求說：「耶穌先生，祢知道我；祢知道我並不是壞胚子，祢知道我不想要傷害任何人。祢知道我是祢的朋友，祢知道我為我的弟兄歌唱，我已經失去我的青春、我的志氣、我的健康、我的朋友。除祢以外，我幾乎失掉了一切，請不要忘記我。」

孤獨與失望使他陷入瘋狂。除了掛在他床頭「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先生」外，他已走投無路了。1969年2月，瀕臨崩潰，他已無法忍受世界上的一切，於是決定前往快樂之地與耶穌基督終身相守。

晚上十點，他打電話給一位朋友尋求安慰；當他與對方交談時，他吞了一瓶稀釋血液的藥丸（此藥為心臟病人專用藥品，正常情況下每天只能服用四分之一粒）。突然間，他的朋友諾伊爾（耶穌會長上）開門走進來，一言不發，拿起電話，叫了救護車。

杜瓦爾被送入醫院，第三天早晨，在裝早餐的托盤上，他看見一份四頁的報告。他翻閱一下，有一個字閃入他的眼簾：酒精中毒。

「醫師，我是酒精中毒嗎？」

弗奎特（Fouquet）醫師以平靜而自信的口吻回答說：「是的。」說完就離開病房，將炸彈留給病人。

難以復原的酒精中毒

弗奎特醫師似乎有辦法醫治杜瓦爾的病，使他鬆了一口氣。現在他知道自己是病人，也明白酒精中毒是一種病症，即是肝臟已喪失阻止酒精流入血液並侵蝕其他器官的功能。

第一個療程持續三週，弗奎特醫師向杜瓦爾上司提出的報告令人振奮。病人的情況日益改善，並且很合作。醫師定期為病人作檢查，以確保醫療的結果。

1969年7月，杜瓦爾開始度他的新生活。21日，他觀看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電視轉播——「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但他的情況並不穩定，他已經不再喝酒，然而，是什麼原因使他又開始接觸酒精卻始終是一個謎。離開弗奎特醫師兩個月零九天後，在一次家族的婚宴上他喝了一小杯香檳酒，他以為自己已經搭建的牆就像骨牌一般的一推就全倒了。在回家途中，他喝了一杯紅酒，第二天中午也喝了一杯，傍晚又喝了一杯。之後他發現舊日的病魔已無情的再來纏住自己了。

離開醫師一年後，他再度打電話求救，醫師的回答是：「快來。」以下是他的報告：「我很擔心杜瓦爾的情況。當他來到時，他非常沮喪、疲倦、昏昏沉沉。」但是他仍然不停的繼續開演唱會。

大約在1970年的復活節，弗奎特醫師勸他參加戒酒協會，但是他卻意興闌珊，醫師運用一些技巧使他覺得戒酒會的經驗確實令人振奮。他深信自己可以走出這個惡夢，並且情況也日益好

轉。

六個月的清醒生活，同時又恢復在各處舉行演唱會，在蘭斯舉行的最後五場演唱會極為成功，1974年11月26日，星期四下午六時，他到車站的餐廳吃飯。一名義大利籍的侍者認出他來並樂意為他服務，他點了一份配有啤酒的晚餐。

在返回會院途中，他走進一個酒吧，坐在靠近門口的位子上，有意要很快就離去。

「一杯啤酒。」他聽見自己這樣說。

他迫不及待的一飲而盡。

「請再給我一杯。」

他希望自己能和別人一樣開懷暢飲，他也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而不能盡情享受杯中之物。他曾經再次落入陷阱，也得到戒酒會朋友的援助擺脫酒癮。他們都是具有經驗的過來人，因為統計數字極具說服力，即是百分之五十不再復發，百分之二十五會如他一樣偶爾復發，其餘百分之二十五無任何治療效果。如何讓自己不再染上酒癮呢？我們沒有明確答案，然而保持愉快心情卻是最佳仙丹。

這便是杜瓦爾努力所做的。他開始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並且善加利用眼前的現況。戒酒會為酒精中毒者所制訂的康復八步驟給了他祕訣，就是：「列出我們曾經傷害過的人，並請求他們的原諒。」

艾梅·杜瓦爾這樣做了，他也得到了心靈上的釋放。他到所有他曾喝過酒的地方對他們說：

「女士，請給我一杯咖啡，謝謝。妳看，我有一年不再喝啤酒了。真不容易，現在我好多了。但是我要為我曾經在妳的酒吧裡喝太多酒的事道歉，請原諒我。」

他開始與酒精中毒者分享經驗，十五年來他都從事這項使徒工作。藉著他那本感人至深的自傳——《與月亮玩耍的小孩》（*The child who played with the moon*），他與廣大的讀者分享自己的經驗，書中坦承自己人生中最落魄的歲月，對耶穌會士的言行也有詳細記載。

雖然杜瓦爾已去世，但是他的歌聲仍然處處可聞，並且不斷告訴我們他的故事。他的歌曲已成為法國的國寶，他的自傳也暢銷全世界。

3. 法國的記事板： 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德日進的悲劇與偉大

傑出的溝通者，被罰不許開口；多產的作家與思想家，被禁止碰觸最多人想要探討、最多人想要聽的熱門話題；具有科學家及傳教士身分，卻被歸類為前者；熱愛基督，並渴望將基督視為宇宙和人類的中心及頂峰的人，卻被認為是一位危險的作者；一位生前、甚至死後都受到懷疑的滿腔熱火的教會之子。這就是德日進的悲劇。

在羅馬當權者首次公開指責德日進之後，教會內對他的指控便愈來愈多。但是突然間，許多人又稱讚他聰明和創新的思想，而且是第一位在科學與信仰之間找到和諧之路的人。

德日進始終如一的服從足以作為後人的楷模，對上司坦誠，充滿赤子孝愛之心，在第一次的痛苦掙扎後，內心仍保持平靜，毫無怨恨。這是他的真正偉大之處。

正統的培育

出乎一般人的想法，「德日進是典型傳統家庭的孩子，一所耶穌會學校的傑出學生；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徒。假如他讓自己做出某些大膽妄為的事，及一些可能危害別人的冒險行為，那都是出於他的深刻信仰。」（都昂斯）

他生長在一個信仰虔誠、極為「古老法國」的傳統大家庭

(十一個孩子)，小德日進在家人的懷抱中感到非常安怡自在。他在家庭所接受的信仰使他在入學後的第一年就成為聖母會的會員。

從一開始接受宗教訓練，他便覺得自己走在正途上。這種肯定隨年歲而加強，他從未懷疑過耶穌會聖召的正確性。他按照依納爵的理想生活，從不敢鬆懈。

他在當時著名的修院接受培育，1898-1900年在普羅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初學，1901-1902年接受文學培育，1902-1905年在澤西(Jersey)念哲學，1908-1912年在奧雷(Ore Place)念神學，1912-1914年在巴黎念古生物學，1914年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接受第三年培育。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尚未完成第三年培育，他加入陸軍，在接受過基本訓練後，被派往前線，擔任擔架兵。令人不解的是，戰爭給予他作深度思考的機會。誠如他的傳記作者所說，此時德日進過人的天資都甦醒了，他也表示「他開始度自己知性的蜜月」。

在前線服役時，他日夜都在沉思和反省；救護站無法提供他所需要的單獨空間時，他便走進樹林裡，一邊散步一邊沉思，第二天早晨將思考的結果寫下來。這些筆記有二十到三十頁，顯露出他是一位傑出的作者，後來集結成《戰爭中的著作》(*Ecrits du Temps de la Guerre*)一書。他的腦海中不時有許多觀念湧現，如宇宙的形成，從宗教觀點看進化論，一與多之間的關係，天主與世界，耶穌在宇宙中的地位，等等。

這些都是嚴肅、需要專心思考的課題。他的好朋友讀了他的筆記後的評語是：「奇特無比，激盪心靈。」自由思想派者鼓勵他繼續寫下他的觀念，但有些人在他的作品中發現帶有泛神論的

色彩，因而保持沉默但心中充滿疑惑。

即便是 1918 年底的情況，德日進已經意識到個人的聖召方向；他坦誠的與耶穌會的上級討論這問題，上級人士都支持他的計畫。他決定全力將計畫付諸實行，然而他自己卻在害怕與希望之間徘徊。

不久，一切都遭到了歪曲。

拒絕與調職

1919 年到 1922 年，德日進在索邦大學（Sorbonne）攻讀自然科學博士學位，從 1920 年開始，他在天主教大學擔任古生物學教授，撰寫文章並作演講。生活忙碌，無一刻放鬆自己。

他在文章中不以傳統羅馬的觀點反駁進化論，而以基督信仰詮釋它，把基督視為進化論的中心和目標。他的理論引起了不小的騷動，但是在巴黎卻受到限制。

他向神學院的學生演講，講題是科學與信仰的關係，演講本身是積極正確、毫無缺點的。但是在回答問題時，德日進便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你認為地上樂園在何處？你如何描述原罪……等問題。

只要有人對他抱有防衛心，他就以保留態度，小心回答。德日進心口一致，坦誠表達自己的想法，從不虛言假意。他的長上也是他的朋友的都昂斯（René d'Ouinice）認為他真的缺乏教學法的技巧。在友善或安靜的氣氛中，藉著自然的交談，他會進一步說明自己在演講中所提出的不夠清楚的觀念。在帶有敵意的氣氛裡，及遭到聽眾的拒絕時，他的純真曾使他受到傷害。聽眾所記的筆記及他自己所寫的回答常遭到羅馬的查封。

德日進以為自己的案子不會呈報到總會長那裡，但是，事實

並非如此。他的案子送到德爾瓦（Merry del Val）樞機主教手中（1865-1930），他雖然沒有要求處死德日進，但是卻要求耶穌會總會長下令停止這位屬下的一切危險行為。

德日進向總會長說明一切，簽署一份由總會長擬定的文件，不僅如此，他還被禁止談論原罪，除非按照教會最正統的神學來講。這一切似乎還不夠，由於他名聞遐邇，甚至在巴黎人人都在談論他，有人認為使他及教會免於傷害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他遠離巴黎，專門從事科學研究。萊森特（Licent）神父在中國天津創立一座自然歷史博物館，徵求一名有專業素養的助理。有誰能比德日進更有資格呢？

1926年4月，他整理行裝，前往中國。

第二事件

當他到達天津後，著名的魯汶傳教學家及博物館雜誌編輯伯鐸·查爾斯（Pierre Charles）邀請他與他們合作。1926年11月到1927年3月，德日進撰寫了《神的氛圍》（*Le Milieu Divin*），並將手稿寄給他的上司，里昂省會長。獲得兩位審查委員的通過後，省會長將文稿交給查爾斯神父，他又將文稿交給另外兩位審查委員，他們二人對德日進的著作讚賞不已。

1929年7月5日，查爾斯寫信告訴德日進，他的大作即將付印。然而就在最後一分鐘，負責給予出版許可的主教想起德日進被羅馬當局列入黑名單，為了確認此事，他將德日進的手稿送到羅馬。

羅馬的神學家們反對出版德日進的著作。這時期正統神學仍受到重視，德日進書中的基本觀念造成全歐洲的轟動，激怒了羅馬的審閱者，教廷當局傾向審慎處理這件出版事宜，他們的意見

是讓德日進的思想成熟後再公諸於世。

這事件造成不小的騷動，也引起許多人的好奇。一些神學教授想要拜讀這本頗有爭議的書，因此有人開始複印他的作品，無人知道由誰主導這事，或如何傳遞這些複印本，就連作者本人也不知情。

德日進在中國，不停的反省、寫作及在各處演講，獲得熱烈的回響。1937年當他在歐洲各地演講時也極為成功。他的聽眾想要借他的筆記，他一如往常，毫不考慮，並相信對方的善意，便把自己的筆記給了他們。他取回了筆記，但是很多次，讀者已經複印了許多本。讀者的要求愈來愈多，德日進同意將一些演講內容複印並分送給他們。他的院長知道這事，也不反對，因為他的跟隨者都是很嚴謹及負責任的人。截至1939年，沒有任何突發事件。

企圖反對他的出版

耶穌會總會長蘭多科斯基知道德日進有未出版的著作，希望他能以精確的文字將自己的觀念清楚表達，然後再公諸於世。德日進同意總會長的建議。1939年當他返回中國時，他希望他的書能獲准出版。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與中國的通訊遭到困難，1940年年底，他的偉大著作《人的現象》（*Le Phénomène Humain*）已完稿。

里昂的省會長應給予他出版的許可，但是因為無法與法國聯絡，德日進於11月初向總會長請求出版許可，同時，他也請求總會長准許他出席第二年在紐約舉行的宗教與科學會議。

1941年3月他得到總會長措辭嚴厲的答覆，即是：他的書要交給資深的審查委員進行嚴格的審查；他不可參加紐約的會議，

但是他可以寄給大會一篇論文。

德日進不顧中國與歐洲兩地之間聯絡上的困難，仍然設法於1941年4月將自己的手稿送到羅馬。1944年他才得到審查的結果，即是：出版無限期延後。

1939年到1946年的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他困在北京，任何地方都不能去。1946年5月初，當他返回巴黎時，他被稱為先知。他在知識分子及學生中成為一位耀眼的明星，手邊還有大量的未出版作品。年輕的一代並無任何顧忌，他們把德日進的作品複印成冊，廉價出售給有興趣的讀者。羅馬嚴厲指責德日進，1947年年初他接到總會長詹森斯的指示要他停止分送未經審查過的著作。他的長上都昂斯神父找到一間小辦公室用以分送他的作品，並且買了二百到三百本他的著作。這種「強勢」作法並未引起反抗，由此可見德日進影響力之大。

假如法國是平靜無波的，但在羅馬卻非如此，在那裡，有關德日進的檔案一天比一天厚。這也是他想要再度遠走他鄉的原因；6月6日當他要前往南非時，他的心臟病發作。1947年8月，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得知羅馬的決定：禁止出版任何與哲學或神學有關的文章。

1947年9月25日，他給總會長的回答反映了他成熟的靈修：「您可以信任我，這是無須我說的。」對於支持他的耶穌會弟兄，他寫道：「值得慶幸的是，您知道，在我周圍有一羣好朋友，他們會幫助我向前走。」由於他絕對的真誠，他也說出問題的另一面：「依我所見，目前情況是一種誤會或因語意不詳而引起的，我希望藉著我的忠誠能得以澄清。」德日進再一次詳細的說明，遭到反對的著作是寫於1939年之前，根據可靠的神學家表示，他以後寫的文章已做了許多修正，受到嚴重傷害的他表

示：「對於一個即將成熟的果子，在不經查驗就斷然拒絕，難道你不認為是令人惋惜的事嗎？我能作的最好補償不就是寫一些不具爭議的文章嗎？」

「不經查驗就拒絕」，這難道公平嗎？

最後的戰鬥 最後的失望

不眠不休的鬥士，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不宣布投降。他繼續加深、修正、精練自己的思想，一如他自己所說的寫「一些不被反對」的文章；換言之，即是突破眼前的阻礙。

他修訂了自己的嘔心之作《人的現象》，並且由經驗豐富的神學家審查，亨利·盧巴克（Henri de Lubac）便是其中一位，他提出了二百四十處該修正的地方。德日進全部接受。

1948年，詹森斯總會長出於一片好意，邀請他來羅馬晉見教會高層人士，或許他們可以保護他。他抱著樂觀的想法，認為一切誤會都能化解，兩本扣在審查者手中的書《神的氛圍》與《人的現象》得以出版，他也可以擔任法國大學的教授，並接受邀請前往美國演講。

他在羅馬遇到慈祥的總會長，使他能見到他想見的人，總會長也給他最誠懇的勸言及充滿希望的承諾。1949年他收到修訂後的《人的現象》，審查委員建議他要做的修改只有很少幾處，他都照做了。但是，不明所以地總會長不再力挺他，而這本書的出版又再度無限延後，他也沒有遭到任何責備。此外，他不可接受法國大學的教職，也不許前往美國演講。他徹徹底底的失敗了。

1950年，教宗發表的通諭《人類的》（*Humani Generis*）為他這種前進的態度開啟了一線希望。通諭中重要的一部分為德日進的思想做了辯白，但是整部通諭的精神仍高度謹慎。總會長的

態度極為小心謹慎，對德日進更是嚴格，並且命令他離開巴黎。

設立在紐約的考古學研究基金會為德日進提供了一條光榮的出路。由於教會高層人士曾告知德日進不許撰寫科學題材外的文章，而要區分科學與哲學的界線又是一件困難的事，德日進便採用這種策略：他將自己的文章寄給兩份科學雜誌《科學問題雜誌》（*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和《古生物學年鑑》（*Annales de Paléontologie*），若被採納而未遭受拒絕，意味著題材是完全屬於科學的。

著作注定死後出版

德日進生命中最後也是最棘手的事便是解決他的著作出版與否的問題。他的許多著作已經無法控制的四處流傳，並且分散在許多人手中。在他過世後情況變得更糟，愈來愈多的私下版本出現在各地。但是他的幾部巨作仍被禁止出版。

德日進自己也提出一個問題：在他死後，耶穌會是否應負起他的著作出版的責任？或將他的著作束之高閣？他是否完全沒有責任？

他請教一位教會法專家，而得到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為，一名會士的著作應屬於修會，但有些知名的作家卻持相反的看法。這些「帶有希望」的意見，使德日進得以將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著作，在其死後委託給他生前所選擇的人全權處理。在幾位同會弟兄的鼓勵下，他採納這個方式，並於 1951 年 7 月 2 日簽署一份相關文件。幾天後，他離開巴黎，前往紐約，開始流浪的生涯。

1955 年 4 月 10 日正是復活節。一個月前，他曾表示希望自己死在耶穌復活日，他的願望果真實現了。當天下午六點鐘，他在朋友家正要喝一杯茶時，他的心臟病發作。

最後審查

德日進的逝世打破了一切沉默；報紙開始談論他，對他推崇備至也讚揚無比，有關他的演講更是內容豐富。而在羅馬，大家對他的認識只限於他那被查封的、厚厚的檔案。他所簽署那份死後將著作處理權授與耶穌會以外某人的文件也被否定。他們認為那是非法行為。

1955年12月情況突然改變，門檻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出版了《人的現象》，立刻成為法國的暢銷書，並在羅馬產生不凡的效果。隨即在12月17日，一個天主教期刊發表一篇長文譴責這項出版行為：「爭議與他的死亡一起埋葬，這是眾人的願望。」

這些譴責並未影響巴黎。在出版了五萬冊《人的現象》後，又有更多德日進的著作及有關他的書出版：1956年有十七種，1957年有二十四種，1958年有六十二種，1959年有四十六種，1960年有七十六種，隨後，如雨後春筍般，有各種不同的書籍問世。

羅馬當局與教會內廣大意見之間的對立大約持續了六年。1961年年底，情況有了轉變，詹森斯總會長擔任梵二大公會議籌備委員，親眼見到神學趨勢與教會官方會議外的策略間的衝突。新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信任神學家的看法。這時，耶穌會總會長授權亨利·盧巴克來表達他對德日進宗教著作的觀點。

盧巴克在幾個月內研讀德日進的著作。這位富有經驗的神學家以客觀的態度審閱他的著作。他發現德日進著作中某些敗筆是來自他自己追根究柢的個性，但是，最後的結論總是正面的。在德日進死後與修會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他的書是一個里程碑。

教廷的神學家仍對德日進懷有敵意，現在雖然缺少了詹森斯總會長的支持，他們決定要直接干預這件事。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較仁慈的方式處理德日進案件，即是於1962年6月30日到7月1日在《羅馬觀察報》（*Osservatore Romano*）刊登一篇警告性的文告，內容說明德日進的著作充滿「曖昧不明、否定教會教導的思想，其嚴重的錯誤，違背了天主教的教義」，並要求主教、修會會長、修院院長以及大學校長「保護青年學子不可閱讀德日進神父及其追隨者的作品」。

死後誤會澄清，恢復聲譽

耶穌會士服從教宗的命令，因此德日進的書仍然不許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但是耶穌會的作家繼續不斷與嚴禁閱讀德日進著作的教會當權人士抗爭到底。

直到詹森斯總會長去世，他沒有針對此事發表任何公開信函，這是為他的繼任者雅魯培神父預留空間。1965年6月在他當選後幾週所舉行的記者會上，他回答有關德日進的問題，尤其有關敏感的公告文告所引起的問題，甚至向媒體發表書面說明。

在雅魯培總會長查明德日進所寫的許多文章並非為了發表，而是一些不成熟、詞不達意的短文後，他說：「德日進的文章裡正面思想遠遠超過負面或有爭議的思想。他對世界所懷有的願景深深影響了科學界，無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德日進神父是當代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成功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實上，他一向努力要化解科學與信仰之間的衝突，使兩者能相輔相成。他以科學研究為出發點，採用當代人最喜歡的現象學方法，以信仰作為他思想的架構，即是，基督是世界進化的中心。一如聖保祿所說的，在基督裡萬物合而為一。對我們這個世代而言，我們不

能忽略德日進神父思想的豐富性。」

明顯的，這份公函並非正式的信仰文件，耶穌會士也毋須接受總會長的觀點；但同樣地，這也是一份耶穌會的授權證辭；是對過程的一種修正，誠如早在 1947 年德日進曾向詹森斯總會長所表達的，是對「某種雙關語或誤會的澄清」罷了。

亨利·盧巴克 (Henri de Lubac, 1896-1991)

備受尊敬的人物

1980年6月1日，剛當選兩年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於1978年10月16日當選教宗）訪問巴黎天主教中心。當他注意到一位年長的神學家也在聽眾中時，他中斷自己的演講說：

「我向盧巴克神父一鞠躬。」

1983年2月2日，教宗任命他為樞機主教。雖然此時盧巴克正式擁有「受尊敬」的頭銜，其實多年來他早已受到尊敬。「他是當代天主教神學界裡偉大的學者之一。若沒有他，就沒有卡爾·拉內（Karl Rahner）或巴爾大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凱斯普，W. Kasper）。

然而授與他樞機榮銜是表示對他神學研究工作的肯定，也是在他長期遭到攻擊和委屈之後的公開讚揚。

他的聰明與在思想方面的創新引來許多反對者，他的生命與他的朋友德日進是同行並進的。他們兩人的區別在於：盧巴克被認定為神學家，名聞遐邇，德日進在自己的修會內比在修會外得到更多同情，而盧巴克在修會內比在修會外樹立更多敵人。

成長背景

盧巴克出生於法國北部，是一家法國銀行職員的兒子，出身貴族之家，但家境並不富有，盧巴克在自傳中告訴我們，他的母親是「一名在鄉間往見會隱修院長大的純樸女性」。

1902年他的父親被調往里昂，盧巴克便在附近的耶穌會學校受教育。他念了一年法律之後，於1913年進入英國聖倫納德（St Leonard-on-Sea）的初學院。

1915年4月5日，在他結束初學訓練之前，被召入伍，並派往前線，1917年11月1日受重傷。戰爭結束後，他繼續未完成的初學訓練，並於1920年4月4日復活節發願。

從1919年到1926年接受耶穌會士的培育：一年在坎特伯雷的人文研讀，三年在澤西哲學研讀，一年在莫格瑞（Mongré）實習，在英國奧雷及法國佛維耶里（Fourvière）各接受兩年的神學訓練。

根據他自己的告白，對他日後的思想有決定性影響的是在澤西讀哲學的那幾年。課堂上教導的是極受德科克神父（Fr Pedro Descoqs）尊崇的蘇亞雷學派（Suaresian），與馬雷夏（Maréchal）、加里谷（Garrigou-Lagrange）以及布隆德（Blondel）等的多瑪斯學派（Thomism）相對立；加上他自己的閱讀及筆記，使他走向一條不同的道路。1912年至1920年，瓦郎森（Valensin）曾任教於此，影響力仍十分活躍；再加上他結識了德日進，拜讀他最早的作品，並且在未來五十年裡都追隨他的思想；他與費薩爾（Gaston Fessard）共同從事研究工作，與他一起撰寫一篇短文，這篇如同花苞的短文已蘊含了他日後一些著作中的觀念。

對過時的神學他提出嚴厲的評論。他從于比（Joseph Huby）神父（1878-1948）處得到幫助，後者勸告他去研究超性事務。一個在主日聚會的神學研討團體對他幫助良多，該團體由于比神父指導，他謹慎的選擇討論題目，並由一位團員負責準備。1946年盧巴克所寫的《超性》（*Surnaturel*）一書的初步結構便在此時誕生。

1920年，一道命令將他的恩師于比神父的四本著作列為禁書，並且不准許他教授神學，他仍然可以教新約詮釋學。但是在1938年他被停止一切教職，然後他便開始蒐集資料，從事撰著，出版了風行一時的福音和保祿書信詮釋書籍。對盧巴克而言，這位恩師所遭遇的一切，正是日後所要發生在他身上的預像，恩師的自處方式也是他要如何面對未來的學習榜樣。

成熟

1929年，當他完成第三年培育後，不久就被任命前往里昂擔任天主教大學基本神學教授。一年後，擔任宗教歷史系的主任，對於這項職務他毫無準備，也從未深入研究這門學科（註一）。

這位不為人知的新任教授卻充滿了他自己的想法。在公開的演講中他表達了自己的觀念。幾年之內，他的文章集結成著名的書籍，例如：1938年的《天主教主義》（*Catholicisme*），1944年的《奧體》（*Corpus mysticum*），1946年的《超性》。

他那些使保守的同僚感到氣憤並引起爭執的基本理論便是：沒有任何時期、任何學派、任何人類的模式能完完全全了解天主啟示的真理。沒有一位神學家，即使聖多瑪斯（今譯聖道茂）也不例外，能提出一種不受歷史背景影響，絕對的、無爭議的神學。因此，神學需要不斷的澄清。今天我們能平心靜氣的接受這種理論，但是盧巴克的時代卻不如此，當時，以全部亞里斯多德思想為基礎的多瑪斯神學，其地位僅次於〈信經〉，奉行多瑪斯思想是一種神聖責任。

盧巴克並未將自己的生活局限於教書工作；1942年他與達涅陸（Daniélou）一起著手蒐集「基督徒早期名著叢書」（*Sources chrétiennes*）中的文章，其目的在於「使大眾能隨時閱讀教會聖

師的作品」。他這種創舉也逃不過別人的批評；在那一個動盪時期，任何出版都被視為對士林神學及對教會信仰的挑戰。

這些新奇的神學思想受到一些人的喜愛。1941年盧巴克及一些勇於「擺脫」傳統神學的作家首先採用這種新的神學思考方式；一年後，帕倫特（Pietro Parente）主教在《羅馬觀察報》上發表文章，嚴厲譴責這些神學家的方法；1946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向道明會大會及耶穌會大會發表演講時，便引用這篇文章的內容；同一年，加里古也引用這篇文章，新的神學思考引起各方熱烈的爭論，他們譏諷地說：新神學，它將何去何從？

所有的神學機構及神學家，無論道明會士或耶穌會士都強烈抨擊這種新的思考方式，帶頭反對盧巴克的是一位擁護多瑪斯思想的耶穌會神學教授柏伊爾神父。他們全力反對以盧巴克為首的里昂學派。

《人類的》通諭猶如一枚炸彈

教宗碧岳十二世於1950年8月12日頒布的《人類的》通諭無疑是一枚炸彈，該通諭是針對「那些威脅天主教信理基礎的錯誤觀念而寫的」。許多詮釋者都認為這通諭直接指責盧巴克和他的那羣新興神學朋友，他被指控將新思想系統化，一名作者指出：「通諭譴責盧巴克著作《超性》的論點。」

里昂學派受到嚴厲的指責。早在1950年年初，盧巴克已收到總會長的一封信，命他在當年夏初離開編輯工作並停止教書，但是他不可向任何人透露這信息。5月，總會長命令他稟告葛立爾（Gerlier）樞機主教，他必須停止神學院的教職；6月，他與其他四位教授被命停止佛維耶里神學院的課程；8月，頒布《人類的》通諭，真如一枚爆炸的炸彈（盧巴克在抵達巴黎的當

天，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新聞）；10月25日，詹森斯總會長下令所有盧巴克以及布亞爾（Bouillard）、達涅陸、蒙舍伊（Montcheuil）、勒布隆（Le Blond）的著作都從初學院圖書室的書架上取下，因為「它們犯了錯誤，並且內容模稜兩可」。

盧巴克被免除一切教書的職務，並被送到巴黎。他住在鄉間的一所舊屋子裡，唯一對外的通道便是廚房，沒有圖書館，也沒有同伴，如同一名孤寂的隱居者。

「整個事件歷經許多年，都沒有任何結論。」盧巴克寫道：「我從未發怒，在這鬧得滿城風雨的時期裡，從不見教會或耶穌會的權威人士與我談論這些事，也沒有人告訴我，為何我會遭到指控。」

里昂總主教，葛立爾樞機多次與教宗談論盧巴克的事件，但是碧岳十二世卻堅持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巴西利（Pacelli）向他說：

「盧巴克最大的問題便是別人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寫什麼或想什麼。」

他是一名偽君子。

詹森斯總會長更在多方面限制盧巴克的行動。他禁止出版盧巴克已獲得法國審查委員批准的書籍，其中一些是不具爭議的，並且下令凡是盧巴克的著作，無論什麼題材都應事先經過羅馬的審核。

1958年3月，教宗碧岳十二世的態度略轉溫和，並透過奧斯定·貝亞（Augustin Bea）神父，感謝盧巴克送給他的四本巨著。但詹森斯總會長的態度並未緩和，也沒有放寬他的限制。

1958年6月，由於無人取代盧巴克在1950年所交出的職位，約阿薩（Jouassard）主教決定請他再回來擔任原職。在重返舊職

之前，他試圖獲得羅馬的准許，他發現「不妥協是來自耶穌會的內部」。修院與大學聖部在一封非正式信中表示，無人反對盧巴克，沒有必要讓一位新人擔任此職。詹森斯總會長也讓步了，6月19日他給盧巴克的信上寫道：「親愛的神父，明年愉快的回去教書吧！」

梵二大公會議的專家

1960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盧巴克為大公會議神學籌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與孔加爾（Yves Congar）一起被稱為「兩個象徵性的名字」，盧巴克自己的結論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想要表明，在前任教宗任內，道明會與耶穌會之間所引起的爭執應到此結束。」

以沃塔維雅尼樞機（Cardinal Ottaviani）為首的神學籌備委員會其實是教義部的幕僚之一，他們一直工作到1962年的夏季。這些專家扮演極次要的角色，開會時，他們靠牆而坐，除了回答樞機主教的問題外，從不發言。委員會按照《人類的》通諭的架構撰寫大公會議文件的初稿，並強化其內容。盧巴克似乎覺得在參加自己的葬禮。

大公會議將過去的憂慮一掃而空，並准許盧巴克在神學委員會中一展他的才華。在會議初期，令人深感驚訝的是許多與會的神長們不再想要對人或對某種思想提出任何譴責，而是共同協商如何回到啟示的根源。這正是盧巴克早年所提出的觀念。

因此，在大公會議進行期間，這位退休的耶穌會神學家深獲與會者極高的評價，並且得到與他共同起草第十三號文件的年輕總主教卡羅爾·沃泰拉（Karol Wojtyla，即日後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友誼，該文件為〈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初稿。

痛苦與喜樂

對盧巴克而言，梵二大公會議閉幕後的時期是極痛苦的一段歲月。他不贊同隨之而來的某些改革，例如：禮儀改革，對主教團的一些看法，未能重視基督論的奧蹟，1968年使耶穌會承受重擊的學生革命，他被視為最大原兇。他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而憂心教會及修會將要面臨的危機。日後為他撰寫訃文的蓋利特（Jacques Guillet）坦承的表示：「他自己痛苦不已也使別人受苦，以他一向準確的判斷方式來傳達他內心的痛苦，將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然而他的活力並未衰退，這幾年也是他豐收的時期；他到各處旅行、演講、參加研討會。他在耶穌會外備受推崇、廣獲好評，但是在自己的修會內，尤其在法國，他卻覺得似乎完全被冷落。

1965年9月，教宗保祿六世透過柏伊爾邀請盧巴克在第六屆國際多瑪斯會議閉幕式中演講；1963年至1974年他是無信仰者及非基督徒祕書處的一員；1977年2月1日，當他慶祝八十歲壽辰時，教宗保祿六世在給他的親筆信中寫道：「我們向你表達如對父親般的喜悅，並衷心推崇你，我們以自己及教會之名，向你表達我們對你虧欠的謝意。」

教宗擢升他為樞機主教，使他名聲大噪，同時也改善他與耶穌會疏遠的關係。他搬離昔日被孤立時所住的公寓並加入一個團體。1986年10月，他半身癱瘓，但是神智仍然清醒。

1991年9月4日當他去世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表達了以下對他的崇敬：「他將天主教傳統裡最好的部分放進他對聖經、教會及世界的默想中。」

一位耶穌會士遭到自己同會弟兄不公平的待遇，含悲而終，他的訃文撰寫者蓋利特直言不諱地寫道：

「雖然盧巴克神父受到《人類的》通諭支持者的攻擊及總會長的指責，但是他並不放棄。1950年7月1日，他寫信給里昂的省會長表示他有權知道他犯了什麼錯誤而受到指責。他得到什麼答覆呢？事實上，在這令人痛苦的事件裡，他最大的痛苦便是那些看上去仁慈的長上們或者了解他，或者無能衛護他；再者，他也知道有些院長受到某種壓力而不敢支持他。日後他曾經努力但並未成功，他想要大家知道，教會聖統比某些耶穌會士更通情達理，一些不確定的指示及頗具爭議性的命令使他身心都受到傷害。假如他對耶穌會的信任被如此的踐踏，那麼，他的服從也就更顯真實，他與耶穌會的結合也更緊密。」

註一：「天主教大學」（Catholic Faculties）當時是一間教堂而非耶穌會機構，如今已成了一所天主教大學。耶穌會在里昂設有一所佛維耶里（Fourvière）神學院。1929至1934年間，盧巴克（de Lubac）住在 d'Auvergne 街上的老住宅。1935年，他搬到佛維耶里，負責講授宗教歷史的課程，一年發表八篇講演，以取得合法居住的權利。1940年，他便停止了授課。然而，他於佛維耶里任教的經歷卻在日後引發了一個奇怪的事件。1951年9月，天主教大學打算向教宗呈遞一份文件以示效忠，而該文件必須由所有的教授具名。當時盧巴克人在巴

黎，已不在佛維耶里教書，但是有人告訴他，要是教宗看到他沒有在那份文件上簽名，他就會被視為不順服的叛徒。在羅馬，盧巴克被當成是「佛維耶里學院的領袖」，許多人害怕學院會倒閉。省會長要求盧巴克到里昂，參加教授們的會議，大家一致認同盧巴克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盧巴克的署名之後，每個人各自寫下自己的職階和任教年份。於是，盧巴克率先寫下：宗教歷史課，1935-1940年。

4. 德國的巨人：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1904-1984)

當代的多瑪斯

由於卡爾·拉內大量及多樣的著作，以及二十世紀後半期他的教導，使他擁有如此的稱呼。四千種不同的著作，發行超過一百萬冊；擁有十四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其著作為所有神學教授必讀之書籍。

他深受多瑪斯、馬雷夏、海德格 (Heidegger) 的影響，但是按照他自己的告白，他也受偉大的基督徒神祕家和聖人的影響，此外，他所吸取的依納爵靈修對他更深具影響力。根據一位認識他極深的友人福格勒 (H. Vorgrimler) 表示：「他的神學是天主神祕經驗的神學，不以超越哲學之原則為基礎。」這便是拉內告訴我們的依納爵靈修，即是：個人對天主的經驗在先，然後才能領略依納爵靈修的內容。

他解釋道：「我不是為了達成神學研究的目的而從事神學研究工作；我不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專家，而僅僅只是一名凡夫俗子，一名基督徒，一名耶穌會士；我希望那是光又同時是不可言喻的黑暗，是我們所稱的天主，是我們要以信望愛來敬拜的天主，才是我唯一所尋找的，是我要談論的；神學研究的對象不是『這個』而是『祢』。」

卡爾·拉內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神學，即是：神學與人的問題有關。如同盧巴克等人一樣，這便是使他不依循古老士林神學路

線而採取另一途徑的原因。

這並不表示他只閱讀輕鬆的書籍。相反的，他的困難在於要以眾人皆知的言語表達神學思想，並且要講許多相關的笑話。例如，如果你想要了解他，你必須讀有關他的法文翻譯；或，他的哥哥雨果（Hugo）能以德文詳細的描述他。

卡爾對自我的要求並不因此而減少，別人對他的譏諷，他都一笑置之。拉內接受克羅斯（Meinold Krauss）的專訪，訪問者以漫畫說明他思想的三個階段，這也是他傳記的資料之一。第一階段，是拉內對「繁殖者」講話，第二階段是「繁殖者」之一將他的話傳給「簡化者」，而「簡化者」必須將這些話以淺顯易懂的言語表達，第三階段是一名「簡化者」以大眾通俗的語言解釋他的話。在聽眾中有一人就是耶穌，他說：

「我什麼都聽不懂。」

兩弟兄

兩弟兄的名字叫雨果和卡爾，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三及老四，他們彼此相差四歲。雨果常說他是兄長中最年幼的，而卡爾是弟弟中最年長的。

他們的父親是夫來堡地方（Freiburg im Breisgau）的教師，嚴肅端莊，他必須憑藉家庭教師的工作養家餬口。他的母親以照顧幼兒及招待來家中住宿的客人而獲得的收入貼補家用。但是她想要擁有他們所居住的這棟房屋的夢想仍然無法實現。

他們的文化水準一如父親的職業，都受到稱讚。除卡爾外，每人都學會一種樂器，在音樂方面，家人認為他毫無希望。日後，他很「慚愧」的承認，自己缺少對音樂的熱愛，也無任何嗜好。

他的哥哥雨果先加入耶穌會。雨果於 1919 年 1 月 11 日進入奧地利費爾德基希 (Feldkirch) 的德國耶穌會初學院，他並未受到任何耶穌會士的影響，而是隨手翻閱了麥什勒 (Maurice Meschler) 的書深受感動，於是選擇了這一條路。三年後，1922 年 4 月 20 日，他的弟弟也追隨他的腳步，進入耶穌會。

卡爾接受正規的修會訓練，即是採用拉丁文，接受士林學派的教育。在他 1925 年 8 月 28 日的論文口試中，便可看出這點，他以拉丁文提出自己的論文及回答有關形上學的問題。學生上課時感到索然無味而私下玩拼字遊戲也不足為奇，根據一名上基本神學課的學生的敘述，卡爾·拉內常坐在教室後排，偷看小說。

卡爾於 1932 年 7 月 26 日在慕尼黑晉鐸，在完成第三年的培育之後，他被派到帕拉黑 (Pallach) 去教哲學史。他在自己家鄉的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並聽海德格的課。這位知名的哲學大師教導他以新方法閱讀相關書籍，尋找隱藏在文字之下的含意。然而當他完成學業正準備去教哲學時，他的院長卻派他到茵斯布魯克去教神學。

第二故鄉

於是，茵斯布魯克就成了他的第二故鄉。1937 年秋季，他開始教書的生涯，大戰期間 (1938-1945) 他在維也納，戰後繼續教書，他在慕尼黑及慕斯特 (Münster) 執教多年後 (註一)，年老時返回故鄉。其兄雨果也是茵斯布魯克的教授，教信理與教父學，而卡爾卻以他特殊的個性研讀信理學。雨果和容曼 (Jungmann) 致力於「宣講神學」的催生，卡爾並不贊同這種方法，他認為解決神學上的問題不在於提出一種對等且具有學理與科學基礎的神學，假如神學與信仰有關，它便應該與生命一起來做反省，並以

生命為導向，如此，方能成為宣講的神學。由於羅馬顧慮在培育修士的課程中，宣講神學可能會取代士林神學，因此，這門新課程只曇花一現便夭折了。

卡爾·拉內在茵斯布魯克的十四年（1948-1963）是他的創作高峰期，根據福格勒的敘述：「這十多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時期，多年來他在研究和默想中所撒的種子，現在開始收穫了，他毫無保留的將這些成果與他的聽眾或讀者分享。」拉內兄弟與容曼，這三位傑出的教父學家、神學家及禮儀專家，使茵斯布魯克的神學教師成為人人爭相羅致的對象；單單耶穌會的學生人數就由 1948 年的七人增加到 1963 年的七十九人。

除寫作外，拉內也是一位積極的編輯和出版的靈魂人物，他使每一個人都忙碌不已，在多人的分工合作下，完成了十冊《神學與教會辭典》（*Lexikon für Theologie and kirche*, 1957-1965），及六冊《神學辭典》（*Sacramentum Mundi*, 1967-1969）及其他著作。

困難重重

但是他卻遭遇許多困難。首先是在 1950 年，他為回應德國的情況所寫有關聖母升天信理的書遭到羅馬的質疑而不許出版。

另一次的阻礙出現在 1954 年秋天。教宗碧岳十二世在一次演講中以「多台彌撒但只是同一祭獻」這句話攻擊拉內的新書，他的書也是以這句話為書名。總會長要求他不要干預自己職務以外的事務，然而那年夏季又撤回這項命令，他感到自己不被信任，他的著作也未受到肯定。

雖然這些困難在梵二大公會議期間獲得解決，但是並非立即見到結果。1962 年 6 月初，他突然接到一道命令要他將所有的著

作送到羅馬接受審核，這是他遭受到的最後一次打擊。拉內認為這種作法有失公正，假如當局繼續強迫他，他便從此封筆。6月23日，他前往羅馬晉見總會長，總會長極慈祥的接待他，並向他說明，他只是執行教廷的命令而已。6月底，三位德語系國家的樞機主教，即慕尼黑的多納（Döpfner）、科隆的芬斯（Frings）及維也納的科尼（König）聯名上書教宗，請求撤銷這道命令；頗具聲望的科學與人文教授聯會收集了二百五十位支持者的簽名提出相同請求；德國總理也透過外交管道向羅馬呈遞他個人的請求。但是，直到一年後，即1963年5月28日，總會長才將撤銷審查的消息告知拉內。在撤銷命令的前後，教義部祕書長沃塔維雅尼樞機主教曾與拉內有以下的交談：

「我們並不是要反對你。這項特殊的教廷審查是給予你的一項特權，目的是使你不受愚昧者的誤會。」

「樞機大人，我拒絕特權。」

參加梵二大公會議

1962年10月11日梵二大公會議開幕，對拉內而言，這是貢獻自己才華的大好時機。維也納總主教科尼樞機邀請他擔任自己的神學顧問。這位私人顧問不久便成為受人景仰的協調者。這位樞機主教在自己的備忘錄中寫道：「他與非天主教觀察員接觸；他是幕後的協調者，不眠不休的支持者，少見的新觀念與創新作法的強力支持者。」

當月，他被任命為大會的專家。大會的規定是：專家們唯有在接受諮詢時才可發言，這項限制使他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但是發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即是與會的主教們不滿意由羅馬教廷神職人員所擬的草案，而拒絕批准，主教的神學顧問們公開表

達他們對文件的看法並指出草案中的缺點，要求提出替代草案以供討論。於是，拉內將有許多事要做了。

首先便是為天主啟示的來源提出草案。與會神長不滿意官方所擬的草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是在 11 月 21 日下令收回草案，並另行起草。主教們的勝利改變了大公會議的過程。12 月 5 日，這位忙碌不已的大會官方神學家拉內寫道：「我終於要參加修改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了。」

直到 1965 年 12 月梵二大公會議最後會期，拉內一直是一位對大會許多文獻具有隱藏但又有實質影響力的人物。我們可以從「教會憲章」、「教宗的首席權與主教權」、「天主啟示及聖經與聖傳的關係」、「聖經的默感」、「聖事與執事」、「教會與現代世界」以及「教會之外甚至無信仰者得救的可能性」等文獻中，看到拉內思想的痕跡。

一位曾經受到壓制、其著作必須經過特殊審查的神學家，他的思想日後竟成為教會官方的教導，這真是一大諷刺。

金色夕陽

拉內的聲望達到最高峰時已六十歲，他是教會外的大學爭相聘請的學者。慕尼黑大學想聘請他接替知名神學家瓜爾迪尼（Romano Guardini）的位子，在該校教授基督信仰及宗教哲學；慕斯特大學願意聘請他教授信理神學；而耶穌會總會會長希望他繼續在茵斯布魯克大學執教。拉內只想接受一項邀請，因為修會無法提供他所需要的助理。

1964 年 3 月 5 日，在他六十歲生日的當天，他被選為慕尼黑大學教授，這是一項破例，因為他是神學家，許多學生來該校讀神學，但是他卻屬於哲學系，因此，神學院否決他推薦學生攻讀

神學學位的權力。

慕斯特大學仍設法聘請他到該校執教，並且給他破格的待遇，拉內接受他們的邀請。1967年4月1日，他正式接受聘請，成為信理神學的教授。

1971年，六十七歲的拉內體力已逐漸衰退，他感到自己已經可以由執教多年的講壇退下，在慕尼黑寫作者之家度退休生活。他繼續寫作並前往世界各地演講。他也到巴黎拜訪盧巴克。

最初他認為盧巴克只讀巴爾大撒的著作，後來有人告訴他，盧巴克也讀費薩爾、布亞爾，甚至他的著作。

1981年，在茵斯布魯克的耶穌會團體邀請他回來定居，他欣然接受，並立即返回他的第二故鄉。三年來，他過著安靜的生活，拜訪老友，在夕陽餘暉中散步、逛街，走進空無一人的聖堂，誦唸玫瑰經。

1984年他慶祝八十歲生日，收到各式各樣的祝賀，但是他覺得死期已愈來愈近了。他不得不放棄散步，自己也感到體力極為衰弱。他不再能寫作或口述，但是他卻做了一件例外的事，即是在寫給連達蘇里（Landázuri）樞機主教及祕魯的主教的信中，表達他支持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和他的解放神學。

3月29日他被送入大學醫院，於30日午夜時分，平安的與世長辭了。

註一：耶穌會士負責管理茵斯布魯克大學（University of Innsbruck）

的神學院，此外還有另外兩個機構：耶穌會的神學院和 Canisianum。1938年3月，納粹德國併吞了奧地利。6月20日，普烈特納州（Plattner）的部長告知總鐸區，神學院將立即遭到查封，至於耶穌會的教授們該何去何從，稍後會下達詳細的指示。9月時，每位教授分別收到指示：他們遭到強制遣散，不得上訴；原因是耶穌會士當時正發起運動，對抗納粹黨推行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份指令究竟是發自柏林或地方當局，無人知曉。於是，教授們疏散到各地，神學院則遷至瑞士的西昂（Sion），繼續運作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雨果（Hugo）和容曼（Jungmann）也隨著神學院到了西昂，雨果擔任政府職位，繼續他的研究；容曼則寫下了著名的《彌撒慶典》（*Missarum Sollemnia*）。這段期間（1938-1945年），拉內留在維也納。

5. 在羅馬的美國人： 若望·柯特尼·墨瑞

(John Courtney Murray, 1904-1967)

爭論

「梵蒂岡主教會議宣稱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大會進一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權的基礎是人性尊嚴。」

這種宣言對今天的人是明確易懂的，但是，在 1965 年，教會首次提出時，則是公開表達了在教會內醞釀已久的意見。

這轉變要歸功於紐約的耶穌會士若望·柯特尼·墨瑞，他經過長期思考與痛苦奮戰後，才贏得這項個人勝利。

「凡錯謬之事務無權柄可言，唯有真理才有權柄。全國必須信仰基督新教或天主教，並要特別保證履行天主教信仰。」這曾是過去常聽到的論調。

1937 年，墨瑞由羅馬學成回國，隨即便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大學擔任信理神學教授，他漸漸注意到天主教徒能在國家社會中扮演某種角色。他覺察到由於天主教徒在政治方面的活躍，而使基督新教感到十分恐懼，同時，教會與政府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且又可怖的關係，一如有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即是教會被局限於貧民區內。

由於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間關係不佳且誤會極深，於是，墨瑞決定面對這棘手的宗教自由議題。1948 年，他覺得自己有足夠的信心接受美國天主教神學學會的邀請，在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請贖主會會士、也是美國天主教大學倫理神學教授方濟·康乃爾

神父（Francis J. Connell）擔任回應人，其實，眾人皆知，他一向反對墨瑞的觀點，而墨瑞選擇了在未來十三年一直是他頭號敵人的神學家作自己的回應者。

墨瑞的觀點是，教會當局為要回應十九世紀風行於歐洲那股強大的俗化主義潮流，而提出有關教會與國家的教導；但是，這種教導不適用於具有不同政治經驗的美國。墨瑞辯稱，雖然西班牙能實行政教合一政策，但是，他們的情況與美國截然不同，因此，不能採用相同政策。

康乃爾的回答是：墨瑞的論點不符合教宗頒布的基督為普世君王的教導。當他看到墨瑞的觀點已廣被接納時，他便展開了一場為期十三年的對抗，他要使羅馬教廷干預此事，並使大家知道只有神學家之間的討論是不夠的。

拒絕

1950年8月1日，康乃爾寫信給皮撒多（Pizzardo）樞機主教反對墨瑞的論點。從1950年到1962年之間，為了拒絕墨瑞的觀點，他曾寫過二十多封信給梵蒂岡不同的官員，請求他們制止墨瑞，這封信只不過是第一封信罷了。

1953年3月2日，當沃塔維雅尼（Alfredo Ottaviani）晉升樞機主教並擔任教義部祕書長時，以「教會與國家：在教宗碧岳十二世教導的光照下當前的一些困難」為題，發表演說，這是康乃爾的首次勝利。沃塔維雅尼不以維護傳統教導為滿足，還提到在美國教會所引起的辯論，並引述三篇墨瑞的文章。

同一天，樞機主教派專人將自己的演講稿送至全國天主教新聞社的羅馬特派員，講稿登出後震驚全美，美國主教團曾試圖阻止刊登這篇演講的英文版。

墨瑞警覺到事情的嚴重性，1953年春末他寫信給教宗碧岳十二世的私人祕書雷勃（Leiber）神父。6月，雷勃神父向他保證：「你應該知道沃塔維雅尼樞機主教的演講只是他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教會官方的觀點。」

在7月23日《紐約時報》引爆這話題之前，一切都很平靜。根據一些西班牙官方的報導，沃塔維雅尼的演講代表梵蒂岡肯定西班牙聖統制所維持的教會信理，並在兩國最近簽訂的協定上，將它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

墨瑞再次請求雷勃神父適時的澄清真相，但是卻得不到任何回應。為要分擔墨瑞的憂慮，伍德斯托克大學的校長寫信給詹森斯總會長；總會長向他保證「墨瑞絕不是教宗所斥責的人」。但是，三個月之後，墨瑞得到指示，要他簡明扼要的寫出對教會與國家問題的立場，並呈報給總會長。

1953年12月6日，教宗碧岳十二世以身為教會最高權威的名義宣布，宗教自由與包容的問題必須放在視國際為一個大團體的脈絡中來研討。這難道意味著他的看法不同於沃塔維雅尼的觀點嗎？他如此做，難道是為了躲避樞機主教的干預嗎？墨瑞和他的朋友都這樣認為。

受到教宗這番話的鼓勵，墨瑞決定採取下一步驟，即是大膽且公開的提出自己的思想，使它成為人人注意的焦點。1954年3月25日他在天主教大學演講時表示，沃塔維雅尼的演講內容並不能代表梵蒂岡或整個教會的看法，教宗碧岳十二世已經排斥他的觀點。

墨瑞的演講立刻引來了對方的回應。三天內，康乃爾寫信給沃塔維雅尼告訴他有關墨瑞的演講。由於康乃爾並未現場聆聽這次演講，因而他以第三人的口吻提出一份曲意奉承、充滿諂媚之

言的報告。在報告的最後寫道：「我相信一份來自聖座的明確文件是迫切需要的。我敢保證，如果聖座不發布明確的譴責，墨瑞神父會繼續教導他的觀點。」康乃爾在同一封信裡也透露天主教聖母大學準備出版一本名為《在世界中的天主教》（*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Affairs*）的書，其中有一篇墨瑞的文章，題目是「論教會—國家結構的困難」（*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urch-State Problem*）。

深受傷害的沃塔維雅尼立即展開還擊。

打擊

1954年7月26日，教義部祕書長皮撒多樞機主教要求墨瑞修正他文章中的錯誤，並請該大學的權威人士收回未售出的書。這種舉動使墨瑞大感迷惑。日後他寫道：「當時我的感覺是很悲觀的；我曾經寫過許多這類主題的文章，我的觀點已在成熟發展的過程中，要我改正我不曾說過的話，這是不對的。」

我們只有從墨瑞的個人資料中才知道他與總會長有數次書信來往；涉入此事的人似乎只限於少數幾人。1954年9月墨瑞寫道：「從總會長給我的私人信件中，我知道有人想要我的命。」1954年夏季發生的事就印證了這一點，即是教義部正式宣布，在墨瑞神父的一篇文章中有錯誤，並命令他將自己的著作送交耶穌會審核小組。最後教義部宣布他犯了四點錯誤。

1955年年初，墨瑞正式駁斥教義部的指責，同時他寄了一篇文章希望能發表的新文章給審核小組。7月9日總會長的美國助理麥克可密克（McCormick）神父告訴他，耶穌會審核小組拒絕他的文章發表。「審核委員心中都贊同你的觀點，而他們也知道這裡的情形。以目前狀況來看，我認為繼續討論那些具有爭議性的問

題是不對的。此時，若使反對者更加憤怒，是無濟於事的。總會長同意這最後的裁決，時間將會改變一切。」

墨瑞以平靜的心接受這打擊，對耶穌會如此保護他，他感激不已。「那篇所謂『不適宜』的文章化解了我的處境。我們的耶穌會（天主降福她）真了不起。總之，體驗到忠實、謹慎及總會長對我這名與他和樞機主教發生不愉快爭執的會士仍然給予父親般的照顧，這一切都是值得的。」1955年年底，墨瑞詢問教義部加予他的限制是否解除，但是，他並沒有從麥克可密克那裡得到任何鼓勵性的回答，只有：「我想你可以寫詩」這樣一句話而已。

當墨瑞打開麥克可密克神父的信時，伯哈特（Walter J. Burghardt）正與他在一起，他敘述了當時的情形：墨瑞立刻清查自己房間裡的書籍，其實書架上都是一些有關恩寵、天主聖三、教育、社會問題、人性探討、新無神論等類的書籍；而有關宗教自由、教會與國家關係的書籍都已歸還圖書館。他是一位立即服從的會士。

辯白

墨瑞並沒有時間寫詩。大多數的美國主教贊同他的觀點，同年8月，主教請他撰寫一份宣言呈遞國會修憲委員會，也就是針對當時備受討論的、著名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此時正是甘迺迪與尼克森競選總統的關鍵時刻，前者因其天主教的忠誠引起一些敏感性的話題。墨瑞是平息這場熱烈辯論的功臣；甘迺迪的私人顧問司乃辛格（Schlesinger）與所瑞森（Sorensen）就這影響選情的熱門話題請教墨瑞，即是：一名天主教徒可否接受美國憲法中有關宗教的規定？1960年12月12日出版的《時代》雜誌便是以墨瑞為封面人物。墨瑞持續不斷的為神職人員帶領避靜，經常

是公眾倫理及宗教在社會中的角色等問題的顧問。

他在自己家鄉極受歡迎，但是在羅馬，尤其在教義部仍然處於孤立狀況，一直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期內才解禁。

他並未受邀參加梵二大公會議的第一期會議，當時他在伍德斯托克大學。最奇怪的是，1963年春天，他受到美國聖統中最保守的成員史培爾曼（Spellman）樞機主教的支持，指定他擔任美國天主教團有關宗教自由議題上的官方發言人。

他很快就適應合一祕書處的小組工作，此時正面臨關鍵時刻，即是：祕書處要撰寫一份與沃塔維雅尼所主張「宗教包容而非宗教自由」不同的宣言。討論的是神學委員會是否有權修改祕書處提交的宣言草案。當輪到墨瑞時，他站起來在沃塔維雅尼面前發言，由於後者當時已半盲，看不清楚，就問身旁的李爵（Léger）樞機主教發言者為何人。

為了不要引起騷動，李爵樞機主教隱瞞了發言者的姓名，只說：「是一位專家。」

墨瑞的發言對祕書處所提草案具有決定性，投票結果為十八比五，壓倒性的通過這項草案。

他尚未贏得最後勝利。宗教自由宣言是大公會議文獻中爭論時間最久的文獻之一。草案經過近乎四十次的討論，修訂稿送交大會，經過七次討論。直到1965年9月21日的上午要投票之時，還遭到一小羣神長的反對，最後投票結果為贊成票一千九百九十七張，反對票二百二十四張，廢票一張。

以上結果表示提案內容基本上沒有改變，只有合一祕書處能做最後的修正。1965年12月7日舉行最後投票，結果是：二千三百零八票贊成，七十票反對（死硬派），八張廢票。

這篇歷史性文件的撰寫者為西班牙布魯日（Bruges）主教史

麥特（Emile de Smedt）、帕文（Pietro Pavan）主教及墨瑞神父，但是他無法參與最後的修訂工作。在1964年1月及12月，他曾兩次心臟病發作，10月5日有一次肺衰竭，並且住院治療。同年11月18日，在他修養期間，他與其他神學家和教宗保祿六世一同共祭。他曾對別人說，這是他從未有過最感人的一次共祭彌撒。他的一位好友表示，這次與教宗共祭具有象徵意義，恭賀他長期的奮鬥終於劃上完美的句點。

返回美國之後，他沒有許多時間從事其他工作。他被派擔任拉法吉（LaFarge）中心的主任。他開始研究與宗教自由相關的議題，即是：種族歧視，良心的反對，節育。1967年6月中旬，他的心臟病再度復發，由於病情極為嚴重，而被命令取消所有預定活動，完全休息。8月16日，當他前往拉法吉中心時，逝世於計程車上。

墨瑞去世的消息立刻使世界各地的政治與宗教領袖感到無比惋惜，對他的敬愛與對他在學術上成就的稱讚之聲不絕於耳，誠如他生前好友及同僚伯哈特神父在葬禮上所說：「他是基督人文主義者的化身，在他身上過人的聰慧與開放的愛結合為一。」身為學者的他，被視為具有美國經驗的神學家，他曾獲得十九所大學頒發的榮譽學位。

6. 大公主義的樞機主教： 奧斯定·貝亞

(Augustin Bea, 1881-1968)

晴天霹靂

奧斯定·貝亞神父是羅馬聖經學院的教授及教義部的顧問，赫斯（Franz Hürth）神父是額我略大學的倫理神學教授。這兩所學校相去不遠，教義部的車通常來接這兩位神父去參加顧問會議。

1959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一向準時的貝亞坐在車裡等候赫斯神父，此時，一輛梵蒂岡車牌的車子開過來，停在旁邊，一位國務院官員走出來要和貝亞神父談話。

「蒙席，我怕現在是不可能的，我必須到教義部開會，而我們已經晚了。」貝亞說。

「但是我是由教宗那裡來的。」蒙席回答。

蒙席遞給他一個密封的大信封，說道：

「恭喜閣下，但是在下午一點後您才可告訴別人。」

一個註明11月12日的大信封，裡面裝有一封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私人信件，告知他，教宗將在近期舉行的樞機主教會議上任命他為樞機主教。

前一天，教廷國務卿告知總會長詹森斯神父這項任命。由於時間緊迫，總會長連表達反對意見的機會都沒有。

「神父，教宗深知貴修會的會憲，因此，他發布了明確的命令，閣下必須遵守。這件消息明天將公布。」

早在1953年教宗碧岳十二世便有意擢升貝亞為樞機主教，

由於詹森斯總會長強烈的反對而作罷。現在情況改變了，在貝亞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上，他說：「對我而言，這項消息有如晴天霹靂。我一籌莫展只有信賴天主，勇往直前。」

貝亞樞機被任命為禮儀委員會、修院與大學委員會及聖經委員會的成員。由此可知，似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對他並沒有特殊計畫，他只是想要表揚他為教會所做的種種服務。教宗任命貝亞為合一委員會的祕書長是出於他個人對大公運動的興趣。

他的終身志業

新獲選的貝亞樞機主教向教宗坦承他的最深渴望是：「為基督徒的合一盡最大的努力。」他將自己的願望付諸於行動。1959年11月30日貝亞樞機寫道：「最重要的問題是在羅馬應有合一運動的代表。等慶祝儀式結束，我將與教宗直接談這事。」次年1月9日，他第一次晉見教宗後，愉快的走出來，告訴他的祕書及日後傳記作者施密特（Stjepan Schmidt）說：「我們完全了解對方。」

貝亞樞機曾與帕德博恩（Paderborn）的莫勒（Johann-Adam Möhler）機構主任史凱米勒（E. Stakemeler）博士有過聯絡，希望該機構對成立教會合一委員會提出計畫。該機構接受這項任務，並在1月20日將組織草案呈上。貝亞樞機研讀草案後，也提出一些建議，並送回給該機構，3月4日當地的總主教耶格爾（L. Jaeger）呈上一份陳情書，請貝亞樞機轉呈教宗。

兩天後，即是3月11日，貝亞將陳情書遞上，3月13日，教宗已經決定成立此委員會，並派貝亞擔任主席。數週後，教宗告訴貝亞，他自己認為新成立的委員會最好稱為祕書處而不稱為委員會，教宗說：「委員會常具有自己的傳統，我們將稱這新機

構為祕書處，如此，你不會受任何傳統的限制而能自由的完成你的理想。」

貝亞樞機主教是擔任此職務最理想的人選。他長期研究聖經使他對天主啟示的聖言有深刻的了解，這是教會生命的根源及最高指導。以下是他在羅馬傲人的經歷：教宗碧岳十二世的告解神師（1945-1958），聖經學院院長（1930-1949），宗座聖經委員會（1931-1959）、修院與大學委員會（1936-1959）、教義部機構（1949-1959）、禮儀委員會（1950-1959）等組織的顧問；他對羅馬主教公署瞭若指掌，他有極高的聲望和豐富的經驗，與最具影響力的新教領袖關係極佳。他具有超人的勇氣和所需要的謹慎。

踏出第一步 碩果豐收

6月29日，著名的大公主義學者威勒布蘭斯（Johannes Willebrands）教授受邀擔任新機構的祕書。

下一步便是制訂祕書處的職權範圍，教宗也再次表示他的慷慨及支持。該祕書處不僅如同其他的委員會具有公共關係的功能，它也有權力為即將舉行的梵二大公會議撰寫文獻，由於它專屬的特性，它有明確的工作領域；此祕書處理所當然應草擬有關大公主義的文章，但是在所擬定的提案中，有些也適合其他委員會採用。

在這友善誠懇、煥然一新的氣氛中，大批新教人士開始訪問羅馬，他們是：坎特布理（Canterbury）總主教費雪（Geoffrey Fisher）、美國聖公會首席主教利希滕貝格（Authur Lichtenberger）、德國福音教會的史金克（E. Schink）等。現在該是羅馬如何回應的時候了，尤其是要派觀察員參加1961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世界教會會議，這是羅馬與基督新教未來

聯絡的第一步。

此時，貝亞樞機面臨首次的阻礙。最初沃塔維雅尼反對派代表參加這會議，他堅持的原則是天主教的代表只能以記者身分而非觀察員身分參加。貝亞讀了來自教義部的信之後說：

「這是行不通的。」

他等了幾天，然後將一份詳細的備忘錄交給沃塔維雅尼，強調自從教宗宣布召開大公會議及其合一目的後所帶來的新趨勢。他也提到邀請其他基督新教選派觀察員參加大公會議的可能性。假如拒絕出席世界教會會議，我們如何能對他們發出邀請函呢？

沃塔維雅尼被說服了，並重新考慮此事，最後的決定令人歡喜。他告訴貝亞說：

「在我們第一次的討論中沒有談到細節。我很高興這決定除掉了你心中的憂慮，閣下。」

五位天主教觀察員出席新德里的會議，這真是一條大新聞。

同樣，來自非天主教會的觀察員及團體出現在梵二大公會議上，也絕對是一件新奇的事。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中，從未有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觀察員出席過大公會議，假如我們還記得，就在十八個月前，天主教與不同的西方及東方教會還沒有任何接觸，因此，這項邀請也真是一項偉大的創舉。

事事多磨

在大公會議的籌備階段中，凡由各個委員會提出的草案都必須經過中央籌備會的審查，貝亞的文章，其中包括宗教自由的文章，也不能例外，因此，他與信理委員會發生首次衝突，該委員會的主席沃塔維雅尼直接挑戰合一祕書處是否具有處理有關信理問題的權威性。再者，信理委員會已擬定自己的草案，其他有關

此議題的草案將不予以討論。貝亞要求這兩個草案都應在籌備會中討論，他的要求獲得了同意，但結果卻是他提的草案未通過，這不是很新奇的事嗎？中央籌備會一定早已預料到了，而大公會議卻不如此認為。

在大公會議召開後一個月，當沃塔維雅尼呈上信理委員會撰寫有關啟示根源的草案供與會神長討論時，這種認知上的差別便漸趨明顯。經過六天的辯論後，此草案以一千三百六十八票對八百二十二票遭到駁回。由於投票結果未達到大會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票，為解決困難，教宗提議此草案應在合一祕書處協助下重寫。其實，草案觸及大公主義中極重要的觀點，而合一祕書處代表多數人的看法。這是一樁多麼自相矛盾的事呀！曾經拒絕合一祕書處撰寫有關大公主義議題的信理委員會，現在必須謙恭的接受該祕書處呈上有關啟示根源——此一受人注目的信理議題。

大公主義法令的歷史背景最不具爭議性，1963年11月20日，此法令的最後草案以二千零五十四票對六十四票獲得通過。大公會議在宣布教會與猶太人民關係草案的過程上遭遇較多波折。1959年的耶穌受難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暗示應刪除禮儀經文中描述猶太人民時所採用的「不忠不義」這類字眼。1960年9月18日，他任命貝亞針對此議題草擬一份提案。中央籌備會將提案擱置，並從議程中刪除此議題，然而教宗卻未提出抗議。

貝亞毫不氣餒，他修改提案內容，並於1964年11月20日提交大會討論，最後獲得多數神長的認同並通過，但是卻遭到教會之外的反對，即是阿拉伯國家從政治角度上扭曲這項法令，他們認為這是國際猶太主義的陰謀，甚至有些主教因此遭到恐嚇，貝亞澄清法令中的疑點，並作些修正，使阿拉伯世界也能接受這法令。

至於宗教自由宣言仍由合一祕書處主導，我們已經看到，直到最後一分鐘，它都是一項具有爆炸性的議題。

英雄沒有安息於自己的桂冠下

貝亞樞機主教是梵二大公會議的靈魂人物。他的同僚之一帕文（Pavan）蒙席曾說道：「他扮演天主照顧與會者的角色。他傑出的人格使他成為合一祕書處各項工作的保證。所有的人都看出他對教會的忠實，他具有獨特的神學與聖經方面的學識，知識豐富，視野廣闊，彬彬有禮，祥和又開放，能與人交談，也了解他人，並對真理具有接納的彈性。」

當梵二大公會議閉幕時他已七十七歲，且身心俱疲，原本他可以放下重擔安享晚年。但是，此時正是在教會內推動他所倡導的合一運動的時候了。他將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三年用於與英國國教、衛理公會領導人、路德教會及東方教會的聯繫上。

他的努力不久就見到了結果。教宗保祿六世拋開固守的禮節，並打破歷史的傳統，主動去訪問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亞撒那古拉斯（Athenagoras），後者不久便到羅馬回訪教宗，這種空前的互訪已點燃了教會初步合一的希望之火。

貝亞在天主教各階層推動大公主義，他透過會議及出版讓教會知道推行此運動的必要性。他的著作有：《大公會議後的合一之路》，《教會與猶太人民》，《大公會議中的大公主義》，《教會與人類》，《天主聖言與人類》，《服務者，大公會議基本主題及其聖經基礎》。

他唯一的願望是無疾善終，天主果然滿足了他的心願，1968年11月，在經歷短暫的病痛之後，他便與世長辭了。

參考資料

- ZIZOLA, Giancarlo: *Il microfono de Dio. Pio XII, Padre Lombardi e i cattolici italiani* (Milan, 1990) .
- LUCIEN, *L'enfant qui jouait avec la lune* (Mulhouse, 1983) .
- NOIR, Pierre: Aimé Duval (Obituary in "Compagnie" 192, Nov. 1985, pp. 173-174) .
- D'OUINCE, René: *Un prophète en procès: Teilhard de Chardin* (Paris, 1970) .
- SPEAIGHT, Robert: *Teilhard de Chardin. A Biography* (London, 1967) .
- DE LUBAC, Henri: *Mémoire sur l'occasion de mes écrits* (Paris, 1989) .
- RUSSO, Antonio: *Henri de Lubac* (Turin, 1994) .
- GUILLET, Jacques: *P. Henri de Lubac 1896-1991* (in "Compagnie. Courier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256, March 1992, pp. 69-73) .
- DYCH, William V.: *Kari Rahner* (Collegeville, 1992) .
- RAHNER, Karl: *I remember.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New York, 1985) .
- NEUFELD, Karl H.: *Hugo e Karl Rahner* (Italian transl., Giuseppe Reguzzoni: Turin, 1995) .
- PELOTTE, Donald E.: *John Courtney Murray, Theologian in Conflict* (New York, 1976) .
- KOMONCHAK, Joseph A.: *The Silencing of John Courtney Murray*; in "Cristianesimo nella Storia. Saggi in onore di Giuseppe Alberigo" (Bologna, 1996) .
- BURGHARDT, Walter J.: *A Eulogy* ("A Tribute to John Courtney Murray, S.J.", "Woodstock Letters, Summer 1967, Vol. 96, Number 3, pp. 416-420) .
- SCHMIDT, Stjepan: *Augustin Bea, the Cardinal of Unity* (New York, 1992) .



IV

福傳傳統

在耶穌會內，二十世紀也是福傳的時代，修會結構與福傳工作密切配合。每個省區都負擔起某些地區的福傳工作，全修會都參與這重要的工作，因此，也吸引了新人的加入。那些曾經禁止耶穌會士進入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成為優先派遣傳教士前往的地區，但是屬於殖民地或具有特殊文化傳統的地區仍列入考慮之中（註一）。

在梵二大公會議喚醒天主教對其他正信宗教的尊重並建立彼此交談管道之前，福傳的觀念及方法仍是依循過去的傳統；所謂本地化還只是理論而未付諸實行。耶穌會在先前那些國家裡的福傳成果，已告訴我們他們展現的活力。

我們要從這些燦爛的花朵中採集幾支樣本。

註一：在所有的會省目錄中，包含一份耶穌會傳教區的名單。1934年的表單列出四十六個傳教區，其上註明了各傳教區所屬的會省，以及各傳教區的特長所在。法國的四個會省在印度設有馬度雷（Madurai）傳教區，在錫蘭（Ceylon，今斯里蘭卡）設有一個傳教區，在中國設有南京和獻縣兩個傳教區，在中東設有黎巴嫩—敘利亞—埃及（Lebanon-Syria-Egypt）傳教區，在馬達加斯加設有菲納蘭索亞（Fianarantsoa）及塔那那利佛（Tananarivo）兩個傳教區，在模里西斯（Mauritius）設有一個傳教區，此外還有亞美尼亞（Armenian）傳教區，不過該教區暫時遭到解散。義大利的五個會省在錫蘭設有一個

傳教區，在印度設有加里吉-芒加洛（Calicut-Mangalore）傳教區，在中國則設有蚌埠傳教區。德國的兩個會省在印度設有浦恩（Pune）傳教區，在日本設有東京和廣島兩個傳教區。荷蘭的會省則在印尼（Indonesia）設有一個傳教區。西班牙的五個會省在印度設有孟買-古吉拉特（Bombay-Gujarat）傳教區，在中國設有安慶和蕪湖兩個傳教區，在加羅林羣島（Caroline）、馬里亞納（Mariana）羣島、馬紹爾（Marshall）都設有傳教區。葡萄牙的會省則設立傳教區在印度的臥亞（Goa）和中國的澳門。英國的會省分別在南美的蓋亞那（Guyana）、南非的羅德西亞（Rhodesia，今辛巴威Zimbabwe）設立傳教區。愛爾蘭會省設有香港傳教區。比利時的兩個會省在印度設有加爾各答（Calcutta）和蘭契（Ranchi）兩個傳教區，在非洲設有剛果（Congo）傳教區。加拿大法語區的會省在中國設有徐州傳教區。美國的七個會省則設立傳教區在伊拉克（Iraq）、菲律賓（Philippines）、阿拉斯加（Alaska）、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宏都拉斯（Honduras）、牙買加（Jamaica）、印度的巴特那（Patna）、波蘭南部的克拉科（Cracow）、北羅德西亞等地。

1. 在馬達加斯加癲瘋病院中的耶穌會士： 詹·貝澤 (Jan Beyzym, 1850-1912)

韃靼人

學童們給他的綽號是韃靼人，原因在於他的容貌及身材，大而平的前額，大大的臉龐，厚厚的嘴唇，寬寬的肩膀，強壯又結實的雙手。

然而，另一個理由也是因為他的祖先曾經打敗大批入侵的韃靼人，因此立陶宛（Lithuania）公爵頒給他貴族的封號及沿喬莫茲（Chomorcz）河岸的土地。為了上述的理由，這名年輕耶穌會士允許別人稱他「韃靼人」。

另一方面，這頭銜說明別人對他的喜愛，而他也真當之無愧。學校坐落於希洛（Chyrów）城外的山丘上（今天布洛在烏克蘭境內，距離波蘭邊界十五公里）。學校建築完成於1883至1887年之間，其正面有一百八十二公尺長，左右各有一翼，足以容納全校學生住宿之用。

1887年，年輕的貝澤神父被派來這所學校教授俄文及法文，但是，不久被派擔任舍監，管理浮躁不安、調皮搗蛋的中年級青少年。此外，他還管理設有十個病房的醫療室，實際上這裡是名副其實的一所醫院。

雖然他有助手分擔工作，但是他仍親手做最低賤的工作，並像母親一般的照顧病人。他還有一種講故事天賦，能夠在漫長的冬天夜晚使那些學生如癡如醉的專心聽他講故事。由於全校學生

都要聽他講故事，因此，必須輪流來聽。他被學生稱為凡爾納（Jules Verne）第二，他的故事常常延續好幾天，有時甚至沒有結尾，他的聽眾想要知道結局，這位凡爾納二世便會假裝說自己也不知道，還要請教他的老闆才行。

在天主的計畫中，這間醫療室訓練他日後到另一所醫院去服務，在那裡，他將要以更大的犧牲及勇氣去服務病人。

第二個聖召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克勞帕（Apolonius Kraupa）在學校實習時，曾發願要終身照顧癲瘋病人，1897年5月，他偶然讀到一本敘述在傳教地區有關這種病人命運的小冊子，書中的敘述勾起他心中昔日的渴望，但是又擔心或許只有晉鐸後才能如願。他向貝澤神父吐露自己的心願，貝澤神父細心聆聽，他一定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引力，然後以一種堅定的聲調說：

「我是個司鐸，應該不會有問題的；假如我的院長准許，我會去照顧癲瘋病人。」

他稟告院長自己的願望，並得到准許，1897年11月13日他寫信給總會長路易·馬丁（Luis Martín）神父：「我四十八歲，可能有些困難，但是我身體健康，希望天主允許我用幾年時間為癲瘋病人服務。」

總會長給予他肯定的答覆。貝澤神父將前往耶穌會法國土魯斯省所管轄、設於馬達加斯加島安巴希沃拉卡（Ambahiworaka）的癲瘋病院。次年12月30日，貝澤到達塔那那利佛學習當地語言，當他學會了簡單的馬達加斯語後，他便立即前往目的地。

癲瘋病院坐落在離小鎮十公里的地方，沒等多久，他便開始

在主日探訪那裡的病人，雖然語言不通，他還是主持彌撒，並從事各種服務。這些並不能滿足他，在兩個月之內，他便搬入癲瘋病院內住在那兒。

他發現病人的生活狀況極為可憐。「沒有醫生，沒有看護，沒有修女，沒有任何人照顧他們，也看不見藥房。他們把任何隨手可拿到的東西穿在身上，有人用舊布袋掩護身體，這就是他的衣服；每人每週領到一公斤的米，這只能維持人的基本所需，不至於餓死罷了。他們沒有藥品，甚至連包紮潰爛傷口的破布都沒有。」

「看見別人如何虐待他們，真會令人大怒，當地的人將他們趕到一處，並向他們扔石頭；假如任何人向他們施捨食物或金錢，往往是丟給他們，如同把骨頭丟給狗一樣。任何人都會被這種方式激怒，而他們卻平靜的接受；看見別人畏懼的表情已是習以為常的事了，對於不害怕的人，他們反倒覺得驚訝。」

這便是發生在貝澤神父身上的事，「他們第一次看見我為他們包紮傷口時，都聚攏過來，驚訝的說：『看，他不怕碰觸傷口。』」

他們開始稱他「癲瘋病人的父母」，這真是名副其實的稱呼。首先，他盡力解決食物的供應問題，使他們不再忍飢受餓，並且改善他們的衛生條件。他先前在希洛的經驗使他知道簡單的敷藥方法。他努力的結果很快就顯現出來，即是死亡率由每週五至七人減為每年五至七人。

貝澤神父也嘗試美化這荒涼的環境。他將這醫院裡四間大而簡陋的病房加以整修，在戶外種上花草，將自己的空閒時間用於他所專長的木刻上。

他知道自己有限的馬達加斯語無法隨心所欲地與他們溝通交

談，更無法向他們傳授信仰。1901年2月初，他用兩個月時間到十四公里外的地方去學語言。「我不忍心離開我那些可憐的病人，但是為了他們的益處，我必須這樣做，否則我沒有任何進步可言，我必須善加利用這特有的機會。」主日他回去為他們舉行彌撒，「星期六上午我回到那裡，立刻去看我的病人，為他們包紮傷口，晚上做一些其他的事，主日舉行彌撒後立刻回來。」

分離與重聚

不久，「癲瘋病人的父母」就提出了他的結論：「一所醫院必須具備良好素質的醫護人員或修女。」他的計畫獲得修會長上的批准，這項計畫的預算是五萬法郎，現在，他開始要寫信給波蘭的友人，向他們募款。他自認自己不是一名作家，不擅長寫作，但是，他抓住重點予以發揮，因而，他的信能打動人心，被人接受，募款的請求也得到良好的回響。在此同時，他著手尋找一個與世隔絕但又有助健康的地方建立一所醫院，就在貝齊寮省（Betsileo）、靠近菲納蘭索亞的馬拉納（Marana）。

離別的時刻終於來到，他的病人都依依不捨。他們被強制遷到一所可容納七百名病人但設備極差的政府醫院，日夜都有警察看守。這是一個保護區，距離安巴希沃拉卡有六小時車程。他們怎能不哭呢？

「病人圍著我，和我道別，親吻我的手，不停哭泣，我也無法忍住自己的眼淚。他們在我的車子後面奔跑，直到邊界，不斷抓住我的手，與我道別。當他們的身影漸漸消失後，我仍然可以聽見他們哀憐的呼叫聲。」

1901年10月11日，他來到新的地方，照顧一批新的癲瘋病人，同時指揮建造醫院的工程。此時，在安巴希沃拉卡和馬拉

納，大人小孩都如同家畜一般擠在一間簡陋的屋子裡。髒亂加上不衛生，引起皮膚發炎和潰爛。

1903年1月，建院工程開始，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工人參與，使工程能快速進行。新醫院分兩大區，可容納一百四十名病人，男女分開，整齊清潔，有完善的衛生設備，尤其有清潔的水可以使用，這是貝澤神父接了一公里的水管引來的。

有一天，當他在自己房間裡工作時，聽見有人在叫他。於是，他由窗口探頭出去，看看是誰在叫他。是一名婦女，貝澤神父覺得她很面熟，但是想不起她是誰。

「妳是誰？」

「出來，我有話對你說。」

貝澤神父走出來，看見兩男一女，都是癲瘋病人，每人拿著一個小包，疲累不堪，他們似乎是由遠方來的。

「你們從哪裡來？假如你們要住在這裡，你們必須要有醫生的證明。」

「你似乎不認識我們。」

「我真的不認識你們。」

「想想安巴希沃拉卡，你就會想起我們的。」

他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翻過陡峭的山，走了三百九十五公里才到達這裡。

「自從我們搬進政府的醫院後有三十人死去；我們現在有五十人，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路，但是，大家不惜任何代價都想要來這裡。」

他們是第一批，三個月後有更多的人陸續來到。「我們每天為路途中的人誦唸玫瑰經，耐心等待他們的到達。你無法想像他們到達時的狀況：全身紅腫，血跡斑斑，骯髒不堪，衣衫襤褸，

極度疲乏，倒在地上動彈不得。每次一些人到達時，這裡的人都驚訝的看到我們以何等的兄弟之愛彼此問候。最後一批已在昨晚到達。」

重重困難與最後成功

新醫院的興建是一種全面改革的標記，因而引起一些具有影響力人士的不滿。主教原已批准，但是，因著某些人的抗議他又改變了主意，1904年6月，在牧靈訪問中，當他看見這兩大棟新建築時，他便收回已批准的許可。貝澤神父無法說服他；但是一位醫生神父設法以他自己的觀點來說服主教。

於是又有謠言傳出說：殖民地的法國政府首長計畫將這所癲瘋病院收歸國有，並且已準備電請中央政府批准。主教再度游移不定，想要阻止工程的進行，但是最後卻因貝澤神父的懇求而讓步了。

1905年，一家英國公司在附近探勘金礦，並開始雇用數以千計的工人進行大規模的開採，貝澤神父因而失去所有的工人。

當他幾乎無法承擔這種困難時，又有了一個新的打擊，即是這個傳教區一分為二，一部分屬於土魯斯省管轄，另一部分屬於香檳省管轄。新省區的院長調走建造癲瘋病院的工人及修士，將他們用於建立新省區所需的工作上。貝澤神父向總會長求助，要回了他的工人。

貝澤神父經常聽到警告他的謠言說：政府要沒收這棟建築，但他卻毫不畏懼。

「我的老闆是童貞瑪利亞；計畫出於政府，完成卻在於她。」

1911年，聖母升天節，他堅定不移的信德戰勝了困難，使一所嶄新的癲瘋病院正式落成啟用。第二天，病人離開骯髒的茅

屋，搬進一公里外位於安巴托沃利（Ambatowory）的新居。

他們從未見過有屋頂、有地板、有窗戶的房子，屋內裝有使用自來水的面盆，床邊有小桌子，床上有墊子及床單，一張聖母像掛在床頭上方，下面有病人的號碼；飯廳裡有餐桌與長凳。這裡的一切都由修女管理。這正是貝澤神父當初所夢想的。

在這裡發生一些趣聞。當他們第一次到餐廳進餐時，有人蹲在長凳上，背對著桌子，端著盤子吃飯。有人打開水龍頭，由於水壓的關係而使得水花四濺，他驚慌失措的飛奔出來求救，而不知道關緊水龍頭。

不僅物質生活上有改善，現在貝澤神父也可以制訂嚴格的時間表及生活規章要他們遵守，他知道缺乏衛生會對人造成和疾病同樣的傷害。他也非常重視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基督徒對他們的愛德榜樣的感召，許多病人已經要求領洗。現在正是建立一個模範團體的時刻。

他還有十三個月的時間可活。1912年3月是他工作的高峰時期；7月，他經常有發燒情況，因而使他的身體非常衰弱；9月30日，病情轉惡，他於10月2日早晨五時十五分走完人生的旅程。

2. 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 湯瑪士·埃斯特本

(Tomás Esteban, 1879-1934)

被捕

事情發生在 1931 年 12 月 17 日，當時蕪源已落入共產黨手中，埃斯特本神父在這之前已經離開了兩個月。當他回來時，他發現自己的房子被革命軍霸占。他們曾經到過附近的村莊去，回來時，卻增加為兩千人。他們在夜間行走，於天亮前搶奪鎮上居民的財物。

神父已經聽到這消息，為預防不測之事的發生，那天一大早他便做完彌撒，並將聖體櫃中的聖體領完。在聽見第一聲槍聲時，他那位住在附近的忠心僕人勞美便來警告他，並勸他逃走。勞美沒有從大門進來，而是跳牆進來的。不久，就聽見敲門的聲音。

神父親自去開門。來者是三名荷槍的男子。他們走進屋內，到處搜查，找不到吸引他們的東西，於是，他們便走進養牲口的茅棚內，牽走了兩頭驢子。之後，又來了十八個人，他們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向神父要錢，埃斯特本給了他們二十元，他們就離去了。另一組人和一名軍官中午來到，要求神父給他們一萬元。

「我沒有這麼多錢。」

「把他捆起來。」軍官命令。

他全身被搜，並且脖子被套上繩索帶走。勞美想要跟著大家走，但是他們不許。他後來設法打聽神父的下落，卻沒有成功。

他問他們要多少錢，他們卻回答說不要錢而要公道。

19日，蕪湖的報紙首次登載蕪源陷入共產黨手中的消息，蕪湖是當時福傳工作的總部。當地的政府機關被燒，城鎮遭到搶劫；許多民眾被殺，不少人被俘擄，天主教傳教士施神父也在其中（這是埃斯特本神父的中文名字）。

聖誕節後，神父的福傳員傳來進一步的消息：在17日，共產黨棄城而去，神父很平安，他們說：「他很勇敢。」神父與兩位當地政府的官員及一名士兵，日夜不停的走了五天後，被關在一個鄉村裡。

共產黨控制了方圓一百八十公里的地方，並設了許多檢查站，進出都不容易。

他的贖金

俘擄埃斯特本神父的人不久就提出他們要求的贖金金額。事實上，當他們在12月22日到達時，他就被迫寫信告訴蕪湖的福傳總部，要求付十萬元的贖金，盡快付款，神父便能早日獲釋。

2月15日，他被迫再寫信澄清他們不是向天主教會要錢，而是向南京國民政府要錢。5月31日，他得知贖金已降為一萬元，假如由教會付款，那麼五千或甚至兩、三千元他們也心滿意足了。他們很快又改變主意了，因為他們要他再寫一封信說明：「前兩封信中有些誤會，今天，我明確的、並正式同意代表會議的決定，即是，我的贖金為一萬元，你們可以一次付清，也可分批交付，當金額收齊後，我便可以回到蕪源。」

埃斯特本神父被擄期間被迫所寫的信與他發自內心所寫的信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語氣冷酷，似乎是某人的口述，而後者則流露出殉道的渴望。「我非常高興留在監獄裡，為基督受苦而死」

(1932年1月7日)。「在天主手中如同孩子在母親懷中一樣，我感到心滿意足。假如我被釋放，很好，我將終生為基督工作；假如我喪失性命，我便會獲得我熱切渴望的，並祈求天主以殉道者的棕櫚枝完成我的使徒工作」(1932年3月3日)。「渴望為主殉道是從我進入耶穌會以來每天所祈求的恩典」(1933年4月4日)。「我已經準備好，並極高興為祂受苦至死」(1933年7月6日)。

神父們相信，想要獲得結果的唯一方法便是直接與共產黨聯絡，並交涉釋放人質的事。但是，何處能找到一個敢面對重重危險的人呢？他們想到了勞美，這位勇敢的人也願意接受這項任務。1932年1月25日，他帶著幾封給埃斯特本神父的信及一份給看管他的軍官的請求書前往目的地。由於他除了蕪湖的神父給他的信件外，沒有其他的正式公文，使紅軍及國民政府軍都懷疑他是間諜，因此他只好回來。

勞美與聾子

當前兩次的嘗試失敗後，勞美和蕪源教堂的看門人於7月7日帶著兩百元、衣服、藥品及日課經本前往埃斯特本神父被關之處。這次探險性的行動很有收穫，共產黨同意以兩千元的贖金釋放俘虜。一位年長耳聾的吳姓基督徒有親戚與紅軍有商業往來，也曾經探訪過埃斯特本神父，他答應將贖金交給紅軍，並把神父帶回來。

1933年1月底，贖金藏在幾個籃子底部送到蕪源。2月1日，埃斯特本神父的代理埃古札伯(Eguizábal)神父拆開一件棉襖，把贖金塞入棉花裡，再將棉襖縫好，然後要勞美穿上。2月2日，勞美和聾子出發前往神父被關的村子去。

由於他們穿得很破爛，沒有人會懷疑他們身上帶了大筆金錢。2月5日他們到達小村子一公里外的地方，靠近路邊有一棟由衛兵把守的八個房間的屋子，埃斯特本神父便關在這裡。衛兵認識這位聾子，一名衛兵護送他們兩人到神父的房間。

「神父！」勞美叫他。

當埃斯特本聽到這熟悉的稱呼時，還以為自己在作夢。原本靠在牆邊的他坐了起來，他等了一會兒才認出穿得像乞丐一樣的勞美來。

勞美想要立刻把錢拿出來交給神父，但是神父制止了他，要他們到村子裡去把這筆贖金直接交給那裡的領導較為妥當。

勞美和聾子被帶到領導面前，他拆開自己的棉襖，然後將一大疊銀票交給對方。領導盯著這些錢，點算後，搓了搓手，表示很滿意，卻沒有提到釋放神父的事。勞美鼓起勇氣詢問有關神父的通行證的事。

「我們會談這件事的。」領導很不耐煩的回答。

他們的確談過了。他們怎能以為兩千元便能贖回一名歐洲人呢？領導發給他們兩人通行證，但是每用一次，就得付兩千元。

聾子的堅持

3月27日，聾子再度前往。這次，他為神父帶來了聖體。除了一罐牛奶、一瓶自製的果醬和一包信件外，埃古札伯神父將聖體放在聖體盒內，用一塊綢子包好，縫在棉襖裡面，一如他前次把兩千元縫在勞美衣服內一樣。當聾子到達時，他將食物及信件交給神父，由於屋內有別人在，他便未提聖體的事，他等了三天，當他看見神父獨自一人時，便對神父說：

「神父，聖體。」

他拆開棉襖，將聖體盒遞給神父。這是 1933 年 4 月 5 日，這天，埃斯特本在寫給蕪湖神父的字條上告訴他們，他領了聖體。

這位勇敢的聾子在蕪湖與囚禁埃斯特本的村子之間來回過四次。有一次，共產黨叫他去，他立刻起程前往目的地，他們當他的面要神父寫封信給蕪湖的神父，要求把贖金提高為三千元，然後就釋放他。埃斯特本當下便拒絕這項要求。

1933 年 9 月 11 日，聾子又來到他與神父會面的地方，但是卻沒有看見他；聾子被帶到三公里外的一所醫院去，因為他沒有帶贖金，所以不准見神父。

11 月底，他又來了，站在他曾兩次見到神父的屋子外面，神父不在那裡。一名階級較低的軍官罵他為何沒帶贖金，空手來到。五天後，他回來，見到領導，交給他兩千元，因著聾子靈活的手段，領導發給他通行證，一名衛兵帶他到距離村子十二公里的地方去見埃斯特本神父。

那是 1933 年 12 月 1 日，埃斯特本神父還活著，他告訴聾子不要再來了，並且轉告蕪湖的神父們不要為他擔心。

「神父，請寫幾句話吧！蕪湖的神父非常悲傷，以為您已經死了，因為，前一次我沒有帶您的信回去。」

他同意了，但是獄警卻拒絕提供紙和筆。聾子再三要求，他們仍堅持不給。他唯一得到的是他們責怪天主教傳教區的一封信，「施傳教士並不認為我們所訂的贖金過高，而你們似乎忘記他對你們的愛。」

聾子毫不氣餒，繼續盡力營救神父。1934 年 1 月的某一天，他再次前往，設法帶回神父。他應該在 2 月 14 日回家過中國新年，但是卻音訊全無。

俘擄

在埃斯特本神父被監禁期間，他的遭遇如何呢？他在信中所言不多，而且極為謹慎，但是，他的簡短敘述也讓我們對他的情況略知一二。

「他們告訴我，我被罰是因為他們要迫害我們神聖的宗教。雖然這裡的食物極少，但是，我的身體很好，面對這種飯食，我置之一笑，毫不介意。他們擺上什麼，我就吃什麼，由於距離太遠，所以我不要你們送東西給我。我會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被囚禁的痛苦」（1932年3月3日）。

「我把牛奶給了紅軍，為要證明我以愛回報他們對我的恨。他們不懂愛仇的道理。有一次，我向羣眾說話，告訴他們，假如他們恨我，我還是愛他們。他們中有人對這道理嗤之以鼻。我曾有三次面對羣眾，就像耶穌在比拉多面前一樣」（1933年4月4日）。

「5月最後一天，我被拉出去三次，面對一大羣暴民。他們要求我站在台上，我很樂意地站上去，向他們講解我們愛主愛人的道理。第二天，6月1日，從下午一時到六時，我遭到更多的折磨；他們拍了一張我的像並恐嚇要殺掉我。起先，我以為他們當真，而我卻很鎮靜，內心很喜悅。他們究竟要何時動手呢？」（1933年7月6日）

有一名同樣被關的囚犯，是蕪源的一名藥劑師，提供了一些消息。他與神父同住一間囚室，直到神父因病重體弱被送入醫院為止。神父的病情日益加重，咳嗽，痰多且濃，全身長滿膿包。當這名藥劑師得知神父已經長時間不言不語時，他相信神父已經死了。蕪源的教友也聽到同樣的消息，並且獲得其他被囚者的證

實：埃斯特本神父已於 1934 年 1 月去世。

從修士到傳教士

埃斯特本神父出生於西班牙納瓦拉的塞斯馬（Sesma），念了三年普通學校之後，便進入在潘普洛納（Pamplona）的修院。一位他的同窗說：「他是一百位修士中最強壯的人。假如他看見一根釘子伸出來，他會用手指把它壓進去。」但是，他不會打死一隻蒼蠅。

他於 1904 年 9 月 23 日晉鐸，然後被派擔任曼德哥利亞（Mendigorría）地方的堂區助理。他全心全力幫助窮人，在聽告解時溫和的勸勉辦告解者，不善於講道，但卻內容實際，易於實行，他使自己的言行像一名耶穌會士。因此，四年後，在 1909 年 4 月 5 日，當他在羅耀拉進入耶穌會時無人感到驚訝。

一如過去的例子，像他這種情形只須經過很短的訓練時期即可，1913 年，他所屬的卡斯蒂利亞會省新開了蕪湖傳教區，並要派遣首批六位傳教士前往中國，埃斯特本立刻申請加入，在他完成耶穌會士第三年培育後，於 1917 年 8 月 24 日從巴塞隆納出發。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蘇伊士運河關閉，因此，他必須經過大西洋、美國、太平洋，最後於 10 月 31 日在上海上岸。

首先，他被派往傳教區最偏遠的地區——蔭縣服務，他的同伴都是法國神父。他在那裡服務了四年（1918-1922）。蕪湖的主教，阿蘭布魯（Zonón Arámburu）蒙席，也是他的院長及傳記作者，知道他在學習中文上的困難，尤其是說與發音上更是備感無力。但是，他愛中國人，並且與他們相處極為融洽。

1922 年 8 月底，由於安徽代牧區劃分為三個獨立的傳教區，他第一次的福傳經驗也因此告一段落。蚌埠代牧區屬於杜林省耶

穌會士；安慶代牧區屬於西班牙萊昂（León）會省；蕪湖劃歸卡斯蒂利亞會省負責，而蔭縣隸屬安慶代牧區，於是他便由蔭縣調到蕪湖傳教區，並被派往蕪源從事福傳工作。

蕪源位於安徽省南部，地廣山多，往來其間只能靠徒步或騎驢子。阿蘭布魯蒙席曾有一次來到此地，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下危險的山路，埃斯特本的福傳員陪伴他，向他說：

「我曾經和埃斯特本神父一起在下雪的夜晚十點鐘，帶著東西走在這條路上。」

當地的方言和神父們所學的國語完全不同，這又是一種新的困難。這裡的基督徒團體比蔭縣的小，有四百七十四名信徒，四百一十一名慕道者，共分散在七個村莊。其中有一個唐門村，在那裡的信徒團體早在 1773 年耶穌會被解散前就已成立了。

因為受到蕪源地理環境的限制，來到這裡的傳教士必須具有高度的機動性，一方面要與蕪湖福傳中心聯絡，一方面要探訪散居在各村的信友，單單後者就使他一年內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他經常騎驢子或步行。除此之外，他還要負責天主堂、慕道班、學校的工作和培養信徒的禮儀生活。

一直到 1931 年 12 月 17 日早晨，共產黨把他抓走，他才放下手邊的工作。

3. 春秋之士： 若金·維拉隆加 (Joaquim Vilallonga, 1868-1963)

巨人

他是印度阿美達巴 (Ahmedabad) 傳教區的開創人，從 1934 年到 1948 年，他一人身兼當地教會首長及耶穌會院長，甚至從外表來看，他也是一位巨人，誠如他的訃文撰寫者在古茶拉特 (Gujarat) 會省通訊上所寫的：「高大的身材，寬闊的肩膀，在同儕中，他是最高的。」另外有人說：「在那時代，年輕修士遇見他，常會使他們印象深刻。」

我們這些從未見過他的人，多年以來從不斷聽到的那些耳熟能詳的有趣軼事中也得到這種印象。將所有片段拼在一起，一位偉大的人物便浮現在眼前；他或者以優越的姿態壓制對方，或者以詭詐的手段規避對方。外人景仰他、尊敬他，而自己人卻對他畏懼三分。他對人和對事有精確的判斷力，善於運用靈巧的外交手腕，知道如何展露文雅溫和的一面，以及殘酷無情的一面。他真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

學者

他生於西班牙的卡斯特利翁 (Castellón) 省的布里安娜 (Burrina)，十七歲進入耶穌會初學院。當初學導師問他為何要成為一名耶穌會士時，他毫不猶疑的回答說：「要到傳教區去。」因此，當他完成哲學訓練後就被派到亞拉岡 (Aragón) 省所管轄的

最大傳教地區——菲律賓去，這是他在福傳工作上的「初戀」，也可能是他生命中服務時間最長的地方。他在那裡完成六年的牧靈實習（1892-1898），當時，為在海外做牧靈實習的耶穌會士而言，這是極為正常的事。他在馬尼拉極富盛名的雅典耀（Ateneo）大學教授數學、物理和哲學。雖然他還不是一名司鐸，但是他已經擔任聖母軍的輔導，也是教理講授志工的指導者。

他在西班牙的托多薩（Tortosa）神學院念完第一階段的三年神學後，於1901年7月28日晉鐸，之後，被派往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士完成全部神學訓練，並加強自己的英文，同時「學習美國方式，以利於日後在菲律賓的新工作」（J. Valiamangalam）。美國艦隊剛由西班牙人手中奪取這些島嶼，英文是當地必須採用的語言，因此，這些西班牙傳教士要面對學習新語言的需要，並且要「美國化」。年輕的維拉隆加神父接受這項挑戰；這是他對他所愛的菲律賓人民的區區回饋罷了。

他在聖路易士的表現超凡出眾，雖然身為外國人，卻獲選參加一項有兩百人參加的神學與士林哲學論文公開發表會。他有一年的時間準備，論文發表會於1903年4月29日在羅斯福總統面前舉行（當時正值聖路易士博覽會），其他貴賓包括吉本斯（James Gibbons）樞機主教、幾位教會高層人士、神學院及各大學宗教系的指導與教授。這種非凡的成就使他聲名大噪，也是他的傳記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完成修會第三年培育後，他回到菲律賓，並在馬尼拉的聖薩威（San Javier）大學擔任行政、財務及哲學教授，共三年（1904-1907）。1907年調往雅典耀大學，擔任哲學及數學教授。1910年他升任校長，從此他便開始長期擔任政府職務，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的前半期。

身為校長的他也是一名使徒。他對學生、政府高官、企業人士都有極大的影響力，他的成就之一便是使當時的總統馬諾爾·奎松（Manuel Quezon）按教會規定完成婚禮。維拉隆加獲得與總統晤談的機會，他與一位堂區神父一同前往。首先，他與總統和第一夫人闢室密談，以真情和動人言語打動他們，他們同意辦告解並領受婚配聖事的祝福。然後他請堂區神父進來，為總統及夫人的婚配聖事作見證，終止了一樁公開的惡表。

早在那段時期他就已對庫利昂（Culion）地區的癡瘋病人表示高度的關心。政府將四千名癡瘋病患者關在這島上，並稱這裡為死亡之島。身為馬尼拉名校的校長常常帶著甜食與菸草、同情與歡笑去探望他們。這份友誼維持了一生。

上司

在他步步高升的過程中擔任過民答那峨（Mindanao）傳教區的院長（1916-1919），維干（Vigan）大學校長（1920），菲律賓全國傳教區的最高上司（1921-1926）。

當他擔任後者職務時令他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將亞拉岡會省引以為傲的、且正在蓬勃發展中的菲律賓傳教區拱手讓給美國耶穌會士（他們原本應該由德國耶穌會士手中接管孟買傳教區，但是卻因為這些美國耶穌會士都具有愛爾蘭姓氏而遭到在印度的英國人拒絕），另外，還要派他手下的西班牙籍會士前往孟買。這痛苦的決定顯示了耶穌會士嚴格的服從精神。1921年11月，七位會士起程前往印度，並在那裡定居。此時，格勞（Grau）神父正在前往菲律賓的途中，他接到命令在印度上岸，他留在那裡，日後成為古茶拉特傳教區一位家喻戶曉的成功傳教士。

維拉隆加在這段關鍵時刻的表現一定獲得各方的滿意，因為

他被任命為亞拉岡會省的省會長，在三年的任期中，他的行政效力為該會省的財務打下穩固而健全的基礎。這並不表示他沒有遭遇困難，在 1932 年當西班牙共和國關閉耶穌會的所有機構時，他的成就也證實了天主照顧；健全的財務幫助他的會省平安度過危機。

教宗的任命

1929 年，他首次接受教宗的任命，成為菲律賓的宗座視察員。視察結果成立宿霧（Cebu）宗座代牧區及六個新教區。他也將民答那峨傳教區劃分為二，並將它們委託許多美國會省管理。他找時間探訪在庫利昂島上的癲瘋病友。麥克阿瑟將軍把自己的水上飛機借給他用。這位宗座視察員向他的癲瘋病友保證，當他卸下重任後即刻回到這裡來。

1930 年，耶穌會總會長任命他為孟買與普恩（Pune）兩地區的福傳視察員。1931 年，他返回羅馬向總會長報告他的工作。總會長採納他的建議使普恩成為獨立的傳教區，委託瑞士和德國的神父管理。曾有傳言說，樞機主教曾向他行賄，但是遭到他的拒絕。

也有人說，他不斷請求總會長蘭多科斯基准許他退休，並到庫利昂島上去擔任癲瘋病人的專任神父，這位波蘭籍的總會長禁止他再提這件事。他答應在他與總會長的有生之年尊重這項禁令，絕不再提。他毫不懷疑誰會贏得最後勝利。

然而，他卻被調回孟買擔任傳教區的院長，並於 1931 年 6 月中旬上任，當他的三年任期在 1934 年 7 月 19 日期滿時，又接獲教宗的新任命，要他擔任有名無實的阿美達巴教區的教會代表。在此同時，他又是該傳教區的院長，在他那雙結實的手中握有三

項重要職務。

他是教區的首腦人物，是一位沒有頭銜的主教。他不需要主教的高帽子、權杖、權戒、十字架或紅色服裝，他有的是有效的行政權；他的外表、他的準確性、他的眼神能使輕率浮躁的人立刻安靜下來，短短幾句話勝過長篇大論。

雙重院長

具有雙重身分的院長也有雙重的權力，並掌控當時的局面。他交了許多朋友，尤其是那些能提供服務的人，但是他並不排除窮人，因此，他贏得了人心，既使他不曾說當地的語言。天主教徒的人數有一萬二千人，整個地區有十二位司鐸，因而有極大的成長與發展空間。孟買的總主教公署有義務提供教區所需的經費，但是這位教會代表認為阿美達巴也有相同的需要。

事實證明維拉隆加是一名募款高手。他不僅向全世界發出請求捐款的信函，也走遍各地，接受捐款，發揮個人的魅力，利用他在世界各地所結交的友人，募集福傳經費。

但是有些人卻帶著幾分不悅的口氣說——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他有兩個抽屜，一個標明為「教會代表」的放有來自各方的捐款，一個標明「耶穌會院長」的則支付所有的花費。

他十四年漫長的任期（1934-1948）以一個驚人之舉劃下句點：他將這傳教區升格為教區，並把它交給一位與他志趣相投的印度人，而他自己便宣告退休，前往他夢寐以求的庫利昂島上去。

他已經決定在 1948 年最後一次旅行歸來後卸下一切職務。但是他仍須擔任兩項職務：1948 年 12 月 21 日，他將耶穌會院長一職交給他的繼任者，自己仍保有教會代表的職務；1949 年 5 月 5 日他接獲新的任命，擔任阿美達巴教區的首任主教。

現在他可以自由了。他帶了兩位可信任的耶穌會士和一位好友（印度拜火教的皈依者），計劃搭機飛往孟買與馬尼拉。會院中沒有人知道他要離開，直到 1949 年 6 月某一天的晚飯之前，他按照當時修會的規定，凡是要離開一個會院前往其他地方者必須在晚餐前跪在眾人面前，親吻地板，坦承自己在這段期間所犯的過錯及所立的壞榜樣。當飛機降落在孟買時，他返回菲律賓的消息才傳出去。

初戀之地亦是安息之所

高齡八十的他仍精力充沛，回到庫利昂島上，立刻以他的微笑和親和力點燃癡瘋病人的生命。

每一個他服務過的機構都對他滿懷感激。耶穌會的兄弟慶祝他生命中每一個重要的日子，如：1951 年晉鐸金慶，1955 年發願金慶，同一年，慶祝進耶穌會七十年以及 1960 年慶祝他七十五歲生日。

菲律賓、西班牙政府和教廷都頒給他獎章。1959 年 2 月，他是馬尼拉雅典耀大學百年慶祝餐會的貴賓。同一年 8 月 31 日，因他在庫利昂島的服務而獲得麥克塞塞（Magsaysay）公共服務獎。1960 年 12 月 20 日，他回到馬尼拉接受由教廷駐菲律賓大使頒贈的獎牌。

他最後獲得的一項榮譽來自他的祖國西班牙，感謝他「多年來為菲律賓及西班牙的教會傑出的服務」。頒獎典禮於 1962 年 9 月 7 日在雅典耀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由西班牙大使阿爾拔（Jaime de Alba）頒贈。

五個月內不斷有來自各方的獎牌。1962 年 10 月底，他在一次意外中摔傷了右腿及右臀部，使他在行走和站立時疼痛不已。

他被送到馬尼拉的一家診所治療，並且情況好轉，但是卻因腸子阻塞及脆弱的心臟使得他的病情極不樂觀，因而領受了病人傅油聖事。他的病情經過多次的反覆後，終於在 1963 年 2 月 1 日與世長辭。

參加他的殯葬禮的來賓包括菲律賓政府代表、西班牙大使館官員、在政府服務的傑出雅典耀大學校友、教授、商人及其他民間各界人士。

4. 在馬拉巴爾 (Malabar) 的稻田裡： 伯鐸·卡洛尼 (Pietro Caironi, 1904-1966)

打架的人

「我來了，我來了，讓開！」

一位走在喀拉拉 (Kerala) 北部稻田區凱魯庫奴 (Cherukunnu) 的婆羅門僧侶口中這樣唸著，同時手中搖著小鈴告訴旁邊的人他來了。這是一種宗教儀式，警告那些印度社會中最低階層的賤民讓開，不要擋住他的路，並且不要以他們的身影玷污他。今天，這名驕傲的婆羅門僧侶卻遇到了伯鐸·卡洛尼神父，他由兩名被稱為賤民的普拉亞 (Pulayas) 族人所陪伴，他已準備要打擊這名僧侶的傲氣。

「我們不怕你，你或者讓路，否則我們便強行通過。」

婆羅門僧侶沒有讓路，卡洛尼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後向前走，後面跟著他的兩位同伴。他的對手爬起來，滿口惡言的走開了。

二十年後，兩人又在同一地點相遇了。由於時代的改變，這名婆羅門僧侶也得到教訓，他不再要求所有的人讓路了。

印度教的另一種教規便是賤民不可與其他階層的人共用杯盤，因為他們會玷污這些器皿。有一天，卡洛尼與他的福傳員多默及一名新信徒在處處可見的路邊茶館點了三杯茶。由於他的兩名同伴都是普拉亞人，因此，店主只為他端上茶而拒絕給另外兩人端茶。卡洛尼從店主手中接過茶杯用力摔在地上。

「混蛋！你不給我的基督徒兄弟端茶嗎？他們不是比你還好的天主兒女嗎？你如果不端茶給他們，我們就拒絕喝你的茶。我所有的信徒都會來教訓你。如果有必要，我們會砸爛你的店。」

店主鞠躬道歉，不敢開口，以顫抖的手為卡洛尼及他的兩位同伴奉茶。

第三個習俗是禁止賤民從公共水井中汲水。卡洛尼也反對這種歧視行為，他把他們領到水井旁，讓這些害怕的普拉亞族慕道者在他面前從公共水井汲水。一名印度貴族走過來，威脅他們，如果他們膽敢汲水，便要打他們。卡洛尼一把抓住他的喉嚨，給他兩耳光。這人立刻去報警。副檢察長當著卡洛尼的面問這名印度貴族說：

「神父有對你怎樣嗎？他打了你嗎？」

這人不敢在警察面前控告神父，只是喃喃的說：

「不，不，他沒有。」

身強體健的人

卡洛尼的勇敢加上驚人的體力使他成為一個身強體健的人。

有一次，一羣他的敵人策劃要綁架他。他們知道他的行蹤，於是就等在晚上他要經過的地方準備抓住他。當他走近他們躲藏的地方時，他們衝上去，抓住他，把他綁在一棵樹上想要打死他。他們舉起手，準備向他打去時，突然好似癱瘓了一般，停止不動。

「你們等什麼？為何不動手？假如你們不動手，我就要動手了。」

他一用力，繩子就鬆開了。綁架他的人紛紛逃跑，不知去向。

另有一次，一名奈爾（Nair）族的人想要報復卡洛尼，他雇

用了三名刺客埋伏在他經過的地方。他們把他包圍起來，抓住他。具有三、四個馬來人力氣的他，掙脫後，就用拳頭猛擊他們。他們也快速的逃跑了。

通常穆斯林比印度教徒強壯，因為他們吃肉。有一名穆斯林與卡洛尼有仇，他以為可憑自己的力量除掉他。他知道這位傳教士會走過鐵路橋梁回到帕里卡拉（Pallikara），於是他便站在橋中央等候卡洛尼，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把神父丟到河裡去。卡洛尼看見他，並且猜到他的意圖，於是就先發制人。他一言不發，抓住他的肩膀，在鐵軌上拖著他向前走。卡洛尼沒有將他丟到河裡，因為那太過分了。於是，他放了他，這名穆斯林驚恐萬分的跑走了。

有一天晚上，在馬大夷（Madayi）村裡，一名穆斯林悄悄的溜進一名普拉亞族婦人的茅草屋內想要強暴她。他沒有注意有一名特地來保護這些普拉亞婦女的福傳員也在屋內。他用卡洛尼的方法痛打這名圖謀不軌的穆斯林。由於馬大夷是穆斯林的中心，因此所有人都跑來保護他，並且大聲吼叫：「伊斯蘭陷入危險！伊斯蘭陷入危險！」

聽到吼叫聲後，卡洛尼衝到現場。他站在茅屋的門口，如同一頭咆哮的獅子一般，要保護自己的幼獅。

「滾開，不許進來。滾開，否則我就把你們的眼珠挖出來，打爛你們的臉。」

前排的人開始向後退，羣眾開始散去。

男士

雖然卡洛尼身體強壯，但是卻身材矮小，一頭蓬亂的頭髮，動作極為粗魯。由於他每天必須走過沼澤之地，涉水通過溝渠及

河道，因此，他常常穿著短褲赤著雙腳。所有的人都怕他，無論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他對普拉亞族人的認同可由他學習他們的髒話甚至能靈活運用這事上看出端倪。別人的謹慎榜樣不會改變他熱情又衝動的個性。對他而言，盡可能快快拯救普拉亞族人的靈魂才是當務之急。為達到目的，他不惜採用任何方式，甚至為要改正他所愛的新教友的缺點，他會痛打他們。難道他不是他們的父親嗎？

他是一個沒有良好生活習慣，並且雜亂無章的人。他沒有手錶；由於他住在火車站附近，當時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火車又很準時，因此，他以火車到達時間當作作息時間。當他睡在其他地方時，他會晚上隨時起來做彌撒，無論是清晨二時或五時，他的三餐也是如此。他沒有廚師，一盤他喜愛的肉配上一杯茶就能騙過他的胃，讓他讚不絕口地說：「真好吃！」

他的生活管理也是毫無章法不依循慣例的。他把錢放在書本裡和筆記簿裡，也隨意丟在他的房間裡。他從不記帳，也不報帳，但是他有驚人的記憶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以及欠別人多少錢。在必要的花費及幫助別人上，他極為慷慨，但是在多餘的花費上，他卻非常節儉。

傳教士

伯鐸·卡洛尼的福傳工作由泰里帕蘭巴（Taliparamba）堂區開始，這裡的信友滿心渴望深度的信仰，而當地的穆斯林卻毫無皈依天主教的跡象。他從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排斥的普拉亞族人中感化了許多人，使他們成為基督信徒。他搬到靠近凱魯庫奴的達里（Dalil）村莊去，開始到他們的小茅屋或他們工作的稻田裡去探訪他們；傍晚時分，把他們聚集起來，以主耶穌的方式教導

他們。他吃他們所提供的少量食物，晚上或睡在茅屋內，或睡在商店門外，或樹下。他從一處到一處，大多數時間是徒步，若可能便乘船，有時在凱魯庫奴和帕亞努爾（Payyanur）之間也搭火車。火車駕駛員都認識他，常常在兩站之間停車，讓他搭便車。

由於他的芳表，他對鄰人的愛，他簡明而有意義的話語，他發起了一種個人皈依運動，然後漸漸發展成集體皈依運動。一位活力充沛的傳教士，永不休止的宣講真道以及基督信仰的理想。但是，他並不以宗教宣講為滿足。

除了要將他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外，他也要從不同形式的經濟和社會奴隸制度中解救他們。最普遍的例子便是雇主強暴女性員工或強暴男性員工的妻子。曾有一名穆斯林很自豪的對卡洛尼說，他已經使普拉亞族的婦女為教會生了許多孩子。

他全力對抗這些不公義的事，也為這些弱勢者走上法庭。他唾棄那些膽敢碰觸、污衊、傷害任何普拉亞信徒的行為。他會在法庭上為賤民和信徒辯護。他輕輕鬆鬆就勝訴，因為對方的指控常常是捏造的。法官非常了解他，並且與他合作，聯手將這些窮苦人由雇主的枷鎖下釋放出來。

還有一種經濟上的奴隸制度，便是那些放高利貸的人每月索取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利息，要想跳出這陷阱，為這些窮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防止他們借錢的第一步便是改善他們的財務狀況，他們必須找到待遇優渥的工作，或某種謀生方式。卡洛尼把他自己購買的一塊土地給他們使用，日後，他們便可以擁有這塊土地，成為地主。這是一種革命性的作法，先前那些兇惡的雇主便不能再將女性員工留下過夜，也不能心懷不軌地進到她們的房間並恐嚇她們的丈夫。

另一種極有效的方式便是教育兒童。他到處建立學校，提供教育場所。有鑑於醫療上的需要，他也建立診所和醫院，為了上述的需要，他由故鄉義大利請來了修女協助這些工作。他寫了幾百封信給他在美國和義大利的朋友、恩人，請求捐助這些工作的費用。他一個人所募得的金額就超過全傳教區募到的金額。

小伯鐸，未來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小輔祭

伯鐸·卡洛尼來自貝加莫（Bergamo Alta），這裡是經由北歐而來的亞洲人民的大熔爐，他們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模式，甚至一種與義大利語不同的特有方言。貝加莫人粗魯又健壯，但是卻足智多謀和善於經商。我們故事的英雄便具有這種特質，但是也與他的同胞一樣具有相同的弱點。

在他的同胞中有一位未來的教宗，他的名字是朗卡里（Don Angelo Roncalli），曾有一段時期，伯鐸每天為他輔彌撒。有一天，他沒有來，朗卡里詢問別人後得知他生病了，這位未來的教宗便去探望他。

「啊，小伯鐸，你好嗎？別擔心，我要降福你，你就會好的。病好了後再來為我輔彌撒。」

伯鐸在自己的故鄉念小學，十二歲時念一所職業學校，十七歲進入耶穌會，他受到聖方濟·薩威榜樣的吸引，在 1926 年 10 月 18 日，當他二十二歲時領受了福傳十字架，然後就前往芒加洛（Mangalore）傳教，該地區在 1878 年由教宗良十三世委託耶穌會威尼托（Veneto）—米蘭省管理。

伯鐸遵照修會規定，接受派往印度的年輕耶穌會士所應接受的種種訓練，他在兩所坐落在高原的修院接受哲學與神學的訓練，由於地處高原，因而不會受到來自平原的熱浪的侵襲。沈貝

加努（Shembaganur）哲學院在印度南部，是一座長滿高大尤加利樹的城鎮，而喀謝翁（Kurseong）神學院則在印度北部，位於喜馬拉雅山腳下。

加里吉（Calicut）教區是芒加洛傳教區的一部分，凡是希望向非基督徒傳播信仰的人通常都派來這裡。這就是伯鐸·卡洛尼終生嚮往的。

哀傷時刻

他嘗到成功，也嘗到痛苦。他面臨無形的敵人，他也逃脫所有敵人的控制。人人必須合乎他的要求，卻無人能忍受他的方式。主教、院長、傳教士、修女、政府官員，人人都必須遵行他的計畫和理想。當權威人士拒絕遵守他的規定而產生了危機，使他深受打擊，因而責怪他的上司缺乏福傳熱火，「做學問的人是傳教生活與傳教問題的白癡」。他向羅馬傳信部提出控告，他指出耶穌會威尼托—米蘭省放棄加里吉教區的福傳工作；許多年輕耶穌會士想來傳教區卻被擋在義大利；他的當地院長及教區主教對福傳工作缺乏興趣，「我相信這是出於對福傳工作的憎惡。看到莊稼已可成熟，而工人卻無動作，我相信天主對這些耶穌會士的懲罰將是很可怕的。我以無比的尊敬之心請求您的祝福。在基督內您謙卑的僕人，耶穌會士伯鐸·卡洛尼敬上。1948年6月21日。」

他得不到任何反應，氣憤的他決定到別處去展現他的福傳熱火。

「你要到哪裡去？發生什麼事呢？你看起來很生氣。」

他的朋友隆巴第尼（Lombardini）神父正巧在加里吉火車站遇見他。卡洛尼提著行李，買了車票，正要前往印度中部的一個

城市安拉帕迪許（Andhra Pradesh），去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福傳行列。他剛剛與主教有一場熱烈的討論。

「他們要像對待傷心死於義大利的貝瑞塔（Beretta）神父一樣對待我。他們要調走普拉亞傳教區所有的神父，也就是要終止我的工作。我留在這樣的教區還有什麼用？」

首先，隆巴第尼神父收下他的票，然後設法鼓勵他，向他說明危機就會過去，誤會總是難免的，最後真理將獲得勝利。然後，他拿著卡洛尼的行李，強迫他陪他去見主教。他成功的平息了卡洛尼與主教之間的爭端。

卡洛尼還有另一次更痛苦、更嚴重的危機。他的朋友亦是他的傳記作者塔發利（Giuseppe Taffarel）說：「在修會內有人暗中計劃陷害他，要把他逐出耶穌會。」這陰謀不是基於對他的誤解，而是對他嚴厲的指控：他太獨立，反抗眾人，不服從上司。

事實上，開除他的信件已經寄往印度。省會長已經收到，但是沒有交給卡洛尼。卡洛尼似乎略有所知，為了不背負遭受驅除的惡名，他寫信給省會長請求離會。

他的另一位朋友蘭德帕蘭比（Paul Lenthaparambil）神父到馬大夷去和他談話後，避免了一場痛苦事件的發生。他覺得卡洛尼所需要的是同情與鼓勵。經過兩小時坦誠的交談後，兩人互相擁抱，卡洛尼答應收回他在1953年5月3日寫給省會長的信，並保證留在修會。

釋放

卡洛尼居無定所的生活、繁重的工作、長期的緊張及不規律的飲食習慣使他的元氣不斷喪失。除了一些重大病痛之外，他還有嚴重的胃病，常常使他疼痛不已；有時，他彎下身體，用力按

住自己的胃部，輕聲呻吟，似乎死神快要來到一樣。他不向任何人提到他的病痛，更不告訴醫生或上司。但是，有一次，那位忠心的福傳員多默發現他臥在自己吐出一灘血泊中。

多默，這位敏銳又實際的福傳員，乍見眼前的景象，驚嚇得目瞪口呆，他立刻通知卡洛尼的院長，並安排送他回義大利就醫。

他們面臨的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昔日猛如獅子的卡洛尼現在如同一隻綿羊，讓他的弟兄照顧他。他在義大利接受一次大手術，甚至要暫時取出他的心臟，並使用人工心臟以保持血液循環；手術經過四小時，醫生割去整個胃、部分肝臟，取出四公斤的膿、腐爛的肉及污穢的血。手術極為成功，連醫生都頗感意外。

經過四十天的休養後他出院了，當醫生告訴他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後，他立刻返回印度。「我幾乎為全普拉亞傳教區的人付了洗，難道我要死在義大利而給他們留下壞榜樣嗎？」他在給義大利省會長的信上，這樣寫道。

1964年秋天他回到印度，在他所開辦的醫院裡，在眾人的愛護下度過生命的餘年。1966年5月26日，當他去世後，神父們想要將他埋葬在醫院的所在地肯納普蘭（Kannapuram），但是年老的福傳員多默說出了卡洛尼希望葬在德里的心願，那裡是他在1937年開始傳福音的地方。

他的墳墓消失在那片稻田中，他的骸骨已化為灰燼與泥土，混合在一起成為大地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稱他是一位「不為人知的傳教士」。圈外的人對他認識不多，然而，他卻是耶穌會傳教士的代表人物，一位在二十世紀以畢生精力拓展教會領域的無名英雄。

5. 在天寒地凍的阿拉斯加傳教： 塞甘鐸·勞倫特 (Segundo Llorente, 1906-1989)

歡迎禮

船順育空 (Yukon) 河而下，終於到達聖十字架 (Holy Cross) 城，這裡是新傳教士的最後目的地。船一靠岸，塞甘鐸·勞倫特便跳上岸。站在岸上的是當地的院長湯京 (Tomkin) 神父，他很驚訝的看見帶著行李的勞倫特。向他打了招呼之後，勞倫特拿出主教的信。湯京神父唸了兩次，然後搖搖頭說：

「真是錯誤一樁。主教不了解育空河下游的狀況。你看，我們這裡有三位神父，而阿庫魯拉克 (Akulurak) 只有兩位，其中一位已瀕臨死亡。主教一定是指阿庫魯拉克。你帶著行李乘原船到阿庫魯拉克去吧！」

「你竟敢違背主教的命令嗎？」勞倫特說。

「年輕人，阿拉斯加是一個與其他地區不同的地方。在這裡，我們看實際狀況的需要而決定事情。只有那些在工作崗位上的人能完全了解真正狀況。我敢確定阿庫魯拉克那邊需要你。」

「可是阿庫魯拉克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你往下游去吧！到馬謝爾 (Marahall) 去，那裡有人會告訴你的。」

勞倫特一頭霧水的回到船上。他想起胡巴爾德 (Hubbard) 神父曾經警告他在旅途中會遭遇到的便是：「你會常常發現自己陷入不知去向的狀況中。」他沒有想到這種狀況竟如此快就出現

了。

到了馬謝爾，他很幸運的看見岸邊停靠一隻小船，似乎正在等他，船主答應免費送他到阿庫魯拉克。他們向下游航行到德爾塔（Delta），然後進入阿庫魯拉克沼澤地，他們在靠近傳教中心的地方上岸。一羣學童在船還未停穩前就上了船。不久，當地院長保祿·歐康諾（Paul O'Connor）神父滿臉驚訝的出現在人羣中。他曾聽說將有一位新司鐸會派來傳教區，但是卻不是來阿庫魯拉克。他高興極了；他終於可以乘著雪橇去探訪這廣大的堂區了。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勞倫特三十九天的旅程到此結束，於 1935 年 9 月在這裡開始了他的福傳生涯。他的旅程首先從西雅圖經過海上到阿拉斯加南部的西沃德（Seaward），再改搭火車穿過綿延無盡的山區，最後乘船沿河而上，航行一千二百公里到達育空河的河口。這裡人煙稀少，眼目所及淨是一片銀白及孤寂的景象。

前往阿拉斯加傳教的聖召

勞倫特的情形是很例外的。按照不同會省派遣傳教士的規定來看，他應該被派往萊昂會省所負責的中國安慶。但是當時教宗碧岳十一世曾稱揚遠在阿拉斯加的傳教士是天主教會中最勇敢的一羣，年輕的勞倫特因而深深的被阿拉斯加所吸引。

那是 1926 年，勞倫特正在沙拉曼卡念人文科學，他告訴省會長自己的意願，省會長說：

「什麼？阿拉斯加在哪裡？你到阿拉斯加能做什麼？我知道那是你的最愛，但是，你現在還是好好念拉丁文和希臘文吧！」

被省會長拒絕後，勞倫特寫信給總會長表達自己的心願。總會長先拒絕了他的請求，但是最後還是讓步並在給他的親筆信上

寫道：「我寫一封信給你的省會長，另一封信給阿拉斯加傳教區所依靠的奧勒岡（Oregon）會省。」

1930年他到美國並完成神學訓練（1931-1935），隨後即前往他心目中的福地。

勞倫特具有傳教士的一切條件。他開放、慷慨、擅長交際，喜歡與人交談，與每一個人作朋友，具有無法比擬的說故事才能，常常使大家聽得如癡如醉；他也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以最正統的西班牙文撰寫數千篇文章，在西班牙及拉丁美洲，他的大作深獲讀者的喜愛，為傳教區募得大筆捐款，同時也將傳教熱火傳遍各地。

這位傳教區的作家也是廣受歡迎的靈修指導者。從來自不同年齡及不同情況的人寫來要求靈修指導的信件就足以證明這點。如雪片般飛來的信件又讓我們看到勞倫特的另一面：內向、有靈修，甚至具有神祕經驗。這便是他異於常人的英勇表現的源泉。

他在阿拉斯加遭到他預料中的種種困難，也一一予以克服。他學會了複雜的愛斯基摩語；他深愛那片土地和那裡的人；他已經習慣那裡的生活、食物、氣味；與外界的隔離不會使他心生畏懼，反而讓他達到良好的目的，也能使他靜心祈禱；他盡量與當地人民打成一片，為自己的羊羣奉獻心力，使自己成為眾人的朋友。這便是他極受歡迎、廣獲愛戴的原因。

傳教士

勞倫特在阿拉斯加度過了四十年（1935-1975），他被派至所有的福傳中心：阿庫魯拉克、科策布（Kotzebue）、本堤（Bethel）、阿拉卡努克（Alakanuk）、諾姆（Nome）、費爾班克斯（Fairbanks）、安克雷奇（Anchorage）……他由最遠、也是環境

最惡劣、靠近白令海的西岸地區開始他的福傳工作。由阿庫魯拉克到最北的地區去，此處已進入北極圈，冬季當地氣溫降到零下六十三度，從 12 月的第一週到 1 月的第二週為永夜，從 6 月第一週到 7 月第一週為永晝。他所管轄的堂區相當於整個法國的版圖，而居民卻只有五千人。

在他的旅行中他與信友同住一頂帳棚，同在一個餐桌進食，這樣的共同生活增進了信友對他的愛戴與信任。他的福傳探訪由 11 月中旬開始，每次為期一週。每次他都帶一名十九歲、體格強健、身材矮小、肩膀寬闊、滿腔熱火的愛斯基摩青年拉非·瓊斯（Ralph Jones）同行。這位青年豪氣萬丈，任何事總不落人後，他曾在傳教區學校就讀，是一名雙語人才。他駕馭一輛由九隻狗拉的雪車。通常他們早晨出發，下午到達目的地，然後在那裡過夜。

當他們探訪完一個村莊後便前往另一個目的地。有一次他們出發到名為努奈瑞佩克（Nunalrapack）的村子去，起程時天氣良好，看著狗兒活潑的跑著真是一大樂趣。漸漸濃雲密布，天色昏暗，雪花開始飄下。拉非向勞倫特保證他不害怕，也知道要去的地方，只要向前走，大約三或四小時就可到達下一個村莊。

雪愈下愈大，狗也放慢速度並且不斷回頭看看駕車的拉非，通常這是一種遇到危險的徵兆。他們不能折返，因為雪已經蓋住他們在地上留下的痕跡，他們只好向前走。

人和狗都停下來吃點東西。然後勞倫特與拉非用全身力量來拉雪車。刺骨寒風和疲累不堪使勞倫特放棄拉車而開始祈禱。他曾夢想自己死在一望無際的雪地上，身體一半埋在雪裡。此時，他心中開始湧出一股奇特的喜悅。

突然，似乎發生了什麼事，狗的耳朵都豎立起來，同時身體

開始抖動，瘋狂地想要向前衝去，因為牠們嗅到一百呎外有鹿羣，但是由於天色陰暗而看不見。鹿羣使狗兒興奮不已，牠們快速的狂奔甚至使拉非感到難以駕馭。

狗兒雖然看不到鹿羣而有些失望，但是牠們卻嗅到來自幾哩外鹿羣主人木屋的煙燻味。一想到將會有一夜的好眠，他們就更加加速朝目標疾奔而去。

當他們到達木屋時，勞倫特跳下雪車走進木屋，看見女主人艾茉莉·阿肯（Emily Afcan）正在清洗晚餐後的杯盤。女主人曾在傳教區學校就讀，勞倫特認識她，也為她的幾個孩子付洗，她的丈夫是當地主要的鹿羣飼養人。艾茉莉一言不發立刻動手為他們準備晚餐，不久，令人垂涎而又香氣四溢的鹿排大餐已擺在眼前了。美味的晚餐結束了一天的考驗。最後，還有時間唸玫瑰經及聽告解。

不久，雪地機車取代了雪橇，輕航機出現在空中，陸地上修築了公路，生活也改善了許多。由於學校的設立和衛生的改良使愛斯基摩人的生活水準也隨之提高，現代化已處處可見，這些都是美國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

人民選出的代表

美國的行政措施也影響勞倫特的生活。1959年1月3日阿拉斯加成為美國聯邦第四十九州，次年秋季，阿拉斯加推舉州議員候選人。一位選民間他是否願意大家將他的名字寫在選票上，並有機會為阿拉斯加州政府服務。勞倫特的回答是假如主教同意，他便接受這項邀請。主教表示假如多數選民願意選勞倫特，他便不會反對。由於勞倫特沒有參加競選，不在候選人名單上，凡是想要選他的人，可將他的名字寫在選票上；這種制度稱為手寫選

票。

總之，勞倫特當選了，全美國的報紙登載這條新聞：一位在阿拉斯加傳教的西班牙籍耶穌會士當選為該州的議員。《時代》雜誌派一名記者飛來阿拉卡努克對他做了一次專訪。

《時代》雜誌的文章帶來如雪片般的信件。印第安那州或內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人來信詢問在阿拉斯加開闢農場的可能性。美國前任郵政局長及政治領袖詹姆士·法萊（James A. Farley）寫信感謝他，並向他保證政治是一門高度的學問。天主教司鐸參與政治將會讓美國人知道政治人物並非都是一羣壞蛋。

議會會議在州政府所在地朱諾（Juneau）召開；1961年1月最後的星期一會議開始，會期持續了七十四天。勞倫特不屬於任何黨派，因此民主黨與共和黨都盡力拉攏他。假如他站在共和黨這邊，議會中的兩黨人數就成為二十對二十，如此，在通過重要法案時會遇到僵持不下的局面。因此他加入民主黨，並成為司法委員會、州事務委員會、健康福利及教育委員會的成員。這是一項最重要的職務，因為委員會能決定法案是否要上呈給議會。他們總共呈報了六百件法案，每一件都經過委員會詳細的審查。

夏季的到來融化了育空河的河水，同樣也融化了最初大家對一位司鐸議員的畏懼。勞倫特以他的能力、誠實、公正及明確的動機贏得了其他議員的肯定與欣賞。主教接到許多信件，感謝他允許一位司鐸在議會中占有一席。第一會期結束後，耶穌會士問他是否要辭去議員一職，他不斷的搖頭、不發一言，表達無言的否定。

最大的犧牲

1975年的某一天，勞倫特接到奧勒岡省會長的信，表示他需

要一位能說兩種語言的司鐸來照顧日益增多的西班牙語系的居民，他們在華盛頓州修建龐大的摩斯湖水壩。他是唯一的適合人選。

阿拉斯加已經是他的第二故鄉，多年來他為第一代和第二代付洗，他是祖父級的人物，與這裡的人關係密切，這是他的家。要離開這裡，幾乎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他日後承認，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犧牲，但是他接受了這項使他痛苦的要求。

他在摩斯湖工作到 1981 年，直到省會長要他到愛達荷州的波卡特洛（Pocatello）去，1984 年他住進路易斯頓（Lewiston）聖若瑟醫院，因為他的健康已開始衰退。

他平平順順的走到生命的終點。1988 年 10 月的一天，有人告訴他得了癌症。於是他打電話向省會長報告，並表示自己不想接受任何治療，但是，他必須獲得長上的首肯。省會長同意他的看法，三個月後他就安然去世了。

勞倫特在阿拉斯加傳教時，有一天他舉行了一次極富高度象徵意義的慶祝儀式。那天，他收到一個美麗的大包裹，他拆開裡面所有的禮物，最後是一瓶上等白蘭地酒。他打開瓶塞，立刻香氣四溢。然後他走出屋子，將那瓶貴重的酒倒在雪地上。第二天早晨，那留在白茫茫雪地上的琥珀色酒印仍清晰可見。

這便是他以自己的生命為阿拉斯加居民所留下的寫照。

6. 與日本人在一起：

雨果·愛宮真備·拉薩爾

(Hugo M. Enomiya Lassalle, 1898-1990)

閃電與雷聲

每天早晨五時半，一架美國的 B-29 轟炸機都會飛過廣島上空，由於它的準時出現，竟使循規蹈矩的日本人已不再理會每天早晨的空襲警報聲，甚至還為那每天都來的飛機取個綽號為「美國郵差」。然而，1945年8月6日情況卻異於往常，七時五十五分第二次警報響起，另一架 B-29 轟炸機飛過天空；八時十分解除警報，居民恢復每天的工作。

八時十五分，第三架轟炸機飛來，原先的目標是太田川上一座橋梁，但是卻偏離了目標而在八百呎外的廣島醫院上空投下一枚炸彈。十五秒內，炸彈在一千八百呎的空中爆炸。輕微的聲音帶著閃光，隨後閃光變成一團具有強大摧毀力的火焰。凡是抬頭觀看那火焰的人都被那強烈的亮光弄瞎了眼睛，凡被火焰觸到的東西都變成一片白色。爆炸時散發的熱比太陽表面溫度高數千度。廣島市區及凡在炸彈範圍內的一切都成為一片焦土。四哩外的房屋倒塌，起火燃燒，九哩外的門窗玻璃被爆炸聲震碎。炸彈雲先變成一個大火球，然後慢慢成為一股濃煙。可怖的黑煙向上飛升，並向四面八方放射出藍與紅的閃電，接著是嚇人的雷聲，難以忍受的高溫，嗆鼻的瓦斯味夾帶輻射線，快速向四周散去，達到四哩外的地方。十分鐘後，在廣島市西北部降下黑色大雨。

日本人將當時的景象形容為 Pika—Don，意思是由核子連鎖

反應所引起的閃光及駭人的隆隆雷聲。死亡人數為二十六萬，一半為廣島居民；五萬人當場死亡，另外二十萬人在數週內去世，其餘一萬人則因受傷及受輻射之害而慢慢死去。

受傷者身上的特徵是這樣的：它與一般槍彈留下的傷痕不同，而是全身布滿如同擦傷或被玻璃碎片刺傷的傷口，這些撕裂的傷口裡嵌進了玻璃、木頭，甚至骨頭的碎片。缺乏醫療的照顧使當地的情況更為悲慘；廣島市原有二百六十名醫生，但是，其中二百名死於這次爆炸中。

耶穌會在廣島有兩個會院：一是位於幟町附近，距離爆炸中心地帶不到一哩的堂區；另外是四哩外，位於長束的初學院。五位耶穌會士管理堂區，雨果·拉薩爾（Hugo Lassalle）身兼會院院長和堂區主任；初學院裡有三十五位耶穌會士，雅魯培（Pedro Arrupe）神父擔任院長及初學導師。初學院的房屋毀於爆炸，而神父和修士都安然無恙。

原子彈的受害者

在堂區的會院裡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首先發作的是克萊索（Kleinsorge）神父。他當時正在閱讀的雜誌由他手中飛走，然後他發現自己穿著短褲在院子裡走來走去。他將手放在身體的左邊，手掌上染滿了血。他舉目四望，唯一未倒的房子只有這座教堂，其他的房屋都已成為一片瓦礫，甚至當地出名的古城堡也不見蹤影了。

黑暗中，院長拉薩爾神父出現在附近。當爆炸發生時，他剛做完彌撒，正靠著窗戶唸日課。無數的玻璃碎片刺進他的背部，他的左腿有一條很深的傷口。

又出現了兩位神父：希斯里克（Cieslik）神父攙扶著西佛

(Schiffer) 神父，後者滿身是血。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中，處處都是大火燃燒時發出的劈啪聲和嘶嘶聲，沒有水撲滅眼前的大火。克萊索神父走進屋內想要搶救一些東西，他發現自己的房間裡一團混亂；急救箱安安穩穩的掛在牆上，而他的衣服卻不知去向，桌上的東西散落滿地，他放在桌子底下的手提箱卻仍在原處沒有移動，裡面放的日課本、教區的帳本及屬於教區的一大疊紙鈔都沒有移動。

如何照顧受傷的拉薩爾神父及西佛神父呢？神田醫生的診所已毀於大火，而四處蔓延的火焰使他們無法去到富士醫生在河邊的私人診所。現在已無計可施，只好走出去碰碰運氣了。門口的三株楊柳幾分鐘前還是青綠直挺的，現在已垂頭枯萎。櫻桃樹也被燒得整株焦黑。

這是悲慘的行列——四位神父、一名神學生高本及陷入歇斯底里狀況中並緊緊靠在克萊索神父身上的傳教區祕書深井先生，他們六人奮力地走上一座橋，跨過京橋川河，走向東邊一處闢為疏散區的公園。

當他們抵達時，眼前是一片淒涼景象，遍地都是死者和傷者，甚至很難區分死人與活人。由於距離爆炸地區較遠，因此，這裡的竹子、松樹、月桂和楓樹都還活著，這片青綠吸引無數的難民，不斷由各處湧入。拉薩爾神父躺在地上睡著了。

下午，神學生高本到長束的初學院去，向神父們報告教堂與會院都已毀於大火，拉薩爾神父與西佛神父受了重傷，他們都躺在淺野公園裡，不能走動。

雅魯培神父及兩名同伴帶著臨時做成的擔架立刻出發。擠在成千上萬的難民中，想要奮力前行真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們終於在晚上十點之後，走到躺在淺野公園一角、靠近河邊的弟兄身

旁。他們都已全身無力。雅魯培很快為他們做了檢查，發現西佛神父情況嚴重，一片玻璃插進耳朵後面的小血管中，他有失血過多而致死的可能。他們把他放在擔架上，他向神父說：

「神父，請看看我的背，我想那裡有東西。」

雅魯培神父將他的身體翻過來，藉著火把的光，他看見他的背部完全被玻璃碎片割傷。雅魯培神父用刀片取出了五十多塊玻璃碎片。

他們先抬著傷勢嚴重的西佛神父回到初學院，然後再回來抬拉薩爾神父。雖然是炎熱的夏天夜晚，又有被火燒後留下的餘溫，但是他卻全身冰冷，他們把他放在簡陋的擔架上，他的背上也有刺進肉中的玻璃碎片。這一段躺在擔架上的路程，真是不折不扣的痛苦考驗。走在黑暗中，視線不良，抬擔架的弟兄一腳踩進水溝，傷者被拋到地上，擔架也斷成兩半。他們找來一輛手推車，將他放在車上，在崎嶇不平的路上推著他。最後終於在清晨四時半到達初學院。

初學院已經成為一所臨時醫院。雅魯培神父曾經是醫學院的學生，此時，他決定擔當急救醫生。不久，初學院裡已經擠滿了傷患。

但是，如何為他們療傷呢？一名鄰居拿來一些看似藥品的東西，是十五公斤的硼酸，這真是天賜之物。床單和內衣都變成了繃帶。雅魯培神父意識到，此時傷患最需要的是食物而非藥物。鄰居們都慷慨解囊，沒有一個傷患感到飢餓。

院長及傳教士

拉薩爾在廣島服務了七年，他除了擔任那裡的堂區司鐸及修會團體的院長外，也是全日本傳教區的長上。

然而他卻是希有的一種院長。他是天生的先鋒人物，不遵行一般人慣常所走的道路。1915年當他十七歲時，他參加了德國的皇家軍隊；他在一次戰役中受傷並獲得鐵十字勳章。加入耶穌會後，他希望到非洲的一所癲瘋病醫院服務，但是，因為已經接受前往日本的派令只好打消原先的願望。1930年，當他到達日本後，他被安排到東京上智大學教德文及社會學，然而他的心卻常惦念著貧苦的人。耶穌會士總認為在幫助窮人的工作中都帶有一些共產黨的色彩，1933年，他克服了同會弟兄的反對後，便在東京市的一個貧民區開始服務窮人的社會工作，自己也住在木造房屋內。

三年後，他被指定為日本傳教區的長上，很不情願的住進上智大學，他寧願與傳教士們一起住在使徒代辦處，1939年，他離開東京來到廣島，在堂區工作了三十二年直到1972年。他擔任日本傳教區的長上共十三年，直到1949年3月3日卸任。在那十多年中，認識他的人都記得他騎著他的破機車，從廣島到東京的路程中，探訪教友及參與首都的商業活動。

他在廣島時集傳教區長上與堂區司鐸兩項職務於一身，有時還要擔任初學導師、第三年靈修培育導師、原子彈和平紀念教會推行者、伊莉莎白女王音樂大學德文教授，偶爾還客串演奏大提琴。

雅魯培神父一次意外的創舉促成了拉薩爾的大提琴演奏。在堂區鄰近的山口市傳教的雅魯培神父，想盡種種可能的方法要當地居民認識天主教，於是，就想以他自己美麗的男中音來舉辦一場音樂會。但是他需要一位伴奏，於是想到要來這裡訪視的拉薩爾神父，他擅長拉大提琴，也會拉小提琴。

雅魯培神父派一名信差邀請他，並請他帶來自己的樂器。信

差沒有見到拉薩爾，但是卻帶了一把大提琴回來。雅魯培神父將樂器藏在床底下，開始依照他的計畫進行。當拉薩爾到達時，雅魯培告訴他，自己已經接受到本城的大學登台演唱的邀請。

「太棒了！」這位不知內情的長上天真地答道。

「問題是沒有人為我伴奏，你可以用大提琴為我伴奏嗎？」

「我沒有練習，我需要準備。」

「我有樂譜，我們還有兩天。」

「但是我沒有大提琴。」

「我會為你準備山口市最好的一把琴。」

「我習慣用自己的琴。」

「那麼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變魔術了。」

雅魯培起身走到床邊，彎下身去，過了一會兒，手裡拿著拉薩爾的大提琴回來。院長神父目瞪口呆的望著他，不能拒絕他的要求。當天這一對天才音樂家有精湛的演出。誰能預料那場成功的演出為幾年後廣島音樂大學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呢？

愛宮真備

1951年，拉薩爾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愛宮真備。他為什麼要改名字？

早年，當他在德國念書時，他就對大德蘭及十字若望的作品極有興趣；從1948年起，他又對禪學產生濃厚的興趣。這並不是因為他覺得基督信仰有所不足，而是出於他渴望徹底了解日本精神及文化。他成為日本著名禪學大師山田耕雲的高徒，大師賜給他禪師的頭銜，即是，這名徒弟通過考驗，並且已「大徹大悟」了。

在將禪修的方法納入自己的生活後，拉薩爾開始將它用到自

己的使徒工作上。這項工作使得他來往於東京與廣島之間，從 1972 年起，他定居在東京，並在那裡創立一個退省中心。

他在東京從未間斷地教導基督宗教的禪修方法。從 1974 年開始，他走遍全球，教導禪修的方法，除了非洲大陸外，沒有未曾到過的地方，足跡遍及他的祖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及美國。使東京耶穌會會士驚訝不已的就是看到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仍然談論著他過去和未來的旅程。

他以自己的工作搭建了基督宗教與禪學之間的橋梁，並把德日進的思想帶到其他的國家，發展出一套新的宗教意識，體驗絕對的真實，達到宇宙終極之點，與天主結合。他以最古老的文化傳統豐富了基督信仰的內涵，他以本土化的方式宣講福音。

德國方濟會士在他們自己修院的花園中，特意为雨果·愛宮真備·拉薩爾修建一個中心，他在這裡教授了最後一次的禪修課程。1989 年 1 月當他到德國講課時，本來預計在春天返回日本。然而，2 月時他發現自己患了腸癌，於是便在慕斯特退休，1990 年 7 月 7 日，弟兄們圍繞在他的床邊唱著他最喜愛的聖歌時，這位早已頓悟的禪修大師進入了永恆的禪修之光。他的骨灰送回日本，一部分放在東京聖依納爵教堂，這裡是他的使徒工作開始與結束的地方；一部分放在他所修建以取代毀於原子彈的小教堂的廣島和平紀念教堂。

雅魯培神父如此描述他：「他不是大師，不是領袖，不是靈修導師，不是浪漫派學者，不是西方耶穌會士，而是集上述的一切於一身，他是一位全方位的使徒。」柯文博（Peter-Hans Kolvenbach）神父論及他時說道：「他是東西兩個世界之間的朝聖者，他將大學與貧民區，德國與日本，歐洲與亞洲連結在一起。」

參考資料

- CZERMINCKI, Marcin: *Un héroe entre leprosos. P. Juan Beyzym, S.I.* (Bilbao, 1946) .
- DRAZEK, Czeslaw: *Il samaritano dei lebbrosi in Madagascar* (Gentes, Student Missionary League's monthly, January 1987) .
- ARAMBURU, Zenón: *Hasta morir por El. El P. Tomás Esteban* (Bilbao 1936) .
- GIL, Pablo: *Misionero y Mártir. Vida del P. Tomás Esteban* (Pamplona, 1956) .
- VALIAMANGALAM, Joseph: *The Mission Methods of Fr Joaquin Vilallonga* (Anand, 1989) .
- ECHANIZ Ignacio: *Fr Joaquín Vilallonga* ("Navajuni", n.6, January 1980, pp. 49-53) .
- TAFFAREL, Joseph: *Peter Caironi. A missionary indeed! A missionary in deed!* (Tellicherry, 1980) .
- LLORENTE, Segundo: *Memoirs of a Yukon Priest* (Washington, 1990) .
- Id.: *40 años en el Círculo Polar* (Salamanca, 1990) .
- BISHOP, George: *Pika-don* (Anand, 1998) .
- ARRUPE, Pedro: *Este Japón increíble* (Bilbao, 1965) .
- Id.: *Yo viví la bomba atómica* (Madrid, 1952) .
- BRANTSCHEN, Niklaus: *Requiem für Pater Lassalle* ("Geist und Leben, 1990, pp. 389-392) .
- STACHEL, Günter: *Täglich eine Stunde sitzen. Der Zen-Meister Hugo Makibi Enomiya-Lassalle* ("Christ in des Gegenwart", 1998, p. 390) .
- KOLVENBACH, Peter-Hans: *100 Jahre P. Hugo Makibi Enomiya-Lassalle-und die Feier im Lassalle-Haus* ("Nuntii", Swiss Province Newsletter, 1998.4, pp. 73-76) .



後 記

雅會培神父與殉道弟兄

1965-1999

先知性的言語

1974年12月20日，當重要的第三十二屆大會準備討論促進正義的議題時，雅魯培神父說了以下的這段話：

「我們的大會必須真正覺察到福音中的正義應該是藉著十字架並且從十字架上開始宣講。假如我們認真的促進正義，甚至達到最後的結果，即是犧牲性命（依納爵的積極福傳精神確實對我們有如此的要求），那麼十字架很快就會出現，並且痛苦也常常隨之而來。即使我們忠於自己的司鐸及修道神恩，也謹慎地從事促進正義的工作，我們會看到那些在今天社會中不公不義的人以及被視為虔誠的基督徒羣起而反對我們……他們指控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是顛覆者，終究有一天，他們不再與我們為友，收回昔日對我們的信任和經濟上的支援。」

「我們是否不僅準備好要撰寫文辭華麗的宣言，也準備採取實際行動呢……我們的大會是否準備好承擔這項重責大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我們是否準備好走上被世人、教會權威人士以及我們的摯友誤解的十字架之路呢？」

當修會最高機構以當代的語言及觀念發布那曾經也是耶穌會第一批同伴以他們的語言和觀念宣稱的使命：「今天耶穌會的使命是為信仰服務，在這服務中促進正義是絕對需要的」時，雅魯培神父就看到了十字架、迫害及死亡已近在眼前，而更令人傷痛的是來自朋友與宗教權威人士的誤解與懷疑。

這些話都出自他的經驗，是他在西班牙一所耶穌會學校的校友會上講述社會正義後不久所發表的言論。當時在七百位聽眾中，他的言論使許多人心中鬱鬱不樂，甚至有些人因他的一席談話而辭去耶穌會校友會的職務。

這只是一個警告，一個預兆罷了。

苦難與光榮

假如苦難與光榮貫穿整部耶穌會的歷史，那麼最後的三十五年也不例外。

雅魯培的言論遭到反對，首要原因是他強調要忠實的傳播福音，即是忠於福音的精神。許多人認為大會的宣言違背了耶穌會的基本特恩與使命，往日的修會已不復存在，很多人也因此拂袖而去。

近年來，苦難也以其他方式襲擊耶穌會士。由於他們是當代的人，再加上自身的軟弱，因此六〇年代的潮流深深的影響他們，尤其對年輕一代影響更大。昔日頗負盛名的龐大組織似乎已搖搖欲墜。傳統、權威及紀律不再有價值，甚至藐視這些已蔚為風氣。大批會士離開修會，耶穌會也大量失血。那些留在修會的和那些以理性克服危機的會士，由新時代中吸取它的優點。但是，一些頑固分子卻要求回歸舊日傳統，主張徹底的權威式領導。而雅魯培，一位擅長交談，且願意以朋友般的勸導取代權威式的強制的修會會長並沒有拔出他的劍。他領導修會的基本方式是重新發現依納爵的神恩並向外推廣，一如梵二大公會議所要求的，即是回歸根源，革新基本精神。在這方面，雅魯培全力投入，成績卓著，但是這並沒有使惡意批評者感到滿意。更令人驚奇的是，有些強調修會傳統的會內弟兄竟然提供大量的資訊支持那些離會的弟兄，一起反對他（註一）。

然而，這些困難是每一位會長都必須面對的，雅魯培一定也預料到了。這些並未構成特殊的流血犧牲。真正的痛苦是來自教會最高權威，即是教宗的誤解。

註一：參見馬丁（Malachy Martin）的英文著作《耶穌會士：耶穌會與羅馬教會的背叛》（*The Jesuits.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Betrayal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以及西爾法（Ricardo de la Cierva）的西班牙文著作《地獄之門：不為人知的教會史》（*The Gates of Hell.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Never Told*）。從這兩本書的書名不難看出作者的意圖。

1. 伯鐸·雅魯培（Pedro Arrupe）的苦路

在我們作進一步的報導之前，先要說明兩點。首先，唯有梵蒂岡所公布並保存的文件，才是絕對正確且具有可信性的，尤其是那些使得教宗採取某些行動的拒絕服從的事件；但是，這文件似乎也不能改變我們所掌握的資料。或許應該對這些資料加以確認，並加添一些細節說明。

其次，雅魯培對教宗的敬愛既溫和又堅定，保祿六世對耶穌會垂愛的態度沒有比當時更好的了。那麼，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這中間可能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因素。首先是兩人在個性和用詞的差異造成雙方溝通上的困難。教宗保祿六世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外交官及學者，具有多重性格，習慣採用外交上的含蓄語言；相比之下，雅魯培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一名天真的鄉巴佬，說話直截了當，毫不隱藏。他們兩人都具有福傳精神，有相同的理想及工作的方向，但是他們的態度及風格卻明顯不同。有一位熟知雅魯培的朋友迪瓦卡（Parmananda Divarkar）告訴我們：「雅魯培的外表天生就能帶給人快樂，通常也可以營造一種適合交談的氣氛，但是這外表卻常使問題變得嚴重，場面尷尬；使交談的另一方感到羞怯、挫敗，最後就憤然的拂袖而去。」我們可以猜想，這種情況很可能發生在他與保祿六世之間。

第二種使他們之間的困難更加嚴重的因素，即是西班牙耶穌會士傳出對教廷的指控並且拒絕服從他們的教導。

苦路第一處：背叛與懷疑

他們很快就採取行動了。雅魯培當選為總會長後十五個月，於 1966 年 8 月 20 日，在西班牙羅耀拉舉行的神操會議上，有三十名耶穌會士提出一份聯名文件表示：「許多西班牙的耶穌會士繼續忠於他們原有的聖召，並且已準備為了恢復昔日修會的榮耀而不惜犧牲一切。」

於是，這小團體便誕生了，稱自己為「忠實的耶穌會士」，別人則稱他們為「嚴守會規者」或「赤足耶穌會士」，他們有系統地將訊息呈報給教廷國務卿而不給耶穌會總部。他們已經注意到這兩個機構間缺少溝通，也盡其所能的乘機製造兩者間的誤會與衝突。最嚴重的是，一些機密文件都來自雅魯培身邊最親信的人。有人告訴他這件事，但是他拒絕撤換這些人，「他對每一個人都深信不疑」（艾卡拉，Alcalá）。

子彈擊中了目標。1966 年 11 月 16 日在三十一屆大會的閉幕演說中，保祿六世提到使他深感「驚訝與痛苦」的有關耶穌會的「謠言和其他聲音」。假如這謠言不是來自拒絕服從的西班牙會士團體，那麼也是以某種特殊方式反映一些事件。他們的第一步已成功了，並且證明他們已打入教廷的高層，而雅魯培總會長卻沒有這麼幸運了。

受到成功的激勵，他們更加強自己的攻擊。他們拒絕服從的基本理由沒有改變，即是：雅魯培確實是一位屬天之人，但是卻不適合領導修會；他的天真、他的軟弱及他所挑選的合作者都成為摧毀修會的強烈火焰。這種對總會長的惡意攻擊已經傳進西班牙的主教耳中。

挾著這空前的成果，1968 年 12 月初，一位西班牙主教團的

代表晉見教宗，除報告該國教務外，也談論耶穌會士。根據西班牙主教團團長莫西羅（Morcillo）總主教給雅魯培的信函顯示，保祿六世極度不滿有些北美及部分西班牙耶穌會士請求主教設法挽救危機，信中並且建議總會長將西班牙耶穌會士劃分為二。

自稱「忠實的耶穌會士」得知消息後，立即展開行動。1969年1月9日，二十位會士集合在馬德里，經過商議後，提議要捨棄這瓦解的耶穌會，而在西班牙為那些想要遵守古老會規的弟兄另設幾座會院，就如在一些古老修會中所發生的一樣，這些會院不屬當地會省管轄，而成為特殊「個人性」的會省，直屬總會長。

二十人中有十八人贊成這項提議。他們將這請求呈交教宗，之後才交給雅魯培總會長。他們也將這提議告知馬德里總主教莫西羅及其他同情他們的主教。

第二枚子彈也擊中了目標。1969年12月的第一週，西班牙主教團召開第十三屆年會，會議結束時，主席莫西羅總主教告訴與會的主教們，教宗希望知道他們對在西班牙為那些想要遵守傳統會規的耶穌會士設立特殊會院一事的看法；這種作法是否能幫助耶穌會度過目前的難關？

西昆薩（Sigüenza）地方的卡司坦（Castán）主教寄給他們一封個人信函，並附有一份三十二名持反對意見的耶穌會士的簽名文件，以及某些控訴，並作出令人驚訝的宣示：「對這不正義的作法，我們不予考慮。」

主教會議表決的結果是四十九票對十八票，以壓倒性的票數贊成設立一個特殊會省，1970年1月27日，莫西羅總主教寫信給雅魯培表示：「個人性的會省似乎勢在必行。」

梵蒂岡最初對西班牙主教的建議究竟為何？是出自教宗或來自國務院？在西班牙省會長的催促下，雅魯培於3月13日求見

國務卿維拉特（Villot）樞機主教，請求澄清外洩的傳言。同月 18 日，七位省會長齊聚在埃納雷斯堡（Alcalá de Henares），全體請辭：他們感到信用已喪失，權力被剝奪。雅魯培請求晉見教宗，於 21 日獲得召見。

與教宗的會面及一封維拉特樞機主教寫於 6 日的信函解釋了教宗的立場：他不干預耶穌會的會內事務，一切都由總會長決定，教宗建議他應謹慎，立場堅定，同時要他對修會紀律的敗壞及偏離了正規信仰的現象提高警覺，教宗也要求他對此事定期提供最新資訊。

3 月 29 日，雅魯培寫信給西班牙的諸位省會長，他的信可視為終結了一場鬧劇，但是卻還有一些後續動作。當雅魯培於同年春天訪問西班牙時，他要求省會長對他的視察做一些評估，6 月 17 日保祿六世也接見他們。在教宗開始演講前，他為洩漏整個事件的信函道歉，也表示這都不是他的意願，對所發生的事件，深感後悔。

個人性會省的計畫沒有實現，但是許多問題卻懸而未決，它所引發的大火也尚未撲滅。一些自認為標準的耶穌會士處處反對雅魯培，他們不斷的以這句話辱罵他們的總會長神父：「一個巴斯克人建立了耶穌會，卻毀於另一個巴斯克人手中。」

苦路第二處：命令停止及責罵

苦路第二處不再出現在西班牙的某處或陰謀者的密室內，卻在耶穌會最正式與最嚴肅的第三十二屆大會的議場中上演。

1974 年 12 月 3 日，教宗保祿六世在就職演說中已經透露某些警告的訊息，他問與會的代表說：「你們為何懷疑？」這並非修辭學上的問題。教宗曾聽說由修會創始者所制訂的〈會憲綱

要) 有被廢除的可能，因此，他堅持要保有該修會基本的特質：會士、使徒、司鐸都要以特殊方式與教宗建立密切關係。

第二盞紅燈的亮起是一封教廷國務院於 12 月 3 日簽署，卻在 16 日才送達的信。信的主旨是：「教廷經過審慎詳查與討論後，認為若每一名耶穌會會士都誓發第四願，將會產生極大的困難，對教廷所給予的必要批准，將是一大阻礙。」

大家都注意到的一點就是：梵二大公會議修會生活法令明確指示應廢除與晉升司鐸的資格無關的任何不平等規定。而耶穌會內的等級之分（與晉升司鐸的資格無關）早已造成某種不安，渴望修會內會士間的平等不僅已是普遍的事實，也是教會法令的要求。在八十五個會省中，有五十四個會省要求檢討這問題。無論為了何種理由以及任何勸告，保祿六世似乎看見這討論是有關正義與等級之間的問題。他可能認為這屆修會大會是在採取一些有損耶穌會司鐸特質的步驟。「事實並非如此，但是看起來似乎是如此，並且又是這樣呈報給教廷的。」（佩伯格）

當國務卿維拉特樞機主教的信到達時，情況確實如此。熟悉梵蒂岡官方用語及風格的人都說，這封信嚴禁大會討論有關修會內等級或所有會士誓發第四願的問題。其他人認為假如教宗希望不再討論這些問題，他可以含糊而明確的說出，更主要的是，他們覺得有責任對來自教廷的命令提出討論。

第二種解釋更占優勢。1 月 22 日委員會以假投票的方式來探測與會代表對上述問題的看法。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贊成討論等級和廢除的問題，甚至要研討發自國務院的那封信函，並且以大會之名派代表向教宗澄清疑點。按照耶穌會的傳統與作法，在上司已否決了某項提案之後，屬下可以秉持完全接受最後決定的心意，再一次向上司請求。

雅魯培為何沒有干預這項行動而被梵蒂岡視為對教廷的叛逆呢？主要原因是因為大會在他之上，所以，要尊重大會的自主權。此外，在面對純潔如同鴿子，機警如同蛇的抉擇之下，他寧願選擇前者，誠如他曾經說過的。

他為這單純的決定付出極大的代價。保祿六世得知耶穌會大會對上述的問題進行一次類似民意調查性的投票後極為憤怒。他召見雅魯培並交給他一封信，信中明確指出並斥責他未制止大會的討論及調查行動。當雅魯培回到大會會場時，他似乎徹底被擊敗。

他正陷入最痛苦的時期，被指控違背及反抗教宗的命令。

1968年可迪納（Victor Codina）撰寫一篇名為「聖依納爵與保祿四世」的文章，文中他研究了當時在選舉教宗的前夕，依納爵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可迪納將這篇文章寄給雅魯培並寫上：「致總會長，願他在『黑夜』中找到安慰」，作者已經忘記這件事了。1975年3月28日，在我們所敘述的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雅魯培用印有「耶穌會第三十二屆大會」字樣的信紙寫一封私人信函感謝他，並告訴他，他的文章的確「為總會長的『黑夜』帶來光明」，他又說：「我敢保證，這獨特的經驗將是有益的。」

的確是獨一無二的經驗。

苦路第三處：請辭遭拒

修會大會閉幕後的日子並不比開會之前的日子好過。討論最激烈的第四號法令已被多數的中庸派接受，但是兩邊的極端分子卻以各自的偏見來解釋這法令。他們只看到促進正義，卻忽略在促進正義的同時，也需要為信仰服務，信仰必能激發促進正義的行動。結果極為重要，過分強調某一方，會造成意識上的混淆。

來自各方的怨言不斷湧向梵蒂岡，有些得到公平的處理，有些卻過於誇大。在此同時，教會的領導階層面臨兩次變化。保祿六世於 1978 年 8 月 6 日逝世，繼任者若望保祿一世由 8 月 26 日到 9 月 28 日只擔任了短短一個月的教宗。原訂 9 月 30 日，教宗要對耶穌會的財務管理者發表重要談話。這項重要的集會卻變成一場悲劇，若望保祿一世成為神祕死亡的主角。一股發自內心的至誠，雅魯培極力主張將教宗已準備的講稿公諸於世。

這便是 10 月 16 日當選為新教宗的若望保祿二世所面臨的狀況。教會內對耶穌會士的抱怨並未減少，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雅魯培考慮辭去總會長一職。當時他七十三歲，健康狀況良好，但是他想要在自己的健康惡化之前辭去這一重任，選舉他的修會大會也同意他的請求，此外，他也想要讓大家知道終身職的總會長也有辭職的可能。

雅魯培與自己的參議商討此事，他們卻反對這種想法；但是他堅持自己的請求，經過幾天的神類分辨之後，他們也讓步了。下一步便是與省會長的祕密會商；六十二位省會長中有五十八位認為他有充足的理由請辭。第三步驟便是召集大會，這是唯一有權接受總會長辭職的最高機構。

其實，雅魯培並沒有向教宗報告的義務，但是，他覺得自己應該這樣做，他只是告知教宗，卻不須獲得他的許可，因為，他是按照修會既定的慣例行事罷了。

梵蒂岡專家紀卓拉（Giancarlo Zizola）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但是卻沒有說明他的資料來源。雅魯培堅決請求晉見教宗，但是，他的申請卻一再被拖延。他覺得自己必須哀求一位主教的幫助才能達成願望。

「我的確有求見教宗的需要，這是有關良心的事。」

他獲准於 1980 年 5 月 30 日在教宗前往巴黎之前與教宗面談。聽了雅魯培的請求後，教宗頗為驚訝，並表示需要時間考慮。教宗讓雅魯培知道，為了能對這事有全面性的了解，兩人需要作進一步的交談。

由於教宗考慮的時間很長，因而造成耶穌會會務的停頓及總會長的焦慮不安，他要求每一位具有耶穌會士身分的主教，在經過羅馬時都為他向教廷請求晉見教宗。最後，他獲得兩次晉見教宗的機會，一次是七個半月後，即 1981 年 1 月 17 日，一次是 4 月 11 日。

雅魯培並沒有失掉自己內心的平靜，他沒有中斷自己的活動，甚至更積極。這期間每年依納爵靈修研習結束時他都發表一篇內容豐富的演講，例如：「前進的路」（1979 年 1 月 18 日），「依納爵神恩中的三位一體靈感」（1980 年 2 月 8 日），「扎根於愛」（1981 年 2 月 6 日），這些是有關依納爵神恩與靈修的三場經典之作。

1980 年 8 月，雅魯培在鞏撒勒茲（Luis González）神父引導下做一次避靜。他以感人的謙遜說出總會長神父心靈深處的感受，即是，在他渴望自己能與耶穌的感覺認同，願意分擔基督身懸十字架上時被遺棄的痛苦，他感到有來自耶穌親密的安慰；他無所畏懼，並準備接受一切。他很清楚並且對請辭總會長一事毫不懷疑。他感覺到天主將對他有某種要求，但是還無法揣測究竟是什麼。他已經準備好全心接受教宗的指示，並為了耶穌會和教會透過瑪利亞將自己如祭品般完全獻給天主。他心中充滿了喜樂。但是在最後一天，雅魯培向鞏撒勒茲神父說出自己的痛苦；在面對屈辱時，他有強烈的反抗。雖然他不斷體驗到極深的痛苦，但是在最後一天，他的內心較為平靜。鞏撒勒茲的結論是：

「我常常懷疑天主是否讓他知道，他將面臨怎樣的未來。」

苦路第四處：兩次打擊

1981年5月13日，一名土耳其青年阿里·阿卡（Ali Agca）企圖刺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未成，卻打傷教宗的胸部，因此使他長時間無法公開露面。8月7日，雅魯培由遠東視察回來，在抵達羅馬機場時便出現大腦血拴症的現象，他立刻被送往人類救主醫院，造成血拴的原因是在他的左邊頸動脈中有一個小血塊。這是第一個打擊，是身體上的病痛。

8月10日，因總會長無法行使職權而制訂一項法規，雅魯培接受四位總參議的建議，提名歐基輔（Vicent O'Keefe）神父在他臥病期間代理總會長的職務。

26日，歐基輔神父向全修會報告雅魯培的狀況：稍早的診斷已獲得證實，他正在接受治療，情況令人欣慰，唯有右手的使用及語言表達上有困難。在9月5日的報告中，代理總會長告訴大家，雅魯培已出院回家。10月3日，他提出雅魯培最新的健康報告，也開始討論他的辭職問題。面對雅魯培確定無法執行職務的情況之下，他的請辭有新的意義。歐基輔神父隨時向卡沙羅利（Casaroli）樞機主教報告雅魯培的健康狀況以及無法再承擔管理耶穌會的重任。他說：「樞機主教知道耶穌會已有因應的措施。我請他向教宗表達我們的服從，全修會繼續為他的康復祈禱。」

三天之後，即10月6日，有一通來自教廷國務院的電話說，卡沙羅利樞機主教將於中午十二時前來探望雅魯培神父。歐基輔神父親自在門口迎接，並陪他到雅魯培的病房。當他們走到病房門口時，樞機主教請歐基輔神父留步，他獨自進去。幾分鐘後，他走出病房，歐基輔神父進去，發現雅魯培雙眼充滿淚水。他遭

受第二次打擊。

教宗的信攤開放在小桌子上，日期是前一天，信上表示，教宗將派一位代表籌備召開修會大會以受理他的請辭之事，這段期間，這位代表有責任管理耶穌會的事務。

10月13日，耶穌會祕書長羅倫都（Louis Laurendeau）神父將這消息告知全體省會長，並命令他們在31日前不得對外公布。這是出於害怕耶穌會士會反叛的假定，其實，並未發生這類的事。只有抗議，而無反叛，也無人談論這事，1982年2月，全修會省會長與特定代表一起開會時，一切都恢復平靜。真正的改變是，在經過長期的干擾後，重新建立與梵蒂岡之間的溝通管道以及在態度上明顯的改變。風暴已過，平靜再現。

接著便是在1982年12月8日召開大會，1983年9月3日大會接受雅魯培的請辭，9月13日選舉他的繼任者。對每一個人，尤其是即將卸任的總會長而言，這是一段短暫的歡欣時光。雖然一切都非人為過錯，但是，這無情的事實卻迫使雅魯培由原有職位上退下。

苦路第五處：無法溝通與孤獨

有七年之久，雅魯培幾乎無法自我表達；他可以行走，但卻是舉步維艱。護士班德拉（Rafael Bandera）修士經常帶著他在走廊上散步。他接見訪客，也對某些客人表達滿腔熱誠。他接受心理治療，但是成效有限。他盡最大的努力所能做到的便是以左手簽名，及歪歪斜斜的寫出幾個單字和一、兩個句子。有些弟兄為他唸他自己選的書。音樂可能是他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卻不喜歡用錄音機或收音機。

漸漸的，他愈來愈孤獨。1987年11月，他又有一次中風，

因而他的情況明顯惡化。走廊上再沒有他慢慢散步的身影；念書也停止了；他不再到小聖堂舉行彌撒，而在自己房間舉行。訪客愈來愈少，並且別人也無法再激發他的興趣了。每天便是從病床到椅子、從椅子回到床上，除了班德拉修士外，再沒有其他的陪伴者，他如慈母般的照顧他，也如嚴父般命令他。在一幅伯鐸被倒釘在十字架上的圖片上，寫著耶穌對他說的那句話，今天在雅魯培身上應驗了：「你年少時，自己束上腰，任意往來；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往你不願意去的地方去」（若廿一 18）。

苦路第六處：十一天的苦難

1991年1月25日，星期五晚上，他的情況惡化，不久便陷入昏迷中。他的痛苦持續了十一天。由於他的大腦血拴而引起一種異常的癲癇症，使他的腦部有間歇性的缺氧現象。這種情況有時持續三分鐘。每次他的心臟都先停止，然後又恢復正常的跳動。

2月3日，星期日，他似乎已瀕臨病危時刻。自從1984年夏季開始，我每天為他奉獻彌撒，在這最後的幾天中，我守在他的病床旁。唸完兩遍臨終禱文後，我又唸依納爵的禱文：〈基督的靈魂〉及〈向聖三呼求誦〉等禱文。我大膽的以十字苦路描述他的生命歷程，以及當他走在苦路上時，由痛苦中發出一股力量支持他走向終極頂峰：

「伯鐸神父，在生命的末刻，天主將以愛來檢驗我們。你付出太多太多的愛！你能受如此多的痛苦，因為你愛得多。鼓起勇氣吧，伯鐸神父！」

2月5日，星期二，大約上午十一時，死神似乎已經來到了，班德拉修士通知總會長，他立刻來到，其他的人也都湧進他的病

房。十一時十五分伯鐸神父呼吸停止。

我拿著禮儀本，要將它交給總會長，而他要我誦唸禱文，我唸到「天主的聖人，請來援助他」，還未唸完，此時，我們認為已經死亡的伯鐸神父又開始呼吸，但是每次呼吸時，因間斷性的抽搐使他的頭不停地向後仰。這種情形由十一時半持續到十二時半。漸漸的，他的呼吸變得平穩些，雖然他還是不停地喘息。

傍晚時，生命末刻終於來到，那是充滿仁慈與平安的時刻。總會長神父已在床邊。七時三十分，雅魯培停止呼吸，這次是完全停止了，但是，他那顆強壯有力的心臟還跳動了十五分鐘，最後在七時四十五分停止。

一位武士最後放下了他的武器。

2. 在拉丁美洲集權主義之下： 魯提利歐·格蘭德 (Rutilio Grande, 1928-1977)

一項發現

雅魯培神父曾警告耶穌會士說：即使我們忠於自己司鐸和修會特恩，別人還是會指控我們為馬克思主義者及顛覆者。

人們無法更恰當的概述在這艱難的歲月中拉丁美洲的情況。掌權者以反共產主義為擋箭牌來破壞社會正義；凡是維護正義的人都被扣上馬克思主義者及顛覆者的帽子。

魯提利歐·格蘭德是一位極為忠實自己司鐸職務的人，仁慈、溫和，甚至柔弱又無安全感，是一名完美主義者，不斷受到憂鬱症及神經病痛之苦。這位體弱的人很快在自己司鐸的生活與工作中有一項大發現，即是：若不積極進入信友的生活中，並關心拉丁美洲的情況，教會便無法建立，對他而言，這便是指薩爾瓦多。

他就讀於布魯塞爾的盧美特（Lumen Vitae）國際牧靈中心（1963年10月至1964年6月），目的在學習歐洲最先進的牧靈方法。從此之後，他便有一項使他全心關懷的事：不以獨裁的方式，而以平等的方式，尋找最大的可能，參與當地的事務。他的願望已經實現在他的第一項任命上了，即是擔任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修院的訓導主任，他全心參與修士的訓練過程，在極端權力主義者的傳統形式下注入民主因素。

魯提利歐認同薩爾瓦多的神父的理念，並且參與他們的活

動，例如 1970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的牧靈週活動，該活動拒絕縱容教會神職人員與少數政治人物共同壓迫農民與勞動大眾。在魯提利歐協助下所撰寫的文件裡反映了他們的心聲。有些主教為自己辯護，並且不再信任他。魯提利歐已感覺到這點，沒有主教的信任，他便不能繼續在修院工作，並被告知離開此地。

牧靈工作的模範

他發現自己已失掉這機會，因此，他必須在耶穌會的聖召裡再找第二種特殊的聖召。1972 年在基多（Quito）所參加的牧靈課程及與里奧班巴（Riobamba）主教波安諾（Msgr. Proaño）的會面，使他找到了他所謂的主要而基本的選擇：小組牧靈工作，目標是一般大眾，邀請他們參與、執行各項任務。就在此時，他的副省會長要求他擔任指導該會省的牧靈工作。他接受這份職務，但是卻一步一步的進行：他以自己的原則和方法規劃一種帶領式的計畫。

首先，他與其他三位耶穌會士組成小組，共同擬定策略，選擇有三萬居民的阿古拉爾斯（Aguilares）堂區為牧靈地區，此處是薩爾瓦多的縮影，所有的衝突都在這裡出現。三家糖廠壟斷當地的經濟；農民耕種向地主承租的小片貧瘠土地，靠每日微薄的工資勉強維持生活。

魯提利歐與他的同伴進入這危機四伏的地區時，正是這些在薩爾瓦多社會中醞釀已久的衝突就要一觸即發的時刻。這種情況刺激了魯提利歐與他的小組的牧靈創意。

他們以宗教經驗為出發點，並採用「福傳」一詞，因為這是普遍的共鳴及深具福音化的內涵。他們將城鎮分為十個福傳中心，將鄉間地區分為另外十五個福傳中心。每個福傳中心持續舉

辦十五天的活動，活動包括誦讀聖經，有許多民眾參加。這些活動造就了許多領袖人才，福傳活動結束後，團體選出自己的帶領人以維繫他們的信仰。

這步驟使團體進入第二階段，即是訓練稱為「聖言代表」的牧靈人員，他們有責任帶動並啟發這些團體。這便是魯提利歐面對別人指控教會神職人員的僵化所提出的答案。

福音與政治

從 1973 年中期到他去世，魯提利歐在純淨的理想與艱苦的現實之間耗盡自己的生命。一方面，他希望從事司鐸的職務，而不插手農民組織的活動；另一方面，身為一名福傳者，從廣義而言，他的職責使他無法逃避去影響政治性的活動。

農民開始自動要求提高工資。福傳小組來到拉卡巴那（La Cabaña）堂區八個月之後，在當地發生了罷工，三個工廠中的一個控制了這個地區。罷工並非由堂區主導，其動力是來自宣講福音。

魯提利歐成為這項新宗教運動最明顯的標記，也帶動了社會正義。在 1974 年的上半年，農民在堂區的基督徒團體裡組成了薩爾瓦多基督徒農民聯合會。他們不是由福傳小組所組成，後者也未阻止他們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下，聯合會只是將福傳運動的成果予以收集並呈現出來罷了。

很快，他們遭受到來自各方的譴責。首先便是來自阿古拉爾斯當地的指揮官的指責。福傳小組的成員拜訪他，請求他不要再稱神父們為共產黨和煽動者。指揮官對他們的請求置之不理。

就在 1977 年那次作弊性的總統選舉的前夕，指揮官對神父的惡意中傷更趨強烈。三位神父遭到驅逐，其中有來自哥倫比亞

的伯諾（Mario Bernal）神父及鄰近地區阿波帕（Apopa）的一位堂區神父。就在此時，阿波帕地區的教會採取了抗議行動，並以聖體大會作為結束，魯提利歐在大會中講了一篇精湛的道理。他表示，對於驅逐伯諾神父，教會不能保持緘默，因為這是一樁教會事件。假如伯諾神父犯了罪，他應該接受公開的審訊和裁判。問題的根源不在於他的國籍，而在於「當我們的國家正面臨殉道的時刻時，他的基督徒和司鐸的身分。在我們的環境中，成為真實的基督徒已經是非法的了，因為我們周遭的世界已陷入徹底的混亂中，宣傳福音的工作已遭到破壞。假如納匝肋的耶穌從查拉特南戈（Chalatenango）來到聖薩爾瓦多，一如祂曾經從加里肋亞來到猶太一樣，祂會在阿波帕被捕。祂會被帶到最高行政官員前，以非法者及破壞分子的罪名受審，被指控為反叛者及搗亂者，反對民主政治，即是違反多數民意。我們寧願出現在街頭的是沉默無語的基督，是一位按照我們的模樣打造的基督。」

這把火使他於一個月後從阿古拉爾斯通往埃爾佩斯諾（El Paisnal）的途中遭人射殺。

在途中遭到射殺

埃爾佩斯諾屬於阿古拉爾斯堂區。1977年3月11日，舉行聖若瑟九日敬禮，魯提利歐從阿古拉爾斯到那裡去舉行彌撒並講道。有人注意到馬西安諾·埃斯特拉達（Marciano Estrada）帶著輕藐的微笑出現在參與彌撒的人羣中，就是他撕下了魯提利歐吉普車上的十字架，那是一種帶有警告意味的行動。帶有不祥意味的謠言在城中流傳著，許多人勸魯提利歐提高警覺，但是他卻不予以理會。

第二天，3月12日，星期六，馬西安諾的兄弟班尼托（Benito

Estrada) 在幾名陌生人的陪同下，駕駛一輛美國牌照的藍色轎車在城中穿梭。他們來往於埃爾佩斯諾與阿古拉爾斯之間的六公里道路上，尋找埋伏的地點，最後選定半路上的草叢地帶。

那天下午五點鐘之前，魯提利歐駕駛著他的吉普車前往埃爾佩斯諾參加九日敬禮。與他同行的是高齡七十二歲的忠實警衛所羅撒諾 (Manuel Solórzano)。在他們離開之前，先去接一名十五歲的男孩雷慕斯 (Nelson Rutilio Lemus)，他來阿古拉爾斯送一捆柴給他的代母，好為微薄的家庭收入添加一點外快。所羅撒諾坐在中間，男孩坐在旁邊，靠近車門。

之後，他們又去接三名要到埃爾佩斯諾去的小孩，他們坐在後排。吉普車向前開，後面緊跟著另一輛車。班尼托帶著他的手下守在洛曼果斯 (Los Mangos) 附近，分別站在道路兩旁，一邊三人。當所羅撒諾及雷慕斯看到這些人時，他們神情凝重地望著魯提利歐。

「我們必須奉行天主的旨意。」他頭也沒轉地低聲對他們說。

班尼托給了一個暗號，於是，子彈如雨點般落在吉普車及車內的人身上。由於中彈，魯提利歐已無法控制方向盤，車子載著全身是血的魯提利歐與所羅撒諾向左邊翻覆，所羅撒諾正好壓在魯提利歐身上，似乎想要保護他。引擎沒有熄火，車輪繼續轉動。雷慕斯因腦部中彈當場死亡。

三個孩子已經嚇呆了。班尼托命令他們下車。他們從車裡跳出來，然後拚命奔跑，一直跑到埃爾佩斯諾，全身沾滿泥土和血跡。

「媽咪，媽咪，班尼托叔叔殺了魯提利歐神父，也要殺我們，因為他認出我們來了。」

魯提利歐被警察所用的槍打中了十二槍。

消息立刻傳到新近上任的羅梅洛（Oscar Romero）總主教及耶穌會省會長傑雷茲（César Jerez）那裡。第二天正逢主日，遺體停放在教堂內，並將舉行葬禮。耶穌會省會長要求三個棺木應是同一規格，表示與人民認同是魯提利歐牧靈工作的特點。

他的死亡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影響，對薩爾瓦多而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促成不久前被任命的聖薩爾瓦多總主教羅梅洛的「轉變」，日後，他也被同樣的子彈所射殺。他們刺殺他的原因是因為他從支持國會轉變為反對國會，從遠離民眾到親近民眾。在他逝世後五年，耶穌會中美大學（UCA）校長依納爵·埃拉庫里亞（Ignacio Ellacuría）於追贈他神學博士學位的典禮上說道：「這對他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須改變，他必須徹底改變。誠如他曾說過的，魯提利歐神父的血與百姓的血和在一起，確確實實喚醒了他的良知。」

「魯提利歐神父的血與百姓的血和在一起。」1989年11月16日，相同的事就發生在說這句話的人身上。

依納爵·埃拉庫里亞／阿曼多·洛佩茲／霍金·洛佩茲
依納爵·馬丁·巴魯／塞貢多·蒙特斯／若望·拉蒙·莫雷諾
(Ignacio Ellacuría, 1930-1989)／(Amando López, 1936-1989)
(Joaquín López, 1918-1989)／(Ignacio Martín Baró, 1942-1989)
(Segundo Montes, 1933-1989)／(Juan Ramón Moreno, 1933-1989)

血腥的黎明

他們共有三十六人，由耶穌會聖若瑟（Externado San José）中學的畢業生埃斯皮諾撒（José Ricardo Espinoza）中尉率領，他直接由軍事學校指揮官員納維德斯（Guillermo Benavides）上校接獲這項特殊任務，即是暗殺游擊隊的「知識領袖們」。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在我們轄區內有一所大學，埃拉庫里亞就在那裡。必須幹掉他，我不要再有目擊者。」

他們以三個同心圓散開成戰鬥隊形，實際上只有一小組人參與這次屠殺。這事件的關鍵人物是歐斯卡·阿馬亞（Oscar Amaya Grimaldi），是唯一知道如何使用AK47來福槍的人，這是國家解放陣線（FMLN）所使用的武器。他們想要製造假象，即是，這次屠殺事件是由該組織所幹的。

那是一個天空無雲、月光皎潔的夜晚。大約凌晨一點，埃斯皮諾撒下令向中美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America José Simeón Cañas）前進。當他們到達時，他們採取假想的攻擊，先丟擲一枚手榴彈，摧毀停放的車輛。在包圍了耶穌會的會院後，他們強行打開大門，進入大樓內。

暗殺者之一的薩佩德（Tomás Zarpate）出乎意料之外的發現一件事。他在走廊上走了幾公尺，聽見由一間房間內發出聲音，

藉著月光，他看見屋內有兩名婦女，她們是廚娘艾芭·羅莫斯（Elba Romos）和她的女兒西琳娜（Celina）。曼多薩（Mendoza）站在他背後，命令他守在那裡，不許任何人離開。

其餘的人大聲吼叫，要逮捕這些耶穌會士。第一位出來的便是身穿咖啡色睡袍的埃拉庫里亞神父，他說：「稍等，我來開門，不要惹出大亂子。」

他也是第一位來到屋前草地上的耶穌會士。其他四人立刻出來，他們是：阿曼多·洛佩茲、依納爵·馬丁·巴魯、塞貢多·蒙特斯及若望·拉蒙·莫雷諾。阿瓦洛斯（Avalos）命令他們臥下。

「你何時動手？」埃斯皮諾撒問他。

阿瓦洛斯知道這是處決眼前五位會士的命令，他告訴皮里桀（Pilijay）說：

「我們動手吧！」

「現在！」

皮里桀瞄準他面前的三人，他可以看到自己打中了他們的頭。阿瓦洛斯射中了靠近他的兩人的頭與身體。

「把他們放到屋內，即使你必須把他們拖進去。」埃斯皮諾撒告訴站在一旁的下士柯塔（Cota Hernández）。

柯塔只有把一具屍體拖到走廊的時間，把他放在右邊第二間臥室內，這是害羞的若望·拉蒙·莫雷諾的遺體（我曾於四〇年代在畢爾包教過他拉丁文與法文）；這裡是當時人在泰國的索布里諾（Jon Sobrino）的臥室。有一本書從書架上掉落到血泊裡，書名是：《被釘的天主》（*The Crucified God*），作者為莫特曼（Jurgen Moltmann）。

還在走廊看守兩名婦女的薩佩德聽見有人大喊說：「動手！」

接著便是一陣射擊。他槍殺了在他面前的兩名婦女。當她們不再動彈時，他確定她們已死，就快速離開。兵士們在樓下焚燒電腦、書籍和文件，他們在另一個房間內發現一大幅羅梅洛總主教的畫像，於是便對準他的心臟射擊。

斐瑞茲（Angel Pérez）下士要兵士守在樓下辦公室內，自己來到二樓走廊。那時，第六位會士，也是最年長的會士出現在走廊上，他是七十一歲、瘦弱的霍金·洛佩茲神父。他來到走廊上看見自己的同伴陳屍在草地上，此時正想要轉身回房間去，幾位在樓下的兵士對他大喊道：

「朋友，出來！」

他不理會他們的喊叫，當他要進入左邊的房間時，一名兵士開槍射中了他，斐瑞茲又開了四槍，將他擊斃。

任務完成後，指揮官下令返回。離去時，他們注意到在大門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道：「今天不上課。」他們取下來，在背面寫道：「國家解放陣營殺死了敵人的間諜。是勝利或是死亡，國家解放陣線。」然後再掛回原處。

一小時後，在撤離之前，他們佯裝曾經與游擊隊發生槍戰，而將所有剩餘的子彈射向大樓及停車場上的車子。清晨三點，他們回到軍事學校。

大學的理念

「他們是游擊隊的滋事領袖」，貝納維德斯上校將這項任務交給埃斯皮諾撒上尉時曾這樣對他說過。暗殺發生後一個月，在一台為殉難者奉獻的彌撒中，分發了一張印有耶穌會三十二屆大會宣言的卡片，上面寫道：「在今日成為耶穌的夥伴，所指為何？那便是在我們這時代重要的掙扎中，以十字架為我們的標

準，為信仰及包含在其中的正義而奮鬥。」

無疑的，這個小團體的領袖是中美大學的校長埃拉庫里亞。他是天生的領導者，「他的思想很前進，似乎很合邏輯，他的辯證具有穩固的基礎，強而有力，常使反對者無法以言語反擊，而認為自己已成為攻擊的對象。」（懷特費爾德，Whitfield）

在改變耶穌會中美洲會省的方向及創辦中美大學為一所「另類大學」的決策上，他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教學僅是複雜的多元行動中的一種；其目的是針對改善薩爾瓦多悲慘的社會狀況，「而非訓練學生從事研究，雖然兩者都兼備，但是必須教導學生解決這個國家及整個中美洲地區令人無法接受的不正義狀況。」

這是一所以改變社會為目標的大學，但是，成為一所大學，它也具有獨特的功能。當三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受到埃拉庫里亞不凡理想的吸引，突破障礙而創立人民革命陣線時，已明顯越過了線。埃拉庫里亞辯稱他們犯下嚴重錯誤，由於假定自己是政治過程中的一員，他們將被政治所吞噬而喪失自己的特性。他所持的立場是：這所大學以及耶穌會在改革的過程中，應當有能力扮演重要及基本的角色，而這種能力完全在於他們的自主性。在革命過程中使用武器完全不符合耶穌會士的身分與生活方式。

薩爾瓦多的寡頭政府執政者並不了解這兩者間的區分，而雅魯培神父的預言卻得到了應驗：「那些在社會上從事不正義工作而又常常擁有模範基督徒美名的人，會指控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及顛覆者。」

埃拉庫里亞與他的同伴被指控以他們的理念煽動游擊隊，並深深影響他們。大學遭到十六枚炸彈的攻擊，大學中的某些耶穌會士成為極右派、軍隊及當地報紙羞辱、恐嚇及指控的目標。中美大學被視為毒害青年與籌劃游擊戰的馬克思思想的巢穴。所有

電台播放的信息都是：「耶穌會士是共產黨徒，除掉他們，埃拉庫里亞是一名游擊隊，砍下他的頭來。」

和平，正義的工作

1999年1月16日，星期六，科索夫（Kosovo）國際調查組織的主任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在科索夫南部一個貧苦農村的山丘上看到一副非言語所能描述的恐怖景象。當他沿著陡峭的山谷往上爬時，他看見一具無頭屍體，然後是三具頭部中彈的老農屍體，最後是二十三具男屍。當他踩在腳下血跡斑斑的屍體間的空隙向前走時，他腦海中閃過了中美大學屠殺事件的景象，那時他是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為要證實對耶穌會士的指控，他隱瞞了安全部隊涉入屠殺事件的事實。現在，他站在山邊，面對眼前可怖的景象，他自言自語道：「我不要同樣的誣告再度發生。」

因此，他決定就在當晚，在普里什蒂納（Pristina）的辦公室舉行記者會。他以這些話作為開場白：

「我無法形容當我看到慘絕人寰的那一幕時，我內心的震撼。我不是律師，但是從我親眼所見的景象，我毫不猶疑的說那是一場屠殺，是違反人道的罪行。我也要指控政府的安全部隊無法推卸責任。」

沃克的報導激起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憤怒（1999年1月23日《華盛頓郵報》記者傑佛瑞 R. Jeffrey Smith 所發之快訊）。

十年之後，在薩爾瓦多發生的事件對全世界，尤其對美國產生重大影響。具有責任感的人士心中忿忿不平，並要求採取有效方式，澄清事實真相。令人驚訝的是，所有參與其事的人員及過

程都一一查出。

但是這並不够；必須探討引發這事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那些不正義的情況。薩爾瓦多政府與國家解放陣線及雙方調查人員共同舉行和平談判。聯合國首席談判代表所托（Alvaro Soto）在懷特費爾德（Teresa Whitfield）的著作《付出代價》（*Paying the Price*）的〈前言〉中這樣寫道：「他們繞著同一主題打轉。」

談判的目的是具有企圖心的，即是：結束武裝衝突，促進民主，保證完全尊重人權，重新整合薩爾瓦多社會。1992年1月16日在墨西哥市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簽署的和平協定，使雙方追求和平的過程達到高峰。

六位耶穌會士的被殺促成了薩爾瓦多的正義與和平。

路易斯·埃斯皮諾
(Lluís Espinal, 1932-1980)

聖者或強盜

這位來自曼雷薩（Manresa）的耶穌會士是一個爭取真相而憎恨妥協的人，他在光天化日下進行每一件事。在聖古格（San Cugat）神學院裡，假如他的同學在課堂上偷偷摸摸的看小說，他則是炫耀式的將自己的小說放在一個大書架上。他從不採取姑息手段；他曾說過他不是聖人，就是強盜。

但是，他絕不是惡霸型的人物。他聰明過人，具有理想，擅長批判，而又富有人性及藝術家的敏感。他與生俱來的詩人才華使他有能力閱讀霍普金斯的詩集，並翻譯他的部分作品。他認真的讀神學，但是卻不隨從課堂上所教導的方式來研讀；當時正逢梵二大公會議時期，拉內、施萊比克斯（Schillebeckx）、孔加爾、盧巴克諸位神學大師是當時教會中最耀眼的人物，當時也是回到聖經及初期基督徒傳統的時代。埃斯皮諾是西班牙一本類似讀者文摘的神學刊物的創辦者之一，該刊物摘錄已出版的最佳神學作品。

神學畢業後（1959-1963），他前往義大利貝加莫（Bergamo）的新聞與視聽教育學校研讀社會傳播學。這是充滿希望與辛勤工作的幾年，也為他未來的福傳工作指出方向。

1966年他開始從事電影與電視的製作。在西班牙的電視台上，他開關了一個每週一次的節目，稱之為《緊急問題》，討論那些官方媒體不談論的當前問題。節目播出極為成功，並被英國

廣播公司買去。1967年，國家審查會禁止他們播出一個有關報導巴塞隆納貧民區以及訪問一位學者兼評論家柯敏（Alfonso Carlos Comín）的節目。他於是辭去西班牙電視台的職務，甚至也未出席最佳電視節目的頒獎典禮。

正在此時，擔任玻利維亞主教團傳播委員會代表的巴塞隆納主教帕塔（Genaro Prata）邀請埃斯皮諾與他一起工作。1968年，這位詩人新聞記者前往玻利維亞，從此不曾返國。

發現玻利維亞

他於8月6日抵達，立即開始認識該國的地理與歷史，四十個種族及他們的文化，特別是原住民多元的文化：如克丘亞族（Quechua）、艾馬拉族（Aymara）、瓜拉尼族（Guaraní）、亞馬遜族（Amazonian）；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石油、天然氣、礦產，不同氣候的農作物、牲畜等。然而為何玻利維亞竟在宏都拉斯與海地之後，成為拉丁美洲第三個貧窮國家呢？他發現原因在於缺少基本設施、政治不穩定，以及少數特權階級和外國公司為既得利益而不斷剝削玻利維亞，使這國家發生無數次的政變。

1968年，當他來到這裡時，他看到的是一個軍人政府，多次政變中，有六個軍人政府，只有兩個文人政府，其結果便形成壓迫、監禁、處決、失蹤、侵犯人權、軍事掌控、凡事必經審查的時代。玻利維亞的教會開始警覺這種情況；不論教會如何游移不定，她終究是唯一能發出捍衛人權的聲音的地方。

這便是這位藝術戰鬥者必須撰寫的劇本。

沉默者的聲音

1970年，他盡快獲得玻利維亞的公民權並全力投入電影評論

與製作、電視、廣播及新聞等工作。他是 *Fides* 電台及幾家報紙的固定節目主持人及撰稿者；1979 年，他創立 *Aquí* 週刊，並擔任編輯。

他不僅是媒體的專家，也使媒體成為服務那些陷入失望及沉默的玻利維亞人民的工具。弗朗哥（Franco）獨裁統治的經驗深深烙印在他心中，他自己成熟的人格、強烈的正義感，這一切都使他成為一位自由與希望的先知。

他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將全部的生命投入為人民服務。他把自己給予大學生、青年、他的讀者、聽眾、電視觀眾、參與他的主日彌撒的純樸鄉民、他的修會團體、工作夥伴、朋友及單純的老百姓。他住在首都附近的拉巴斯（La Paz），總是敞開大門，迎接遭受迫害的人。

在班塞爾（Bánzer）的統治時代，那些被關在監獄中的犯人常收聽他大膽言論的廣播。他被官方電視台解職，因為他在節目中訪問了國家解放軍的成員。在奧萬多（Ovando）執政時代，他第一次遭到警察逮捕。另一次，內政部長私下抱怨他對法西斯主義的批評。還有一次，班塞爾的妻子在一個有關電影的座談會上，公開的斥責他。他在電台的一個評論性節目中，將樞機主教的產生（世界上最古老的參議院）與該國第一位艾馬拉族執事的晉陞作比較（「使玻利維亞教會成為更獨立自主的明確而又具決定性的第一步」），「我們希望這種基層的活力擴散到更高層」；這項言論引起了教廷駐該國大使的嚴重抗議，他隨即就被逐出廣播電台。一篇登載在天主教報紙上有關祕魯影片《黎明死亡》的解說中，埃斯皮諾明白表示，電影中的司鐸站在政府那一邊，而不站在人民這一邊，「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我們中間」，他又再度遭到撤職。

1977年12月，受到美國卡特總統的施壓，班塞爾宣布競選總統並給予政治特赦。一羣礦工的妻子發動絕食罷工，目的是想要獲得完全、無條件的特赦。埃斯皮諾為這羣參與罷工的婦女安排住在總主教公署內。罷工已擴散到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罷工人民迫使政府注意他們的訴求，這是從未見過的一種運動。結果是政府讓步並給予他們特赦。

那次罷工是埃斯皮諾生命旅程的寫照。從以專業媒體人士服務人羣開始，他就成為「沉默者的聲音，勇敢表達人民的心聲，說出別人不敢說的話。」（1979年3月29日，*Aqui* 週刊〈社論〉）不可避免的是，他的生命已日漸受到威脅。1978年他說道：「我知道我們在玩火；隨時都……」

那一天便是1980年的3月21日。

屠宰場的酷刑與死亡

那天，星期五的傍晚，如同往常一樣，身為一名電影評論家，他會在每個週末到電影院觀看兩場電影。極為諷刺的是，第二場電影的片名竟然是《無心者》（*Los desalmados*）。他總是坐同樣座位，因此，要尋找他並不困難。

散場後，他通常在黑暗中走回位於迪埃茲（Díaz Romero）街底的家。當他快要到達家門時，四名陌生男子突然跳了出來，將他拉進等在一旁的吉普車內。這時已接近午夜，一名青年聽到喊叫聲，便由窗口向外看，看見他被拖進車裡後，吉普車便急速開走。

由高梅茲（Luis Arce Gómez）上校領導的刺客將他帶到市立屠宰場。他們對他進行大約四小時的嚴刑拷打，並且身中十七槍。黎明時，一名農夫在八公里外由阿加契卡拉（Achachicala）

通往加卡塔雅（Chacaltaya）的路上的垃圾堆裡發現了他的屍體。他的身體上有多處血跡斑斑的割傷，胸部骨骼及幾根肋骨都已斷裂，胸前還有一大塊十字形的瘀傷。根據醫學報告，他一定死於清晨四時之前。

他的葬禮成為一次意料之外的羣眾示威。有八萬人伴隨他的棺木走向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一行字：「因幫助人民而遭到暗殺」。

第二天，在聖薩爾瓦多，一隻殺人的手對準正在舉行彌撒的羅梅洛主教開了一槍，當場將他擊斃。一陣強大的暴力風浪掃向所有反對不正義現象的人。

若望·鮑思高·伯尼爾

(João Bosco Burnier, 1917-1976)

在警察局遭到謀殺

當巴西聖菲利克斯 (São Félix de Arahuaia) 的卡索得利卡 (Pedro Casaldáliga) 主教與伯尼爾神父抵達伯尼托 (Ribeirão Bonito) 來參加當地的慶典時，他們發現那裡瀰漫著恐怖的氣氛。幾天前，一名獲得五年緩刑的傷天害理、罪不容誅的惡棍——菲利克斯 (Felix) 下士遭到一個名叫巴伯沙 (Jovino Barbosa) 的人殺害，因為這名下士未查明真相而將他的兒子關進監獄。無論氣氛如何緊張，他們仍然按照傳統，遊行到河邊，取河裡的水給人付洗，該鎮稱為美河岸，便是以這條河而得名的。

那是 1976 年 10 月 11 日下午六時，兩名印第安婦人在警察局遭到刑求，她們的慘叫聲傳遍整個村莊。她們是巴伯沙的姊妹瑪塔 (Margarida) 和媳婦姍塔娜 (Santana)。兩人整天罰跪，雙手高舉，沒有進食也沒有喝水，喉嚨及指甲都如被針刺一般的疼痛。警員以槍對著瑪塔審問她，並以左輪手槍抵著她的耳朵。姍塔娜遭到燒毀她丈夫裝滿稻米的倉庫的幾名士兵強暴。

卡索得利卡主教決定前往警察局為這兩名婦女求情。福傳中心的一名男孩希望與主教一同去，但是，主教擔心他的安全而未允許他同行。伯尼爾神父堅決要與主教一起去。那時，天色已漸暗，街道泥濘不堪，空氣中瀰漫著恐怖。

當他們抵達警察局時，朱瑞西 (Juraci) 下士走出來，往別處

去，但是幾分鐘後與另一位下士及兩名士兵乘坐知名的警察首長布雷辛何（Bracinho）的箱型車回來。車子就停在警察局旁邊。四名警員一字排開，帶著攻擊的眼神等候這兩位教會人士。他們兩人穿過鐵絲網，走到他們面前，主教自我介紹後並與他們握手。伯尼爾神父也照樣做了。

接著便展開雙方的對話，一方是平和的，而另一方卻是污辱、恐嚇、甚至以死亡來威脅對方。當伯尼爾神父告訴這幾名警員，他要將他們的言行報告他們的長官時，其中一名警員跳到他面前，給他重重的一記耳光。主教試著要打破眼前的緊張局面，說：

「若望，我們走吧！」

於是士兵用左輪手槍打神父的臉，並且對著他的頭開了一槍。主教彎下身察看這位受傷的同伴，叫他的名字，他還有反應。朱瑞西下士說道：

「這一槍只是要嚇嚇他而已。」

主教把他送到福傳中心的診所，但是這裡對他的傷勢卻無多少幫助。主教為他行了臨終傅油聖事，並提醒他隔天便是巴西最受人喜愛的聖母節日。神父點點頭，表示他要為印第安人，為人民獻上自己的疼痛。

晚上十點鐘後，一輛箱型車送他去搭小飛機，飛往戈亞尼亞（Goiania）。清晨五點，當他們在晨曦中已可以看見地平線時，便立刻起飛，前往目的地。然而，神經醫療中心的醫生只能確定伯尼爾神父的腦部已經失去生命機能了。

人民的反應

「假如這件事發生在我們任何一人身上……人民都習以為常

了……這是每天都發生的事。但是卻發生在一位神父身上。」

這是一般的反應。

按照慣例，一位重要人物去世後，頭七天的晚上，全村村民聚集一處為亡者祈禱。最後一天，10月18日，有許多來自其他村落的人民都來參與一台隆重的彌撒。全體滿懷欣喜的唱著第一首歌，高聲宣稱：

「我們是一羣不同的人，我們都是天主的子民。

我們在天上已有住所，我們在地上也要有棲身之處。」

當地有一種習慣是在亡者被殺的地點豎立一個十字架，於是他們組成了遊行隊伍向警察局走去，在那裡豎起一個大十字架，上面刻著以下的字：

1976年10月11日

伯尼爾神父為了捍衛自由

在此被警察暗殺

截至目前，一切都在平安與虔誠中進行，但是空氣中卻浮現一股無聲的緊張氣氛。有些聲音喊道：

「他們可能會把這十字架推倒，我們不讓步，我們要豎立另外一個。」

「十字架代表我們的自由，警察局代表迫害、酷刑、暗殺和每一種恐嚇我們的方式。」

「警察局沒有執行公義，我們最好把它毀掉。」

所有的人一起用棍子、石頭，甚至徒手開始摧毀警察局；有些人拿來了斧頭；不能靠近的人便站在一旁鼓掌並為他們加油打氣。

「這是暴力嗎？神父被殺，我們的房子被燒，那才是暴力呀！」

異類的神職人員

其實若望·鮑思高·伯尼爾神父並不是一名社會行動者。他出生貴族，並在貴族家庭中長大，個性保守，重視傳統，極端厭惡社會正義之類的議題，對第三十二屆大會文件的第四條所激起的重視社會正義的風潮，他難以適應。在那重要的一天，他能勇敢面對警官，是因為在那情況下，他的良心驅使他要捍衛正義。

然而，我們必須說，早在他擔任耶穌會羅馬總會拉丁美洲會省籌備處的祕書時（1948-1954），天主已經在準備他，他也經驗到內心極大的轉變，該會省的成立遭到很大的失敗，直到1954年至1958年才在戈亞諾—米奈拉（Goyano-Mineira）成立副會省。他曾擔任初學導師、安謝塔（Anchieta）會院的院長（1958-1965），1965年受命前往巴西的迪亞曼蒂諾（Diamantino）從事福傳工作。

在卸下行政職務後的暫時休息時期裡，他被派擔任庫亞巴（Rosario de Cuiabá）堂區及馬托格羅索（Mato Grosso）流動福傳站的助理司鐸，從1968年2月到7月，他首次前往四百二十公里外的亞馬遜叢林區展開福傳工作，9月，飛往更遠的上巴拉那定加（Alto Paranatinga），在那裡工作直到1969年10月，之後返回庫亞巴。從1970年開始，他組成了飛行福傳隊，在他獲得飛行執照後，他住在兩個印第安村莊洛普斯（Simões Lopes）和聖大拿（Santana）裡，為不同族的印第安人服務。他覺得有必要學習他們的語言，因而參加每一種有關印第安語言、文化與人種學的課程。為獎賞他在致力本地化方面的努力，他得到一個真正的印第安名字——沙賓那克（Sapinague）。

他關心一名智障的印第安男孩，並且透過自己的家人，尋求

幫助男孩的途徑。他用飛機將一名罹患急性腦膜炎的兩歲小孩和他的母親送往庫亞巴。他甚至在產房陪伴一名胎盤緊閉的孕婦生產。尼可拉斯（Nicolas）修士生病了，伯尼爾神父從凌晨一點到下午一點與另一位同伴輪流看顧他。他的豐田吉普車在第一次開了五百公里後，引擎發出奇怪的響聲，他將它運到二千二百五十公里之外的迪亞曼蒂諾去修理。

1976年2月他被提名擔任馬托格羅索北部本地福傳協會的協調人，這職務使他更有機會深入本地文化的研究，及認識協會的幕後靈魂人物卡索得利卡主教。因而能參加1976年10月4日至6日在馬托格羅索的塔瑞辛哈（Teresinha）所舉行的年度會議。在完全出於偶然的情況，他陪主教到伯尼托，面對那位開了致命一槍的警察。一位以最文雅、寧靜的態度面對粗暴強權的人；一位擁有面對權勢者仍忠實為卑微者服務的信念的貴族。

文生·卡那斯

(Vicente Cañas, 1939-1987)

被棄的獨木舟

當他在村子裡時，為了不干擾他依那也內那也（Enauenê-Nauê）式的生活而不架設無線電發射機，因此，他的朋友對他長時期的寂靜無聲早已習以為常。但是當一個月都音訊全無後，他們開始擔憂，因此決定在 1987 年 5 月中旬前去探望他。

沿著河流前行，要靠近他的小木屋時，他們看見他的獨木舟拴在岸邊，一半沉沒，但是卻裝滿貨物，似乎準備出發。他們上了岸，往上走向小木屋，他通常在那裡安靜工作，寫下他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或只是反省與祈禱，或以無線電與他的同伴聯絡。

他們發現他已經死了。一些破碎的東西散布在地上，證明某種暴力導致他的死亡：一個眼鏡片掉落在地上，一隻涼鞋已經斷裂，上顎的假牙掉在地上，腹部有四公分的傷口。他已經死亡一個月了。

悲劇一定發生在 4 月 6 日，那天，他回到小木屋來拿剩下的一些東西，然後準備離開，他意外的撞見了幾名暗殺者。

他最後一次用無線電與同伴聯絡是 4 月 5 日，告訴他們第二天他將前往依那也內那也村，這是一座原住民的村落，幾年前一羣傳教士開始與他們建立關係，他便是其中的一人。這是一處尚未與白種人接觸的地方，村民保存自己原有的文化，以捕魚和農耕為生，完全不吃肉，宗教祭典按一年四季的更替而變化。由於

這種生活型態，他們被暱稱為「叢林中的本篤會士」。

依那也內那也的朋友

文生·卡那斯修士出生於西班牙的阿爾瓦塞特（Albacete）省的阿爾布雷（Albres），自願前往傳教區，他被派到巴西馬托格羅索的迪亞曼蒂諾地區。1969年他第一次接觸印第安原住民，便深深被他們所吸引。他請求院長准許他在他們中間工作。

1974年，在詢問了幾個部落之後，他決定落腳在依那也內那也。以他具有廚師、護士、機械師、漁夫、獵人及牙醫的技術，他是幫助他們的最佳人選。他喜愛他們，與他們生活在一起，以一種新的方式從事福傳工作，完全尊重他們的文化，保護他們獨特的生活品質。他的田野調查記錄生動地描述了他對這一族人的文化與宗教那份深深的景仰與高度評價。依那也內那也族人也視他為他們的一分子，給他一個新名字奎西（Kiwxi），以此回應他對他們的愛。

從1984年開始，一些唯利是圖者，包括商人、伐木者及政客企圖占有這片土地，不斷對他們進行侵占及掠奪。強占他們的土地，使他們不再有足夠的溪流可以捕魚，他們失去唯一攝取動物蛋白質的來源，身體將漸漸消瘦。文生修士看見這種危險，因此盡量不離開那裡，不離開這些朋友。

那些搶奪者知道依那也內那也族人視文生修士為他們的保護者，只要他住在這裡一天，他們就絕不投降，因此，他們決定殺掉他。他們有方法，也容易得逞。

悄悄的，一項私人的調查與官方推託式的調查同時進行，資料顯示：發生謀殺案的當地警察代表竟然是這件殺人案的指使人之一。1993年12月，本地福傳協會向法院提出控告，但是在隔

年 5 月法院才接受此控訴；9 月進行調查，但是卻未開庭審訊，理由是：無法找到被告。

3. 置身於炎熱的非洲：
若望·德烏斯·坎德薩／斯維歐·艾維斯·莫雷拉
(João de Deus Gonçalves Kamtedza, 1930-1985)
(Silvio Alves Moreira, 1941-1985)

在黑暗籠罩之下

1985年10月29日傍晚時分，如同往常一樣，在莫三鼻克西北查波泰拉（Chapotera）福傳中心的僕人，做完一天的工作後回到半公里外的家裡。第二天早晨，他上工時卻不見那兩位傳教士，並且很驚訝的發現東西一團亂。到了31日仍不見他們的蹤影。6月19日有一位神父及一位修士、7月12日有一位神父，分別在多牧（Dómue）和姆佩哈（Mpenha）被游擊隊綁架，是否同樣的事又發生在他們身上呢？這便是基督徒開始害怕的原因。

11月1日，諸聖節，沒有神父來舉行彌撒。現在他們警覺到事態的嚴重性，便向住在三十公里之外的弗拉烏朗圭（Vla Ulóngwe）福傳地區院長瑞斯（António Pereira dos Reis）神父報告兩位傳教士失蹤的事。進入該地區需要軍方的許可與護送，因此，瑞斯神父在11月4日才抵達這裡。當他正在收集堂區的文件時，一名信徒悄悄的來到，在他耳邊說道，在三百公尺外的小樹叢中發現兩位神父的屍體。事實上，屍體已經開始腐爛，部分身體已遭野獸啃噬。兩具遺體分開約二十公尺，全身布滿彈痕及刺刀的刀痕，死狀令人慘不忍睹。

事實上，有人知道這樁殘酷的謀殺事件。由於內戰的陰影所引起的不安，很少人敢在村子裡過夜，大部分的人都躲在樹林

裡。在 10 月 29 日與 30 日的夜裡，有人從躲藏的地方聽到有車子開來，隨後便是一陣槍聲。他知道事情的過程，但是害怕遭到報復而守口如瓶。就在同時，消息已祕密地傳開了。

第一線的傳教士

坐落於太特（Tete）省安哥尼亞（Angónia）地區的查波泰拉是利菲齊（Lifidzi）傳教地區的中心，該地靠近馬拉威邊境。安哥尼亞是耶穌會在莫三鼻克福傳工作的主要地區，包含五區，其中利菲齊又是最主要的一區，因為安哥尼亞地區的基督徒團體都是從這裡產生並以她馬首是瞻。

從 1983 年 9 月起，若望·德烏斯便來到查波泰拉；慘案發生前三個月，斯維歐加入他的工作行列。德烏斯是莫三鼻克人，出生在太特省，斯維歐則是葡萄牙人。

德烏斯是一個愉快而又能與別人溝通的人，全身散發著喜悅與信心。他在葡萄牙結交了許多好朋友；他的同伴都記得他唱的故鄉歌曲，在他們中間，他激發許多人投入福傳工作。他的熱誠沒有止境，為了自己同胞的福音化與發展，他付出全部的心靈。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同胞的需要與觀念，他的同胞以愛和尊敬接受他說的每句話。莫三鼻克的前任院長李奧（Joaquim Ferreira Leão）神父（1967-1975）曾這樣寫道：「我無法想像，假如安哥尼亞沒有若望·德烏斯神父會是什麼樣子，他走遍各地，向每一個人散播信仰和希望。」

1985 年 8 月，斯維歐加入他的福傳行列，照顧利菲齊地區龐大的基督徒團體。斯維歐是一個不畏艱難、勇往直前並能當機立斷的人，具有經營頭腦又活力充沛，在內戰頻仍的莫三鼻克，他以熱誠和喜悅面對困難，冒險從事福傳工作。他將自己的優異天

賦及精神上的特長用於服務天主和莫三鼻克人民身上。

德烏斯神父去世前十五天，他描述他們兩人那具戲劇性的生活：

「你告訴我不要氣餒！當我看到這些平和的基督徒的遭遇時，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內心的感受。我很傷心難過。這種深深的難過是來自看到許多發生在眼前的暴力事件而無法制止。你無法想像在利菲齊、恩蘇拉（Nseula）、姆佩哈這些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槍殺的地方，人民都籠罩在痛苦與恐懼中。不安定所造成的後果便是貧窮與饑荒，穀倉被燒，因而使他們失去抵抗力。缺乏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常無故被人洗劫一空，並且搶劫的人還說：『你應該感謝，因為我們讓你活著。』他身上僅有的一點錢，他的外套，一小袋由磨坊帶回來的麵粉都被搶去了，還被痛打一頓後才放他走。」

傳教士是唯一對這些暴行發出抗議之聲的人，因此，必須除掉他們。他們知道自己正用生命來冒險，院長勸他們有時要避一避風險，但是他們決定留在那裡，與人民一起度過這考驗的時刻。

從死到生

加爾瓦略山的盡頭已經不遠了。弗立莫（Frelimo）族與雷納莫（Renamo）族之間的戰爭仍如火如荼地持續著，前者從 1975 年獨立戰爭後拿到政權，也曾經想要掌控教會，但現在正在對教會表達善意，希望在國家的重建上獲得教會的合作。從 1983 年起經由主教的努力，1987 年訂定特赦法，1989 年國家元首晉見教宗，同年這兩族由聖埃吉迪奧團體（Sant' Egidio Community）促成，在羅馬舉行談判，並於 1992 年 10 月 4 日簽署和平協定。

德烏斯與斯維歐兩人沒有白白犧牲。

多福·木齊赫瓦主教
(Christophe Munzehirwa, 1926-1996)

在兩次戰火之間

1994年4月，在盧安達屬於多數的胡圖（Hutu）族企圖消滅人數較少的圖西（Tutsi）族；1996年情勢逆轉，圖西族又設法消滅胡圖族。胡圖族人大批逃離自己的村莊，到鄰近的薩依，即今日的剛果避難。有一百二十萬的胡圖族人湧進薩依東部的三個教區布卡夫（Bukavu）、戈馬（Goma）、烏維拉（Uvira），其中已有二十五萬居民的布卡夫鎮便接納了三十萬難民。

1996年9月中旬布卡夫成為薩依政府軍與號稱薩依國民軍的圖西族的戰場。來自戰場的報告提到，薩依政府軍毫無軍紀，處處搶劫商店、教堂及人權機構的辦公室與住家，這是在布卡夫的最大障礙。薩依國民軍的目標是驅散難民營中的胡圖族人，因為他們宣稱在這些人中，有些人應為發生在1994年的種族屠殺負責。

9月18日，城裡出現了憤怒羣眾的遊行，其對象是圖西族人；遊行以搶劫那些早已定居在布卡夫的少數圖西族人和暴力收場。盧安達軍隊連續三天轟炸這座城市，以示報復。該城市的總主教木齊赫瓦寫了他最後一封牧函，目的是保護他的教區內的圖西族人，並敦促雙方和平與包容。「僅僅為了不同種族而攻擊一個和平的民族，真是一件愚蠢的事。讓我們對所有的人持有著歡迎的態度；不同族羣所作的不同貢獻使我們更富有。」

總主教被指控保護圖西族人，但是，他也譴責圖西族人策劃已久的攻擊行為。烏干達、盧安達與蒲隆地三國的聯合軍隊，其

先進的裝備遠超過薩依政府軍隊。

人民的捍衛者

眼見這迫在眉睫又充滿暴力的侵占行動，大部分的民間和軍事領袖都棄官而逃，總主教是唯一關心這些前途茫茫的人民的人。在他的領導下，組成約二十人的防衛隊，以保護人民的利益，不至於被搶劫與被俘擄。10月25日，他們召開首次會議，討論目前這十分危急的情況，他們決定譴責那些造成目前狀況的人，同時也向國際社會揭露他們的罪惡行為。總主教負責簽署這份文件。下次會議將於29日星期二下午二時在總主教公署召開。

27日，星期日，總主教主持彌撒，他停止彌撒中的歌唱，要大家安靜的默想。每篇讀經之後，他都提出與他們生活有關的反省重點。當時在路上開車是一件冒險的事，因為軍隊要沒收所有的車輛，而總主教卻利用一天其餘的時間拜訪城中的宗教團體，為他們打氣。他設法去見地方首長，但是卻未見到，總主教留下一張抗議字條，抗議軍隊的暴行以及不斷招募青年加入暴行。這些稱為鬥士的青少年四處走動，尋找真正的和可疑的圖西族人。在這種情形下，總主教仍然有時間寫一份報導寄給梵蒂岡電台。

28日，星期一，他乘坐由園丁兼司機巴尼（Boni）駕駛的耶穌會學校的白色校車離去。整座城市正遭到入侵軍隊迫擊砲的攻擊；他們兩人冒著流彈及薩依軍隊粗暴行為的危險在街道上行駛，薩依軍隊不但沒有保護當地人民，反而處處大肆搶劫及掠奪。

29日，星期二，戰事更激烈，尤其在城市的南端。總主教約在上午九時出門，進行慈善探訪。他擔心七位在學校避難的圖西族熙篤會修女的安危，因為她們遭到死亡的威脅。下午二時，他主持自衛隊的會議。當時的情況極為緊急，盧安達的軍隊在五公

里之外，而薩依軍隊卻肆無忌憚地處處縱火。自衛隊委託總主教拜訪新到任的軍事長官，並請求他斷然制止軍隊的暴行。

大約是下午四時，會議即將結束，這時突然響起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接著便是大砲的射擊。每一個人都驚訝無比，但是無人懷疑這是來自薩依軍隊。總主教擔心主教座堂的安危，因為一個火箭發射台已經架設在教堂前了。砲火似乎便是發自那裡。

當情勢略微平靜後，他與一名軍方的侍衛離開，希望能在阿爾法吉利（Alfajiri）的耶穌會學校過一夜。當車子到達那維爾（Nyawere）廣場時，一陣槍聲阻止他們前行。總主教走下車，司機隨後也下了車。他手中握著十字苦像，走向排列在街道右邊的士兵。他們抓住木齊赫瓦主教，將他綁在柱子上，面朝大街。司機被綁在十五公尺外的一棵樹上，侍衛走出車子時就被士兵射殺了。

第二天幾個路過的人看見總主教的遺體倒在路邊，手邊有一串白色唸珠，面容平靜，身體正面看來沒有明顯的傷痕。安放他遺體的人發現他的腦後中了一槍。他們乘坐的車子彈痕累累，車頭被拋在一百多公尺外的人行道上。

農人兼學者

木齊赫瓦主教出生在剛果與盧安達邊境的基夫（Kivu）湖邊，是當地農民之子。日後晉陞為布卡夫教區的司鐸，五年內擢升為主教；1963年，他選擇進入耶穌會，有人說，因為他要逃離主教的高帽子。

進入耶穌會後，他先複習部分已讀過的教會課程，1967-1969年於魯汶大學修社會學。他被派管理大學堂區，他度過了因陸軍強迫篩選所有大學生而引起學生極度不安的時期。出於兄弟之

情，他自願徵召入伍，由於直接與腐敗的統治階層接觸，最後這一切都成為極痛苦的經驗。

之後，他身兼院長與教師，並且為盧本巴希大學（University of Lubumbashi）社會學博士學位作準備。1978年，他被派擔任位於金威薩（Kimwenza）的聖伯鐸加理修（St. Peter Canisius）哲學院的院長，兩年後被派擔任包含薩依、盧安達及蒲隆地三國的會省的省會長。

這職位並未使他失去他特殊的農人風格，笨重的步伐及帶有諷刺意味的笑容，當時薩依的學者及政府官員設法以極盡奢華的生活影響同僚，而他卻絲毫未改變他一貫的儉樸生活方式。他度著極貧窮的生活，這使得他能親近純樸的老百姓，並贏得他們的喜愛。他保持著自己學者兼司鐸的風範，不修邊幅，使人感到困擾，以致有一次在基威特（Kikwit）的耶穌會技術學校門口，眾人列隊等候歡迎該國總統來訪時被趕出隊伍。有人說，他是耶穌會士在該國的最高權威人士。

「能夠把非洲黑人的智慧與福音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的，非他莫屬」（Matungulu）。人們給他一個「老人」或「智者」的外號，他很喜歡。

1986年，當他省會長任期滿後，他被指派為卡松果（Kasongo）的助理主教；1993年接掌布卡夫的宗座行政首長；隔年晉牧為該地的總主教。他參加於1994年4月至5月在羅馬舉行的非洲主教會議。當他返國後，他發現在1994年4月發生在盧安達的恐怖事件迫使成千上萬的人民逃離家園，他急速前往布卡夫。當他離開時，他向同伴與朋友說：「多多為我祈禱，因為我知道我正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

4. 與印度受壓迫的人在一起： 安錢尼可·多瑪斯

(Anchanikal T. Thomas, 1951-1997)

酷刑與砍頭

為了提升窮人的教育程度，多瑪斯在赫扎里巴克（Hazaribag）地區建立了教育網。受到文盲的束縛，他們不能閱讀，因而容易受欺騙，土地被掠奪，得不到合理的工資。晚上當他與鄉民聊天時，那些駭人聽聞的殘忍故事使他義憤填膺。

隨著教育而來的便是意識的覺醒與行動。在面對鄰近的高階族羣想藉不法手段獲得他們的土地的訴訟時，多瑪斯全力支持他們。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竟然勝訴，這些高階族羣中的某些人還被判入獄。對某些人這是一次勝利，但對另一些人卻是一次顏面盡失的挫敗。

之後，多瑪斯到馬尼拉進修，研讀社會學。1997年9月返回印度。10月24日，星期五的早晨，他前往在赫扎里巴克西南方約十五公里的色卡（Sirka）村。當他到達時，一羣身穿警察制服的人正在鞭打一名村民。多瑪斯上前想要一探究竟，一名看似警察的人說：

「就是這傢伙把我送進監牢。」

他被包圍，並在槍枝的戒護下被押走。

從此沒有人再看見過他了。10月27日，星期一的早晨，有人在河床上發現他曾遭受酷刑半裸的遺體，頭被砍掉。他的頭未曾被尋獲。

人們也無法找出應對他的死亡負直接責任的人。再者，神父們勸告大家不要再追究此案的原委，因為這樣將對多瑪斯曾經保護過的人造成傷害。

心繫窮人

在多瑪斯的身體裡似乎流著熱愛窮人的血液，他們常常是他特殊的朋友。

初學期滿之後，當他在孟買念心理學時，他經常陪伴窮人，尋找可能幫助他們的途徑；在普恩（Pune）讀神學期間（1978-1981），有一段時期，他與幾位同伴住在貧民區內，與最窮的人一起生活，住在狹小、沒有水的屋子裡。

由於他對窮人的偏愛，他被派到印度憲法裡歸類為最低賤族羣中去從事使徒工作。他所負的特殊使命便是設法給予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幸運的是，他找到優秀的合作者，在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工作上都有傑出的表現。

他是一位全心奉獻自己的人，充滿對基督的熱愛，這使得他對依納爵所稱的「耶穌的朋友」有一份無比的喜愛，也使他毫不妥協的徹底選擇了窮人與受壓迫者。在這方面他有強烈的信念，而使他不接受其他的觀點。1995年年底，他的上司認為有必要讓他暫時遠離這種與窮人在一起奮鬥的生活，因而送他到馬尼拉去進修，以取得社會學的學位。當他回國後，許多人注意到他有明顯的改變，他似乎比較安靜，也放鬆多了。但是他的奉獻之情毫無減退，對耶穌基督、對耶穌會、對自己所屬省區及弟兄的深愛與忠誠更是有目共睹。

他已為殉難做好了準備。

5. 置身於柬埔寨戰爭的受害者之中： 理查·弗南多 (Richard Fernando, 1970-1996)

「我的天鵝之歌」

經過幾年的血腥內戰後，共產黨執政的北越合併南越，結束了越南分裂的局面，解除壓制的後果卻產生了「船民」的現象，無數難民乘坐設備簡陋的小船逃離自己的國家。

這些不幸者的命運深深打動了總會長雅魯培神父。對他而言，耶穌會似乎有責任，也有能力為他們出些力。這種迫切的需要將要動用極大的修會與人力的資源。儘管已經有耶穌會士從事這項工作，現在卻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使這項工作組織化。

1980年11月14日，總會長神父宣布組成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JRS），其目標為：在修會內建立聯絡網，使目前已開始的難民工作有周詳的計畫與有效的協調；蒐集資料，為未來協助難民的工作開啟新機會；成為提供幫助與實際需要幫助者之間的調度中心；強化修會成員對難民服務的意識。

初步的計畫已經完成。目前，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有四百名成員，其中五十二人為耶穌會士。大部分的人都在散布於四十個國家的難民營中工作，組成五或六人的工作小組，他們中有耶穌會士，有其他男女修會會士，有年輕的男女平信徒。誠如雅魯培神父所意識到的，這種創新的工作已經燃起了青年人的慷慨之心。

耶穌會難民服務與其他國際機構合作，以當代的觀點來照顧難民，服務項目包括以下各方面：教育、心理、社會、法律、組

織、就業及牧靈。與其說他們為難民服務，或許更好說他們的目的的是視難民為兄弟姊妹，而與他們一同工作。

1980年8月6日，雅魯培神父召集首批在泰國為難民工作的核心耶穌會士，以他慣常的方式，誠懇的向他們講話。他稱讚他們所從事的是一種複雜、困難、艱苦而又創新的工作。他最後說：「我還有一件事要說，並且請切記，那就是：祈禱，多多祈禱。只靠人的努力無法解決這些困難。我想要強調的，也許正是我對耶穌會所唱的我的『天鵝之歌』。我們在開始及結束都祈禱，我們真是好基督徒！但是，在我們三天的會議中，假如我們為了要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結論，用半天的時間祈禱，我們會得到非常不同的『靈光』。即使我們的觀點各異，我們也會得到很不同的綜合，這是你們無法在書本裡或透過討論能得到的。我們目前正經歷新的使徒工作誕生前的陣痛。我以醫學的比喻結束我的談話。」

「我的天鵝之歌」，他是否知道不出兩天，他就因腦中風而病倒呢？

血的洗禮

在殘酷的赤棉政權統治（1975年），緊接的越南占領（1979年），及隨後在這兩方之間的內戰，使高棉人民遭受長期的痛苦，造成無數的戰爭受害者，其中也包含兒童。1990年，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在距離金邊（Phnom Penh）二十五公里的班達普（Bantey Prie）開設了一所技術學校與農場，教導這些青年機械、電機、農業技術及其他貿易技能。由於這所技術學校與越南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的關連，加上該校收容遭地雷炸傷的孩童，他們的悲慘故事喚醒了憐憫之心，使得它成為耶穌會難民服務中

心的最愛。

1995年5月，一位二十五歲的菲律賓籍耶穌會士，理查·弗南多加入這項服務，成為學生的朋友與指導老師。他是耶穌會團隊中最年輕的一位，天生就具有極大的個人魅力，又具有與青年建立和諧關係的非比尋常能力。他的西班牙籍院長費加里多（Kike Figaredo）說：「他把自己的圓領衫給了學生，他和學生一起吃飯，常常告訴我們學生的故事。」理查活潑的個性使他遠近馳名，他的幽默感打開了痛苦者的心胸，他對那些畏懼他的人開玩笑，這點使他深受孩童的喜愛。他來這裡八個月後，在一封寫給耶穌會同伴的信上，他寫道：「我為這些學生感謝天主，他們使我發揮了我的長處。我希望完全為他們奉獻我的生命。」

七個月之後，1996年10月17日，星期四上午九點半，他的心願達成了。

沙倫（Sarom）是學生中的一人，他的雙親死於波布政權的大屠殺中。當時他十六歲，是一名士兵，十八歲時被地雷炸傷了腿而成為殘障，現在二十四歲，個性極為奇特。他一再觸犯校規，屢次因賭博遭到被校方開除的警告。他非常氣憤，將怒氣發洩到同伴身上，他從自己袋子裡拿出一枚手榴彈，假如不是理查及時抱住他，手榴彈便會丟進教室。

「放開我，老師，我不想殺你。」他反抗著說。

似乎就在扭打的過程中，沙倫將手榴彈丟在地上，爆炸了。它炸到理查的頭及背部，兩名殘障學生也受了傷，因為理查抱住沙倫而救了許多其他學生的性命。

他的遺體被送往金邊的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第二天空運回馬尼拉。這件事在學校引起極大的震撼，他們把留在地上的血裝在一個柬埔寨的甕中，將甕放在聖堂裡。當遺體運走時，殘障學

生撐著自己的手杖，排成兩排，他們儼然一列軍隊，向戰爭英雄致敬。10月21日，他們舉行了一個感人的儀式。裝了理查血的甕被放回他被炸死的地方，在一尊象徵柬埔寨的四面雕像的周圍放了一串鮮花，這四面的意義是：慈悲、愛憐、普世性、因別人的美好而喜樂。在一個簡短的宗教儀式之後，他們將甕埋在雕像的愛憐這一面的下面，此時，大家以本地語文唱聖詩：「天主是光，天主是愛。」

沙倫被抓，被警察監禁在拘留所裡。費加里多神父與柬埔寨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的主任柯蘭（Denise Coghlan）修女去探望他，修女表示，他深切痛悔自己的罪。他已經寫信給理查的父母親，稱理查是自己的朋友，因為他曾與他一起吃飯。沙倫深受暴力文化的影響，質問生命意義何在。讀過沙倫的信後，理查的父親說，他不責怪這名青年，他們夫妻二人請求柬埔寨國王特赦沙倫。在理查的最後一封信中曾提到，雖然沙倫很「詭詐」，但是，他在他心中仍保有一席之地。

6. 與東帝汶的無辜者一同犧牲：
塔希修斯·迪萬托／卡爾·阿爾布萊希特
(Tarcisius Dewanto, 1965-1999) / (Karl Albrecht, 1929-1999)

暴力處處 如水宣洩

從 1586 年開始，東帝汶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6 年 6 月 24 日被印尼強占。聯合國與歐洲議會分別在 1982 年 11 月 23 日及 1988 年 9 月 15 日投票贊成人民自決。經過兩次的延期，最後在 1999 年 8 月 30 日舉行公民投票，其結果是壓倒性的贊成脫離印尼政府統治而獨立。

投票結果宣布後三小時，兩天內，各地就發生了暴動。首都迪黎 (Dili) 很快陷入一片火海中，處處硝煙瀰漫。有些人在逃命，有些人悄悄地搶奪商店物品，並把這些掠奪物裝在軍隊的卡車上。所有商店都被夷為平地，民眾開始移往城外，因為他們的房屋都被燒毀了。

9 月 1 日，卡爾·阿爾布萊希特神父的傳真這樣寫道：「我有機會看見下午發生的事。我要到首都南方的艾路 (Aileu)，去幫助陷入危險中的瑪利諾會修女。我遇到一隊民兵，身穿作戰服裝，頭上纏著紅白印花大手帕，手臂上掛著現代武器。在我回程的路上，我經過一個失火的村莊，村民的房屋好像一支支燃燒的火炬。僅僅在一哩之外，我遇到一隊國民兵，他們押送一羣步履蹣跚、身上背著大大小小包袱的村民，我不知道他們向何處撤退。看見眼前這一羣不知道走向何方的無家可歸的無助人民，真令我心酸。」

首都也不能倖免於暴動的襲擊；第二天，不分晝夜，暴動蔓延到每一座城鎮鄉村。教堂與修院成為這些受驚嚇的人民當然的避難所。

年輕的被選者

避難地方之一便是位於東帝汶西面的蘇伊（Suai），受驚的兒童與婦女、抱著孩子的母親與懷孕的婦人，都湧向這間古老的木造教堂，因為他們在這裡感到安全。男人則躲到樹林裡去。

9月6日，星期一，民兵排列在教堂外。教堂內約有一百人。首先走出教堂去面對難題的便是年輕的耶穌會士塔希修斯·迪萬托神父。如雨的槍彈立刻將他擊倒。

隨後便是方濟（Francisco）神父，鮮血染透了他白色的長袍。民兵在等候堂區神父希拉里歐（Hilario），當他一直未出現時，他們就走進教堂，踢開他書房的門，對他開槍射殺。

一位修女從鄰近的修院窗口目睹了下面這場屠殺經過。民兵進入擠滿難民的教堂，開始用槍掃射他們，並向擠在一起的無辜者丟擲手榴彈。當他們離去時，鮮血由門前台階流下來。

塔希修斯是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才在二十二天前，即是8月15日晉鐸，他可以說帶有爪哇腔的當地語言，他被派到蘇伊練習語言，直到12月。

他個性開朗，多才多藝。一位在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工作的日籍耶穌會士林（Hayashi Hisashi）神父常常訪問東帝汶，在塔希修斯要前往蘇伊之前，林神父與他見面。

「保重！我不想要參加你的葬禮。」林神父開玩笑的說。塔希修斯微笑著，此時，車子載著他疾駛而去。

林神父能對他開這種玩笑，因為他們是好朋友。塔希修斯常

以機車載著他到首都迪黎四處逛逛。他會彈吉他，喜歡唱日本歌。他最喜愛的一首日本歌曲是〈心之友〉，歌詞是：

我能幫助你減輕痛苦的那一刻，
勇氣自我心中湧出，
使我充滿朝氣。

他反覆練習，直到他能牢記歌詞，流暢的唱出。他喜歡與林神父一起唱歌。在他前往蘇伊的前一夜，他坐在電腦前，將一首日本歌曲以羅馬拼音打出，在練習時，又配上了音符。他準備自己能在幾天後與他的中學生一起唱這首歌。

一名住在西帝汶難民營裡的難民作證說：「迪萬托神父，在你晉鐸後兩個月，你便將自己與耶穌一起奉獻在東帝汶的祭台上。你將你三十三年的歲月獻給東帝汶的人民，他們以民族自決表現了他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並具有人性尊嚴的人民。你為天國的來臨奉獻自己的生命，因此，愛、和平與正義能在我們國家裡繁榮滋長。」

經驗豐富的長者

七十歲的卡爾·阿爾布萊希特神父，出生於德國，但具有印尼籍，1959年便來到印尼，大部分的九〇年代都在東帝汶度過，1999年初被任命為東帝汶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主任。

他與院長馬哇塔（Ageng Marwata）神父及都坡（Edward Ratu Dopo）神父一起住在迪黎的耶穌會會院裡。9月11日，星期六，他告訴他在印尼的工作夥伴蘇得加（Hendra Sutedja）神父說：「我們無法顧到每件事，但是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力做可以做的事。」幾小時後，他「干擾」了一名進入院子的不速之客。這名不請自來的外人命令他關掉他的手電筒。由於卡爾神父有點重

聽，沒有聽清楚對方的話。當他猶疑是否要關手電筒時，他便身中一槍，接著是第二槍與第三槍，其中一槍擊中卡爾神父的腹部。此時，馬哇塔神父也在會院裡，立刻將他送往醫院，但是已回天乏術。

卡爾神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當國家陷入動盪不安的時候，他是許多無辜受害者不離不棄的朋友、僕人與保護者。

他有許多英勇的故事。在他被殺之前，正是攻擊最猛烈的時候，他開車到迪黎城外一座山上，帶一位年長的澳洲籍仁慈會修女到較為安全的達爾文（Darwin）去。他路過拉哈內（Lahane）一個遭到搶劫的耶穌會會院，他停了車，走下來要阻止搶劫者放火燒房子。他以各種方式運用自己的權威保護人的性命。搶劫者曾多次到他的住處想要偷竊他寶貴的車，也是他在迪黎從事慈善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他總是拒絕向他們退讓。

他也是即將要在 12 月離開迪黎。他滿懷信心地對他的朋友也是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的夥伴林神父說：「很可能，到今年的 12 月，難民潮便會過去。我在這裡的工作也將結束，明年我可能到尤雅加達（Jagyakarta）工作。另一方面，他們在這裡蓋的耶穌會會院過於華麗，我覺得自己無法留在這裡，因為，我來這裡是要與貧窮的帝汶人民生活在一起。」

參考書目

ALCALA, Manuel and others: *Pedro Arrupe. Así lo vieron ……* (Santander, 1986) .

LAMET, Pedro Miguel: *Arrupe, una explosión en la Iglesia* (Madrid, 1994) .

ZIZOLA, Giancarlo: *La restaurazione di papa Wojtyla* (Roma-Bari, 1985) .

PADBERG, John W.: *The General Congrega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esuits, Yearbook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2000, pp.7-22) .

DIVARKAR, Parmananda: *Pedro Arrupe* (ibid., pp.28-29) .

CODINA, Víctor: *La noche oscura del P. Arrupe. Una carta autógrafa inédita* (Manresa, 62, abril-junio 1990) .

JEREZ, César: *Rutilio Grande, Mártir de la Evangelización Rural en El Salvador* (San Salvador, 1978) .

CARDENAL, Rodolfo: *Historia de una esperanza. Vida de Rutilio Grande* (San Salvador, 1985) .

WHITFIELD, Teresa: *Paying the Price. Ignacio Ellacuría and the Murdered Jesuits of El Salvador* (Philadelphia, 1994) .

DOGGETT, Martha: *Death foretold. The Jesuit Murders in El Salvador* (Washington, 1993) .

CODINA, Víctor: *Luis Espinal. Gastar la vida por los demás* (Santa Cruz · Bolivia, 1995) .

MANRESA, Ferrán: *Luis Espinal: huelga de hambre, muerte de justicia* ("Sal Terrae", December 1980, 857-870) .

MARTIALAY, Roberto: *Comunidad en sangre* (Bilbao, 1983) .

COELHO DE SOUZA, José: *O Sangue pela Justiça. Pe. João Penido Burnier, S.J.* (São Paulo, 1978) .

MORUJAO, Manuel: *Vale a pena dar a vida* (Braga, 1988) .

ALVES DE SOUSA, José Augusto: *Os Jesuítas em Moçambique 1541-1991* (Braga, 1991) .

Id: *A Igreja e a Paz em Moçambique* (Maputo, 1995) .

基督的僕人 IV

IRAZABAL, Juan A.: *In Memoriam: Mons. Christophe Munzehirwa, S.J., arzobispo de Bukavu. El pastor dio la vida por sus ovejas* (Mensajero, December 1996, pp.18-20) .

FARHI, Benjamin and others: *In memoriam: Monseigneur Christophe Munzehirwa, S.J., Archevêque de Bukavu, Serviteur et Témoin* (Kinshasha, 1996) .

MATUNGULU OTENE, Marcel: *Mzee Munzehirwa, S.J., Homme de foi assoiffé de justice et de paix* (Rome, 1999) .

CRONIN, Kevin: *Fr. Anchanikal T. Thomas, S.J.* (Private communication) .

GREENAWAY, John: *Remembering our Brother Richie* ("Servir", Jesuit Refugee Service bulletin, February 1998, p.8) .

STRUCK, Dough: *Death Invades a Church* (Washington Post Service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 Sept. 1999) .

HISASHI, Hayashi: *Two Indonesian Jesuits Offer Their Lives For "Timor Loro Sa'e (Rising Sun)"* (Social and Pastoral Bulletin, Jesuit Social Center, Tokyo, Oct.25, 1999) .

Dispatches from JRS Cambodia to JRS Rom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基督的僕人：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 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著；楊黎芳、尤淑雅、張佩英、譚璧輝譯。--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9.02〔民97〕面；公分
第1冊：spring 1529-1581；第2冊：summer1581-1687；第3冊：autumn-winter1687-1773-1814；第4冊：Second Spring 1814-1999
譯自：Passion and Glory: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I ,II ,III,IV

ISBN 978-957-546-556-8 (第1冊：平裝)

ISBN 978-957-546-573-5 (第2冊：平裝)

ISBN 978-957-546-591-9 (第3冊：平裝)

ISBN 978-957-546-640-4 (第4冊：平裝)

1. 耶穌會-歷史

248.85

97025630

基督的僕人IV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2009年2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譯者：譚璧輝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中文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380元

光啓書號 209026-4

ISBN 978-957-546-640-4



這一幅長達四、五百年的耶穌會巨畫，終於開展至最後一段卷軸；解除禁令後的耶穌會，面臨的是一個更加多變的世局，前方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反倒處處充滿著嚴苛的考驗；一面背負著古老耶穌會的傳統，一面面對著更複雜的環境，從政治、社會、文化、人性各方面考驗著耶穌會士。

一個又一個的會士用他們的生命，追隨幾百年前會祖的信念，並接力扛起無可推卸的福傳使命，毫不猶豫地行向四面八方，在世界各個角落燃燒自己，他們的生命力，使得耶穌會的第二春，雖然荊棘密布卻依然奮力勃發。無論耶穌會的未來將如何譜寫，他們都已經留下了屬於自己的印記，也為耶穌會畫下了璀璨的瞬間，閃亮而動人。

《基督的僕人》是一套用耶穌會士的血淚寫就的歷史，暫時以第四冊的本書劃下了休止符，但未來漫漫，我們相信仍有為數可期的後繼者，繼續創造屬於他們的歷史篇章。

